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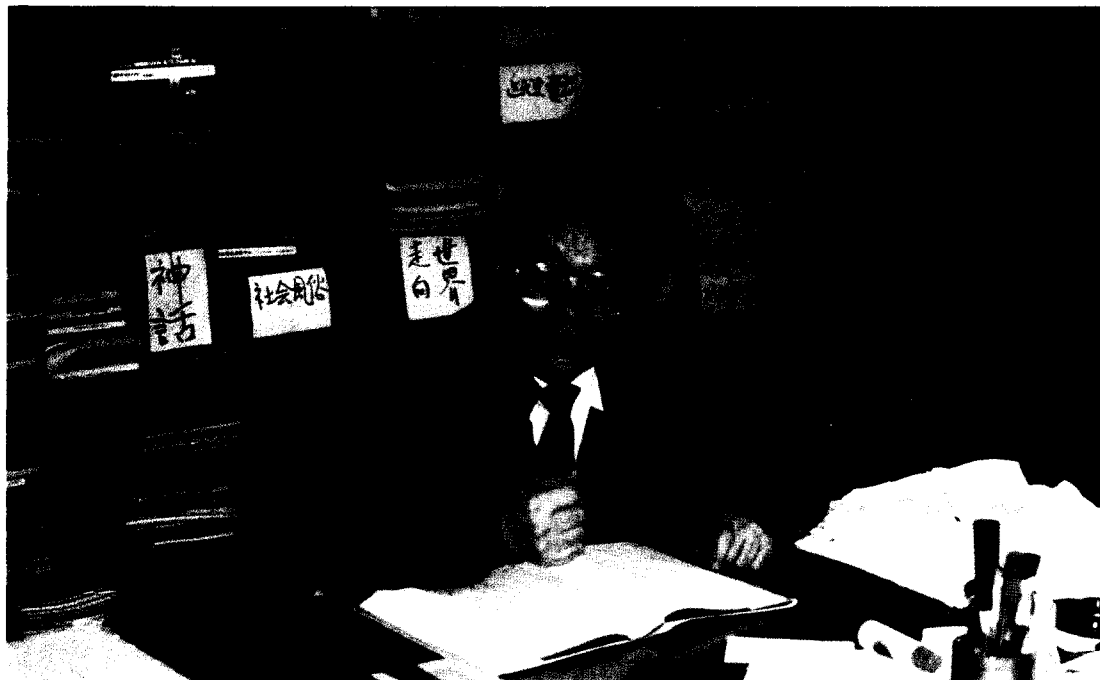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出版

◎ 第 25 期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初創時追隨郭廷以所長的 Founding Member 之一，王爾敏先生。（錢思亮前院長贈語）



▲ 1997 年 12 月 4 日王爾敏先生榮退講演。

學術會議 嚴復研究的新趨向：

- 記近年來三次有關嚴復的研討會黃克武 1
第四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黃自進 19
中國現代教育家雷沛鴻教育思想討論會綜述曹天忠 26
第二屆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會議紀要范春源 30
會議消息藍旭男輯 37
-

學術演講 師友風誼，道術因緣——退休講演王爾敏 40

研究與教學 教學與研究生涯四十年孫廣德 57

學人簡介 博古通今，闡幽發微——

- 王爾敏先生的學術志業劉德美 67
明晰論斷、發微知漸：孫廣德先生朱浚源 87
狹間直樹先生石川禎浩撰·黃自進譯 103
巴斯蒂(Prof.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許文堂 120
-

研究概況 牛津大學的中國研究曾銳生 130

史料介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 中英庚款會檔案簡介周琇環 143
西班牙外交部總檔案館
及其所藏有關中國史料簡介李毓中 155
-

新書評介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Reform*

- in Late Qing China* by Joan Judge張朋園 170

2014

張啓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呂秋文 172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1911-1929》.....李國祁 180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7.2-1998.3).....公小穎輯 193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編輯委員 呂芳上 陳三井 魏秀梅

朱泐源 張啓雄 胡國台

黃自進 翟志成 許文堂

張秋雯

執行編輯 朱泐源

助理編輯 藍旭男 公小穎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 25 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電話：27824166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文芳印刷事務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台幣 100 元



嚴復研究的新趨向： 記近年來三次有關嚴復的研討會

黃克武*

一、前言

嚴復(1854-1921)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歷史人物，長久以來嚴復的生平與思想就是一個受人關注的課題，然而以往多為學者的個人興趣，近年來中國大陸則出現了三次以嚴復為主題的研討會。¹最早的一次是「93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1993.11.8-9)，其次是「紀念嚴復誕辰140周年學術研討會」(1994.1.6-8)，最近舉辦的則是「97年嚴復與中國近代化研討會」(1997.12.1-3)。²這些會議都是由福建地區對嚴復有興趣的人們，尤其是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福州市嚴復研究會，與嚴氏宗親所推動，海內外學者共同參與，地點在嚴復的故鄉福州。³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1996年5月台灣的政治大學文學院也曾舉辦一次有關嚴復的研討會，並出版了論文集，見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主編，《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嚴復》(台北：政大文學院，1996)。然而在台灣對嚴復有興趣的人並不多，與大陸的盛況形成強烈的對比。

² 這三次會議的論文目錄請參見本文附錄。第一次會議出版的論文集是：福建省嚴復研究會編，《93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第二次會議論文集則是於1994年7月由福州市紀念嚴復誕辰140周年活動籌備組編，《嚴復誕辰140周年紀念活動專輯》(為內部使用書籍，但是在福州林則徐紀念館買得到)，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兩者所收的文章略有重複。97年的會議正在出版論文集，因為該會沒有印製論文目錄，筆者所收到的論文又有缺，因此該目錄並不完備，如四川大學歷史系謝放教授有關嚴復教育理念的文章就漏掉了，謹致歉意。

³ 福州市嚴復研究會成立於1991年，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則是1996年1月正式成立。見〈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籌備經過情況報告〉，《嚴復研究》，簡報第1期(1996.3.31)，版3。

這一轉折不是偶然的，而是與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有密切的關係。首先福建地區經濟上的繁榮使地方上有能力召開大型的會議；而伴隨著經濟發展而萌生的區域文化的想像，則使地方上一些以往被人遺忘或被人貶抑的歷史人物，重現於現實舞台，走進人們記憶的世界。嚴復這一位福州的才子，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展現新的面貌。福州地區除了舉辦三次研討會之外，近年來還在台江建了一座「天演公園」，在鼓山下立了嚴復塑像，為學生們舉辦「天演之路夏令營」，播放了一個敘述嚴復一生的廣播劇，出版了一本為年輕人寫的少年嚴復傳，也修整與嚴復相關的古蹟、文物，並開闢一間「嚴復陳列室」等。⁴

嚴復能以上述的方式為人們所回憶，或許不是他生前所能預知的。大約自辛亥革命以後，嚴復所堅持的政治上漸進改革的路線、文化上肯定傳統與會通中西的主張，得不到革命黨人與五四新青年的認同。隨著近代以來人們在思想與行動上的「激進化」、烏托邦主義的興起，與「革命中心史觀」的建立，⁵嚴復的歷史定位簡單地說是：早期宣傳維新、啟蒙、愛國，在打倒「封建」、專制之上有功，晚年思想倒退，支持袁氏帝制與張勳復辟，主張尊孔、讀經，回復到「封建主義」的懷抱。近年來嚴復研究的主軸就是修正這一觀點，企圖展現嚴復思想中連續性的一面，並給予他更多正面的評估。

就一個更廣的歷史背景來說，我認為近年來的「嚴復現象」是大陸上「告別革命」之歷史動向的一部份。在一篇文章之中我曾指出：從毛澤東

⁴ 這些活動是我在福州開會時的見聞。有關西方對紀念與歷史記憶、國家認同的研究請參見 John R.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⁵ 余英時認為自清末以來，一部中國思想史是一個不斷激化的過程，思想又落實到行動層面，所以知識分子的思想每激化一步，他們的改造方案也跟著更徹底一步，至共產主義運動而登峰造極。Ying-shih Yu,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edalus* 122:2 (1993), pp. 125-150. 張灝曾指出在 1895-1925 之間，中國知識分子受傳統的「未來意識」與西方歷史目的論的影響，有烏托邦主義的出現，而「國家主義與道德世界主義兩者都是構成救世烏托邦主義的重要因素」，他認為此期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是共產主義的淵源之一，見張灝，〈再論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起源〉，收入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頁 55-62。有關「革命中心史觀」請參見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6-9。

的轉化政策到鄧小平「摸著石子過河」的調適取向是了解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一書時所不能忽略的社會背景；⁶而隨著告別革命而出現的「新權威主義」、「國學熱」、「文化熱」也與百年前嚴復所提倡的開明專制、強人政治與肯定傳統、會通中西的主張若合符節，難怪嚴復受人注意。簡言之，因為要告別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革命」，所以支持「改革」的嚴復才有機會走入人們記憶的世界，變成超越時代的先知先覺。

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會長鄭重在「97年嚴復與中國近代化研討會」的開幕詞的一些話多多少少反映了這樣的一個新視角：

嚴復經濟理論的核心是經濟自由主義……嚴復的經濟學思想，不僅為落後國家發展經濟提供了理論指導，在許多具體的經濟政策策略上，諸如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外資，中外合資，農工商並重，發展近代化規模農業生產，聯營，控股等等一系列近代化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上，都有精闢的見解。嚴復揭示了經濟建設的共同規律……當我們為發展現代化社會主義經濟重新認真研究經濟學時，一向被認為「不合時宜」的嚴復，他的許多理論卻是那樣適合百年後的今天的時宜，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驚嘆和高度的重視。

嚴氏宗親嚴以振在94年會議上的發言，也可以看出在經濟層面之外，嚴復精神與未來中國理想圖像之間的關聯：

今天我們紀念先祖嚴復就是要繼承和發揚先祖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就是要學習他革創開關，發展科學、技術教育的偉大精神；就是要發揚他的宏圖大略，建設國家造福人民的精神……紀念他，就是為了更好地激勵我們前進，早日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早日實現祖國的富強、民主和文明。⁷

當然，歷史研究除了受現實環境影響之外，也參雜許多其他的因素。無論如何，在現實關懷、先人崇拜與純知識等因素的牽引下，嚴復作為一

⁶ 黃克武，〈論李澤厚思想的新動向：兼談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討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5(1996)，頁457。

⁷ 收入《嚴復誕辰140周年紀念活動專輯》，頁21-2。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關「和平統一」的觀點，為何嚴復研究與統一有關係呢？我認為因為嚴復的後人定居海峽兩岸，嚴復孫女嚴倬雲與嚴倬雲又分別嫁給了台灣名人辜振甫與葉明勳；再加上研討會有台灣學者參加，因而透過嚴復研究培養共識，以「建設統一富強的現代化的中國」成為研討會開幕、閉幕時常見的口號。

個思想資源，被重新動員起來，使他以一個新的面貌走進人們記憶的世界。人們所重建的嚴復新塑像到底有何特點？這是一個非常有趣而需要作深入研究的課題。筆者有幸參加 97 年的會議，也透過論文集的閱讀，對前兩次的會議有所了解。本文的主旨即是以個人所見，介紹這三次嚴復研討會的重要議題，以一窺近年來嚴復研究的趨向，並希望對以上所揭示的「嚴復現象」有更多的認識。

二、研討會的主要議題

我認為這三次會議觸及了以下幾個主要的議題：（一）史料收集；（二）嚴復生平的探討；（三）嚴復翻譯之研究；（四）嚴復思想之剖析與評估。以下分別敘述。

（一）史料收集

過去對嚴復的研究主要是依靠王栻等人所編的《嚴復集》，⁸以及一些零碎的資料，⁹然而《嚴復集》並不完備，其他的資料則散布各地，因此史料收集與全集編訂成爲嚴復研究的當務之急。在這些會議之中有些學者發表了一些嚴復的軼文。例如嚴揚揭露了嚴復寫給上海中西女塾校長 Ms. Helen L. Richardson 的一封英文信，鄧華祥與蕭忠生找到嚴復在 1894 年給陳寶琛的一封信，官桂銓也收集了一些短文（〈伯父恭詒公墓碣銘〉、〈廬山寺碑題跋〉、1915 年〈與三子叔夏書〉）。此外對這個工作用力頗勤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馬勇，據稱他從遼寧、南京等地收集數十萬字的新史料，其中有些是嚴復寫給他的學生熊季廉的信，有些則與開平礦權的談判有關，最近將由台灣的聯經出版社出版。

嚴復到底還有多少軼文？這是一個不易解答的題目，我認爲其中特別

⁸ 嚴復著，王栻編，《嚴復集》（上海：中華書局，1986）。

⁹ 如嚴復與莫理循的通信，收入 Hui-min Lo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52-657；中譯節本見劉桂梁等譯，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頁 781-786。又如〈《馬氏文通要例啓蒙》序〉，見王憲明，〈介紹嚴復爲《馬氏文通要例啓蒙》所做的序〉，《清華大學學報》，1996:2。

缺乏的是嚴氏英文的作品，本所通訊會刊有一篇，¹⁰但可能還有不少。再者，嚴復在一些報刊上的作品、師友間的通信、任職天津水師學堂的二十餘年間之資料等，也值得仔細收羅。我們期盼福建的學者能辦一個定期的《嚴復研究通訊》，來徵集嚴復的作品，或許幾年之後可以出版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嚴復全集》。

(二)嚴復生平的探討

嚴復生平的資料在王蘊常的《嚴幾道年譜》已有概略的敘述，¹¹然而此書並不理想，還有許多地方有待補白，因此學界亟需一本新的《嚴復年譜長編》。據稱南京大學的孫應祥先生已撰有一稿，可惜並未出版；另外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也曾規劃申報《嚴復年譜新編》作為科研課題，然而也尚未完成。

在這三次會議之中有關嚴復生平的文章甚多，有文章談嚴復的世系、早年、在英國的情況、家庭生活；嚴復與他的朋友陳寶琛、方伯謙、吳汝綸、伍光建；嚴復與安慶高等學堂及北大；嚴復與海軍；嚴復與《國聞報》等。也有人抓緊嚴復與重大歷史事件的關連，探討他與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或籌安會的關係，以及他對毛澤東的影響。

其中我覺得較有意思的一篇是王植倫的〈嚴復心湖初探〉一文，他依靠《嚴復集》的「書信卷」部分，來考察嚴復的私人生活與情感，包括嚴復與元配夫人、如夫人與第三夫人之情；嚴復對子女事業、兒女婚姻、學業之情；嚴復對自身疾病、鴉片癮與窮困之嘆；嚴復對親屬晚輩之愛等。此文使嚴復的身影、思緒躍然紙上，有興趣的讀者不宜錯過。然而嚴復的私生活與他的公生活（如仕途、啓蒙工作等）之關係，作者並未處理，仍有待後人釐清。再者，嚴復與皖系軍人之間的關係也值得挖掘。

(三)嚴復翻譯之研究

翻譯是嚴復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課題，在這方面研討會的文章有林慶元、陳允樹、謝天冰、黃順力、范啓龍等人有關《天演論》歷史地位與影響的文章；俞政有關《法意》案語的評析；林其泉與俞政對《原富》的

¹⁰ Yen Fuh,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1(1991)，頁234-239。

¹¹ 王蘊常，《嚴幾道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翻譯與社會反映的分析；日本學者緒形康對嚴復導入資本主義體系之特點的簡短文章；¹²以及林秋云、蘇東福泛談他的「社會譯著」。

此外拙文：〈嚴復的翻譯：近百年來中西學者的評論〉則是對嚴復翻譯工作的整體分析。在該文中我談到嚴譯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事，在他之前國人所譯的西書或是經由中西合作，或是轉譯自日文，往往「紙謬層出，開卷即見」，結果「讀譯書者，非讀西書，乃讀中土所以意自撰之書而已」。¹³嚴譯西書的數量雖然不多，只有八、九種，但皆為經典作品，文字又雅馴，出版之後甚獲好評。

然而嚴復的譯作除了廣受好評之外，也引起了不少的討論。近百年來學者們對嚴譯的討論延續不斷，形成一個複雜的評論傳統，不但包括人們對嚴譯的評論，也包括了對於評論的再評論。這些批評主要是環繞著嚴復所說的「信雅達」三原則。開始的階段學者們多半同意嚴譯合乎雅與信的標準，而集中於批評達的方面，尤其是雅與達的關係。

逐漸地也有學者注意到信的問題，評論嚴譯是否忠於原書，而如果不忠於原書的話，為什麼。許多人指出嚴譯與原書之間的各種差距；有些人並從富強的關懷對翻譯所產生的影響來解釋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對於上述批評嚴譯不忠於原著的看法，部分學者不表贊同，認為嚴譯完全合於信的標準，或者認為嚴復並沒有因為富強而忽略西方自由主義對於個人價值的肯定。另一種對信的批評則從政治領域轉移到文化背景的問題，認為因為嚴復思想與固有文化的連續性，使他的譯文受到扭曲。

從拙文對於嚴譯是否合於「信」的各種討論，我們發現有關嚴復的翻譯還有許多工作值得做，但是這幾次的研討會卻鮮少觸及。我曾將《群己權界論》與 *On Liberty* 對照，從事文本對比，因而發現嚴復自由思想與彌爾自由主義之間的差距。¹⁴王克非的書則是將嚴復對《天演論》與《群己權界論》的翻譯和日人加藤弘之與中村正直對西方進化論與自由思想的引介與翻譯做一對比。¹⁵另一個類似的研究是台灣清華大學經濟系的賴建誠

¹² 緒形氏為日本研究嚴復翻譯的一位重要學者，然而此文實際上只是一個兩頁的大綱，雖然有一些有趣的想法，但出版這樣的東西顯然是過於草率，不足為法。

¹³ 嚴復，〈論譯才之難〉(1898)，《嚴復集》，頁91。

¹⁴ 黃克武，〈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以嚴譯《群己權界論》為中心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4，上冊(1995)，頁81-148。

¹⁵ 王克非，《中日近代對西方哲學思想的攝取：嚴復與日本啟蒙學者》(北京：中國社會科

對嚴譯《原富》的分析，他不但仔細探討該書案語，並嘗試了解嚴復是否忠實地翻譯了斯密：以私利作為經濟活動起點的主張、「看不見的手定理」與「鑽石與水的矛盾」等觀念。¹⁶總之，從文本對比來重建嚴復翻譯的過程，探討他對西方思想的認識、誤會、詮釋與批判等，是嚴復研究的一個新趨向，在這方面如嚴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彌爾的《穆勒名學》、孟德斯鳩的《法意》、甄克思的《社會通詮》等仍有待學者從事研究。

(四)嚴復思想之剖析與評估

在三次會議中有關嚴復思想的文章非常多，或是探討政治、經濟、教育、宗教、文學、史學等面向，或是更廣地來分析嚴復對文化創造與現代化路徑的思考；也有人針對嚴復思想的變遷，討論嚴復早、晚期之間有無重大改變；並由此而對嚴復做出新的評估。

要整理出這些文章的論點並不容易，在此僅能點出一些比較顯著的變化。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學界對嚴復思想的研究，以便對這三次會議的特色有更清楚的認識。我認為整體來說學界對嚴復思想的研究有三個焦點與八個立場。¹⁷

第一個焦點環繞著中國知識分子非常熱衷的「革命」的議題，探討嚴復思想與革命的關係。有些學者如王棊、周振甫、李澤厚與熊月之等，相信嚴復早年了解並宣揚彌爾式自由民主思想，促成打倒「封建」、「專制」的變革，但在晚年變得越來越保守，很愚昧地反對進步的革命主張。¹⁸另一些學者如蕭公權與歐陽哲生，同樣地認為嚴復了解彌爾思想，但他們卻以為嚴復明智地反對革命理念之中激烈的傾向。¹⁹

學出版社，1996）。

¹⁶ 賴建誠，〈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漢學研究》，7:2(1989)，頁303-340。

此外作者正將此研究擴大為一本專書。

¹⁷ 以下的分析是引自即將出版的拙著，《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¹⁸ 周振甫，《嚴復思想述評》（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 [1936]）；王棊，《嚴復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957]）；李澤厚，〈論嚴復〉，《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282-284；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242-251。

¹⁹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860。歐陽哲生，《嚴復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頁169。

第二個焦點則集中於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課題，例如史華慈與林載爵，他們既不批判也不肯定嚴復反對激進的觀點，反而著眼於嚴復思想中的國家主義，認為因為嚴復主要的關懷是追求國家富強，因而強調群體、忽略個人，導致後來集體主義的出現。

第三個焦點是歐陽哲生所觸及的嚴復思想與傳統之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問題，注意到嚴復在哪種程度內受到傳統理念與思維模式的影響，又在哪種程度發現西方的新價值，而他又如何調和中西之差距。²⁰

從以上的三個角度出發，學者們對嚴復思想的解釋頗為複雜，大致而言有以下八個立場，有人秉持其中之一，有人結合其中數項。

1.嚴復（至少在早年）了解並肯定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與進化觀念等西方啓蒙運動以來的新思潮。2.史華慈等人反對以上的看法，認為嚴復（無論是早期還是晚期都）把國家富強的重要性置於個人自由之上，所以他不了解西方自由主義中的核心觀念。²¹3.認為嚴復在晚年隨著對西方文化的失望，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逐漸變得保守，有些學者並認為此時嚴復放棄了早期所肯定的自由主義。²²4.有些人反對上述的看法，認為嚴復並沒有一個從激進到保守的變遷，而是針對不同的情境而有前後一致的看法，他的一致之處或是關懷救亡，或是主張漸進調適的進步原則。如蕭公權說嚴復在時代保守之時顯得激進，在時代激進之時則顯得保守，這樣一來發生激烈變化的是時代，而非嚴復。²³5.有些學者強調西方思想（至少在早期）對嚴復的重要影響。6.另外一些人則認為中西思想在嚴復的腦海之

²⁰ 歐陽哲生，《嚴復評傳》。

²¹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64]).

²² 周振甫與王弼認為嚴復早年為激進的西化論者，支持自由民主思想與憲政改革；戊戌變法之後，則逐漸「退步」，從主張中西折衷，再變而為「反本復古」，最後成了一個「落後的保守的」、「頑固反動的」人物（王弼語）；周振甫更以嚴復在〈民約平議〉一文對盧騷思想的駁斥，說明嚴復在肯定傳統的同時，對西方自由、平等學說是抱持著否定的態度。周振甫，《嚴復思想述評》；王弼，《嚴復傳》。熊月之則說「辛亥革命以後，他在政治上日益墮落，思想上日益倒退」，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頁250。

²³ 蕭公權認為嚴復一生秉持漸進求變的基本原則，他從激進轉為保守，主要是針對時代變遷而有的不同策略。當時代保守而不及於漸「變」之時，他的議論「偏於激進」；當時代激進而超過「漸」變的程度之時，他則傾向守舊。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860。蕭氏的學生汪榮祖繼承了此一看法，見氏著，《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25。

中並非互相排斥，而是「交融互釋」，或者說他是以西方新的工具來開發傳統舊的礦藏。²⁴ 7.有些學者認為嚴復因為反對「進步的」「革命」主張，或是由於他重視群體的思想傾向，導致後來的集體主義，因而是錯誤的。²⁵ 8.另一些人不同意以上的論斷，認為他的思想具有價值而充滿了智慧。²⁶

這三次研討會之中以上的八點立場都有，因而形成一個相互辯駁的場面。換言之，以往對嚴復的看法仍然存在。但是我們也隱約地看到在部分學者之中浮現出一個新的共識，尤其表現在有較多的人支持上面的第四、第六與第八等三個立場。他們認為嚴復一生思想表現出中西的會通，因此前後期並沒有一個從激進到保守的變遷，有些人並從這樣的思想特色之中肯定嚴復的貢獻。以下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一新論述的出現。

馬勇所撰寫的〈嚴復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和他在 92 年所寫的〈嚴復晚年思想演變之重估〉等文即充分表現上述的觀點。²⁷他反對「使歷史只成為勝利者的陳述」，而希望站在人類發展的整體趨勢與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轉變以往對嚴復的看法：

嚴復晚年……一方面依然主張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又較為深刻地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內在弱點，期望中國在吸收、引進西方文化的部分積極因素之後，批判地承繼中國人過去賴以安身立命的終極根據，重建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意義結構與自我意識，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發掘其現代意義。

嚴復在辛亥革命之後直至去世前的一系列政治選擇既不是盲目的，更不是故意與時代思潮主流立異，而是他基於理性思考的必然反映。²⁸

²⁴ 如歐陽哲生認為「在嚴復的思想世界裏，本來就沒有『近代西方』與『傳統中國』分野」，他認為嚴復對傳統雖有批判，但並無離異；對近代西方文化雖曾大力宣傳，卻一直是選擇性地接受；換言之，「西學和中學，在嚴復頭腦中，始終是在不斷地『交融互釋』著」。他又認為嚴復在 1917 年寫給熊純如的信中說「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書五經，故〔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提供我們了解嚴復思想的重要線索。歐陽哲生，《嚴復評傳》，頁 148、170。

²⁵ 周振甫、王棊與李澤厚等人有此一評估。

²⁶ 蕭公權、歐陽哲生很肯定嚴復的觀點。

²⁷ 馬勇，〈嚴復晚年思想演變之重估〉，《哲學研究》1992:4。

²⁸ 《93 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6、42。

蕭功秦的〈嚴復對中國現代化的思考及其啓示〉一文是從近代以來激進主義與漸進主義之對立，來突顯以嚴復爲代表的「近代漸進主義的現代化思路」，他認爲這一條思路可以概括如下：

他們主張以開明專制爲推動中國近代化的權威槓桿，以傳統文化價值符號爲現代化的中介，透過內源的現代化素質的發育成熟，並使之與相應的新制度相協調，形成內源爲主的發展機制，這樣就可以避免「單項引進」與「全項引進」的兩難矛盾，逐步地、穩健地實現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的傳統社會機體向以商品經濟爲基礎的近代文明有機體的歷史轉變。漸進主義在批判激進主義與國粹主義過程中，在深入認識中國現代化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鉅性的基礎上，爲後人留下了一筆值得重視的思想財富。²⁹

曾參加 97 年會議的李承貴，在他的新書《中西文化之會通》一書也有類似的看法，他以嚴復所說的「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來說明嚴復思想的特色，並肯定嚴復在會通中西文化之上的努力：

在中西文化知識修養方面得天獨厚的嚴復，他對中西文化進行了具體而廣泛的比較與溝通，並進行了中西文化結合的嘗試。在嚴復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的實踐中，我們既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得到繼承，也看到中國傳統文化新的發展方向。嚴復的文化思想無疑代表了 19 世紀末中西文化融合的最高水平。³⁰

此外北京清華大學的劉桂生與王憲明教授所正在編輯的一本收集了兩岸三地學者有關嚴復思想論文的書《嚴復新論集》以及拙作《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也都配合以上的觀點。

總之，在上述的著作之中我們看到嚴復思想的變遷不再被描寫成從激進到保守或西化到傳統的一個自我否定的過程；在評估方面他在政治上緩進主張被認爲是穩健的、理性的與智慧的，他在文化上肯定傳統與會通中西的取向，也得到人們的讚許。我認爲這一個新的論述的主旨在批判二十世紀中國主流思潮，包括上文談到的激進化、烏托邦主義、革命中心史觀，

²⁹ 《93 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51。值得注意的是蕭功秦是近年力倡「新權威主義」的一個重要人物，見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台北：唐山出版社，1991）。

³⁰ 李承貴，《中西文化之會通：嚴復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思想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五四反傳統思潮，因而肯定改革，也肯定傳統。這一個新的論述在批判舊說之時雖然也有可能矯枉過正，然而在新、舊論述競賽之下，我們看到學者們正嘗試以更細膩的學術工作與更宏觀的視野，來展現嚴復思想的複雜面貌。

三、結語：如何深化嚴復研究？

據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告知該會有八十多個成員，此外福建師大的林平漢教授也告訴我：該校正開始籌辦嚴復研究所，招收碩士班學生，這樣一來福建地區無疑地已經成為嚴復研究的一個重心。我認為這三次研討會為嚴復研究開拓出一個嶄新的視野，然而如何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深化嚴復的研究呢？在此我願意談談個人的想法。

1.在基礎工作方面：應儘速編寫《嚴復年譜長編》、出版《嚴復全集》。並設法將嚴復學術研究會逐漸擴大為一個包括國內、外成員的組織，網羅各地對嚴復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參加。其中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法就是出版嚴復研究通訊，收集軼文、交換資訊、聯絡情感。

2.在召開會議方面：97年會議的招待非常周到，然而還有一些缺點，例如議題過於零散、沒有印製詳細的議程與論文目錄、無法在會前仔細閱讀論文、討論時間不足等。這些雖是大陸學術會議的通病，無可厚非，然而將來如能參考歐美學界的做法，特別是舉辦一些小而精緻的會，使與會學者有充分的交流與討論，將可更有效地提昇學術會議的品質。

3.學術成果的累積與創新：這幾次的會議論文雖不乏佳作，但是也有不少作品了無新意。其中原因甚為複雜，但我認為這主要涉及中國學界不夠重視成果之累積與方法、議題之開創。嚴復研究是一個範圍明確的領域，在領域之內的各個主題都已經有一些成果，因此要突破以往的成就，一定要針對已有的論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眺望，這樣才能避免人云亦云或炒冷飯。再者，方法與議題的開創也可以促成學術研究的進展，從近年來的研究趨向可見，嚴復譯文與原文的對照是一個值得嘗試的路，然而這樣的工作有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語文程度，一是專業了解。換言之，研究者必須要對嚴復所翻譯的典籍有深入的認識，也對英文與嚴復所運用的典雅的文言文（尤其是各種典故）有充分的掌握，才能深入了解嚴復翻譯的過程與思想特色。這樣的條件並不容易在一個人身上具備，因此一個

可行的方法是中外學者的合作或歷史學與其他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與邏輯學等）之間的整合，共同從事研究，這樣或許比較容易做出一些新意。

嚴復研究的熱烈展開是一個令人欣慰之事，我們希望各地對嚴復研究有興趣的學者能與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聯絡，³¹共同推展此一工作，也期待將來看到更為豐碩的研究成果。

附錄一：《93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論文目錄

1. 習近平，〈序〉
2. 嚴停雲，〈吾祖嚴復的一生〉
3. 馬勇，〈嚴復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4. 陳端坤，〈嚴復的故鄉、出生地、少年時代〉
5. 手代木有兒（日本），〈嚴復在英國(1877-1879)——對於西方民眾存在方式的探討〉
6. 范啓龍，〈學貫中西的近代啓蒙思想家嚴復〉
7. 蕭忠生，〈試論嚴復早年愛國思想的形成〉
8. 柯遠揚、鄧華祥，〈試論嚴復傳播維新思想的貢獻〉
9. 蘇中立，〈論戊戌辛亥間嚴復的西學宣傳及其啓蒙意義〉
10. 范兆琪，〈嚴復和他的維新愛國思想〉
11. 許在全，〈嚴復的譯著及其愛國思想〉
12. 呂乃澄，〈試論嚴復的中西文化觀〉
13. 李正午，〈嚴復的文化思想芻議〉
14. 陳允樹，〈警醒國人的匠心巨作，變法維新的思想武器——淺析嚴復譯注《天演論》的歷史意義及其深遠影響〉
15. 謝天冰，〈崇尚和傳播現代理性思維的第一人——兼論嚴復編譯《天演論》〉
16. 黃順力，〈嚴復與章太炎進化論思想的比較〉
17. 汪毅夫，〈《天演論》：從赫胥黎、嚴復到魯迅〉
18. 羅耀九、林平漢，〈嚴復評《老子》芻議〉

³¹ 該會地址：中國福建省福州市群眾路 27 號，郵編 350004，電話 86-591-3357793，傳真 86-591-3333201。

- 19.王中江，〈觀念的整合——嚴復對道家哲學的詮釋〉
- 20.馮佐哲，〈簡論嚴復的社會思想〉
- 21.林秋云、蘇東福，〈嚴復的社會思想及其社會譯著述評〉
- 22.胡偉希，〈中國自由主義之父——嚴復〉
- 23.姚春樹、鄭家建，〈嚴復：第一個點燃自由聖火的啓蒙思想家——論嚴復自由論思想體系〉
- 24.俞政，〈自由、平等、民主——《法意》按語評析〉
- 25.陳小雅，〈中國政治科學的奠基作——嚴復的《政治講義》〉
- 26.王民，〈嚴復政體觀要論〉
- 27.張志建，〈論嚴復變革的政治思想〉
- 28.廖楚強，〈論嚴復思想中的「改革開放」意識〉
- 29.鄭師渠，〈嚴復與盧梭的《民約論》〉
- 30.林恩燕、林家鍾，〈試談嚴復思想趨向保守的原因〉
- 31.張先文，〈論嚴復晚期政治思想〉
- 32.牛康，〈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嚴復晚年思想和言行的探討〉
- 33.蕭功秦，〈嚴復對中國現代化的思考及其啓示〉
- 34.林慶元、翁紀陽、楊波，〈「活力」與富強：嚴復思想軌跡的鳥瞰〉
- 35.緒形康（日本），〈嚴復的經濟思想與亞當·斯密的思想比較〉
- 36.林其泉，〈簡議嚴復對《原富》的翻譯〉
- 37.潘心城，〈論嚴復的理財思想〉
- 38.俞政，〈論嚴復的經濟自由主義〉
- 39.嚴揚，〈嚴復的一封英文信〉
- 40.張寄謙，〈嚴復與北京大學〉
- 41.黃新憲，〈嚴復與中國教育的近代化〉
- 42.吳中光，〈「今日教育應以物理科學爲當務之急」——嚴復科學教育思想探討〉
- 43.高時良，〈嚴復「教育強國根本」說評估〉
- 44.葉芳騏，〈嚴復教育救國思想述評〉
- 45.陳名實，〈嚴復教育思想的歷史地位〉
- 46.盧美松、歐潭生，〈嚴復譯著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
- 47.郭毓麟，〈嚴復的家教及其第三子叔夏的成就〉
- 48.鄭劍順，〈略論嚴復的人才思想〉

- 49.潘潮玄，〈嚴復與福州——兼論人才與城市的關係〉
- 50.林偉功，〈嚴復與陳寶琛的友誼初探〉
- 51.何綿山，〈嚴復與近代侯官文化〉
- 52.鄒振環，〈中國近代翻譯史上的嚴復與伍光建〉
- 53.姚春樹、鄭家建，〈「闊視遠想，統新舊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嚴復關於中國新文化創造論綱〉
- 54.李慈健，〈嚴復與近代文學變革〉
- 55.牛仰山，〈嚴復散文的風采〉
- 56.石文英、范輝，〈「浮休齊得喪，優患塞乾坤」——讀《癡壑堂詩集》札記〉
- 57.官桂銓，〈嚴復世系〉
- 58.王鐵藩，〈嚴復家鄉陽岐調查記〉
- 59.鄭江、延齡，〈附錄一：拓開嚴復研究的新局面——'93 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述評〉

附錄二：《嚴復誕辰 140 周年紀念活動專輯》論文目錄

- 1.林慶元，〈嚴復和《天演論》的歷史地位〉
- 2.林國清，〈略談嚴復的「天演」思想〉
- 3.吳聿秀，〈奠定嚴復歷史地位的豐碑——《天演論》〉
- 4.林萱治，〈淺論嚴復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
- 5.蕭忠生，〈淺論嚴復早年愛國思想的形成〉
- 6.戴學稷，〈嚴復的留學生活及其對近代中國的重要貢獻〉
- 7.林炳釗，〈嚴復在戊戌變法時期的思想〉
- 8.黃保萬，〈嚴復變法維新思想的理論特色〉
- 9.柯遠揚、鄧華祥，〈試論嚴復傳播維新思想的貢獻〉
- 10.羅耀九、林平漢，〈嚴復評《老子》芻議〉
- 11.游天星、楊秉綸，〈貫穿嚴復一生的愛國主義思想〉
- 12.黃啓權，〈論嚴復改革開放思想的現實意義〉
- 13.陳舍，〈從《原富》的按語看嚴復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 14.陳文亮，〈略論嚴復經濟思想〉
- 15.黃政，〈嚴復教育思想及其特徵〉
- 16.陳錦谷，〈試論嚴復的教育思想〉

- 17.歐潭生，〈首任北京大學校長嚴復〉
- 18.盧美松，〈嚴復自由觀初探〉
- 19.李林洲，〈論嚴復的法律思想〉
- 20.王能超，〈略述嚴復的民本思想和譯著的功績〉
- 21.孫應祥、皮后鋒，〈嚴復對基督教的認識及其教案觀〉
- 22.陳允樹，〈嚴復人口觀初探〉
- 23.鍾秀蘭，〈試論嚴復的「西學」思想〉
- 24.陳志，〈論嚴復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 25.林偉功，〈嚴復中西文化差異觀試探〉
- 26.徐曉望，〈論嚴復與閩人「兼容並蓄」的文化精神〉
- 27.張英惠，〈揚善倡美，重鑄國民之魂——嚴復文藝思想初探〉
- 28.葉芳騏，〈嚴復與中國近代海軍〉
- 29.陳道章，〈嚴復提示伯努利定理起於中國〉
- 30.陳怡，〈淺析嚴復思想嬗變之軌跡〉
- 31.陳孝華，〈試論嚴復晚年的政治思想〉
- 32.高丘，〈淺論嚴復晚年思想及其評價〉
- 33.張傳興，〈略論嚴復的晚年〉
- 34.李鄉瀏，〈試談嚴復的詩〉
- 35.鄭國珍、張振玉，〈嚴復字跡拾零〉
- 36.王植倫，〈嚴復心湖初探〉
- 37.葉翔，〈嚴復倡修尚書廟之謎〉
- 38.官桂銓，〈嚴復世系〉
- 39.陳子桑，〈嚴復與家鄉〉
- 40.黃榮春，〈嚴復在陽岐的遺址〉
- 41.周國忠，〈關於嚴復研究的若干問題〉
- 42.游天星，〈嚴復研究資料檢索綱要〉
- 43.楊秉綸，〈嚴復故居修復方案研討〉

附錄三：「97年嚴復與中國近代化研討會」論文目錄

- 1.方鏞（福建省機械廳農機局高工），〈嚴復與方伯謙〉
- 2.王大同（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嚴復救國圖強的偉大抱負〉
- 3.王玉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楊昶（武漢華中師範

- 大學文獻所副教授)，〈論嚴復的神秘觀〉
- 4.王宜椿（福建省地震局副研究員），〈一代哲人嚴復〉
 - 5.皮后鋒（江蘇省社科院現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國權、民權、特權、黎矩——嚴復自由觀論析〉
 - 6.任恒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天演論》傳播的啓示〉
 - 7.朱政惠（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簡論嚴復對中國近代史學的貢獻〉
 - 8.江道源（廈門市委黨校副教授），〈嚴復「三民」思想的本質追求——人的近代化〉
 - 9.吳儀（台灣基督國際學院副院長），〈從中、日近代思想史探討嚴復與福澤諭吉對促進中、日近代化之比較研究〉
 - 10.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嚴復與清季海軍現代化初探〉
 - 11.李華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論嚴復的國家學說〉
 - 12.李斌，〈嚴復與《國聞報》〉
 - 13.周濟（廈門大學自然辯証法研究室教授），〈嚴復的科教治國思想〉
 - 14.官桂銓（福州林則徐紀念館副館長兼副研究員），〈嚴復佚文三篇〉
 - 15.林利本（福州市委黨校經濟系副教授），〈嚴復對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傳播〉
 - 16.林其泉（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嚴復君主立憲主張小議〉
 - 17.林偉功（福州市地方志編委副編審），〈淺論嚴復中西文化差異觀〉
 - 18.林國清（福州市晉安區地方志辦公室），〈嚴復未參加「籌安會」說〉
 - 19.林啓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嚴復論中西文化〉
 - 20.俞政（蘇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嚴譯《原富》的社會反應〉
 - 21.姚春樹（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潘筠（福建省建陽市二中教師），〈論嚴復與近代「文界革命」——兼論其政論雜文〉
 - 22.封安波（廈門大學歷史系研究生），〈近五年嚴復研究述評〉
 - 23.洪峻峰（廈門大學學報副編輯），〈論嚴復的自由觀〉
 - 24.胡慧玲（福州市政協文史辦），〈文化牽引社會進步的巨大作用——試論嚴復思想文化的社會意義〉
 - 25.范啓龍（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天演論》的譯著及其偉大影響〉
 - 26.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嚴復與安慶高等學

堂)

- 27.高時良(福建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從魏源到嚴復:近代中國西學教育思維的歷史性轉變〉
- 28.張延榕(福建師範大學講師),〈嚴復——中國譯界泰斗〉
- 29.張榕、張厚林(福建省永泰縣一中高級教師),〈嚴復教育思想體系初探〉
- 30.曹世鉉(北京師範大學留學生),〈論嚴復的《天演論》與李石曾的《互助論》——中國近代進化論的兩種譯著〉
- 31.梁義群(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嚴復與吳汝綸〉
- 32.許維勤(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嚴復的仕途、煙癮及其他〉
- 33.郭常英(河南大學史學月刊副編審),〈評嚴復對近代中西社會差異的對比〉
- 34.郭權、羅喬,〈廣播劇:嚴復〉
- 35.陳九如(蕪湖師專政史系副教授),〈淺談嚴復的啓蒙思想〉
- 36.陳允樹(福建省委政研室),〈康有爲、梁啓超與嚴復——評《世紀檔案》首三篇〉
- 37.陳名實(福建省地方志編委會),〈嚴復的素質教育觀及其現實意義〉
- 38.陳伯強(福建師範大學經法學院教授)、莊藝真(福建師範大學經法學院研究生),〈試論嚴復的處世哲學〉
- 39.陳俱(福建省科技史研究會顧問),〈讀《天演論》札記〉
- 40.陳絳(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英美學者筆下的嚴復(初稿)〉
- 41.陳華新(廣州師院教授),〈嚴復傳播西學與中國近代化〉
- 42.陳雙燕(廈門大學學報編輯),〈嚴復晚年政治思想再研究〉
- 43.黃克武(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嚴復的翻譯:近百年來中西學者的評論〉
- 44.黃順力(廈門大學歷史系),〈嚴復與辜鴻銘文化心態的比較〉
- 45.黃新憲(福建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論嚴復的基督教觀〉
- 46.楊沐喜(廈門大學馬列部),〈啓蒙時期嚴復與康、梁、譚思想異同之比較〉
- 47.楊旻旻(福建師大),〈嚴復女子教育思想剖析〉
- 48.楊勝良(廈門大學馬列部講師),〈嚴復的啓蒙思想與對老莊之學的評

述)

49. 葉芳騏（福州師專學報編委會副主任），〈中國近代化的先聲——嚴復傳播「西學」述評〉
50. 葉濤（廈門市委黨校教師），〈「開民智」：嚴復一生所追求的目標與實踐〉
51. 齊上志（福建中醫學院附屬人民醫院中醫師、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輯），〈嚴復變革維新思想初探〉
52. 蔡永明（廈門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略論嚴復中西文化觀的演變〉
53. 鄭雅真（廈門大學歷史系）、何淑珍（廈門大學歷史系）、鄭劍順（廈門大學歷史系），〈嚴復研究論文篇目索引(1992-1996)〉
54. 鄧華祥（福建省博物館）、蕭忠生，〈從嚴復致陳寶琛的一封信札中看他的愛國思想〉
55. 鄧劍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石方杰（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建華（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政法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維新時期嚴復思想述評〉
56. 盧美松（福建省地方志編委會副主任）、歐潭生（福建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嚴復對創辦北京大學的貢獻〉
57. 鮮于浩（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何云庵，〈追求中華民族素質近代化——嚴復「三民」說平議〉
58. 羅耀九（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平漢（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從嚴譯《天演論》到孫中山的互助思想〉
59. 蘇中立（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世紀之交嚴復和孫中山的倫理思想近代化比較〉
60. 蘇全有（河南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嚴復思想轉型問題研究〉

歡迎海內外學者提供各地已舉辦之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學術會議簡介及發表之論文目錄，或即將召開之會議訊息，以廣交流。

第四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 國際學術研討會

黃自進*

由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衛藤瀨吉與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長山田辰雄教授共同領銜主導的第四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997 年 11 月 15 日、16 兩日，假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召開。本次會議共有來自台灣、中國大陸、美國、法國、加拿大、韓國及日本本國的七十九位學者參加，發表論文三十三篇，誠為日本學界近年來有關中日關係史研究的一場學術盛會。以下按會議主題，將三十三篇論文要旨簡略敘述於後。

第一組討論會的主題是「日本論」。有三篇論文。佐賀大學佐佐木揚教授首先以〈一八六〇、七〇年代的清朝官僚的日本觀：以李鴻章、郭嵩燾為例的探討〉一文，解析清朝開明官僚日本觀的形成與變遷。佐佐木教授認為早期的李鴻章並不留意日本，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力精圖治，尤其是在 1874 年的台灣出兵事件上所凸顯出日本對外政策上的擴展性後，遂促使李鴻章對日本日生警惕，並視日本為首要敵國。而郭嵩燾則因 1877 年的駐英公使經歷，讓他深知日本士人在英國的學習狀況，並進而肯定以引進西方政經制度為基軸的日本現代化政策，同時也開始倡導中國應參照日本的現代化模式。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賈世杰教授(Don C. Price)的〈複雜的反應與影響：宋教仁與日本〉一文，以宋教仁在日本求學的經歷為題材，以心理學的角度來解析宋教仁的人格重建過程。並以此一人格的重塑為線索，分析辛亥革命時期的宋教仁能在大聲疾呼抨擊日本的對華野心之餘，也能替兩國之間尋找合作空間的原因所在。復旦大學余子道教授的〈敵乎？友乎？：30 年代關乎中日關係的一場論爭〉一文，以 1934、1935 年代表蔣介石與汪精衛立場所各自發表的〈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及〈對日的兩條路線：讀徐道鄰《中日關係的檢討》書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後)兩篇文章為基軸,探討蔣、汪兩人的基本對日態度。依余教授的歸納,蔣、汪皆不願與日本為敵,蔣是企圖以外交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兩國的爭執,而汪則主張中國應全面接受日本的要求。

第二組討論會的主題是「清末新政與日本」,有三篇論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的〈中國近代化與日本:論清末新政〉,主旨乃在探討清末立憲運動開始的「新政」措施,與取範於日本近代化的種種改革所具有的意義,以及日本的對應,協助中國的動機及其角色,進而闡釋中日兩國近代化的異同以及文化交流的問題。神戶學院大學中村哲夫教授的〈光緒新政與日本〉,則以1898到1901年間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與盛宣懷之間的交流為線索,解析中國在歷經義和團之亂以及東南互保等重大變局之後,在重建的摸索過程中,日本對中國走向新政所曾發揮誘導性的關鍵角色。關西大學陶德民教授的〈清末中日關係中的政治和文化:關於「黃金十年」論爭的檢討〉,嘗試從政治、文化等多樣性角度對1898至1907年之間的中日關係是否可稱為兩國的黃金十年,提出全面性的檢討。認為在政治上,兩國之間的交流的確可歸類為侵略與被侵略者之間的關係,但是在文化上,日本卻扮演著誘導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仲介角色,對中國的現代化有不容抹煞的貢獻。

第三組討論的主題是「日本人的中國研究」,有三篇論文。同志社大學錢鷗教授的〈近代中國學、東洋學的成長及其先驅者藤田豐八:清末與明治學術交流的橋樑〉,主要在介紹藤田豐八在近代中日文化學術交流史上所扮演的「承先啓後」角色,認為從1898年起就協助羅振玉等人在上海創立日語專門學校的藤田,對清末中國的新學以及爾後東亞近代學術文化圈的成形皆有卓越貢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傅佛果教授(Joshua A. Fogel)的〈明治末期漢學家的中國觀:以狩野直喜為例的探討〉,旨在介紹日本明治時期學國走向全面西化之際,漢學家狩野直喜為求漢學在日本社會的延續與傳承,力求漢學研究現代化的過程。追手門學院大學伊原澤周教授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面:王國維與京都學者〉,以具體的史實,說明民初大儒王國維在建構其獨特的「甲骨學」及「金石學」的研究領域上,受京都學派狩野直喜、內藤湖南等日本漢學大師的啓發情況。

第四組討論會的主題是「日本人的中國論、台灣論」,有三篇論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教授的〈北一輝與中國革命〉,旨在探討

戰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導師北一輝早年為何參與中國革命，爾後又為何放棄中國革命轉投身於日本革命；並循北一輝投入中國革命由淺入深以及中日兩國革命局勢的驟變等線索，分析他參與中國革命的體驗和他投身日本革命的必然性之間的互動關係。此一研究不僅刻劃出中日兩國現代化過程中有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存在，也凸顯出二十世紀初期，胸懷「亞洲情結」的部分日本知識份子，對世務的考量並不單從日本的角度出發，而是以區域性的視野關注整個東亞世界的發展。台灣師範大學吳文星教授的〈荒尾精與台灣〉，以日本大陸擴展政策理論先驅荒尾精在 1896 年 9 月的台灣訪問為研究焦點，並進而探討此一訪問對日本早期台灣殖民政策的具體影響。奈良女子大學齋藤希史教授的〈再論「支那」：十九世紀東亞社會對中國的觀測指標〉，認為明治時期的日本社會，之所以稱「中國」為「支那」，實有其深遠的文化考量。也就是說，日本為了早日建構近代化的民族國家的新面貌，就必須要與中國的傳統華夷秩序劃清界線，更必須要將日本文化中受中國文化影響的部分重新定位，因而將「中國」硬稱為「支那」，也可視為是日本社會尋求確立自我文化過程中的一個摸索指標。

第五組討論的主題是「九、一八前後」，有三篇論文。漢城大學閔斗基教授的〈萬寶山事件與韓國言論的反應〉，旨在介紹韓國的《東亞日報》駐上海的特派記者申彥俊，如何在 1931 年 7 月間揭發日本政府利用萬寶山事件煽動韓國民眾的排華陰謀，且以一己之力力謀中韓兩國民眾親善的奮戰歷程。大阪外國語大學西村成雄教授的〈中國東北地區的廢除厘金、新設營業稅政策與日本奉天商會議所：九一八事變前夕中日關係的另一側面〉，指出 1931 年 5 月間東北當局以新設營業稅代替原有的厘金制度，不僅增加了東北當局的財政收入，同時也兼有打壓當地日商正常發展的政治效益。因而，此一新的財稅政策的導入，所引爆的中日兩國之間在東北地區的經濟利益衝突，無疑地也是引起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原動力之一。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鹿錫俊教授的〈中日兩國對「直接交涉」的態度：1931-1932〉，認為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中日兩國對直接交涉的態度可謂是「表裡不一」。中國在表面上雖然持拒絕態度，暗中卻多次秘密摸索直接交涉的可能性。而日本在表面上雖然一再表達欲謀直接交涉，事實上卻是處處設防，從頭至尾就是為了要營造中日兩國不可能直接交涉的局面。

第六組討論會的主題是「日本文化論」，有三篇論文。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唐德剛的〈從挹婁、阿留、阿伊努之史跡看一個中日亞美民族文化圈之興亡〉，指出北美洲西北部的原住民和東北亞的原住民的種族背景及生活方式，有高度的一致性。唐教授在參照印第安裔學者對北美洲原住民的考證研究以及其本人橫貫阿拉斯加四千英里的實地考察，認為北美洲的原住民與東北亞的原住民應屬同一個種族，在歷史上是一個兼跨白令海峽兩岸文明的民族文化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玉法教授的〈中國留日學生的經歷與見聞(1896-1945)：以回憶錄為主體的探討〉，則以留日學生的生活與活動，留日學生對日本的觀察，日本對留日學生的限制與監視等三個角度來審視戰前中國留日學生日本觀的形成。張教授綜合戰前留日學生的集體記憶，認為當時日本可以稱為強國，但尚非現代化國家。非現代化的情況尚表現在對中國留日學生的態度上，對中國人的歧視尤非一個現代化國家所當為；又認為，中國領導階層中的少數人，以其留日的背景欲與日本親善合作，但領導階層中的大多數人，由於留日期間的不愉快經驗，反日情緒特別高昂。Macalester College 譚汝謙教授的〈近代日本對清末中國文化的衝擊：梁啓超個案的再考察〉，以梁啓超個案研究說明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確實深遠。認為梁啓超所提倡的自由思想、尚武精神、國粹主義等皆與志賀重昂、陸羯南、德富蘇峰等當時活躍日本輿論界的主流思想有密切關聯，連梁啓超推廣的日本詞彙和筆端常帶感情的文風，也是深受德富等人影響。

第七組討論會主題是「七、七前後」，有論文三篇。神戶大學安井三吉教授的〈從塘沽停戰協定到盧溝橋事件〉，以綜合中日兩國最新研究成果，認為盧溝橋事件的爆發雖可強辯為是一擦槍走火的偶然事件，但是日本軍部一再企圖染指華北也是不爭的事實。是以，因盧溝橋事件所引爆的中日戰爭，日本應負全部的戰爭責任。吉林省社會科學院解學詩教授的〈七、七事變前後的滿鐵華北經濟調查〉，以滿鐵的華北經濟調查活動為研究焦點，以期揭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滿鐵在經濟侵華決策中的地位與作用。按解教授的研究，滿鐵華北事務局調查部於1937年所制定的〈華北產業開發計劃案〉及1938年所編制的〈華北生產力擴充計劃〉，皆為「七、七」事變後日本的華北經濟資源掠奪勾劃出了藍圖。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教授的〈盧溝橋事件後國民政府的戰和抉擇〉，探討國民政府是在什麼樣的判斷基礎上作出抗戰的決議，其主要軍

事決策人的願望是求戰還是避戰。按王教授的解析，國民政府本無意求戰，只因華北情況不同於東北，中國已無再讓步的空間，是以抉擇「不挑戰必抗戰」作為回應。

第八組討論會的主題是「抗戰論」，有三篇論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教授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抗戰變局〉。以知識份子的抗戰觀及抗戰中知識份子的抉擇為探討焦點，描繪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日本侵華戰爭所帶來的全國性震盪，全民族苦難之際，如何因應？又如何從書生空議論到奮起而行，共赴國難，共體時艱。法國 CNRS 巴斯蒂教授(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的〈法國人看 1942-1945 年中國敵佔區的「合作」〉，以法國駐華使團的觀測報告為基礎，說明當時淪陷區民眾與汪政權以及汪政權與日本佔領軍之間的三角互動關係。依巴斯蒂教授的歸納，中國淪陷區與當時的法國相比，有三點特殊意義。第一點，嚴格來說，中國淪陷區並沒有合作的問題，因為日本軍方當局從未真正期望和尋求跟中國人的合作，它更傾向由它自己來管理佔領區。第二點，汪政權與國民政府之間沒有內戰的危機。法國人認為汪政權服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目標，而不是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第三點，日本人在華北建設中所表現的效率與組織才幹令人印象深刻，日本所促進的中國現代化遠勝過西方影響的貢獻。武漢大學胡德坤教授的〈中國戰場與日本世界戰略的演變(1937-1945)〉，認為中國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戰場，它的存在對日本世界戰略的展開起了極大的牽制和制約作用，例如在北進戰略方面，由於日本陸軍主力被牽制在中國戰場，無力進攻蘇聯而未能實施。在南進戰略方面，中國戰場的存在，使日本遲遲未能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遙相呼應，使日本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而遭致失敗。

第九組討論會的主題是「清末中日文化交流」，有三篇論文。亞細亞大學容應莢教授的〈清末留日學生派遣政策的成立〉，認為清末十餘年間，所以有近二萬的中國學生湧入日本，是基於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皆有以下共識：一、日本和中國的距離相近，往來方便，費用亦較歐美便宜。二、兩國的文化背景相似，日文習得容易。三、日本已從龐大的西學中去蕪存菁，抽出求富強的必要之道，為中國學生開辦速成班，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亞細亞大學李廷江教授的〈十九世紀末期中國的日本顧問〉，以日本顧問在中國角色的演變，來探討兩國關係的實質變化。李教授認為中國延聘日

本顧問始自 1885 年，早期的應聘者大多為開礦技師。爾後因日本政府有計劃性的策動，日本顧問在中國的工作性質亦隨之多元化。其中，尤以政治顧問人數的倍增，最為顯著。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季桂珍教授(Joan Judge)的〈明治日本和晚清的婦女教育〉，認為藉由大量有關婦女教育的書籍被翻譯成中文以及知識女性湧入日本留學等事實，可一窺當時日本在晚清婦女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角色。是以，以晚清婦女教育中的日本影響為例的探討，可更掌握中國婦女教育的特質。也就是說，女性雖然爭取到受教育的機會，但日本模式的女性教育設計仍是以培養「賢母良妻」為走向。

第十組討論會主題是「二十年代的國民黨政治以及汪精衛政權」，有三篇論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芳上教授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東京支部黨務糾紛初探〉，旨在探討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對海外黨務推動的影響。呂教授的研究說明兩件事：一是政治與黨務能否和諧運作，與權力分配是否允當，理念是否一致，有很大的關係。二是海外黨務的活動與國內政治聲氣相通，海外國民黨組織與黨務活動完全反映了國內政治生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鵬仁教授的〈日本的對汪兆銘工作〉，認為日本政府對汪精衛自始就是策略上的利用，再加以，汪精衛不能有效鼓動雲南的龍雲，四川的潘文輝，廣東的張發奎參與他所謂的「反共和平救國」運動，更增添日本政府對他的鄙視。是以，汪精衛可謂是誤上賊船，注定要以悲劇收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振鵬教授的〈日本與汪精衛〉，以汪精衛政權成立前後，汪氏與日本政府之間所簽定的〈調整中日新關係之協議〉、〈基本關係條約〉、〈關於協力完遂戰爭之中日共同宣言〉、〈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等四個條約為基軸，追究汪政權的傀儡本質。

第十一組討論會的主題是「中日十五年戰爭說」。中國文化大學王友仁教授的〈中國民族主義在中日關係史的歷史考察〉，認為 1895 年的甲午戰爭、1919 年的五四運動以及 1937 年的抗日戰爭，皆是觀測中國民族主義演變的重要指標。中國民族主義的走向，可謂是從大眾自發性的民族反抗運動演變成由知識份子指導的運動，進而轉變成為由政府來主導。York 大學若林正(Bob T. Wakabayashi)教授的〈中日十五年戰爭說：以學問追究戰爭責任〉，認為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日戰爭的稱呼，事實上也是反映出各人對戰爭的認知。例如稱「大東亞戰爭」者表達了這是

一個解放亞洲的戰爭。稱「太平洋戰爭」者意味著這是一場美國為主角中國為配角的戰爭。這其中日本左翼學者所堅用的「十五年戰爭」一說，代表著對中國的贖罪意識。認為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十五年，日本的主要戰爭對手是中國；又認為日本不是敗於英美的尖端科技，而是敗於中國大眾的不屈意志。若林教授支持「戰爭十五年」說，指陳戰爭已結束五十二年，但日本人民仍不願向中國民眾坦承戰爭責任，仍不願拋棄對中國的傳統優越意識。認為「戰爭十五年」說有助於日本民眾反省。不過，他對日本是先敗於中國而非敗於美國之說，提出質疑，認為有違史實。日本大學的秦郁彥教授的〈南京大屠殺：以數字為例的探討〉，以生存者的目擊報告、埋葬紀錄、樣本調查的推計法、日本軍的戰事紀錄等四種方法來推算南京大屠殺的可能人數。秦教授根據以上四種資訊，再參考當時的南京人口以及南京的佈置兵力，認為慘遭屠殺的人數大約是四萬至六萬人。

以上簡介的三十三篇論文，如以研究範疇來歸類，政治外交十九篇，佔百分之五十八；軍事四篇，佔百分之十二；經濟二篇，佔百分之六；文化八篇，佔百分之二十四。此與上屆發表的三十六篇論文，政治外交十六篇，佔百分之四十五；軍事十五篇，佔百分之四十二；經濟三篇，佔百分之八；文化二篇，佔百分之五的比率相較，似有顯著的改變，即討論文化的論文大幅增加，軍事方面則大幅減少。此一數量比率的變化，無疑地也是反映著中日關係史朝向多元化研究的新趨勢。再則，此次會議是繼香港、北京、台北之後在東京召開，也象徵著東亞學術界的一大整合。蓋「近百年中日關係史」研討會萌生於 1990 年的香港，是一個以海峽兩岸及美加華裔學者為中心的世界華人學術會議，而此次能由東京學界接辦，頓使此一學術會議很自然地跨了族群，成為東亞學術界的共有財產。是以，東亞歷史學界，今後也將藉由此一會議的薪火相傳，以及各國學者的陸續援投入下，可望朝向基本共識培養的方向持續邁進。

中國現代教育家雷沛鴻 教育思想討論會綜述

曹天忠*

1998年2月11日是廣西籍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雷沛鴻(字賓南)110周年誕辰。雷沛鴻曾於1927、1929、1933、1939年，四度擔任廣西省教育廳廳長，對國民教育的改革貢獻甚大。近年以來，在中國教育學界，被承認為中國偉大的現代教育家之一，與蔡元培、胡適、陶行知、梁漱溟、晏陽初等齊名。為緬懷先賢，開掘中國現代教育文化遺產，推進教育科學繁榮和教育事業發展，3月1日至4日，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專業委員會，廣西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會聯合在北京舉行了雷沛鴻教育思想的第七次學術研討會。會議主要圍繞在三方面：(一)雷沛鴻教育思想與教育現代化；(二)民族教育體系的理論與基礎；(三)雷氏在中國近代教育史的地位和貢獻。

本次學術會議一共進行四天(中途休會一天，外出參觀)，討論會部分開幕式、大會發言、分組討論、總結發言四個階段。來自美國、義大利、新加坡、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海內外專家、學者100多人與會，提交論文近70篇。論文之中，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有關者，計48篇，其目錄如下：

- 張傳燧(西南師大教育系副教授)，〈雷沛鴻與教育現代化〉
- 陳時見(廣西師大教育系教授)，〈論雷沛鴻的比較教育研究〉
- 馬佳宏(廣西師大講師)，〈雷沛鴻教育管理思想論綱〉
- 郭齊家(北京師大教授)、王建梁(北京師大講師)，〈雷沛鴻教育師範思想發微〉、〈雷沛鴻教育社會學思想初探〉
- 龐守興(華東師大博士生)，〈試論雷沛鴻教育思想與時代精神的契合點〉
- 楊啓秋(廣西師大副教授)，〈國民中學述論〉
- 馮力行(桂林市教育學院副教授)、唐國英(桂林市圖書館副研究員)，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雷沛鴻在桂林〉

- 王川（四川教育學院副教授），〈論雷沛鴻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
- 林家有（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論雷沛鴻的偉大人格〉
- 蔡梓權（廣西玉林市教委），〈國民基礎教育運動與雷沛鴻教育思想〉
- 趙俊杰（河北師大副教授），〈論雷沛鴻的師道觀〉
- 劉兆偉、趙偉（瀋陽師院教授、助教），〈雷沛鴻師範教育改革思想〉
- 包國慶（廣州教育中心研究員、義大利世界教育系統協會主席），〈雷沛鴻教育觀的史學智慧〉
- 錢宗範（廣西師大教授），〈編著《雷沛鴻的生平與事業》一書的體會〉
- 高增德（山西社科院研究員），〈教育家雷沛鴻與中西文化遺產〉
- 李露（華東師大教育系博士生），〈淺論雷沛鴻教育行政管理思想與實踐〉
- 牟映雪（華東師大博士生），〈雷沛鴻與晏陽初教育思想之比較〉
- 楊海文（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生），〈西江學院的大學精神〉
- 閻國華（河北大學教育系教授），〈試論雷沛鴻的教育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
- 楊潔（華東師大教育系博士生），〈試論雷沛鴻先生的民族教育體系〉
- 王慧（河北師大教管系講師），〈雷沛鴻師範教育思想淺析〉
- 董乃強（北京師大圖書館副研究員），〈國民中學制度對董渭川教育思想的影響〉
- 徐學瑩（廣西師大教育系副教授），〈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方法論探析〉
- 何光峰（北京師大教育系碩士生），〈雷沛鴻的教育文化思想〉
- 熊明安（西南師大教科所教授），〈雷沛鴻在中國現代教育改革史中的特殊作用和貢獻〉
- 宋荐戈（中央教科所教授），〈雷沛鴻主持下的廣西教育改革和陝甘寧邊區教育改革之比較〉
- 苗春德、呂雲飛（河南大學教育系教授、講師），〈略論雷沛鴻的民眾教育思想和實踐〉
- 孫德玉（安徽師大教育系副教授），〈試論雷沛鴻教育思想的中國特色〉
- 錢源偉（上海師大教管系副教授），〈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交融貫通的楷模〉
- 李劍萍（山東師大教育系副教授），〈雷沛鴻與 20 世紀前半期中國成人教育〉

- 王建軍（華南師大教育系副教授），〈評雷沛鴻的教育發展觀〉
- 吳桂就，（廣西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會秘書長），〈論雷沛鴻的民族教育體系與其大教育觀〉
- 陳業強（廣西教育學院副教授），〈雷沛鴻教育思想與現代化〉
- 熊賢君（華中師大教育系教授），〈雷沛鴻的教育現代化思想〉
- 周洪宇（同上），〈雷沛鴻與中國的現代大眾教育運動〉（論綱）
- 李全偉（廣西右江民族師專講師），〈雷沛鴻的人類學視界〉
- 韋善美（廣西雷沛鴻研究會會長），〈雷沛鴻的研究十年〉
- 朱法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救亡兼啓蒙的良方：雷沛鴻訓政式普及教育改革思想〉
- 陳重光（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雷沛鴻的婦女教育理論與實際〉
- 潘啓富（廣西教育學院副教授），〈雷沛鴻教育改造和社會改造思想和他的民族教育新體系〉
- 董祥智（華中師大教授），〈雷沛鴻教育管理思想與實踐芻議〉
- 胡德海（西北師院教育系教授）、高增德（山西社科院研究員），〈論中國歷史上的教育家和雷沛鴻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及其基本特點〉
- 汪灝（華東師大教育系碩士生），〈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發展概述〉
- 但昭彬（湖北教育學院編輯）、董寶良（華中師大教育系教授），〈略論雷沛鴻的高等教育觀〉
- 程剛（瀋陽師院教育系副教授），〈雷沛鴻教育思想中的「救愚」主題〉
- 孫培青（華東師大教育系教授），〈對人民教育家雷沛鴻的初步認識〉
- 胡波（廣東省中山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雷沛鴻人格簡論〉
- 曹天忠（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哈佛游學與雷沛鴻的教育思想〉
- 根據內容分類，提交論文涉及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研究教育現代化思想、師範教育思想、民眾和成人教育各 5 篇；教育管理、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各 4 篇；民族教育體系、國民中學、比較研究、人格思想各 3 篇；方法論、教育與文化、研究總結、教育社會學思想各 2 篇；其他問題則不再一一列舉。研究問題既相對集中，同時又可以結合個人興趣和特長自由選題，在集散結合之間，達到相當高度的共識。
- 經過熱烈研討，形成不少共識：關於雷沛鴻在中國近代教育史地位，

與會者一致認為雷氏是近代中國傑出的教育理論家、實踐家和改革家；他學貫中西，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堪稱一流。他的教育思想內涵，包括民眾教育、成人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門類齊全；層次上，又涉及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個方面，構成一個整體；他推動教改的主線，是大眾化、中國化、社會化和學術化；其教改運動特徵，兼顧了系統性和整體性、民族性、時代性、創造性和可操作性。比起其他所有中國現代教育家，雷沛鴻在若干方面顯得更加卓越。影響的範圍，首先及於全廣西兩千萬人口，其次擴及全國教育界，最後得到國府重視，普遍在全國施行。他較好地處理了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關係，他善用權力，以達到自己的教改目的，他也特別重視教育立法等。

會議在北京舉辦，名家薈萃，著名教育史專家和學者，張健、孫培青、王炳照、郭齊家、林家有、朱泮源、熊明安、韋善美等蒞會，給會議增色不少。學者來自海內外，以大陸論，東、西、南、北、中均有，區域廣泛。特別是中國教育史研究的重鎮北京與華東師大的參與，使本次會議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意義的學術會議。參加者職稱、年齡結構合理，老、中、青三代學者齊聚一堂，尤其是一批年輕的博士、博士生和碩士生湧入，給學術會注入活力，說明「雷研」後繼有人。

學者還就雷沛鴻及其教育思想的十年研究作了反思和展望。這次及以往會議，雖然取得不少成果，但鑒於選題的重覆，專題深入研究尚欠，爭論不多，學者仍對今後「雷研」如何開展得更好，各抒己見，提了許多建議性的意見。歸納起來，計有：

第一，繼續發掘史料，編輯和搶救有關資料。據雷沛鴻夫人，高齡 92 歲的馬清和表示，仍有許多史料尚未發表，將繼續提供，使研究奠定在更加扎實的基礎之上。

第二，精選專題，深入探究，控制會議頻率和規模，讓研究向縱深發展。廣州中山大學的林家有、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朱泮源兩教授貢獻了不少真知灼見。朱教授指出未來仍有十二個項目值得進一步探討：華僑教育、特種教育（少數民族教育）、雷氏憲法理論、政治思想、教育行政、歐洲教育思潮、菲律賓教育、雷氏黨政關係、人生觀、當代環境，還有雷氏對西方的整體認知，以及對中國各大教育學派的接觸情形。朱先生特別指出，過去都用馬克思及共產黨史觀看雷氏，難免不夠真確，應該跳開來，把歷史還給歷史。另有一些學者也肯定新桂系在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

領導下的貢獻。

第三，新角度、多學科、全方位地進行研究。不少學者認為要加強雷氏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等空白點的研究；充分運用比較方法、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歷史學和哲學等多種學科整合研究，使「雷研」的學術範圍和視野不斷拓寬。

第四，希望「雷研」要有理性準繩和科學態度，有不同的聲音。既有贊歌，也有「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積極營造正常健康的學術氛圍。

總之，98北京第七次雷沛鴻教育思想研討會以精心組織、各家雲集、成果豐富和富於前瞻的特色，載入「雷研」的學術史冊。

第二屆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會議紀要

范春源*

一、會議緣起

早在1987年夏，當時的日本國立筑波大學體育學系主任成田十次郎博士（現兼UNSECO轄下的ICSSPE亞洲區會長，日本體育史學會會長，日本高知縣立女子大學校長）應邀來華演講時，即呼籲籌組亞洲地區的體育運動史學會。

其後，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1990年北京亞運會，以及1991年成田氏二度訪華時，再次提出。1994年11月23-26日，舉辦了一次以東北亞地區（包括台灣、大陸、日本及韓國）體育運動史學術研討會，台灣有許義雄及蔡禎雄受邀，並發表兩篇論文。會中，各國學者，認為應籌組一正式的、長久的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的組織，輪流主辦學術研討會，以促進相互間的交流。並通過「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會章」，推舉成田十次郎為第一任會長，日本今村嘉雄及吳文忠為最高顧問，並由台灣、日本、

*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體育系講師

大陸及韓國各推舉一位副會長(台灣由台灣師大體育學系主任許義雄為副會長)。並決議在台北正式舉辦首次的學術研討會

1995年12月19-21日,在台灣師範大學主辦第一屆東北亞體育史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體育運動的近代化」、「女性體育運動的發展」及其他與體育運動史相關之論著,與會者二百餘人,發表論文六十篇,而世界體育運動史學會會長 Dr. Gertrud Pfister〔德國籍〕專程來華訪問,同時並以「歐洲女子運動發展史」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二、大會議程

第二屆東北亞體育史學術研討會於1997年12月9-12日在日本福岡舉行,會議主題為「亞洲武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共發表論文三十餘篇。茲臚列如下：

(一)專題演講：

藤堂良明(日本筑波大學),〈日本武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柔道為主〉

趙玉亭(中國體育史學會會長)、崔樂泉(中國體育史學會副祕會長),〈中國武術史與發展方向〉

羅永一(韓國龍仁大學),〈東洋武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蔡禎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地區武術發展的現狀與課題〉

(二)一般論文

崔鍾三(韓國龍仁大學),〈武道競技的變遷過程及其特徵〉

陳晉璋(中國體育科學會體育史分會委員),〈論東方傳統文化及其對武術理論、技藝發展之影響〉

谷慶芳(江蘇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中國漢代武術「錄影帶」初探——簡析刻在漢畫像石上的中國古代武術形象〉

林伯原(國際武道大學),〈朝鮮「武藝圖譜通志」之研究〉

許光應(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中央國術館發展之研究——1927-1937年〉

林玖君(國立台中商專),〈台灣宗教祭典中的 Sports〉

田忠(杭州大學公共體育教學部)、趙譚華(杭州大學體育系),〈論中

國武術的繼承與發展)

- 關文明(華南師範大學體育系),〈中國武術的文化特徵與發展前景〉
- 趙譏華(杭州大學體育系)、蘇蕭晴(福建師範大學體育系),〈從武術的發展演變看武術在歷史上的社會價值〉
- 林榮茂(韓國教員大學),〈高句麗局堂和體育〉
- 王建台(國立屏東師範學院體育學系),〈西方自然體育教育理念之探究〉
- 劉進枰(弘光技術學院,台灣),〈江良規的體育思想〉
- 洪肇欽(國立體育學院)、魏義雄(中華民國角力協會),〈台灣的新興武術——搏擊〉
- 李鎮洙(韓國漢陽大學),〈關於韓國的手搏〉
- 盧熙德、宣奉玉(韓國漢城大學),〈韓國的自行車的國內導入和周期競技的發展過程——以自行車的導入到1913年全朝鮮自行車競技大會為中心〉
- 蘇蕭晴(福建師範大學體育系)、趙譏華(杭州大學體育系)〈略論『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武術的影響〉
- 康戈武(中國武術研究院),〈武術發展的文化學思考〉
- 袁合(山西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姬際可與形意拳〉
- 李淑珍(中華工商專科學校,台灣),〈安內攘外時期我國軍中體育發展之探討——1928-1937年〉
- 范春源(國立台東師範學院體育學系),〈戰後初期台灣小學體育科教育演變之研究(1945-1949年)——以台北為例〉
- 大久保英哲(日本金澤大學),〈關於近代日本學校體育定著過程的地域差和歷史的背景——岩手縣和石川縣的比較〉
- 新井博(日本福井大學),〈關於日本1920、30年代的滑雪用具製造販賣業誕生的研究——從對富山縣城端町的金田滑雪用具製作所的考察〉
- 掛水通子(日本東京女子體育大學),〈關於我國女子體育選手像書歷史的研究〉
- 程瑞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五四運動與中國近代女子體育〉
- 金昌龍、許建植(韓國龍仁大學),〈韓、日弓術的比較〉
- 李重申(甘肅工業大學),〈論敦煌石室遺書——呼吸靜功妙訣〉
- 張生平(國立交通大學,台灣),〈唐代詩賦中所反映蹴鞠運動的發展〉
- 宮尾正彥(日本八千代國際大學),〈近代水府流水術的教授種目的變遷〉

Bittmann Heiko（日本金澤大學），〈關於空手道的歷史和「教」〉

本次大會論文的中心課題是以亞洲武術的發展為主，與會的國家分別將各國武術的變遷及發展為題作一論述，如台灣及中國大陸的「武術」，日本的「柔道」，韓國的「跆拳道」。透過各國的研究，發現各國武術的形式、發展方式雖有不同，但其精神卻是一致的。而綜觀東亞各國武術的發展，已日漸擺脫其傳統健身的功能，逐步走向競技化、大眾化，甚至如柔道、跆拳道已列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正式比賽項目，成為世界各國推展的運動項目之一。

其次，除了大會的論文主題之外，各國的學者亦提出有關近代中外體育交流、學校體育、體育思想、近代中國體育、女子體育等多篇論文，相互切磋。

此外，為了推動東北亞體育史學的研究，大會設置了「最佳論文獎」，由各國代表評審，以獎勵在大會發表論文的研究者。本次大會的論文獎由來自中國大陸的康戈武獲得，其題目是〈武術發展的文化學思考〉。

三、相關論文簡介

本屆的東北亞體育史學術會議，台灣地區是由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蔡禎雄率 13 名學者組成代表團參與，會中並發表十數篇論文。由於手上缺少其他地區學者的文章，以下僅就代表台灣與會者發表的幾篇論文，擇其與近代史相關者予以評述：

李淑珍，〈安內攘外時期我國軍中體育發展之探討（1928-1937年）〉一文，探討民國 17 至 26 年之間的軍隊體育與軍事學校體育發展為主，其結論為我國的軍事體育是以德式教育為基礎，根據作戰不同需要，對不同性質兵種進行不同的訓練。其中，以「運動場即戰場」競賽方式成為軍事體育和訓練的手段，重視團隊合作精神，反對選手為主的政策。該文徵引不少中國國民黨及部隊之資料，因此，該文發表時，大陸方面的代表曾提出有關史料徵引方面的問題，其中，包括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戰役、規模、對於史實的認定等問題。並引起與會者廣泛的討論。

范春源，〈戰後初期台灣小學體育科教育發展之研究——以台北為例（1945-1949年）〉。該文以戰後台北地區各小學體育教育的推展為主題，

探討光復初期的小學教育政策、小學體育課程標準及其實際上課的情形。研究發現，戰後初期的小學體育並不受重視，執政者只強調在短期內將台灣「中國化」的政策，對於小學體育課程的規定，以去除日本色彩，實行在中國大陸實施的體育課程標準為主。但是，在體育師資及設施不足的情形下，戰後初期台北各小學體育教育的實施，並未落實，沿用日據時期的教學方式進行教學，相當普遍。相對於政府推動的「中國化」政策有所落差。此外，該文作者徵引不少當時的教育考察報告，對於小學體育科教育實態的了解有所助益。

程瑞福，〈五四運動與中國近代女子體育〉。該文是根據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前後十餘年間之相關資料，就五四運動與中國近代女子體育的影響，加以探究。研究結果得知，五四運動前，女子體育教育受傳統社會風氣未開之影響有所限制。五四運動時，自日本傳入「體操」，開啓了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契機，而五四運動時期的婦女解放，提倡男女平權，較全面肯定女性的權益，強調女性身心發展，體育教育從而更能夠被女性自覺的接受。而五四運動後，受西方平民主義思想影響，女子教育蓬勃展開，提供女子體育發展的條件，無論學校體育的開啓，或婦女對體育運動的參與情況，均相較於五四運動前明顯。

劉進枰，〈江良規的體育思想（1914-1967年）〉。該文係針對江良規體育思想的淵源以及體育思想的內涵予以探討。研究發現，江氏的體育思想受當時動盪的國家情勢、美國的自然主義體育思潮，以及留學德國的學術背景之影響，一方面主張體育應以成就全人格的教育為目的，另一方面卻又主張中國的體育目的應以強國為首務，是為自然主義體育和國家主義體育的綜合體。

林玫君，〈台灣宗教祭典中的 Sports〉。該研究根據文獻資料及實地考察，以目的、內容、方法為主幹，探討台灣宗教祭典中的運動，研究結果歸結如下：

1. 附屬活動漸成主體：台灣多元化的宗教信仰與運動是密不可分的，為使宗教慶祝儀式點綴得多樣而熱鬧，運動的呈現，已成為台灣宗教祭典活動中的主體之一。
2. 項目繁多，內容標新立異：台灣宗教祭典中的運動項目多而混雜。以廟宇活動為主的運動，表演操作方式居多，動作、服裝和道具也十分講究，並不斷自創風格，更具台灣特色；而以歲時活動為主的

運動，一年僅呈現一次，除了配合當地風俗，多以比賽方式進行外，並備有類似競賽規程之簡章，比賽者需結合體力及高度技巧，方能勝任，近年來，並極力提升為觀光重點。

3. 組織雜而有序：除了職業的技藝團之外，並無特定組織，參與者利用業餘或農閒時於曬穀場，或村廟廣場練習。而在附屬配備方面，表演者多著古裝或戲服，十分華麗，配樂也以較有節奏的鑼、鼓、鈸居多，動作大而誇張，道具多而複雜是其特色。
4. 具文化傳承功能：宗教祭典的多樣化，成就了熱鬧的台灣運動文化，雖因時代變遷而有所變質，但仍背負文化傳承功能，不得不加以重視。

許光廬，〈中央國術館發展之研究（1927-1937年）〉。該研究是以歷史的觀點，追溯中央國術館組織成立的淵源，並分析其考試制度的內容，闡明其競賽活動發展方向，探討其國術研究之內涵。其研究結果歸結如下：

1. 中央國術館成立於內憂外患的背景下，歸功於張之江的奔走鼓吹，憑藉其良好的黨政關係，且國民政府財政的支援，並依據組織大綱之規定，各級政府普遍設立相應機構，形成一個完備的國術組織系統。
2. 中央國術館抄襲西洋運動規則，模仿舊時科舉制度，制定「國術考試條例」及「國術考試細則」，對於國術考試等級、各級名稱、考試科目、考試方式等，均有所規定。惟，尚處嘗試階段，缺點仍多。
3. 中國武術逐步踏上競技的方向，以國術館人員主導的國術表演和比賽，因缺乏明確的評分標準，深受人為因素及門戶派系之影響。其次，綜合運動會也列國術為比賽或表演項目，以國術與體育的融匯為驅向。
4. 在西方科學的衝擊下，任職中央國術館人員多具有較高的知識水準。有些採用自然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另一些人則從人文社會科學方向進行探討。在促進國術科學化只是起步階段，對國術理論的建構處於開端。

王建台，〈西方自然體育教育理念之探究〉。該研究採歷史哲學研究法，將蒐集之相關文獻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與詮釋，探討西方自然體育之教育理念，包括自然體育之教育目的、教學原則與教學方法。研究

結果發現，自然體育的教育目的，非但要培養受教者的個性，引發其潛能，也要培養其服務社會造福人群的使命感，達成「自我表現」之教育目標。其教學原則包括，遵循自然法則，堅持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強調感官經驗教育的重要，注重學童的個別差異等。至於其教學方法包括，強調自然教學法，個別化教學之重視，注意學童的遊戲活動，真實經驗之體會與教學情境的安排。當今，自然體育思想仍是世界體育思想之主流之一，雖在形式上、方法上或名稱上容或有改變，唯在本質上仍是自然體育之範疇與延伸。

蘇蕭晴、趙譚華，〈略論「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武術的影響〉。該研究指出，在中國武術發展史上，武術曾經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如印度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武術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尤其是武術價值觀念的影響，引起了武術文化形態的變化。其次，「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武術發展的影響是西方自然體育觀的傳入，自然體育強調人的本性，注重個性發展，突出體育的教育意義以及自然科學作為理論基礎的觀點，拓展人們對武術的認識，使武術成為近代學校的教育內容，確定武術的教育地位。

「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武術影響，其結果是近代中國武術並未被西學吞沒，而是經過改造而發展。簡言之，其影響是積極的。

四、會議的特色

本次學術會議有以下幾個特點：

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已是一常設性的組織，總會設於日本筑波大學，每隔二年由我國、日本、韓國及大陸輪流主辦。主辦者擇定某一主題進行研討，不僅可達到深入了解該課題的目的，同時，也可促進東北亞各國體育運動史學術研究者的經驗交流。

1. 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舉辦學術會議，以尊重各國所使用的語言為原則，因此，與會者分別以各國的語言發表論文，同時透過翻譯，以達到學術交流的目的。

2. 本屆大會的主題是「亞洲武術的過去、現在、未來」，各國均有相關的論文提出，如台灣的武術、搏擊、中國的武術、日本的柔道及韓國跆拳道，整體來看，透過上述各篇研究成果的發表，對於亞洲地區武術的形

成，不僅提供了追根溯源的機會，同時，也對各地區今後武術的發展，有著相互學習、觀摩的機會。總之，對整個亞洲地區武術的未來走向，提供了省思的空間，實具有正面的意義。

會議消息

藍旭男* 輯

The Southeast Conference/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第卅七屆年會

時間：1998年1月16-18日

地點：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t Charlottesville

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討論主題及論文題目如下：

Asian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i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Jane McCollough and Guoli Liu (College of Charlesto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d Public Expendi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guyen Manh Hung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China and Vietnam'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Problem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es"

Lost Horizons

Roger B. Jeans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Third Force Pipe Dream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ighting League for Chinese Freedom and Democracy, 1952-1954"

Peng Deng (High Point University), "The Demise of Private Education in China, 1950-1955"

The Art of Things Seen and Unseen

Molly S. Fros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ensuous Imagery in Modern Chinese Film"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員。本欄承陳三井、Roger B. Jeans 教授提供資料，特此致謝。

Douglas Wilkerso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Love in Search of Romance: Shen Fu and the Ming Essay"

Gulfs and Bridges Across the Pacific Rim

Daniel Metraux (Mary Baldwin College), "The Literary Legacy of Chinese-Canadians"

Cross-Strait Relations After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Szu-yin Ho and Jih-chu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nking in Taiwan"

Teh-chang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s Investment Policy in Mainland China: A Domestic Perspective"

Weixing Chen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The CPC 15th Party Congres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ar,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Asia

Wei-chin Lee (Wake Forest University), "Sales R Us: U. S. Arms Transfer Policy to Taiwan"

The West Looks at Asia, Asia Looks at the West

Derek Waller (Vanderbilt University), "Early American Travelers in Tibet"

Paul R. Rivera (Edison Community College), "Through Chinese Eyes: Chinese Catholics and the Maryknoll Mission Enterprise in the 1920s"

Paul B. Foster (North Atlanta High School), "The Ironic Infl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Lu Xun'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Romain Rolland's Critique of 'The Story of Ah Q'"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Ann L. Lo (Independent Scholar), "Epicureans and Gourmands of Qing China: Gastronomical Exoticism and Extravagance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New Patterns of Asian Commerce

Elizabeth M. Freund (Mary Washington Colleg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Public Enterprises: Corporatizing China's State Enterprises"

Scott Wilson and Ning Tang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A Regional Perspective"

Seth Har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lamming Shut and Flinging Open the Southern Window: Reflections on Hong Kong-Guangdong Relation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rea McElderry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Boom and Bust in Shanghai Securities Trading, 1880-1997"

Elizabeth Koll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Social Division on the Shopfloor: The Introduction of Factory Work to Nantong County, 1895-1930"

Kristin Staple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engdu, 1906-1937"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sian Traditions

Cecilia O. Jan and Lee-jan Jan (State University of West Georg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he Art of Fu Chuan-fu"

Howard Giskin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Chinese Dragon Tales: Communal Resolution of Difficulties in a Confucian Society"

Within Chinese Walls

Fred H. Martinso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Chinese Sacred Sites as Mandala"

Wah K. Cheng (Hofstra University), "State Authority and the Late Qing Press"

Edward Krebs (Independent Scholar), "The Walls Have Become Windows: A Book-Browser Survey of Chinese Publishing Today"

Central Asia: Yesterday and Today

Denys J. Voadan (The Mongolia Society), "Aviation and Politics in Mongolia, 1921-1945"

Alicia Campi (U.S.-Mongolia Advisory Group), "U.S.-Mongolian Political Relationship, 1915-1987"

Mrs. Baasan (Embassy of Mongolia),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Mongolia Today"

New Views on Traditional Asia

Zuyan Zhou (University of Florida), "Hundun (Chaos) and Hulu (Gourd) :Taoist Microcosms in Honglou Meng"

David Jones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The Fractal Self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Nature: A Daoist Manifestation of Chaos Theory"



學術演講

師友風誼，道術因緣——退休講演

王爾敏*

作一個個人學術進修的回憶性報告，實難避免流趨於兩個俗氣的後果。一個是流水帳登錄式，一個是雞零狗碎雜湊式，這種講演會令人沉悶。我非文學家，更怕做這類文章。如今像是緣走前人軌道，爲了退休，卻必須作如此這般報告，真是難爲人。好像既然退出江湖，還要作一個封箱大戲似的。

回憶我的學問造詣，原不值報告學界知道，卑卑無甚高論。但是有笨人可做成之事，也可以鼓勵他人參酌，能夠增加信心，放膽去做。我正是中庸之才，決無冒險精神，是靠一點勤勉謹慎，纔可以以努力累造一點學識。現在可以以時地變遷，劃分一些段落，提供後世參考。

我的生活經驗領悟，深知我的學問品詣，是靠師友的教化薰陶所範鑄。交代我自己，必須追溯與生平師友接觸經過，因而獲得薰陶與啓悟，學問增長，俱出於潛移默化之中。

一、學養根基的培育

我出生於河南省周家口市鎮。主要是一個農工中心，重商而輕學。只因祖父是廩生，父親是監生，家中維繫著濃厚的書香氣味。家境小康，可以供我專心讀書。我先讀家館，除了啓蒙師已忘其姓名，其餘分別追隨劉憲文、郭老敏、石榮濤以及三叔王家幹讀過四書五經。其中教我最嚴印象最深的是石榮濤老師。除四書五經外，我並已開講論語。其書名《二論引端》，並讀《千家詩》及《鑑略妥註》、《幼學故事瓊林》。不過我在課外，十歲以前已閱讀《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西遊記》、《封神演義》、《精忠說岳》、《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以及《濟公傳》、《野叟曝言》、《綠野仙跡》、《平山冷燕》、《女仙外史》、《清宮十三朝演義》、《薛仁貴征東》、《樊梨花征西》、《羅通掃北》、《劉金定下南唐》、《章臺柳》、《五美圖》、《十美圖》、《唐祝文周四才子傳》等小說。我必須說明，父親不許我讀《水滸傳》，同時我也不喜讀《紅樓夢》、《儒林外史》和《兒女英雄傳》。雖然這些書很常見，我也不讀。經過五年餘家館學塾，隨後我改入小學堂讀三年小學。校名是樂善小學，原由樂善書院改成學堂。校長是樊書楷（字佩之），他對我十分愛護，我對他畢生敬重，可惜他因是國民黨忠貞黨員，早被中共處死了，我至今憤恨難抑。

我開始有一定學問趣好，是在小學受于祥瑞老師的影響。因為他是新文學家徐玉諾的學生。所以大力推揚新文學各家作品，使我認識到鄭振鐸、朱自清、冰心、葉紹鈞、魯迅、茅盾、周作人、蘇雪林、凌叔華、許地山等作家。這個愛好的趨勢，延續到初中，我自己大看文藝雜誌和新小說、散文等作品。並長期訂閱《中學生》、《文化先鋒》、《中央周刊》、《西北文化》，借閱他人的《黃河》，記憶中又增加更多新作家名字。有謝冰瑩、王魯彥、王西彥、蕭軍、老舍、巴金、陳白塵、洪深、陳銓、田漢、孫伏園、盧冀野、趙清閣、陽翰笙、郭沫若、聞一多、歐陽予倩、張天翼、馬彥祥、臧克家、姚雪垠等。這中間很受女老師王桂芳女士的鼓勵，我開始嘗試寫小說。只在作文時有些無病呻吟之作。

我的新文學興趣，在讀高中時受到明顯挫折，是因為在作文時寫一篇小說，題名「二楊」，是一個鄰人小販的名字。寫他母子相依的窮困生活故事。由於文字太長，下筆不能自休，改到第二天呈交作文。被國文老師毛季浩先生批為抄襲，並向全班當眾宣布。使我真是羞憤氣悶。但我一直保留原樣，每週作文當堂敷衍寫完交卷了事，這篇小說亦保留在作文簿中，直到全本用完。並保存此文留作斷絕新文學的一個紀念。

我自高中已進入古典國學領域。特別是古代學術思想。受到閻子系老師（他近年病逝台灣，曾在世新教國文）和曾次亮老師的影響。我在高中已讀了「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孔子世家」、「荀子非十二子」、「莊子天下篇」、「韓非子顯學篇」等學術思想文字，是在課堂上學到，乃對古代思想打下良好基礎。閻子系先生更多講魏晉文章，包括曹操、曹丕、嵇康、陶潛等詩文。曾次亮則多講詩、詞、曲的區別。對曾次亮先生要特別一提，他是著名天文曆算學家。清人王韜的曆學三種是經他校注刊

印的。我因受他影響而學習到古代天文曆法。我可以在此透露一點，我自讀大學一年級起就加入了台北天文同好會作會員，是同學劉學高的介紹。我自此開始認識青年時代的蔡璋獻先生，他帶我們多次觀測月球表面和土星環。我們窮學生交不起會費，往往由蔡先生出錢招待我們吃飯。他真是一位精純天文學家，他的成就是日積月累而得。

我的英文不好，但在初中打下很堅實基礎，乃是梁燦章老師（字紫雲）所教。他也是我的校長，後來病逝美國。理科方面，除了物理尙學得好，數學、化學、生物均勉強過關，故只有絕意於理科上求出路。在考大學以前我只有歷史和地理兩科，自信遠超過別人。這兩科在初中三年受教於張又銘先生，高中則受教於程百讓、曾次亮兩位先生。程百讓是高中校長。我想我之能考進師範大學，全靠史、地、國文三科得分的力量。

在這裡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中學校長朱紀章（字修庭）先生。他只做短短一任校長，其實我上初中高中的三所中學全是由他創辦。我必須深切懷念與崇敬，是我在台北讀大學時期遇到他。他是立法委員。見我窮困潦倒，從此有兩年時間，每月接濟我一百元。那時一百元可等於現在一萬元。我想他也同時接濟幾位讀台大的學生。大家若不常記在心上，就是對不住師長的愛護。

二、大學時代所承受的人格與學問薰陶

民國三十九年夏秋，我有幸考進台灣師範學院，在我畢業那年親自聽到張其昀先生來校宣告這就是師範大學。畢業證書也加以實現。所以我可坦然自信出自一個國家的最高學府。在校四年對於爲人做事，學問識見有重大影響。

我自進學校以至畢業，校長都是劉真（字白如）先生。到校後的第一個新生談話，見到劉真校長，原來他還很年輕，不到四十歲，由他的英壯年齡和誠懇談話，可見出學校的蓬勃朝氣。那時學校很小，人數很少，只有十個系和一個專修科。而師資陣容則可謂是集國內名流，匯學林碩彥。這正反映劉校長虛心禮聘，苦心經營的成就。我有幸在此讀書，一開始就奠定了旺盛的求知欲，強烈的進取心。

我一個少年，漂泊天涯，到此就以學校爲家，寒暑假也住在學校。混了整整四年，連看門的工友、廚下的伙夫，也都會叫出張三、李四，我是

真正的吃定了學校。我的戶口就在學校，每年吃年夜飯，劉校長帶同若干老師，和我們一同過年，想想是親切熱鬧，深深值得回味。

在校承受老師教導啓發，對我人生觀的確定學問的方向，有極大影響。在校四年可以儲存入世四十年的學力、毅力、智力、能力等等運用。得自於各樣老師的言教身教。我是中上人才，一路做錯事而反省後悔，可謂難於儂計。經歷困難，方纔覺悟到老師教導之切，愛護之深。

我在歷史方面的學問，受業於郭廷以、朱雲影、王德昭、張貴永、陶振譽、李樹桐、曾祥和、戴玄之、藍文徵、姚從吾、勞榦與吳俊才等教授。地理方面受教於沙學浚、章熙林、孫宥越、蔡東建、王華隆、鄭資約、任德庚、朱祖佑等教授。國文方面受教於陳致平、程發軔、王叔岷、屈萬里、潘重規等教授。我的哲學老師是田培林（字伯蒼），邏輯學老師是陳大齊（字百年）。國音受教於王壽康教授。三民主義受教於孫德中教授。在學問上打下良好基礎，可以自信是師承有自，並感念老師的授業專精。

除上課以外，尚有一些老師對我照顧備至，使我感到有長者依靠，充分感受人情溫暖。我最難忘的幾位老師，有的雖未嘗教授我功課，但使我永遠紀念著他們。其一，王成椿（字壽巖，浙江人）先生，他是物理系教授。對於學生誠懇愛護，關懷備至。我並常到他家中聽他一些在上海的經驗，他原是做過訓導長，使他深知學生的困苦，故凡事代學生設想，我有許多個人困難，都是得他的幫助而改善，在校四年多承他悉心愛護，此恩永遠難忘。其二，戴玄之先生，本來我進入史地系是經過他的口試，而主要關係，他是我河南省鄉長，他結婚後就常請我去他家中吃飯，是照顧一個漂泊在外的同鄉後輩，而在我畢業後相繼保持密切來往，把我一個窮小子當親人看待。別的不說，單是爲我介紹女朋友，前後有三次，在第四次時，我已快訂婚，就作罷論。想想他每次安排雙方相見，不知花他多少心機，每每勞動戴師母燒製精緻菜餚，以使我等享受些口福。甚至又要陪我們去看電影。試想誰有耐心爲我做這等趕鴨子上架的事，他們寧其再三再四不厭其煩。我對這位鄉長真是沒齒難忘。其三，吳俊才先生，本校兼任教授，我在民國 41 年起先後選讀他兩門功課。班上同學他最賞識李恩涵和我。他爲照顧我，邀我到他家吃年夜飯，被我拒絕了。但我在年初也親自到他家中拜年。事情雖過了，但使我回想起來，總覺對不起老師，想來是由於年輕胡塗。不免後悔。其四，屈萬里（字翼鵬）先生，屈先生在台大、師大國文系中門人弟子累數千計，並自有其最親近的入室弟子。我只

在師大上他一門《版本學》，我算老幾呀！若把屈老師比作太陽，而我不過是倏然來去的小彗星。連最遠的行星也比不上。但是屈老師十分看重我，我出校也到中央研究院。他結婚也邀我觀禮，抑且他結婚後邀我去他家吃年夜飯，被我拒絕了。我原以為這一下可開罪了夫子，其實他看重我如故。談學問時我對《尚書》中一些解釋也觸犯他，他當面很不悅，後來仍對我很好。這樣老師氣度，令我永遠佩服，我真是敬佩他這樣寬博醇厚的師道。他雖然門弟子數千，我仍在他心目中有一定分量。其五，沙學浚（字道夷）先生，他是史地系主任，我們的大家長，我生平受他身教甚大，氣度風範，威重而慈祥，令我永遠景仰。當然受他學問的教益也是對我影響最深。兩樣我都在努力效習，畢生受用。他愛護每位同學，在畢業旅行時，他特別交我一筆錢資助同班十位窮苦同學的旅費。經我手分發，並向他報明。我想在那艱困時代，可解除我們很大困擾。可以高高興興去旅行。

大學讀書時代的糗事多如牛毛，不可一一登諸文字，不過尚有一點可以取信於師友的個人條件，則是做學生所意外達到的。當大學生一年級時，得悉同系學長呂實強榮獲全國性大專論文比賽第一名，全校同學為之振奮，視為全校榮譽。我心下十分嚮慕。於是不揣固陋，嘗試參加次年全國性社會組論文比賽，竟僥倖差得第二名。這一下子足然也使同學刮目相看。像我這樣土頭土腦，原來腹中尚有些文墨。其實我在讀大一國文時已在同班中小小露臉，由於大一國文老師陳致平先生在課堂上當眾宣讀我和劉芳剛、秦可喜兩位同學的作文。自己得到師長肯定。我之敢於參加論文比賽，也是因為得到事先的鼓勵。我無意誇炫這些瑣屑紀錄，但可告訴後人，我之走上文史之路，已在大學時期建立深厚基礎。

三、追從師教繼往開來

我自大學畢業就追隨郭廷以（字量宇）老師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始於民國四十四年進入中央研究院，專業治史。迄今已四十三個年度。我固然是一個後進末學，而量宇師早期中央大學政治大學門人若唐德剛、王聿均、竇宗一、鄭憲、孟瑤等，實早有各具建樹。但在後進的諸家英髦，自應各人選定方向，力求上進。我也必須自勉追隨，盡一分努力。

郭廷以老師是一代史學大師，其近代史著作可以永垂不朽。他的元、明、清專史也有其獨到之處，我有幸身為師大學生，承受他的授業、薰陶，

自感天幸際遇。量宇師自早有許多門下高弟子，原不缺少我們多幾個追隨的後學門生。我十分明白，自始我就必須加倍努力，以期不負量宇師的栽培。我雖不免自卑，卻絕不自棄，所以我敢用繼往開來要求自己，這全是真心，也決不涉自大。想想郭老師的學問傳給我們，我們這些直接受教的及門弟子，若不努力上進繼承並發展近代史這門學問，如何對得起老師？還能在杏壇混嗎？

我在學校追隨量宇師打下堅實的近代史基礎，進入中央研究院是科班出身，有七年時間編《籌辦夷務始末引得》和各類檔案。而關乎研究著作，首先的兩本專刊全是出於量宇師指定由我承命去寫作。這很重要，量宇師不但引我入門，而且領我即時進入堂奧。省卻我許多摸索試探。我著成《清季兵工業的興起》和《淮軍志》兩書，其中潤色文字，改正錯誤，皆曾經過量宇師之手。這對我學問的成全最大，使我畢生難忘。

我對於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檔案的經驗，可以在今天在此地顯露我的自信與榮譽感。當然一開始出於量宇師的囑命。但必須使大家相信，我自入中央研究院，以至今日，我一直都在編史料。最近一種是今年（民國 86 年）6 月出版的《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三巨冊。我的職事，直做到退休，我的功力絲毫未減，我前後編成的資料書和工具書有十三種之多。想想如此辛苦的編書工程，在同時代中無論海內外學者尚無在我之上者。我投界心血四十年，豈不以此自豪？我一直把近代史所工作視為己任，從不逃避缺席。例如我與同仁呂實強、王樹槐、李恩涵、王璽五人合編《中法越南交涉檔》，一年中編輯完畢，其他四人已一一出國，只有我一人承擔付印校對工作，一年之內出全七巨冊。我於印完之後方作出國準備，可以說始終一事，任勞任怨。近代史所中同僚，迄今仍在編資料出版者尚有林明德、黃福慶兩位。不過大家做口述史，性質也是一樣。這是一個學術傳統。我近十餘年編印盛宣懷史料六種，大致也是一力承擔。我不能保證有些小錯，但可坦言全經親手核校，絕無偷免。向來不會把勞動之事推給別人。編史料是為學界大眾鋪路，是為他人方便，此是貢獻勞力心血，故能在學界有發言的公信力。

我自第一年入手做《籌辦夷務始末引得》，即進入直接史料搜淘其廣闊內涵，雖然一步跨入史料叢叢，卻是真正找到門徑。這是近代史所和外國的第一個合作計畫，參與者為賀凌虛、呂實強、李國祁和我，共四人。我們除薪水外並無其他補助。

所中第二個對外合作的對象是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合作研究中俄關係。爲首的郭老師幾位大弟子王聿均先生等加入其中，在半年之後我們幾位新進青年，被分派編纂《海防檔》，也就是合力入手研究自強運動。參與的學長尙有呂實強、李國祁、鄧汝言、黃嘉謨等，此外分出一種資料浩瀚的《礦務檔》，由李恩涵、王璽兩位編纂。合力仍以自強運動爲重心。在我個人而言，我自中國近代兵工業入手研究，進而研究近代軍事史。對於湘軍、淮軍、練軍、勇營，我俱敢自承是個中權威學者。學界俱可取來拙著與各家同道咨證。我的學問建樹，俱在著作之中。也指導新銳學者從事研究。但如思念到啓牖前徽，就必須深深感謝恩師量宇先生給我的教誨。

我的學問自然流趨，因爲自強運動是近代史上重大問題，順勢即進入近代思想背景的追尋，由於內涵豐富，美不勝收，使我游騁其中，做了半生努力，著成論文達五十篇以上。投畀心血之巨，自可想見，所幸學界同道多加肯定，在近代思想領域有我一席之地，著作皆可覆按。我有何等貢獻，查對比較即可獲知，願與先賢後聖較量先後成果，重輕質量。

我在近代史所所拓展的第三個研究領域是基督教史。這也是受郭廷以老師的分派工作所引路。在民國 48、49 年間，我和呂實強、李恩涵受命展開編纂《教務教案檔》，我從這兩年經驗進入研究基督教史。嗣後我在民國 52 年至 54 年又到英國搜求基督教史料。可惜我在這方面著作甚少，只有數篇論文問世，有整整四五年功力，僅可以沾一點內行的邊緣。我必須說，我教導的研治基督教史的學生有五位。敘到此，可以總說一句，我之能夠開拓學術領域，實與編纂檔案密切相關。

我在近代史所拓展第四個研究領域是地方都邑史的研究，主攻中國沿海最早開放之五口，連帶也研討東、西、南、北洋問題，其中以上海所做工夫最多，其他包括廣州、寧波、廈門也都作過研究。在此可以順便一提，地理學也是我受教的專業，對於地方各領域我並不陌生，所以也能在這個範圍盡力作一點建樹。

我在學問上開拓第五個領域是明清社會文化史。原來自近代秘密會社入手，擴大至於庶民社會一切文化生活活動。因此能夠出版兩部書。而我近時正在指導研治明清庶民文化史專題的學生已有六位。我將順利的傳授門人，使他們各有建樹。我必須說明行情，今日學界研究民間社會文化的風氣，以研究宗教佔主流地位，而我與我的門人，沒有一個研究民間宗教。

只有我是包羅秘密宗教在內。也略談民間信仰，卻決不視為宗教。總的來說，我這個流派是避開宗教不談。不與主流的宗教研究爭分一杯羹。今日研究民間宗教者，人才眾多，我們無須加入。我相信我的天地遼闊，足夠門人作各個方向發展，並信心堅強。

總的說來，前期的二十四個年頭我能獲得近代史領域中各個重大方向的開拓，而尚存著若干潛藏的動能。至此方始敢於放馬出山，游走江湖。我自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以來，在明清近代領域之內，全未出郭廷以老師學問的外緣。只是較量宇師在個別小領域中多作深入，多作一點建樹，能夠堅定不搖的站穩五個領域，甚願接受質問挑戰，決不退縮逃避。

最後我必須略述近代史所這個學術重鎮的特殊風氣，這是郭廷以老師在其晚年所範鑄而成。近代史所是他一手所創，大部分外交部、經濟部檔案是他創所時向政府求得來，連年刊布各類檔案可以對得起政府，開放給中外學者來訪，也充分提供各界學者方便。至於量宇師個人，未嘗利用其中任何材料作過任何研究。其開闊胸襟、遠大眼光，能不令人折服？近代史所圖書不算很多，但所選甚精。再加大量顯微膠捲，可以提供多方面論題之參考，量宇師個人也未嘗就本所圖書作任何研究。我們做後學者追隨，在此中建樹學問，豈不飲水思源，想想所受厚益？

近代史所在量宇師主持之下，給予每位同事充分的學術自由，並不勉強任何人走其個人方向。我的老同事史語所出身的張春樹先生和其夫人近代史所出身的駱雪倫女士對於郭廷以先生有其定評，在香港任教期間曾向我論及，春樹說：郭廷以所長教導後進門人，其宗旨是造就學人，而並不是教導人只能成為學者。這話十分重要，但無他人知道，我願負責的寫出來，以供後人參閱。我很珍惜舊有的學術氣氛，懷有無限的回想追憶。

在郭廷以先生主持下的近代史所，人才進出是十分自由，大多是留不住第一流的卓越人才。這個黃金時代的同事們，真是欣和活躍。我深深懷念在初創時期的英英競爽之氣，彼此真心切磋學問，也都表現才氣學力，但無爭權利傷感情之事。因為本所是小得可觀，上層有郭所長和張貴永、陶振譽兩位老師相輔助。中層亦有王聿均承所長命照顧全局。我們下層的一群英年後進，正是全心投注於學習，也交換各人肚子裡的陳貨，隨空氣放出去就收不回來。這批才華洋溢的英銳同事，早離開本所，令人深深思念。他們是鄧汝言、李作華、呂士朋、許大川、李本堂、謝文孫、金承藝、賈廷詩、馬天綱、夏沛然、亓冰峰。還有轉入銀行界的郭正昭、李正三，

轉入政界的魏廷朝、張俊宏。他們固是各展鵬程，自必使郭老師感到惋惜。在女性同事方面，創所時代早有三位佳人參與。她們是王執文、駱雪倫、許淑真。我相信他們會想著郭老師，也一定會記著這個潛龍舊巢。

走掉的老朋友中，鄧汝言、李作華是我同班同學，無論學識才華，全都超越於我，到美國也有卓越表現。而在這些老朋友中我最懷念許大川先生，他出身名門，是一個個儻超群的公子。有充分良好教養，深識中外禮俗，平日交接，我向他學到不少洋規矩。我離開大學纔開始穿西服，當然不會打領帶，無論單結雙結，全是向他學得，他教我如何吃咖啡，吃西餐，中間的微細動作，何者中禮，何者不中禮，他都一一給我解說。這時我了悟到甚麼是文明，甚麼是粗野。我雖然土氣十足，也能做到頑石點頭。在感情上，許大川先生也對我極好，我和高貴人家全攀不上，自慚形穢。由於他的真純厚愛，熱忱相待。使我更感念他的人品超卓，具高尚氣質。我是永遠懷念他的談吐身影。

有三位同事代表近代史所的朝氣活力。一個是呂士朋先生，他人矮小而嗓門大，喜發議論，人又活躍。有他在三五人聚集就十分熱鬧。其次一位是李作華先生，他的個性外向，所有運動項目全來，對人熱忱，好管閒事。也喜歡高談闊論。一有他在一定使氣氛加熱，興緻升高。其次一位是謝文孫先生。他是西洋紳士型，熟諳西洋禮俗，最喜談論政壇中人事花絮。注重深入追尋，但眼光放得很遠，胸襟寬大，論事左右逢源，很具備外交家天資。

近代史所人才濟濟，靈氣所鍾，同仁眾多，無法一一歷敘，高人如林，各懷絕藝，豈可妄議雌黃？正待多人陳述。至於我們全部久留斯地流血流汗的老友共事同伴，大家接觸最久，人人也全部充分了解，我自毋須多所贅述。我一例祝福，恭祝大家健康長壽。

四、游歷英美與授學海市

(一)旅英：雪泥鴻爪

由於我有兩年時間專心致志的編纂教務教案檔，對於基督教史想作深入發掘，其時正值郭廷以所長與福特基金會訂定合作計畫，所中同仁已紛紛受支助到美、日訪問，我也獲得機會被送去英國研究。這使我有機會去

訪問那裡的各大教會，並進而採輯基督教史資料。由於呂實強、李恩涵兩位先生均用心於反教問題，我則另闢蹊徑，專志於傳教問題。

自民國 52 年 11 月至 54 年 10 月近兩年時間，我前往英國作訪問研究，可以說是土包子出洋，從此觀覽世界上文明先進，富強大國，真是大開眼界。這不但使我增長見識，也同時產生深深感觸，對世界、對國家，對中國流寓外洋的各類人物，對於個人的立身行事，均已產生重大啓悟，我自當珍惜這個機遇，需要作深心觀察體驗。

在英倫兩年，主要訪問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國家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自然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海軍學校(Greenwich Naval Academy)和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y)等，而主要則多走訪一些基督教傳道總部。其中包括聖公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浸信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聖經公會(The Bible Christian Hom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等，同時也訪問有兩百年以上歷史的兩所教會：S. P. C. K.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是 1698 年創立，S. P. G.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說來慚愧，我的這些研究，一直沒有進入撰述，沒有甚麼表現。很對不起量宇師的辛苦栽培。

在英國有許多可回憶記述之事，值得陳敘者在於師友的教導薰陶。我不可忘的前輩有陳源（字通伯）凌叔華夫婦、陳堯聖夫婦。都是外交界耆宿，而凌叔華為當代文學家。他們無論其學識淵博，而待人接物，誠懇溫厚，正見出大家風範，使我銘注深刻印象。陳堯聖先生尤其博學多聞，恬淡瀟灑，對來英青年多加照顧，他夫婦真是花費心力金錢不少。而代表政府的兩位新聞界前輩，王家松夫婦、曾恩波夫婦隨時給予多方招呼關顧。更有兩位長久旅居英國的劉殿爵先生和賴寶勤女士，也對我有諸多教導。當然我受恩於各大教會中的先生小姐們，一定永遠不忘。

到了英國也同時和一批自台灣來的學人多所來往，這同時有陳奇祿、王聿均、札奇斯欽、易君博、陸震來、黃美序、佟秉正、黃易、杜維運、王曾才、甘立德、江陵、陳鈞、莊明哲、程建人、金開鑫、余國燾等。而流寓全英國各地偶而來會者多不能記其名姓。我在英國與多人來往，方知國民黨的領導人有其卓識遠見，他們一直不忘培育人才，在經濟尚不寬裕之時，所派公費保送到英、美、法、德各國留學者已十分可觀。所見所親，

亦俱見英英競爽，不可輕視。自此深信國民黨必是人才濟濟，會有重大發展。不過此時也見到一些到外國游歷訪問的醜惡官僚，充分表現其上詔下驕行徑。這類政客，很會挾洋自重，大吹法螺。舉例一位教育部姓姚的大官，還陪著一位姓張的國際文教處長，代表政府宣慰留學生。旅英留學生及訪問學人集合盛大歡迎，表現得氣勢非凡。姓姚的大官全然一副洋買辦架式，大吹他自己一路訪問美、法、德、英所見大人物大政治家大學者，表示如何談話親密，彼此親切，好像凡夫俗子見不到那些大人先生一樣，他自己自然就更偉大可觀。須知我們聽眾，不是還在台北，深知各國的洋人會把姚某看成那股子蔥蒜？還不知照照鏡子，老兄在洋人眼裡還算得上虱蟻蚊蚋嗎？竟然還到英國嚇唬老百姓。我們孤陋寡聞，自來還不曾聽說有一位姓姚的教育家，真是頭號新聞。此宴以留學生勢眾人多，果然大家搶著發言，大吐苦水，箭靶也就全朝著教育部種種為難海外學生，傾訴薄待歧視。姚某招架得十分狼狽。靠王家松先生在席間解嘲。這事請問程建人、杜維運、王曾才、金開鑫甚至陳奇祿都還記得。

我固不崇洋媚外，但在英國頗得一些洋人關照和遇事解圍。我所最敬重的洋朋友康無為(Harold L. Kahn)是美國人哈佛出身，他那時正在英國，我可說深深感謝他對我諸多照顧，我永遠難忘。其次是倫敦大學漢學教授杜希德(D. C. Twitchitt)和日本史教授畢思類(W. G. Beasley)兩位。我承他們接受在大學研究，為他們增加太多麻煩，在此一併表達我深深的謝意。

(二)訪美：瞬息雲霞

我在民國 57 年至 58 年(1968-69)有一年時間訪問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是被邀請做那裡的高級專家(Senior Specialist)。主要是由其高級研究中心主任篠田實(Minoru Shinoda,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Projects)出面邀請，篠田先生是歷史系教授，因同系郭穎頤教授的推荐而邀我前往。

郭穎頤(Daniel W. Y. Kwok)先生是我思想史同行，但我兩人並不相識，由於他獲得一年休假，可以留在東西文化中心做研究，因此考慮到和我共事，此情我事先全然不知，忽然收到邀請函，我向郭廷以所長報告，承他同意，允許我應命前往。遂得有機會訪問美國。

郭穎頤先生對我非常好，我們不但天天見面，抑且多次一同用餐，我實在向他學到不少洋人的生活禮俗。在東西文化中心只要求作一次講演，

即可全部交差。這一年同時被邀請自台灣前往的有五位。有沈宗瀚、杜蘅之、翁紹耳、朱桓銘幾位先生。但是和我走得最近的是比我年紀小的朱桓銘先生，我二人同租一所房子住，後來又一同住在吳燕和先生家。

夏威夷大學集名流學者於一校，到此見到很多學者教授。可使我大開眼界而自度渺小。所見到中央研究院老同事陶天翼及吳燕和夫婦自不必說。尚有前輩鄭成坤、張鍾元、姚克，此外郭德華先生是穎頤太翁，也是外交界老前輩，是最早在抗戰勝利後交涉收回香港九龍城的外交代表。（注意：九龍城雖小，卻是外交大事，我有一個香港學生梁炳華以此題做博士論文。）

夏威夷大學內各系都有中國學者，有羅錦棠、張鏡湖、王兆凱、章生道、洪家駿、成中英、鄭延齡、范寶峰、范純、陶天翼、姜道章、吳燕和等。當然有不少遺漏也經久遺忘一些。總之這是一個華人學者較多的學校，是可以斷定的。

關於郭穎頤先生邀請我實有一個很重大嚴肅的目的，但直到我住滿一年，他也未向我言及。多年以後，我們二人在香港相遇，他方纔告訴我要做近代思想史料的翻譯，要和我共同選輯近代思想關鍵性的文獻，收集一起，譯成英文。這是仿照前人選譯古代諸子百家言論的前例，而重在近代思想家的經典著作，可使之流布於西方世界。如今既未絲毫啓步，只好待之後聖了。相信這種有意義的工作，永遠具有吸引力。

在夏威夷期間，在做人做事方面又增進不少識見。我以一個學人身份被邀，在外國周旋來往需要講究，幸有郭德華前輩時時指教，聽其解說一些外交界往事，方知我國打倒禮教之後，學者學生都成了白癡。見了西洋的禮教，方知覺悟已晚，周旋於洋人仕女之間，纔知道他人禮俗教養之深厚，舉手投足全循一定規矩。我華人到此場合，茫然不知所措。原來我連吃三明治的方式都不會，被我同學徐美齡指教，纔知道如何拿著吃。若到了飲酒調酒，更是比中國複雜百倍，有時主人親切的要親自爲你調酒，當面會弄得張口結舌，一臉茫然。自己丟臉，又使主人掃興。想想西方禮教，也是繁文縟節，美國社會尚是如此，歐洲文明大國更是遠遠超過。想想我國那些提倡打倒禮教的文人，真是喪心病狂，毒害後生不淺。打倒自己本國禮教，又要去接受洋人的繁縟禮教，這豈不等於邯鄲學步？抑且洋人會把中國人當作野蠻人看待。我想人類社會規範，最好聽其自然。我們只有努力學習，纔可以面對世界上各樣禮教。

在此訪問，也親自體會到美國學界名家的錚錚節操。可以寫來給我們學界參考。夏威夷州州長表達對學人尊重，下帖子邀請我們這四十位學人專家晚餐。設宴場地是當地最高級豪華的太平洋俱樂部(Pacific Club)，這當然是很抬舉我們。但是那些美籍真洋鬼子學者以為不妥，立即表明謝絕此一餐會。事情弄僵。官方請一位當地紳士，一位銀行家兼 Aloha 航空公司董事長，是姓張的華裔美國人。召齊學人前來疏通。這些美國鬼子堅拒不去，據理甚明，因為 Pacific Club 是歧視有色人種的人工貴族要地。訂明不接受任何有色人種進入。我們的美籍同事，全以為違反東西文化中心宗旨，並違反他們一生做東西文化交流的志節。一旦前往此地，即等於自欺欺人，名節全失。因此堅拒不往。後來改在州長官邸招待晚宴。告訴各位，州長官邸我也沒有前去。我以為太勉強的飯吃不下去，我決定逃席。至於這些美國的真洋鬼子學者，確足令我肅然起敬。

(三)寓港：海天流連

我在民國 66 年得劉廣京先生的推荐，李田意先生的約聘，而能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當然其中尚有王德昭老師的期許與鼓勵，使我能夠放膽前往。在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以及「方志學」等課。在港勾留，轉眼竟達十二年歲月。於學問的增長見識的開拓，均獲得深厚的充實與蓄養。這段講學時期，值得無限回味。

就香港中文大學的環境與接觸人際，在我個人所見，自是狹小而局部，我非交際能手，只憑個人周旋於有限領域，當不免有拘墟之見，不出乎主觀論談。我可以自學校談起，再談校外以至有關香港見聞。可佐我記憶，俾供他人參考比較。

香港中文大學雖非一流大學，而其校人才之眾，不能漠視，我無從鼓吹與評斷，只緣身在此山中。比較來看香港一個英國殖民地，被英國朝野人士既重用而且輕藐，其教化程度自被看在澳洲、紐西蘭、南非之下。（我這裡舉出澳洲、紐西蘭、南非，你或不甚明白。須知這些地方在英國上流社會眼裡是看成缺乏文化教養的下民。）更豈可與英土同日而語？只是一個有用的商業舞台，可以充分的無情的加以利用而已。香港當早有一個天之驕子大學，就是香港大學。而同時港府的英人領袖以及附庸英人的港人官僚，也一致看待對待中文大學作為二等或次級的學校。我一到中大就遇到香港政府整合性的教改大計。專門計算中文大學。但凡在中文大學作主

持的這長那長，也全然心知肚明。我敢說香港中文大學是英國殖民官僚蓄意製造的二流大學。我也時常見到聽到一些同事私下大發牢騷，但對英官總是必恭必敬。雖然如此，香港中文大學的師生卻是自尊自重，自強不息。完全值得肯定。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享受學術自由，一意專心教書，其他事務絲毫不加聞問。我雖只教十二年書，卻可成爲三朝元老。一到中大校長是李卓敏先生，我和他全無來往，一無接觸，很快他就退休離校。印象不深。只有一點要在此透露，李卓敏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到英倫敦進行其就任中文大學創校的就職講演會，當時有我和陳源、陳奇祿兩先生到場。抑且陳堯聖先生請他吃飯，也有我和陳奇祿先生在同一席。此事我在香港一直未曾透露，也決不會向李校長去談。今天是第一次說出。現在的重要人證是陳奇祿先生。

馬臨校長繼任，在位達十年，我感謝他對我的尊重，我雖然年年參加校長公館酒會，而只有一次作了他特邀的座上客，因爲校方在考慮籌款購買盛宣懷的生平來往書牘。主要因爲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鄭德坤先生交我評鑑這批資料，由於我向鄭所長力荐購買，因是馬校長同時邀請鄭所長，及收藏家程伯奮先生和我一共三人到校長公館用餐，順便作籌款購買決定。後來是由校董利榮森先生出資爲中大買下這批寶貴資料。我雖然吃了這一頓飯，卻爲中大先後編刊盛宣懷資料六種，前後費時十四年。用此報答馬校長對我的信重與禮遇。

我在歷史系任教，系主任是孫國棟先生，唐宋史專家。他是一個謙謙君子，有儒行格局，可以見出其醇厚雍容。真不愧是錢門大弟子。此外尚有羅球慶、蘇慶彬、李杜、羅炳綿、唐端正、王煜幾位錢門弟子，我真是如入儒鄉，深佩錢穆先生在香港的遺風，一個當世儒者，能在英國殖民地之下，保全中國文化元氣，在當世學術界，真是難得。值得敬重。其實我早相識錢門大弟子何佑森、余秉權兩先生。我早在台灣推尊陸寶千與何佑森爲當代純儒，心下一向欽佩。惟於久負盛名的余英時先生接觸太少。但自我到中大以來，也多承余先生許多愛護與相助。在此一併說明我對錢門諸多弟子的敬重。當世儒家傳承，只有這一個陣營在支撐大局，代表今世儒生維護中國文化的中樞脈流。中流砥柱。

在香港中文大學我所受益的長者是劉殿爵、鄭德坤、王德昭三位先生。俱是博通中西，遍覽古今，足爲世界一流學術表率。他們的愛護至深、鼓勵至切，俱在潛移默化中使我的人格學問並能提升增長。

香港中文大學文風鼎盛，這其中要推重宋淇先生為隱然領袖，他是卓越的散文家更是精深的紅樓夢專家，足以表率群倫而護持善類，一時文學名家如余光中、余也魯、陳之藩、劉紹銘、鄭樹森、梁錫華（佳羅）、孫述宇、葉維廉、黃國彬、遼耀東、蔡思果、黃維樑、盧瑋鑾、李金銓、鄭子瑜等均聚集中大，形成文風重鎮。我在此環境中，也受到不少影響，感受文學薰陶。

從中文大學向外延伸，以我的一點學術聲譽，我同時做了三所大學的校外委員。原來的浸會書院請我做歷史系的校外委員。這是校長謝志偉和歷史系主任劉家駒先生所邀約。原來的嶺南書院我被邀為文學院的校外委員。這是校長陳佐舜、文學院長梁錫華所邀約。此外珠海書院聘我做文史研究所的校外委員。這是校長梁永燊所邀約。

再向外推展，我也結識了香港的一些社會賢達。故而能到各處被邀講演，而且多是被人約定要講論孫中山。當然也有其他近代史上的論題。雖然為量不多，而十二年間公開講演有十六七次之多。我的在港活動以學術為界，居然頗能受到各處尊重。同時，也參加不少學術會議。除此以外，雖不免有不少人事周旋，人物款接，中外時勢嬗變與觀感，但因不在學問探討之列，自無須一一引敘。

五、餘 論

我必須說我是平庸人才，壯年以後，懂得反省，多自檢驗個人的缺點，從而知道改正。因此也就成為我的一項優長。我一切失敗，只有在學問上成功，有重大貢獻，有不少超過同輩學者之處。舉例說，我畢生編著資料書工具書，所有學界人士不能和我對比，一定在我之下，再舉例，我在大學開課十三種，我相信趕得上我的學者也極少。例如「近代重大問題研析」（近年只有呂實強學長開此課）、「中國古代典籍」、「掌故學」和「近代名人箋啓」等課，是自我開始，前人和同時代均無此課。我開課豈是兒戲，必須是研究生完全傾服，方可站得住。我非常盼望各位學者與我開相同之課，可以體驗其中苦樂，我非常盼望各大學開此課，如無其人，我的門人會接班。我已有兩位門人出師在大學裡開「方志學」和「歷史地理」。這兩種課我仍在師大講授。自信後繼有人。

我是中庸之才，自小就進展緩慢，我讀了五年家館，三年小學，方進

入初中，比他人多費兩年時間，我在高中畢業正逢國共內戰，全國動盪，家鄉淪陷，浪跡四年方考上師範學院。使我獲得進修機會，又是晚過別人。我最當感激郭廷以師的識賞，可以追隨他創建近代史所這個學術重鎮，我當如何努力報答恩師、量宇師是決定我一生命運之人，我怎能忘本，我無時不深深感懷師恩，當以宏揚師教為職志。

郭廷以師對我們門人後生十分寬待，加意培植。而我不過是末學後進，照著師道倫理，一切自甘居後，自有幾位大弟子可以直接承命，代為分勞。其實我為此疏於對師長的親近禮敬，內心是十分抱愧，今日想來，更覺對不起師長。我的做法是錯誤的。

在近代史研究所，諸多同僚，各有專長，大家受教於量宇師，有幾位長者常常協同經畫本所各項事務，我自是諸事不問。不過有時郭老師也命我做一些瑣事，做事很小，也很偶然。譬如量宇師隨時命我查一些洋人人名，他要我查一下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的英文名，麥士尼為能(字問皋)(William Mesny)的英文名，是我代為查出。又有香港大學Cranmer-Byng教授因注解馬戛爾尼日記，向量宇師求證，有兩位陪伴的中國官員周大人、萬大人究為何人？量宇師把此事交我去辦，經我查出周大人是喬人傑，萬大人是王文雄。後來Cranmer-Byng教授出書，對量宇師大表感謝。其實我是何等的熱切盼望能隨時為老師服務，代量宇師分勞。此外我也曾代量宇師準備學術報告性資料。我傾心盼望量宇師給我一些報效他的機會，但是自覺實在做事太少，不能報答師恩於萬一。

近代史所人才濟濟，同仁老友不必一一登錄其名，各人自有專長，獨立著述，均成名家。無論在學問觀摩，與做人風品，我都獲得薰陶，受益甚大。一個學術機構要正面競賽，不要鉤心鬥角，大家正面建樹，都會有成就。

生平交際，受到師友的關照與成全甚大。無論在何地，多得他人相助，一切受到恩惠，可以永存記憶。我學習日久，深知如何立身行事，早已明白為人所當執持，通曉職業倫理，漸次犯錯減少，亦足以不負恩師栽培，立足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何人敢於輕視。官場人物，無論如何顯赫，一概敬而遠之，謹守學者清白，站穩君子立場，保持一個士人風品。雖在窮困地位，不失清廉節操。要有所不為。尤戒貪得。正要做到莊子所謂：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相託於學術界領袖，要知所進退，知所堅持，這中間須慎選出處。在此考慮下，學界領袖我推重王壽南、李雲漢、郭穎

頤、傅應川、林天蔚、林治平等，我願追隨合作。主要出於充分信賴，我以為不在於任何得失，而是不至於損名辱身，這有極深遠意涵，不足細述。

我也有幾位很要好的洋人知交，一個是康無為(Harold L. Kahn)，一個是包德威(David Buck)，都是近代史同道。我生平處處承他們關照，他們對我無微不至，一切為我設想，我受他們的好處，不能忘記。還有一位在台最久的艾文博博士(Robert L. Irick)，可惜我剛聞說他近日病故。他雖出身哈佛，最不驕傲，早在 1960 年代就對我十分信重，彼此十分要好，但無一毫事業的來往。我仍然很土，不染洋習氣，也真學習不來，更不拿洋人裝點門面。尙有不少洋朋友，我自十分敬重，但可不必一一列舉其名，他們也不會計較。

我自近史所創所之年追隨郭廷以所長，一向本本分分做事，感念老師恩誼，努力報效自己，在所中有何貢獻，俱可見之於實質的工作成品，有心人可查照比對，對史學界虱於名流之間，決無愧色，我為他人鋪路甚多，皆可比較高下，一切著作，後世自有公正評駁，不待多敘。我是本所第十一位退休之人，從創所以來，均已付出心血勞力，俯仰無愧於師友，回味有安於良知。如今退休，可以善刀而藏之，毫無遺憾。

附記：感謝陶英惠先生費神校訂，改正錯誤。感念思想文化史組主任熊秉真博士對拙文的精要之處公開朗誦。本人備感榮寵。

中華民國 86 年 10 月 22 日於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67)

劉承漢先生訪問紀錄

校閱：郭廷以·沈雲龍 訪問：沈雲龍 紀錄：林泉 681 頁 精裝 500 元

劉承漢先生(1901-1992)，江蘇省東台縣人，1924 年金陵大學商業專科畢業，旋以第一名考取甲等郵務員，開始踏入郵政界。1928 年再考入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攻比較法學。1932 年擢升郵政總局法律秘書兼法規課主任，任職達十年之久，郵政法及郵政法規之起草，均出於先生一人之手。抗戰勝利後，派長甘寧青郵政，於發展西北郵務頗多獻替，另奉派出席於巴黎舉行之第十二屆萬國郵政聯盟大會。來台後歷任郵政總局副局長、代總局長，並兼任交通部參事，主持交通各業基本法之起草。先生服務中華郵政，歷時四十三年。本訪問紀錄內容，遠溯自 1868 年新郵誕生，以迄中華郵政撤退來台，舉凡有關重大問題，與夫先生及身親歷之見聞，以「從郵談往」為題，作詳盡之介紹與分析，誠為中華郵政史有系統之珍貴史料。



研究與教學

教學與研究生涯四十年

孫廣德*

前 言

我曾在中等學校教書十年，然後停止教書而去讀了五年研究所；研究所畢業之後，又到大學教書二十九年，合計三十九年，不足四十年。從在中等學校教書便自行摸索研究，所以研究時間則超過四十年。茲將二者取其整數，就籠統地說是四十年吧。

與教學與研究無關的事情，似乎沒有詳述的必要，不過有幾件事，仍可在此略加舉述。其一、我於民國十八年出生於山東省萊陽縣一個農村，上小學一年級，正值對日抗戰開始之年。到初中二年級，抗戰勝利，繼之便是國共戰爭。所以從小學到高中的學業，都在局勢不安，經濟條件極差的情形下完成。流亡期間，常數日沒有飯吃。來台後的第一年沒有上學，而且生活無著，爲了糊口，曾做過打零工、賣報紙、修馬路、當學徒及幫人種田等工作。其二、從小學到高中，我的各門功課成績大體都是很平均的，沒有那一門特別突出。其三、在一般人喜歡讀小說的年歲裡，我很少讀小說。記得初中、高中時代，每逢寒暑假，同學們大都每人借一大堆小說，看完了再彼此交換。而我則讀些三民主義、孫文學說、哲學概論、理則學、經濟學大綱、政治學概要、農業經濟以及討論批評上述各類著作的書。其四、我的志願曾經過幾次改變，大致小學階段，想做一個橫刀躍馬的將軍；初中階段，想做一個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家；到了高中，開始想做一個引導人類思想的哲學家。所以高等教育階段，我本想學哲學的，但由於許多因緣與環境的影響，專科學校讀了教育，大學讀了行政，研究所讀了政治。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退休教授

一、教學與研究的經歷

我專科學校畢業，受了一年軍訓，便到中等學校教書，大學是夜間補修學分，白天仍在教書，先後曾在台東農校、花蓮師範與新莊中學教過國文、英文、西洋史、教育心理、教材及教法與三民主義等，而對哲學的興趣未曾稍減，總覺得一般社會科學有些膚淺，不夠深入。於是除從哲學的角度研讀經書、諸子之外，也研讀一些當代哲學家的著作。於經書、諸子，特別喜歡老子、莊子、韓非子與宋明理學；於當代哲學家的著作，則特別喜歡馮友蘭、唐君毅及牟宗三諸先生的書文。民國五十年左右，曾受他們的啓發，以「心之發展」為總題目，寫了一系列每篇數千字的文章，發表於當時在香港出刊的《人生》雜誌上。其時也讀些心理學的書，不過總覺得心理學的研究不夠深入，其中所講的東西，我們大都已經知道了，它只是作了些實驗，並加以系統化而已，所以興趣不大，只有對精神分析興趣較高。

進了政大政治研究所，我的心之發展有了轉變，覺得社會科學的論題與方法均有可取，不再認為它膚淺了。不過對哲學仍有相當興趣，因而想在所修習的政治學領域內，找一個與哲學最接近的科目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幾經斟酌，以為政治思想與哲學最為接近，便想著力於這方面的研究。但政治思想又分中國政治思想與西洋政治思想，當時因為我讀了不少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書，又修過柏拉圖(Plato)研究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研究的課，所以本想研究西洋政治思想，但經與當時任所長的鄒文海師商量，考慮到出國的機會很少，在國內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很不方便，於是便決定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碩士論文乃以「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為題。因為有研讀經書、諸子及涉獵哲學著作的基礎，所以寫起來非常輕鬆，寫完了覺得很不過癮，因而在當時規定最短畢業期限的兩年內獲得碩士學位後，接著攻讀博士學位，想找一個較具困難性的題目撰寫論文，幾經考慮，乃決定以「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為題。寫這個題目，雖須地毯式的研讀所涉時代的全部典籍及後人相關著作，但仍於當時規定最短畢業期限的三年內完成，而獲得博士學位。

民國五十七年應聘至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及研究所教書，並先後在政治

作戰學校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興大學行政學系、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兼課，且於台大第二次休假期間，至東海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及研究所任客座教授一年。在大學教書期間自然要作研究，因為教書與研究是分不開的。

二十九年中，除在台大政治學研究所開過幾年「政治神話研究」的課，出版過一本《政治神話論》的書之外，都是從事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所以我的專長是中國政治思想，政治神話只是涉及而已。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除我之外，至今國內各大學沒有人開過「政治神話研究」的課，也沒有第二本《政治神話論》的書出現，所以在我開課的時候，常有外系外校的學生來旁聽。至於中國政治思想，先是研究古代的，自從二十多年前在台大政研所開授「晚清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一課之後，也同時研究近代的，先後曾自行開過大學部的「魏晉以來政治思想」、「中國政治思想史」，碩士班的「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晚清政治思想專題研究」，與賀凌虛及繆全吉二位教授合開過博士班的「中國近代政治分析」、「中國近代政治典籍研究」與「中國近代政治專題研究」，而負責政治思想部分。並同時配合教學進行研究，除參加學術研討會及講演所撰寫的論文外，每年均向國科會提出研究著作或研究計畫而得獎助，無一年或缺。與教學及研究相關的，則是指導過約三十篇碩士論文，十二篇博士論文，題目均屬中國政治思想方面，其中有許多於口試時頗獲好評，有些已經出版問世。

二、教學與研究的甘苦

在各種行業中，我獨喜歡教書與研究。記得民國四十二年，在預備軍官訓練班第一期即將結業之際，政府發了就業志願調查表，共可填寫三個志願，而我三個志願都填了「教書」。大概因為我的高等考試考的是教育行政，結果被分發到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去了。那時省政府在台北，教育廳就在現今監察院那棟樓上。當時我覺得台北很吵雜，又覺得處理公文很無聊，不需要什麼學問，於是待了不到兩個禮拜，剛開始正式上班，便請求人事室把我分發到偏遠的中等學校教書，後因至大學補修學分，又回到台北。

我從在中等學校教書開始，便利用課業之餘，自行研究。到了大學教書，更是教書與研究並重，而且二者互相配合。我的興趣本來在教書研究，

能進入這個行業，自然是甘之如飴，當然與從事其他行業的人一樣，也免不了有些苦處。教書與研究的樂處，在於天天與學問接觸，使自己的學問不斷地增進，而且隨時有機會講出來，寫出來。此外在教書方面，遇到聰明好學的學生，見到學生有好的成績，寫出好的報告或論文，都會令人喜悅，尤其眼看著學生成長，甚至有所成就，更是令人欣慰。在研究方面，研究的問題告一段落，發表一篇論文，出版一本書，都會帶來快慰，尤其得到什麼研究獎的時候，更不勝欣喜。

不過苦處也是有的，我凡事要求完美，所以上課前常作過分的準備，上課要講的東西，必先寫好講稿，上課的前一天晚上再用心地細讀幾遍，至於能夠全部記憶為止，以免上課時講得凌亂，浪費時間。研究所的課，差不多每年都換新的專題，專題的選擇自然要花很多的精力與時間。這些當然都很辛勞。但這只是盡本分，不該叫苦，苦的是遇到學生成績差，無法使他及格，那是非常煩惱的事。有時所指導的學生論文寫得太差，三番五次幫他修改，常令人苦不堪言。論文考試時，被其他考試委員指出錯誤、缺點，或給予不太好的評價，常會好多天覺得難過。

在研究方面，資料的搜集、處理與論文的撰寫，其中雖有樂處，但也非常辛苦。作任何一個問題的研究，一個大學圖書館的資料絕對是不夠的，爲了搜集資料，常須奔波於各大圖書館之間，有時還須輾轉請託友人從國外搜集。到較遠的圖書館搜集資料，中午無法回家，吃飯休息都不方便，常須餓著肚子，拖著疲乏的身體，強打精神，繼續搜集下去，這樣的情形，常常需要連續好多天；遇到重要資料無法獲得的時候，更是苦惱。資料蒐集好了，便要加以處理，面對大堆的資料，取捨、爬梳、理出系統，都是很傷神的事。至於撰寫論文，更是要絞盡腦汁，連續許多天坐在書桌前苦思、撰寫，常使消化不良，影響睡眠，我想作研究的人大都受過這樣的苦。論文寫出來，要發表的時候，如果與審查人的意見不同，而不得不屈從修改，那又是一種苦處。

教學與研究，其中雖有樂趣，但實在是一種很辛苦的行業。記得某教育部長曾有一次請台大七、八位教授談話吃飯，席間說：你們教書的人空閒時間多，又有寒暑假，可以自由看看書，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我們做公務員的天天要上班，沒有自己的時間。我回答他說：做公務員只在辦公室裡工作，下班後回到家裡，時間便屬於自己了；我們教書的，工作實無日夜之分，晚上回到家裡照樣要做，連看電視的時間都沒有，而且常常要做

到深夜，寒暑假雖不須上課，但有數不清的考試，有審查不完的著作，何況又要準備開學後的功課，利用時間多作研究呢？所以仍然要日夜忙碌。他聽了之後有些尷尬地說：是，是，你們的確很辛苦。

三、教學與研究的方式

前面曾提到過，在大學教書期間，我的專長是中國政治思想，所開授的課程與所研究的題目，主要是屬於中國政治思想方面的。中國政治思想的教學與研究有兩種方式，一是專家方式，二是專題方式。

專家方式是逐一講授或研究某家某人的政治思想，專題方式是從中國政治思想中找出一些重要或具代表性的問題，加以講授或研究。這兩種方式各有優點與缺點。專家方式的優點是資料比較集中，容易掌握，可以對某家某人的政治思想作全面的研究，有全面性的瞭解。缺點是無法貫穿古今，看不出中國政治思想中共通的重大問題。

專題方式的優點與缺點恰好相反。優點可以貫穿古今，對中國政治思想中共通性的重大問題作系統性的研究與瞭解。缺點是涉及的時間較長，思想家較多，資料零散，搜集起來困難，不易巨細靡遺地全面掌握，而對所涉及的每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只取其與專題有關的部分，不能有全面的瞭解。同時作專題研究，須對全部中國政治思想有相當基礎，否則對所採每位思想家涉及專題的部分思想，常會斷章取義，頗易發生誤解。

我在教學上，大學部的課，大體以專家方式為主，以專題方式為輔，就是主要按年代的先後，逐一講授某家某人的政治思想，但也常從某家或某時代許多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抽出幾個共通性的重要問題，綜合地加以講授。研究所的課，則完全採用專題方式，以問題為中心，對中國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課題，綜合各時代各有關思想家的見解加以講授，並留出時間讓同學發問討論。在研究上，有時採專家方式，有時採專題方式。

不過依我的看法，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專題方式似較專家方式為好，因為研究中國政治思想，本來就是要嘗試瞭解中國政治上的問題，探索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途徑。知識就是由問題的發生、問題的瞭解與問題的解決而形成的。杜威(John Dewey)認為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問題，首先認識問題，瞭解問題的性質，再想出解決問題的假設，然後使用所想出的假設去解決問題，如果問題得到解決，這假設便成爲一種知識。人類生活中

所遇到的問題很多，因而也引起許多思想，政治思想就是政治問題所引發的。如此說來，愈是亂世，政治思想應該愈發達，因為亂世的政治問題特別多，證諸中國歷史，這大體是不錯的，難怪鄒文海先生曾說政治思想是不祥之物呢。

四、教學與研究的困難

中國政治思想在教學與研究上的困難，第一是有關中國政治思想的著作，尤其是古代典籍，大都是後人纂輯而成，內容多駁雜，零碎而無系統。一本書之中，常常人生、政治、天文、地理、花鳥蟲魚甚至物理化學等，什麼都談，而不是專講政治問題，雜亂無章，沒有明確的主題。西方政治思想的著作，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情形，但比中國政治思想的著作要少得多，一本書的主題大都很明確，全書的重點都在討論政治問題，而且很有系統。譬如柏拉圖的《共和國(The Republic)》，從頭到尾都在討論如何才是一個合乎正義的理想國家，只要讀一遍，便可以把握住它的重點，有完整而系統的瞭解。其他如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神都(The City of God)》，以至後世許多政治思想的著作，大都如此。中國政治思想的著作則不然，如《論語》，不要說讀一遍，就是讀三遍五遍，也難把握住它的重點，而有完整系統的瞭解。其他如《老子》、《孟子》，以至於其後許多諸子的著作，也大都如此。因此要瞭解其中的政治思想，必須熟讀之後，把它打碎，撿拾重組，這在教學與研究上當然要困難得多了。

第二是有關中國政治思想的著作，尤其是古代典籍，大多全部或部分有真偽及年代的問題，也就是所謂偽書。偽書的產生，大概因為一是從前國人好託古，常把自己所著的書託以古人之名（郭象例外）。二是秦火之後，許多書不見了，西漢時代鼓勵民間獻書，獻書的人爲了求賞，難免有偽造者。三是有人爲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偽造或竄亂古籍。四是編纂或傳抄傳述者無意中弄錯了。於是許多典籍的真偽便成了問題，而有偽書出現。所謂偽書，有全書皆偽者，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載黃帝著或黃帝臣著，以及堯、舜等人所著的書，顯然全書皆偽，因為那時連文字都還沒有哩。再如《鶡冠子》，標爲周人所著；《六韜》，標爲太公兵法，亦是全書皆偽，從內容及用語中便可看出，又有部分真部分偽者，如《管子》，有部分可

能真是管仲所著，但其中摻雜了各家各時代的作品；《商君書》，可能有商鞅自著的部分，但也有部分是後世法家作品。以至《荀子》、《韓非子》，也有些不可靠的部分，連一般認為最可信的《論語》，崔述的《洙泗考信錄》中還說最後兩篇不可靠呢。偽書太多了，請看張心激的《偽書通考》，中國古代的典籍幾乎無書不偽。我們教授與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人不長於考據，又無暇多作考據，在這種情況之下，教授與研究起來，實在倍感困難，只好參照各家考據的結果，加上自己的考據和判斷，作個交代而已。

第三是原文引用的問題。教授與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常遇到的一個困難，就是原著文字的引用。爲了要忠於原著，在教學與研究上不得不引用原文。但引用得太多，變成抄書；引用得太少，又常變成斷章取義。所以在引用時要煞費斟酌，絕對必要的才加引用，非絕對必要的，盡量不加引用，而且引用時，盡可能把不相干或不重要的語句刪除，而用刪節號代替。這樣說來，似乎並不困難，但做的時候卻不是那麼容易，常令人大傷腦筋。尤其在教學上更是困難，在課堂上講述的時候，只把原文念出來，學生聽不懂，無法作筆記；寫在黑板上，又太費時間。因而只好自己多辛苦一些，把原文背得很熟，上課時以不慢於口述的速度寫在黑板上，然後略加解釋，這樣才不會影響進度。說到這裡，想起在國外教授中國思想的朋友們，對這個問題不知道怎麼處理。

五、教育與學術圈內的見聞

長期在中等學校教書的人，大多只把教書當著一種謀生的職業，沒有什麼理想抱負，甚至沒太大的興趣，所以很少人作研究，平常上上課改改作業就算了，寒暑假裡，則下下棋，打打麻將，聊聊天，以打發時間。但也有少數的人肯作研究，而且頗具功力，其本行的學問甚至比一般在大學教授同科目的人還要好。當校長的人，一般當然都想把學校辦好，但只有少數人真正熱心教育事業，以終生奉獻的精神辦學。另外也有極少數人靠著某種關係當了校長，而不學無術，整日交際應酬，吃喝玩樂，貪污舞弊，不知廉恥。剛好我就曾經遇上了這樣一位，對他厭惡至極，他接任一年之後，我便離開了那所學校。在那一年之中，我沒與他講過一句話，有時剛好迎面相逢，他向我打招呼，我也置之不理。以上見聞是三十年以前的情形，現在如何，我不敢說。

大學裡的情形與中等學校不同，不過前後有很大的變化。剛到台大教書的幾年，整個校園是一片肅穆寧靜，很少受社會政治的風浪所波及，沒有學生鬧事，同仁們各人教自己的書，作自己的研究，不干擾他人，不會勾心鬥角，沒有人爭著去做系所主任及學院院長等。系務會議不大召開，其他會議更是少之又少，沒有甚麼公文雜事，以政治系所來說，只有一位助教，除處理系所務外，還有時間自修研究。在外兼差及借調兼官的人不受尊重，升等要扣分，他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這種風氣真使人有一種安祥的感覺。

但後來漸漸發生了變化，校園不安靜了，學生常相聚轟鬧，鬧校務，鬧政治事件，甚至鬧到學校外面去；有些同仁也參與其中。同時會議多了，公文多了，雜事多了。近年來，政治系所有三位助教，一位祕書，整天忙得團團轉，而且只辦系務，不再自修研究。系所主任、學院院長等，忙碌又辛苦，但許多人爭著要做。兼差及借調兼官的人越來越多，而且被視為有辦法，自己也覺得光榮。甚至有些人到處參加政治活動，希望找尋做官的機會，以教學為副業，更不作研究。尤其自所謂教授治校之後，系所主任、學院院長及校長等，均由教授投票選舉產生，而出來競選者大有人在，拜託拉票，運作造勢，而形成派系，互相對立，整個校園一片亂象，往日純樸的學風不見了。接下來大事小事都要投票決定，大會小會不斷，整天有開不完的會。這對教學與研究當然是會有影響的，所以我非常厭惡這種現象。不過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認真教學，孜孜不倦地日夜研究。對這些人我非常崇敬。

一般而言，在大學裡，我所見到的教授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學問好，會教書，但不作研究。第二種是學問教書都好，也肯作研究。第三種是學問教書都馬馬虎虎，又不肯做研究。我所見到的校長則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完全放任，什麼都不管。第二種是有點僚氣，但很有辦法。第三種是婆婆媽媽，只留心瑣事。第四種是雖然做得很辛苦，但仍有些罩不住。

在學術方面，大約我到台大政治系所教書的前十多年間，是行為科學最熱絡的時期，凡是掛有行為科學標誌的課，學生趨之若鶩。相對的，對思想、歷史方面的課頗不重視，曾有一段時間，大學部「中國政治思想史」及「中國政治史」兩課，只有政治理論組為必修，在國際關係組與公共行政組都被改為選修，而「中國政治制度史」一課，則根本沒有開。但後來

風氣慢慢轉變了，行為科學方面的課選修的學生越來越少，「中國政治思想史」改為三組必修，「中國政治史」與「中國政治制度史」，三組皆必選其一。至於研究所學生寫論文，選中國政治思想、政治史及制度史方面為題目的人，自始便有。待博士班成立以後，因為當初成立的時候，大家有一個默契，就是以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為主，所以選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以至政治史及制度史為論文題目的人特別多。不過後來這個默契漸漸被大家忘記了，因而也有不少人選其他方面的題目寫論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現代化，在大學裡及其他學術界，一直是被關切而討論的問題，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問世。對這個問題，這裡只提到我所看見的一點，那就是大約在十多年以前，有些人，尤其是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或在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學者，大都把中國現代化的緩慢或失敗，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身；而他們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的思想而言，這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及其弟子們以來的一種普遍說法（不過在美國老一輩的中國學者，如蕭公權先生、瞿同祖先生等，卻都沒有這種論調）。但自從亞洲四小龍興起之後，這種說法很快地有了轉變，許多人認為亞洲四小龍都接受儒家思想，其所以快速地走向現代化，自當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因而儒家思想不僅不妨礙現代化，而且會促進現代化。於是有些人也有些研討會，特為撰寫論文，討論儒家與現代化的關係，而結論大多是肯定的。由此可見學術界，尤其是人文與社會學科，其研究結果只能作為參考，是很難有定論的。

我是純教書研究的，未曾擔任過學校的行政工作，更未曾做過政府的教育官員，且又個性內向，頗少交游，所見所聞有限，以上所謂見聞，只是點滴，不能代表全面。

六、學習與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用處

有些人常有一種疑問，就是學習與研究中國政治思想有什麼用？這些人之中有學生，也有同仁。他們的意思是學習與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實在沒有什麼用。因為一則中國政治思想所講的是從前人的思想，已不適用於當前。二則中國政治思想所講的只是從前人的意見，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其實這種見解也指涉到西洋政治思想，以至經濟思想、法律思想等。也就是說在社會科學領域內，講思想是沒有用的。以台大法學院的情形來說，經

濟思想似乎沒有開課，因為開這門課要研讀許多從前的典籍，開了課又不受歡迎，辛苦而不討好。法律思想雖有很好的師資開課，但選課的人並不多。我是開授與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所以其他思想暫且不說，茲單就中國政治思想而言。依上所述，難道學習與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真的沒有用嗎？實則一般人所講的用，只是能看見的用，是小用。這種用，中國政治思想當然是沒有的，因為它不能讓你立刻用到職業上，不能替你立刻解決某個現實問題，更不能幫你賺錢。

然而中國政治思想仍有其用，而其用是看不見的，是大用。它是各政治學科的基礎，可以作為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參考尚且不論。而主要的是它可以訓練思考能力，可以啟發政治智慧。記得從前英國有一派教育學說，叫著「形式訓練說」。依此說，教育不是教給人一些具體的死板的知識，而是培養人有靈活應付一切問題的能力。例如不教人兩個蘋果加兩個蘋果等於四個蘋果，因為這樣只知道蘋果相加是如此，不一定知道一切東西相加都是如此，所以只教人二加二等於四，這樣便可用於一切東西的相加。又杜威主張教育是給人一種謀生的工具，所以主張在學校裡實施職業訓練，而當時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R. M. Hutchins)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題目是〈自由教育(Education for Freedom)〉，認為學校不是實施職業訓練的場所，在工作崗位上實施職業訓練，應比在學校裡實施更有效。教育不應把每個人造成一個螺絲釘，只能被按在一個位子上，而應教人適應多種工作，並自由思考人生及各種事物的目的意義等。在這裡應要特別聲明，我舉這兩個例子，只在說中國政治思想是有用處的，並非在排斥實用學科與職業教育。

後 語

教書與研究是很清苦的，但如果人生可以從頭再來一次的話，我還是會選擇這一行業。可惜的是我的孩子中沒有人走這條路，可喜的是我有許多優秀的學生們接棒。回顧一生，在顛沛流離之後，能有四十年的時間，讓我在安定的環境中教學與研究，也應該很滿足了，唯一不滿足的是未能達到更高的成就。



學人簡介

博古通今，闡幽發微 ——王爾敏先生的學術志業

劉德美*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爾敏教授今(民國 87)年適逢七十華誕，也是他即將從工作崗位上退休之年，敝人嘗有幸忝列門牆，故撰此短文介紹他過去的學術成就，以表深摯的祝賀之忱，也讓後學者略識他的治學風範。

王教授於民國 16 年生於河南省淮陽縣周家口市的一個書香之家，在五年多的家館學塾及小學教育中，接觸了許多古籍與民間小說，啓發了日後熱愛學問的基礎。中學時代一度愛好新文學，旋又轉入古典國學領域，因而在此方面紮下堅實的根基。抗戰後適逢國共相爭，乃輾轉來台，民國 39 年進入台灣師範學院史地系，在歷史、地理、國文、哲學等方面俱獲名師指導，遂走上文史研究之路。民國 43 年畢業，翌年起即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以迄於今。入所之初，由研讀點校外交檔案入手，先後整理了《海防檔》(民國 46 年)、《中法越南交涉檔》(民國 51 年)、《教務教案檔》(民國 63 年)等，又參與編輯《籌辦夷務始末引得》(民國 49 年)，奠定其在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堅實基礎。民國 52 至 55 年間赴英國訪問研究，57 至 58 年間應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之邀，榮膺高級專家之職，66 至 78 年間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並先後在台灣師範大學及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擔任許多課程，以豐富精深的學養，平易近人的風格，指導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多名，扣應啓發，學生均感受用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無窮，他們畢業後，有些在國內教育及研究機構工作，有些遠在美國和澳洲的大學任教，今日王教授真已桃李滿天下了。王教授四十餘年來，勤奮精進，著作等身，迄今已撰論文百餘篇，專著十種以上，編纂史料十四種。他不斷地開拓新領域，研究範圍不僅遍及近代政治、社會、經濟、思想史，還前溯上古，下迄民國，並且旁及史學理論、掌故學、地方史等方面，皆卓然各有創見，宏觀與微觀兼而有之，譽滿士林。

茲就王教授學術工作上的重要成就，依研究主題次第及治學重點趨向，分述於下，以見其學術成就之燦然。

二、近代史——重要事件、制度與人物的闡釋

中國近代史是王教授最重要的研究領域。然而一部中國近代史有其背景及特色，王教授於〈中國近代史之史學意義〉一文(收於《禱乘小品》)，強調此特色有五：外力之衝擊、思想之醒覺、謀求富強之總目標、西化之趨勢、中國發生全面重大之改變。可謂提綱挈領地掌握這個時代的精神。王教授雖未參與近代史研究所一項大規模的集體合作計畫——「中國近代化區域研究」，但是他對近代化問題極為關心與用力，絕大多數論著是對這個核心問題的深入探索。郭廷以教授早在民國 39 年即提出〈中國近代化的延誤〉一文，從中國朝野知識上對近代世局之認識與適應世變之方法，評估其造成近代化的延誤，王教授再闡師說，撰〈從政治局限看中國近代化的延誤〉一文，進一步從固有政治制度、政權結構、以農為本之局限等方面，闡釋傳統君主集權政治之害，造成當時知識份子雖有認識，卻難以施展抱負，加以上層多疑，工於內鬥，忽於外侮，為保政權，一意輕商限商，終於造成近代化延誤的後果。然而近代化仍是繼續要走的路，後人須以前事為鑑，知曉失敗的癥結所在，才能克服困難，期盼成功，他提出最穩健且具實效的策略是「重商」。

對近代以來許多大事，王教授皆賦予時代的意義，表現史家的卓識。例如辛亥革命肇建民國，在中國史上是極重要之大事，王教授言簡意賅地說明其背景，評估其四個重大意義：(1)充分表現中國近代的民族覺醒、(2)開創民主政治的前軌、(3)政府結構的充分改變、(4)帶來思想的全面開放。

中英鴉片戰爭常被近代史學者作為中國近代史開始之標幟，是開啓中國巨變之關鍵，南京條約為其直接結果，開放五口通商是此約之重要內

容。王教授指出五口通商的歷史意義有四：改變傳統的市舶貿易、打破千餘年來的中外封貢貿易關係、開啓近代西式海關貿易規制、開啓近代港埠都市之發展，因而是中國史上劃時代之轉捩點，王教授提出「五口開關之商埠區劃」研究專題，由上海、廣州、寧波、廈門等港埠的歷史發展、地理條件、近代港埠之形成，深究開放五口通商之重要性，特別注意中國居民之反應與自覺，分析帝國主義之侵略本質。

王教授有鑑於治中國近代史與外交史者常致力於南京條約、北京條約等政治條約，忽略關係喪失主權、虧損金錢尤甚於割地賠款的商約章程，因而根據中外檔案資料，探討晚清與各國所訂商約問題，撰成《晚清商約外交》（民國 84 年）一書。中國近代開放對外通商貿易，原則是根據南京條約，具體執行之關稅細則即根據其後所詳訂之通商章程，「商約外交」專指中國海關進出口各種稅則之制定，此事關係中國財政收入至巨。到了清季，一方面是中國出於財政需要，主動要求修訂商約，一方面因庚子拳亂後，列強為確保能得到中國的鉅額賠款，同意中國海關加稅，中國又分別與各國修訂商約，歷時十年，在此中許多官吏展現外交智慧與談判技巧。王教授闡明此一階段之交涉歷程及其時代意義，強調中外商約交涉對於國家主權與利益之影響，更重要的是由此一時期商約中，中國主其事者要求取消治外法權及洋稅務司建議幣制改革，導致晚清的司法改革與財政改革。晚清商約外交的時代意義是：在中國當時處境艱難，列強圖謀下，盛宣懷、呂海寰、伍廷芳等人的因應表現，發人深思，不僅是中國覺醒後重要的外交大事，也是關係到晚清政治、財政與政情之大事。

人物是創造歷史的主角，是歷史研究的核心主題之一，在王教授的論文中，許多篇是以人物為主要探究的對象。他注意的人物有兩大類，一類是全國性著名的大人物，活躍於政壇或學界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盛宣懷、張謇、姚瑩、孫中山、蔣中正、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一類是默默無聞的咕畢小儒，如翁仕朝、鄭復光等。王教授研究其生平、志節、才能與思想，表彰其貢獻，闡明其時代意義。茲以近代中國史上的偉人孫中山先生與嘉道年間的物理學家鄭復光為例，王教授特由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門戶開放主義、全面利用外資政策、實業計畫等，論述孫氏之建國藍圖及理想，顯示其高瞻遠矚，恢宏胸襟，又論及他理想中的現代中國政府是共和政府、萬能政府、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國民享受自由與平等，可充分發揮才智，服務人群，謀求國家富強，人民安樂。嘉

道時期的物理學者鄭復光撰著光學著作《鏡鏡論癡》和物理學著作《費隱與知錄》，他在當時只是聲光俱闇的小儒，但能客觀研究西洋學問，王教授指出他的表現具有時代意義，其功績不下於聖賢，值得闡幽發微，作為典型。總之，透過這些人物的研究，王教授不僅增加吾人對歷史發展的認識，也發揮歷史知識鑑往知來，見賢思齊的功用。

三、軍事史——開創湘軍、淮軍、勇營 與練軍的新研究

在王教授的專業領域中，最早從事的是清代軍事史研究，重要的專著是《清季兵工業的興起》（民國 52 年）、《淮軍志》（民國 56 年）和《清季軍事史論集》（民國 69 年）。他由研究自強運動中的兵工業入手，進而研究湘軍、淮軍、練軍，更對清季的勇營制度予以系統理論的探討，以精密的史料爬梳功夫，敏銳的眼光，獨闢蹊徑，成就了這些富有創見之著作。

《清季兵工業的興起》一書，探討清季兵工業興起的思想背景、三大兵工廠（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漢陽槍砲廠）以及各省共二十三座機器局的成立過程，並於結論中分析其成就，也指出其缺失。認為就國防效力而言，未必盡合理想，然而機器局的設立在其他方面的影響則有足稱之處，例如機器局也兼造機器零件，修理機器，製造錢幣，可謂多元化經營；培養了推廣機器局、經營其他企業的人才和負責交涉任務的使節之才；其在傳播新知識方面，一則翻譯西書，刊印新書，一則辦理新式教育，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淮軍志》一書旨在探討淮軍興起的背景。淮軍是承藉湘軍勢力發展出來的軍力，由於清軍綠營主力江南大營在對抗太平軍之役潰敗，說明綠營廢弛，不堪國防重責，而予曾國藩以擴展湘軍的機會，後來湘軍亦不足以應付局面，乃予李鴻章創建淮軍的機會，王教授論斷淮軍可謂是湘軍之分歧。接著論述淮軍沿襲湘軍的要素及後來的變化，分析淮軍之結構、成份、訓練、精神、餉源、新式軍械、幕府人才、內外防務、軍力變化等，闡釋其意義。王教授以豐富的史料、翔實的考證和比較的方法，探討此一關係清季兵制變革與政治勢力消長甚巨、後人議論甚多的主題，得到明確精密的結論。他論斷淮軍絕非私軍，其領袖忠於朝廷，絕非擁兵自重、據

地稱雄之軍閥，肯定其貢獻。

《清季軍事史論集》收集敘錄及九篇有關湘淮軍與十九世紀軍事制度史的論文。王教授於敘錄中說明本書撰述緣由，是針對中華民族在近一個半世紀以來，歷經浩劫，認知惟有發展工商以求富，精研武事以圖強，方能生存於此競爭之世界，因而特別留意深究近代軍事史，並補此一領域之缺略。在〈清代勇營制度〉一文中，王教授指出勇營制度有國防軍之功能，卻非經制軍。處境尷尬，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本文分析勇營制度產生與形成之淵源、探討與團練及綠營之密切關係、內容(結構組織、特色、制度規程、訓練、戰法、紀律、精神)及其時代意義。勇營固然帶來對綠營改革之思考，但是二者互相掣肘，勇營發展受到制度之局限，組織體系簡陋，存在半個世紀之後，終於為新式常備兵取代，與綠營俱成歷史名詞。在〈練軍的起源及其意義〉一文中，王教授分析練軍之產生在近代軍制變革之時代意義及其與政治之關聯。咸豐十年的兩大事變：江南大營崩解和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帶來一連串的影響，軍事方面的變化為湘淮軍之發展與練軍之產生。練軍是學者忽略的課題，王教授指出練軍由倡議到創制，基本動機是強化京師防衛，改操西法，以固根本，但在實行之際，由於頻受外力干預，迭起變化，由強化京師禁軍，轉為沿海洋人練兵，再變為湘淮軍領袖練兵；其兵源來自綠營挑選，無法另行招募，僅直隸練軍有改進，各省練軍徒具形式，無法達成全面改革。

接著幾篇以湘軍人物為中心。在〈胡林翼之志節才略及其對於湘軍之維繫〉一文中，作者由胡氏之識量堅卓，志節高遠，熟悉兵學，識拔人材，培育並維護部將，肯定其足當湘軍靈魂人物，為清代中興名賢之冠。在〈曾國藩經營湘軍之艱難遭遇及其心理反應〉一文中，深入剖析湘軍首腦人物曾國藩之心境，王教授指出學者常由儒家高標準要求或審視曾國藩之不當，而將曾氏還原為具有真性情之人，曾氏雖識見超卓，謹慎效忠，有抱負擔當，卻也憂讒畏譏，時刻惕勵警戒，王教授以其言行實據，了解其處境與心情。這個新的觀察角度，不僅打破許多臆測，也讓讀者更能深思體會大人物鮮為人知的內心世界。重要人物之間的關係往往是歷史發展的隱藏線索，提供了解史事的關鍵，但受資料少而隱晦之限，因此如能抉幽闡微，才足顯示史家功力，王教授〈曾國藩與李元度〉之文即探討二人之間的關係：曾李二人有師生、主賓、及長官僚屬之誼，卻因李自視能戰，但以出師不利，影響戰局，加以疏忽遵循官場習慣，以至與曾交惡，曾雖數

次打擊李，終因雙方有深厚情誼，曾氏亦反省知過並謀補救，而恢復昔年恩誼。王教授之〈由墨經從戎論湘軍將帥之志節及其軍容之維繫〉一文，以創始楚勇之江忠源、承詔練兵之曾國藩和再振湘軍聲勢之胡林翼，皆墨經從軍，申論其意義在於顯示湘軍統帥知書守禮，忠孝兩全；用兵之際，嚴肅戒慎，以哀兵姿態，終能克敵；發揮袍澤情誼，團結互助。總之，墨經統軍表現湘軍領袖操持高尚，關係湘軍軍容之維繫，精神紀律之基礎，為不可忽視之關節。王教授之〈湘軍軍系的形成及其維繫〉論文，仍就湘軍領袖人物之志節、胸懷、眼光、才能，探討其經營締造湘軍，擴展及於湖南之外，形成湘軍軍系之特色，彰顯統帥能堅毅貞定，掌握機緣，高尚志節，團結奮鬥之意義。

最後一篇是〈咸同之際江南官紳借兵助勦的經營及其影響〉，王教授認為此次借兵助勦和歷史前例作比較，最大差異是此次所借為有優越船砲和軍伍組織的洋兵，其影響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特別是給予外國特權的建立和擴張，中國關稅行政權落入外人手中，外人勢力伸張，帶動租界的急遽變遷，洋人與中國官員也有共同利益之處，因此有拳亂期間為維護地方安定形成東南各省互保之舉。

四、思想史——近代西方思想傳入 與中國知識份子因應的分析

王教授由對清季兵工業之研究，進而深感需要了解近代政治制度，以認識清季知識份子思想的變化和啓蒙之努力。他在《晚清政治思想史論》敘錄中詳述他研治思想史的方法，不採通用的傳記式或學案式，而係受氣象學中氣團分析法的啓發，以單一概念為中心題旨，注意此一概念之定義、內容、時代意義、淵源、發展、影響，及其在整個時代思想演變之地位；研究角度是注意新觀念之意義、普遍性和影響力。他不斷發現新問題，加以綜合分析，成就《晚清政治思想史論》（民國 58 年）和《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論》（民國 66 年）二書，以及未收錄於二書中其他有關思想方面的論文多篇，均有獨到卓越之貢獻。

《晚清政治思想史論》一書共由九篇獨立而又關聯之論文合成，建構晚清思想界原貌，探究其時代意義與影響。重要主題有託古改制論、中體西用論、中西調和之思想，均強調儒家學說在清季知識份子接受西學時，

非但不是阻力，而且是展開近代化運動之助力，清季學者由吸收西學，進而融會貫通，產生新觀念和理論，雖不免誤解駁雜，但其影響力是值得重視的嚴肅問題。其次是對晚清學會的探討，王教授於〈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變的原質〉一文中，指出晚清學會之共同特性和類別，深入探索「南學會」，並作〈清季學會彙表〉，整理各學會之名稱、會址、創設年月、創始人、宗旨、組織及集會性質、活動、經費來源、代表性文獻等資料於一表，可以概見當時學會發展之盛況。再次是〈道咸兩朝中國朝野之外交知識〉和〈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前者痛惜當時主事者缺乏國際知識，任憑錯誤觀念導致更多的損失；後者由晚清人士所用的傳統外交智術、在經驗中得到的世界眼光與主權觀念、當時對外交政策的認識等三方面來探討晚清朝野外交認識已向近代外交觀念的規模發展，形成新的外交觀念。最後是〈晚清士大夫對於近代民主政治的認識〉，論述晚清有代表性論點的民主言論，闡釋民主觀念的蓬勃發展，影響至深，壓力至大，迫使清廷很快接受，惟實行之際，與倡議者的理想落差太大，終於啓發革命思想。

《近代中國思想史論》是對前書的進一步闡釋，亦收錄九篇論文，深入發掘探討近代中國敏銳的知識份子所發展的創新思想以及其所代表的時代思潮，追究其淵源，闡明其意義，評估其影響。王教授在〈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一文中，將十九世紀後六十年間的思想變化細分為四個階段：1840-1860、1860-1880、1880-1895、1895-1900，掌握此時期各階段思潮主體的士大夫階層認識西方的程度、對西力衝擊的反應、因自省而覺悟的新思想，進而吸收並融會西方的主權、富民、民主等觀念，他們在甲午戰後，更擴及發現西方教育制度、政治制度、進化思想、天賦人權等觀念，清楚地自覺民族主義，組成新式學會，爭取中國的自立與主權，反映此一時代的文化態度與醒覺意識。其他〈清季知識分子的自覺〉、〈晚清政治思潮之動向〉、〈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應變之自覺〉等篇皆係進一步深究知識分子對晚清變局的反應。〈「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一文，指出「中國」一詞悠久的源頭及豐富的意義，是中華民族自我認同之一重要論題，是直至今日，欲了解「中國」一詞涵意者必須一讀之文。〈當代學者對於儒家起源之探討及其時代意義〉一文，指出近代學者以新態度、新觀點探討儒家起源問題，彰顯其創立人孔子為中國文化最顯著的表徵，他不僅是中國的偉人，也是世界的偉人，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不可磨滅之光輝。在〈近代中國思想研究及其問題之發掘〉一文中，王教授提出二十一個有創發性、開拓性、有重大意義及相當充足資料的論題，供有志者深究。

大體而言，王教授對近代中國求富強的主流思想，研究極深，其主題可歸納成兩類：一類是對中國發生刺激作用的西方新思想，例如人權、女權、自由、平等、國家主權、主權在民、國際觀念、公僕觀念、社會主義等；另一類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因應，如商戰、學會、運會觀念、經世思想、變法、立憲、普及教育、通俗文學等，皆有深入之分析探討，具見功力和識見。

五、文化史——傳統社會面貌的展現、 在華西方教士貢獻的闡明

王教授在鑽研近代史、軍事史、思想史之餘，進而擴展至文化史的面向，創建新理論來詮釋傳統社會，對來華西方傳教士的文化活動也有心得著述。

(一)秘密社會與庶民文化——提出生態環境與社會功能說， 取代民族革命與農民起義說

庶民為創造世俗文化之主體，傳承民族文化之動力，雖然人數眾多，屬於傳統文化最深層最根本的部分，有強韌的生命力，多彩多姿，可大可久，對歷史發展有強大的影響力，然而卻因資料零散，尤其近代以來，傳統文化備受西力衝擊，速遭淘汰，文字資料，散失殆盡，搜羅費時。加以學者較為注重各時代的主流文化與思潮，冷落不夠高尚雅緻的庸俗文化，致使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更形困難。王教授基於史家責任，闡幽發微，致力庶民文化的開墾工作，成就《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民國 85 年）和《明清社會文化生態》（民國 86 年）二書以及相關論文多篇。

由於明清兩代庶民文化資料保存最豐，值得注意的問題最多，因而王教授以此一時代的庶民文化生活為主題，撰寫《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一書。共分十章，論及民間多神信仰、日常生活節奏、飲食醫藥與養生益壽法、日常禮儀規矩、應世規矩與關禁契約、游樂才藝、風月調教（即兩性生活）等方面，此書雖未處理庶民的衣著、住屋、行旅等問題，實已兼

顧精神與物質生活的許多層面。中國幅員廣大，庶民文化自然有區域差異，但仍異中有同，王教授歸納出其共同特色：(1)上承古老文化傳統，表現於時令、歲月、節氣之沿革；(2)充分自主性自動參與；(3)場地無定，就地取材，價值低廉，易造易改，常見巧思利用；(4)注重群體創造，無個人名分。

《明清社會文化生態》一書共收論文十三篇，前八篇著重文化生態；後五篇著重社群生態，皆利用不為人重視或熟知之資料，以生態的觀點，探索一些社會文化現象的重要意義，極具創意巧思。第一篇討論作為清代治術的《聖諭廣訓》，是由康熙制定強調儒學教化之十六條目，經雍正推衍成約一萬字之書，由官員宣講，讓士民熟知。這種經驗到清季被創造轉化為宣講新知，形成普及新知識之運動。第二篇以香港處士翁仕朝為例，說明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民間風教之浸濡，傳統社會中有些儒生雖未入仕，但能奉行儒家禮法，潔身自愛，在地方導化民俗，卻被近人忽視。王教授以翁仕朝的生平志行彰顯「小儒」能獨善其身，淑世任事，為鄉曲之導師，地方之柱石，一方之文家，展現其對社會和文化之重要性。第三篇由治生智能基礎、社會因應軌轍、公眾遊樂活動領域等角度，闡明傳統中國庶民日常生活情節。第四篇探討從蒙學到高深學養乃至裨販優伶基本學識之記憶方法與口訣，肯定塾師教學利用學童記憶力最強之時，指導學童多讀有用之書，強調傳統教法有足資現在參考者。第五篇乃就明清時代市井小民之文化創造，運用文字語言之靈活，以見其文化素養，並由戰國秦漢以降，主婦閨房之大小銅鏡啟發女性創作迴文詩之靈感，斷言迴文詩創於女性作家之手。第六篇探討乾隆 58 年來華使團在外交目的之外，將「茉莉花」等十首民歌西傳歐洲的中西文化交流美事。第七篇以《點石齋畫報》為例，析論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傳播之圖說形式，其創始者是在華的英商美查，1872 年創辦《申報》，1884 年創辦《點石齋畫報》，作者表彰《點石齋畫報》以豐富之題材、多樣之圖畫，對普及知識、推廣新知、啟發思想之貢獻，也質疑當代學者公認梁啟超為中國報業史開山祖師之說，因對中國思想文化知識學問影響最大的「申報」發行之時，梁尚未出生，斷言中國報業之祖師當為美查。第八篇析論中國人由十九世紀中葉五口通商到末葉已普遍習用禮拜日制，顯示現代中國人思想認識、生活行為變化之快速。

王教授於〈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之生態環境及社會功能〉、〈灤州石佛口王氏族系及其白蓮教信仰傳承〉、〈五口通商初期上海地區暴亂事件

所反映秘密會社之生機及適存環境〉三文中，反對大陸學者套用秘密會社及秘密宗教出於農民起義的理論，提出生態環境及社會功能之新說，因為農民起義、階級鬥爭等理論實無法解釋這些歷史現象，王教授指出中國農民安分守己，即使貧苦亦無造反之心、農民入秘密宗教只圖免今生之苦，求來世之福，而秘密宗教之領袖則旨在騙錢謀生，鮮有建立王朝之極大野心。最後兩篇是〈從社會生態看清代民間鏢局〉和〈丐幫舉隅〉，前者論述明清時代鏢局源於商旅民戶水陸道上行旅時生命財產安全保障之需要，保鏢旨在完成任務，不隨意拼命廝殺，江湖道上英雄彼此通財，互相關照，無須兩敗俱傷，而小說只為增加情節曲折，不免過度誇大失實，留給讀者錯誤印象；後者考查乞丐行討方法，並為近代乞丐活動留下記錄。

(二)傳統文化的新視野——自然生態、社會維繫與個人養生的觀察

王教授不僅於中國近代史創獲極多，對傳統文化也很有興趣，研究許多問題，屢有新見，展現新的視野。〈先秦兩漢之自然生態保育〉一文以周文王至於兩漢聖哲之言論，稱述先王盛世注重養民教民，為了養民，強調維護自然生態之重要，以今日全球環保意識高漲情形而言，更印證吾國先賢之智慧。〈四民名義考〉與〈周禮所見婦女之地位及職司〉二文皆由典籍資料考察古代社會階層之區分及婦女被排於四民之外的過程。《周禮》中記載不少婦女官職，〈地官篇〉將國中人民職業區分八類：農、圃、工、商、牧、嬪、衡、虞。八民之中，女性亦佔重要職業。〈考工記〉言六職：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婦女居其一，後世貶抑女性，到「四民」說就被忽略了，王教授論證這段變化過程，必然有益於後人對傳統社會發展的認識。〈家訓體製之傳衍及門風官聲之維繫〉一文，由歷代著名家訓創製者之身份、地位、經歷、人品、家訓內容，解釋形成這種規勸後世子孫遵守寶典的原因，是傳統政治、經濟及儒家思想蘊育之下的產物，並歸納此一現象豐富的社會意義。儒家學說在傳統政治翼護之下，由先秦的顯學而躍升獨尊地位，相形之下，可補儒家不足的道家思想未受應有的重視，王教授特以〈道家之重己貴生學派及其養生道術〉一文，闡釋戰國時代道家主要流派及養生之法，發揚道家精神。

(三) 西方傳教士在華的文化貢獻——新式教育機構的創立與新知的傳播

西方國家自近代以來，發生一連串的變遷與革命，掌握最新的知識與技術，在世界史的進程上居優勢的主導地位。西方列強挾其船堅砲利，侵略中國，充分顯示帝國主義的行徑，但在中國與西方相遇之際，也有和平的文化交往，不少西方傳教士發揚宗教博愛精神，在華傳教之餘，也從事傳播新知、慈善事業等活動，貢獻卓著。王教授在這方面頗為留意，撰有《上海格致書院志略》（民國 69 年）、〈上海仁濟醫院史略〉等論著。

上海自 1843 年開關之後，迅速發展成全國最大的貿易港埠，為中外人文薈萃之地，近代中國的重要觀測站。來華教士關心文化教育事業，傳教之餘，從事譯書、辦報紙及學校等活動，引進並推廣科學知識，啟發並傳播新思想，對近代中國影響甚大。《上海格致書院志略》一書即對 1874 年由在華的西洋教士在上海創立的格致書院詳加論究，著重其所帶來的近代西式教育體制、經營、教材、教法等方面，是五口通商後西洋教士在華早期從事之重要文化教育事業之一。

〈上海仁濟醫院史略〉一文，詳述自 1843 年至 1938 年間，雒魏林、顧惠廉、韓雅各等英國倫敦會所派遣之傳教醫師在上海成立並先後主持仁濟醫院之情況，分析其歷史意義：仁濟醫院出於傳教動機而設，創立人雒魏林為中國醫學近代化之先驅，他與後繼者建立醫院良好的管理制度，培育華人醫師，並獲華人富商支持，雖有西洋毒梟因捐款而得廁身組織之中，應予指出，但這些傳教醫師之博愛醫德，奉獻精神，對上海及江浙地區的醫療服務，永遠值得感念，因此是外人在華事業中最受敬服之門類。

六、其他——史學理論、方志學、掌故學的立新

(一) 史學理論的識見與經驗的傳遞——史學是推理的科學，可以鑑往知來

史學方法是民國初年發展出來之一門新課程和新學問，然而迄今並未形成一定體系，王教授由於環顧史界學術現況和教學需要，根據多年研究實務和心得，撰寫《史學方法》（民國 66 年）一書，特別留心其中有較持久效用之處，以嘉惠後學。全書分引論、原論、通論與分論四部分。引

論開宗明義說明此一著作之撰寫緣由。原論則綜合諸家之言，解釋「史」之形義、史官職責、史書、由傳說到歷史，指出史官的著作為中國學術文化基礎的重大意義，並呼籲注意口傳史之發掘與研究；於「史學」一節解析其傳統範圍是六經皆史，近代意涵則擴及人類活動現象之記錄，強調史學屬於推理之科學，由於史料難以保存完全，史事不易捉摸，史家只得就已有資料推論，由微知著；史家是歷史研究工作之主角，王教授認為成為良史之學養條件除了劉知幾所言史才、史學、史識、章學誠所論史德之外，還要有使命感、尊嚴感和嚴肅感，才能勝任。論及史家任務是：以正確研究解釋建立人類過去活動之重要史跡，供後人參考、記錄當代重要史事，以備後世史家研究批判、建立解釋與理論，以供後人了解，並可指導人群未來的活動。通論雖係針對史料、史實、記注、解釋、理論等方面立論，然而這些皆構成王教授史學方法論著之整體，彼此關聯。分論部分則詳申選題、結構、引證、表譜、圖版、考辨、註腳、敘例、彙餘（書目、附錄、字彙表、引得）等方面的實際操作情形。全書也強調史料學非史學、史學有鑑往知來的作用等觀點。

（二）地方都邑史——地理形勢與歷史發展的結合

地方史或方志史亦為王教授專攻的學術領域之一。他最主要的研究是中國沿海最早開放通商的五個口岸都市，對於上海、廣州、寧波、廈門都有論著探討，前已敘及。他於〈近代史上的東西南北洋〉一文，說明東西南北洋的指稱範圍及其變化緣由。此外，有關地理的重要論著是對地理學前輩沙學浚先生地緣政治學的研究，提及曾於抗戰時期盛行，勝利後不久即被人們遺忘的「戰國策學派」，他闡述沙氏所創的位置理論與空間理論，以地理因素、地緣政治學的理論來分析歷史上的立國形勢，開發中國歷史地理的新面貌，與傳統史地學者注重考證沿革、評析形勢、辨識地望、勘定史蹟等方法不同，可說是另闢蹊徑。

（三）掌故學——歷史故實的根柢

掌故通常指歷史人物、典章制度等之故實或傳說，緣由與正詁，拾遺補闕，以供後人考究了解。王教授留意這門學問已久，於《禱乘小品》（民國 73 年）中之〈逸獻備采〉篇就曾經常見現已不知其詳的事物，如荷蘭水、牛榜油、紅毛泥、通市雙十三，開埠兩李家、洋涇濱、一塊洋錢、欽

差大臣等名詞，加以疏解，可擴展見聞，饒添趣味。又於〈近代史上的東西南北洋〉一文，由澄清東西南北分辨，區域變化，顯示其受中國航海事業發展與技術進步的影響；〈中國二十四方位觀念之傳承及應用〉一文，研究二十四方位之形成可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紀，甚至更早，一直沿用到十九世紀末，因受西方影響，很快改用十六方位制，卻未發生排斥，是近代文化交流過程中罕見的現象。〈德智體群四育的緣起〉、〈鬼、鬼子、洋鬼子、假洋鬼子〉等文，皆蘊含豐富的掌故。掌故研究不僅可由名詞演變了解其歷史發展與意義，更有助於正確地利用史料，王教授常以盛宣懷的書信手稿為例，證明如不了解其中所用以古人字號、地望於稱呼時人之名字，即無法知其所指人物為誰，可見熟知掌故之重要。

七、結語

王教授在四十多年的史學研究生涯中，勤奮耕耘，故有豐碩的收穫。他不斷開拓新的領域，由治中國近代史開始，而深入軍事史、思想史、文化史，兼及史學理論與方志掌故之學，編纂多部資料集與工具書。行有餘力，更探索古代史的奧秘，其學問領域涉及時間之長，地區之廣，專題之多之深，氣象雄偉，功力非凡。在當前講求急功近利的學術風氣下，培養能從事短時間小範圍瑣碎專題研究的「專家」較易，期望有長時間大範圍全面深入研究的「學者」極難，王教授無疑為真正的歷史學者。

王教授的研究撰著有其特色。他很注重選題，特別是開創性的題目，發前人所未發，因而自有獨到的見解。對於前人已有研究的論題，必以敏銳的眼光，堅實的論證，提出新的觀點與詮釋，也是迭有創見。他恪守史家天職，以公正客觀的態度，豐富翔實的資料，充實周密的註釋，旁徵博引，支持其論點，文字典雅流暢，思路條理清晰，每本專書皆有「敘錄」，說明撰述動機與研討方法、重點，提綱挈領。讀者不僅能明白他的治學路徑，更可從中獲得許多啟發。他在學術上有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抱負，飽學多識，心胸寬廣，毫不保留地提示可再深入研究的論題，嘉惠後學，不僅是授人以規矩，更是授人以巧妙的大匠，此點凡是受他指導的學生皆有深刻的感受。

王教授在榮退演講會發表的〈師友風誼，道術因緣〉一文中，特別強調師友切磋之益，他在每部著作或論文之前後，都不忘感激對他有提攜切

礎之功的良師益友、幫忙搜集資料、校對文稿的助手，更特別感謝治療眼疾的醫師。王教授所以有如此成就，除了師友之助，道術因緣際會之外，我認為他的天資聰穎，意志堅強，自信樂觀，勤奮精進，是他學術生涯成功亮麗的最基本條件。他中年時，由於研讀《申報》之類縮版小字體的資料過多，導致視網膜剝落，視力嚴重受損，仍然勤於讀寫編纂，每年完成多篇論著，編纂卷帙浩繁、字跡潦草的史料集，這份對學術工作的熱忱專注，令人動容。此外，他專心致志，不慕名利，也常告誡弟子做學問要能甘於寂寞，自己以身作則，這種為學術奉獻的精神，值得感佩。

太史公所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每位歷史工作者努力以赴的標的，但是能達到如此境界的歷史學者實屬鳳毛麟角，吾師王教授博古通今，闡幽發微，庶幾乎近之，至少已登「成一家之言」的境地。他雖然在榮退演講會上宣稱退出江湖，但仍孜孜不倦，繼續研究工作，以歷史學為他的終身志業，相信不久將會有更為宏觀與綜合性、代表性的史學經典巨著問世。

附錄：王爾敏教授著作目錄

專書

- 《清季兵工業的興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民國52年，222頁。
- 《淮軍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22)，民國56年，457頁。
- 《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民國58年，312頁。
-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民國66年，566頁。
- 《史學方法》。台北：東華書局，民國66年，338頁。
- 《清季軍事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69年，377頁。
- 《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民國69年，119頁。
- 《禱乘小品》。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3年，179頁。
- 《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8)，民國85年，257頁。
- 《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86年，496頁。

論文

- 〈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權力之擴張〉，《大陸雜誌》，卷 20 期 5（民國 49 年），頁 20-27。
- 〈拳變時期之南省自保〉，《大陸雜誌》，卷 25 期 3、4、5、6（民國 51 年），頁 13-18、24-27、28-32、30-34。
- 〈論張喜在中英交涉中之地位及其才品〉，《幼獅學誌》，卷 1 期 1（民國 51 年），頁 1-15。
- 〈耆英外交〉，《大陸雜誌》，卷 30（民國 54 年），期 9、10，頁 9-15、24-27。
- 〈清季兵工業約論〉，《大陸雜誌》，卷 35 期 9（民國 56 年），頁 15-19。
- 〈中國近代學會約論〉，《食貨月刊》，卷 1 期 6（民國 60 年），頁 1-9。
- “China’s Use of Foreign Military Assistance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1860-186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民國 60 年 6 月），頁 535-583。
-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讀後〉，《食貨月刊》，卷 2 期 10（民國 62 年），頁 43-50。
- 〈廈門開關之港埠區劃〉，《食貨月刊》，卷 4 期 6（民國 63 年），頁 1-12。
- 〈王韜早年從教活動及其與西洋教士之交游〉，香港大學，《東方文化》，卷 13 期 2（1975 年），頁 154-161。
- 〈外國勢力影響下之上海開關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中華學報》，卷 2 期 2（民國 64 年），頁 129-166。
- 〈王韜課士及其新思潮之啓發〉，香港大學，《東方文化》，卷 14 期 2（1976 年），頁 213-234。
- 〈戊戌湖南客籍人士對於地方思潮的啓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5（民國 65 年），頁 379-422。
- 〈德智體群四育的緣起〉，《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10 期 2（民國 66 年），頁 67-73。
- 〈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華學報》，卷 4 期 1（民國 66 年），頁 129-151。
- 〈中西學源流說所反映之文化心理趨向〉，《中央研究院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輯 2（民國 67 年），頁 793-808。
- 〈薛福成的生平與思想〉，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史潮》，期 5（1979

- 年)，頁 1-19。
- 〈儒家傳統與近代中西思潮之會通〉，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學術集刊》，期 2（1979 年），頁 163-178。
- 〈中國近代之自強與求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民國 69 年），頁 1-24。
- 〈上海中外會防局始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1 本第一分目（民國 69 年），頁 71-95。
- 〈十九世紀中國國際觀念之演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 11（1980 年），頁 61-108。
- 〈鬼、鬼子、洋鬼子、假洋鬼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中國語文研究》，期 2（1981 年），頁 81-94。
- 〈近代湖南女權思潮先驅〉，《中國婦女史論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70 年，頁 115-128。
- 〈中國近代之工商致富與商貿體制之西化〉，《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70 年），頁 1215-1262。
- 〈中華民國開國初期之實業建國思想〉，《中華民國建國史國際會議論文集》，冊 2（民國 70 年），頁 40-70。
- 〈評介徐高阮著《中山先生的全面利用外資政策》〉，《珠海學報》，期 13（民國 71 年），頁 223-234。
- 〈斷髮、易服、改元——變法論之象徵旨趣〉，《「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71 年），頁 59-73。
- 〈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之自覺及國語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1（民國 71 年），頁 13-45。
- 〈官督商辦觀念之形成及其意義〉，《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期 13（民國 71 年），頁 19-43。
- 〈中國近代人權醒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期 14（民國 72 年），頁 67-83。
- “Changing Chinese Views of Western Relations 1840-9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42-201.
- 〈姚瑩之經世思想及其對於域外地志之探究〉，《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

- 會論文集》（民國 73 年），頁 201-232。
- 〈中國近代知識普及運動與通俗文學之興起〉，《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73 年），頁 921-988。
- 〈《實業計畫》之時代背景及建國功能〉，《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冊 3（民國 73 年），頁 60-99。
- 〈經世思想的義界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3（民國 73 年），頁 27-38。
- 〈鄭觀應的實業救國思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期 15（1984 年），頁 21-47。
- 〈廣州對外通商港埠地區之演變〉，《漢學研究》，卷 3 期 2（民國 74 年），頁 581-630。
- 〈一八五四年上海「泥城之戰」原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4（民國 74 年），頁 371-375。
- 〈張謇之實業經濟思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 16（民國 74 年），頁 5-30。
- 〈興中會同盟會與中華民國國號之創生〉，《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 2（民國 75 年），頁 2-16。
-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之初步反應及共產制度之適然想象〉，韓國西江大學，《東亞研究》，輯 7（1986 年），頁 231-237。
- 〈中國近代史上的東西南北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5（民國 75 年），頁 101-113。
- 〈蔣中正在抗戰後期的實業建國理想〉，《蔣中正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5 年，頁 1-25。
- 〈蔣中正五大建設之建國宗旨〉，《中國六十年來之憂患與建設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民國 77 年），頁 723-733。
- 〈盛宣懷與中國電報事業之經營〉，《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7 年），頁 755-789。
- 〈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顧〉（與鄭宗義合撰），《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7 年），頁 1-45。
- 〈從政治局限看中國近代化的延誤〉，《第二次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民國 78 年），頁 681-703。

- 〈孫中山理想中的現代中國〉，《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10（民國 80 年），頁 5-22。
- 〈寧波口岸淵源及其近代商埠地帶之形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0（民國 80 年），頁 37-69。
- 〈中國近代之公僕觀念及主權在民思想〉，《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冊 3（民國 80 年），頁 2-23。
- 〈四民名義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期 2（民國 81 年 3 月），頁 169-183。
- 〈家訓體製之傳衍及門風官聲之維繫〉，《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1 年 6 月），頁 807-845。
- 〈先秦兩漢之自然生態保育思想〉，《漢學研究》，卷 10 期 2（民國 81 年 12 月），頁 1-26。
- 〈中國二十四方位觀念之傳承及應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廿五週年銀禧特刊》（民國 81 年 12 月），頁 1-23。
- “The ‘Turn of Fortune’ (*Yun-hui*): Inherited Concepts an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Cosmology, Ontology and Human Efficac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205-215.
- 〈鄭觀應傳〉，《國史擬傳》，輯 4（台北，國史館，民國 82 年 6 月），頁 273-288。
- 〈鄭復光與泰西科技知識〉，《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2 年 6 月），頁 739-770。
- 〈清代公案小說之撰著風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學哲學研究所集刊》，期 4（民國 83 年 3 月），頁 121-159。
- 〈上海仁濟醫院志略〉，《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民國 83 年 3 月），頁 389-435。
- 〈孫中山先生的謀國遠識〉，《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台北，民國 83 年 11 月），頁 1-16。
- 〈孫中山先生的門戶開放主義與全面利用外資政策〉，《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7 期（民國 83 年 12 月），頁 65-74。
- 〈《周禮》所見婦女之地位及職司〉，《漢學研究》，卷 12 期 2（民國 83 年 12 月），頁 1-10。

- 〈甲戌日軍侵台清廷之援防因應〉，《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民國 84 年 3 月），頁 363-430。
- 〈王韜生活的一面——風流至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上）（民國 84 年 6 月），頁 223-262。
- 〈滿清入主華夏及其文化承緒之統一政術〉，《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民國 84 年 9 月），頁 247-271。
- 〈孫中山思想學說的實用價值〉，《近代中國》，雙月刊第 118 期（台北，民國 86 年 4 月），頁 6-15。
- 〈剛毅南巡與輪電兩局報效案〉，《近代史研究》，第 100 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 7 月），頁 243-256。
- 〈盛宣懷與中國實業利權之維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7（民國 86 年 6 月），頁 1-43。
- 〈上古五帝神話及其科學內涵〉，《人文中國學報》（香港浸會大學，1997 年 7 月），頁 1-30。
- 〈《酬世錦囊》之內涵及其適用之人際網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訊》，期 24（民國 86 年 9 月），頁 97-100。

編纂資料

- 《海防檔》（九冊，與呂實強等四人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46 年。
-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引得》（與賀凌虛等三人合編），民國 49 年。
- 《中法越南交涉檔》（七冊，與呂實強等四人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1 年。
- 《教務教案檔》第一輯（三冊，與呂實強、李恩涵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3 年。
- 《教務教案檔》第二輯（三冊，與呂實強、李恩涵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3 年。
- 《中國文獻西譯書目》。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64 年。
- 《近代名人手札真蹟》（九冊，與陳善偉合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87 年。
- 《近代名人手札精選》（與陳善偉合編）。香港：中文大學，1992 年。
- 《清末議訂中外商約交涉》（二冊，與陳善偉合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 年。

- 《盛宣懷實業函電稿》（二冊，與吳倫霓霞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2 年。
- 《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與吳倫霓霞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2 年。
- 《康有為手書真跡》。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3 年。
- 《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三冊，與吳倫霓霞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6 年。

書評

- “Book Review of *China and Christianity*,”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28, Part I, 1964.
- 〈書評： *Ch'ing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 1847-1878*, by Robert L. Irick,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2〉（梁家麟合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83 年，頁 275-280。
- 〈書評：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by Paul A. Coh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43p.〉（梁家麟合著），《漢學研究》，卷 2 期 2（民國 73 年），頁 671-692。
- 〈對於吳著：《孫逸仙先生傳》之補充〉，《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民國 73 年），頁 229-232。
- 〈評介馬之驢著《中國的婚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17 期 12（民國 73 年），頁 64-66。
- 〈評王家儉《清史研究論叢》〉，《中央日報·長河》，第 17 版，民國 83 年 11 月 6 日、7 日（連載）。

其他著作

- 《解醒集》，台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64 年 4 月。
- 《水手的話》，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民國 66 年 11 月。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明晰論斷、發微知漸：孫廣德先生

朱浚源*

前 言

孫教授是道地的本土學者，但其問學，貫穿古今三千年，以冷靜客觀的態度，明白簡單的筆法，用泰西新近社會科學方法，切入古聖先賢的政治思維。能將複雜問題如此深入淺出地處理，相當不易。他的學士學位得自前省立法商學院（現為國立中興大學）的行政系，碩士及博士學位得自我國最早有政治學系的國立政治大學。而且是政大政治思想史已故名師鄒文海教授最欣賞的及門弟子之一。為何說「最欣賞之一」？有兩個證據：鄒教授是抽煙的，他當年的煙灰缸，現在在孫教授家；還有，孫教授在他的指導下，三年之內就取得博士學位。國內政治學界的人士心中都十分明白：要想在政大政治系（或其他大學的政治系）用三年的時間拿到博士學位，是十分困難的。但孫教授做到了，可見其根柢與功力之深厚，以及師父鄒文海教授的肯定。

他的處女作是《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成名作則還有《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等。此外，《晉南北朝隋唐佛道爭論中之政治課題》、《政治神話論》、以及《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三部專書，也是費力甚鉅、擲地有聲的作品。還有，他在台灣大學政治系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講義，深入淺出。後來我跟他合作編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先秦與秦漢的主要部分，都來自他的講義。（當然，當時也廣泛參考賀凌虛教授、盧瑞鍾教授、黃競新副教授、葉仁昌副教授和林俊宏博士的若干作品。）專書之外，另有論文約三十篇，雖然在數量上不能和錢穆等人相比，但每一篇都深入淺出，都是獨立創作，而且別有見地。

基於這些成就，他擔任教授數十年以來，每一年都得到國科會的獎助，而且還曾經獲得菲華特設「中正文化獎」的第五屆優良著作獎、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優等研究獎等，並當選「連震東講座」的第二屆法政講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座。（按：第一屆民國 80 年度法政講座的得主是胡佛教授，第三屆民國 82 年是蔡墩銘教授，第四屆李鴻禧教授。）

如今雖然已經退休，他還孜孜不倦，繼續整理手上的稿件，準備在今年，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三部書：《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集》、《明清政治思想論集》以及《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論集》。將來，我們還想建議他整理在台大政治系「中國政治思想史」課程的講稿，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目前他還在猶豫當中。）這四部大書，將進一步以更大的格局，更深的觀察，呈現他通觀中國三千多年政治思想的成果。

這是一系列非常艱難的工程，但孫教授默默耕耘，爲文不發高論，祇求平實明白地忠於前賢昔年的政治智慧，述而不作地加以鋪陳。但不泥古，而改從現代社會科學的觀點，以及今人關懷的幾個面向，一步一腳印地經營，其止於至善的自我要求，有目共睹。

由於他是社會科學家，重點放在政治思想，特別是政治理論部分，要忠實地介紹他，如果單用歷史研究法，自然離真實太遠；即使是用思想史的研究法，也祇能摸到邊，不明究竟。怎麼辦呢？

研究政治必須注意統治的主體、客體、統治的原理、組織、方法與手段。而研究政治思想史，就要找出思想家（與從政者）的有關統治的論述、政策與措施，以便從中找尋其對統治的主體、客體間之關係、統治的原理，還有統治的組織、方法以及手段的不同看法與做法。現在我們試著以這樣的架構來看孫教授的研究成果，希望可以清楚地描繪出其關懷與用力的主要方向。

介紹孫廣德教授的學術成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的原因在於他的問學根柢較深，滲透也較廣：從先秦到民國初年，這前後三千年期間的中國政治思想家，數量非常之多。其中相當多位都在他規撫研究之列。他的切入點，有縱向與橫面兩大類：

（一）縱向貫串

由於歷代的政治思想家，都是當時社會百數十年難得一見的智者，他們涉獵極廣，對人生、社會以及大自然各方面，多所論列，在每個人龐大或深奧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著作之中，所觸及的學問與知識非常博雜：除了人生、社會與自然三大主題均需深入之外，有許多人又及於哲學或玄想的許多面向，諸如：宇宙（天道觀）、本體（理、氣、陰陽五行）等等。這些面向與主題，在這些人的心中，又彼此相互連結，依自性與不同的時代

認知，以及相異的研究與推論方法，各自形成博大複雜的知識與智慧網絡、體系、以及世界。壁壘分明，自具特色，而有儒、道、法、陰陽等學派，與佛教、道教等宗教。他們隨著時代演變而互動，產生共存、相生、相合與相斥。這些龐雜的智慧結晶，都表達在龐雜的著述裡頭。

想前後一以貫之，了解政治思想家對某一主題的看法，就必須細讀前後三千年具代表性者的著書。這是相當困難的事情。但是孫廣德教授做到了。而且，不祇一次地分別以神話、成就、政權轉移、德、力、聖人、無為而治、義務、民本、民權、君臣民關係、天道、陰陽五行、實利等 key words（關鍵詞）作為主題，從先秦到近代，縱向貫串研究歷代政治思想家的主張。

（二）橫面剖析

除了縱向的一以貫之以外，他也做橫面的剖析。橫面剖析的焦點，又分兩種：一個是人物探究：將其一生思想予以個別探討，另一個是主題論述：通論當代與該議題相關之言論與行動。

1. 人物探究：以先秦和近代為主

許多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家，通常終其一生，祇挑選若干人加以論述，而且以通論其整體思想為主。孫教授不然。除了曾經討論古代重要思想家，特別是老子、孔子、孟子、莊子、荀子、墨子、鄒衍等八位先秦第一流的思想家的政治論述之外，更將焦點放在近世，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思想家。他曾經專文深入介紹過的近世思想家，集中在明清兩代，間亦及於元末以及民國初年。這些思想家，依時間順序來看，計有元末的方孝孺，明初的劉基、薛瑄，明中葉的呂坤、張居正，明末的王船山、顏元、李塨，清初的唐甄，清中葉的龔自珍、倭仁。可見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至少十一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都在規撫之列。先秦八位，近代十一位，是他的重點。此外，他也曾經深入討論先秦法家的其他要角，如管仲、鄧析、李悝、尸佼、慎到、申不害與商鞅；秦漢時期的法家李斯、《鹽鐵論》作者，儒家董仲舒、陸賈、賈誼，雜家呂不韋、淮南子（劉安）以及東漢的王充，也有所論列；魏晉時期阮籍、鮑敬言。以上至少十七位，在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未刊稿之中，也佔有相當份量。與先秦八位以及近代十一位思想家相加，孫教授深入論列的人物，至少有三十六位。

2. 主題論述

另外有一些關於近代政治思想的書籍與論文，以主題的形式展開。孫

教授嘗試扣緊中國近代思潮的核心脈動，把最重要的幾個政治議題，先提出定義，再就不同階段、不同流派的相關爭論加以介紹、排比，加上檢討，最後又在結論中明白加以總結以及評論。他所挑選的議題，至少有四種：

第一，傳統與西化的看法。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兩大時期，分別論述各派爭論的內涵。

第二，對民權的看法。以戊戌時期前後十年(1894-1903)的主張，作為討論的對象，以了解洋務與維新運動時期的民權理論。

第三，對民主政治的提倡與設計。在討論洋務與維新運動時期對西化，特別是民權的看法之後，孫教授進入憲政運動時期，也就是 1900 年到 1911 年的清末最後十二年，就民主政治的範圍，以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陳天華、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為對象，針對革命與君憲兩大派的論點，深入討論有關自由、平等、權利、義務、民主體制等的觀念與制度。

第四，對民主的看法。民國剛剛成立，在袁世凱、段祺瑞、張勳、馮國璋等人主政的北洋政府（民國 2 年到 8 年）時期，以反動派、維護派與闡揚派人士的主要看法，作為討論對象，來論列比較。反動派包含嚴復、古德諾、楊度、宋育仁、勞乃宣、與張勳；維護派包含梁啟超、「秋桐」、「重民」、「林平」、「箸超」、汪鳳瀛、「稟秋」、徐佛蘇；闡揚派包含陳獨秀、高一涵、張東蓀、「儉父」、「高勞」、「竹音」、「待英」。

基於以上兩類的三種切入法，孫教授均下了許多工夫，而且分別又有豐富的作品。他究竟如何論述？依個人淺見，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

一、論統治的主體與客體

談到政治，就必須先確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才能進一步再看治與被治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要明白統治的主體（subjects，也就是統治者）與客體（objects，也就是被治者）。

〈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73-1)一文直接處理這個問題。他將之分為兩個層次：（一）階層流動，（二）主客體關係。

（一）階層流動

孫教授引用西人 Bernerd Barber 的階層理論，從社會階層的區分，以及其間的流動，說明統治的主體與客體之間並非固定不變的。這是一項非

常重要的認定。因為即使到了資訊發達的今天，我們有許多人還誤以為古代是個「封建」的社會，百姓世世代代受奴役，而君王則世世代代為君王。他明確地點出：「商周雖是封建社會，尤其周朝的封建制度非常完備，但仍有社會流動；商朝的平民可以向上流動為臣，周朝平民中的士也可以為小吏。至於秦漢及其以後，自然有更多的社會流動。這些都是事實。」（73-1，頁49）他引用黃宗羲的論點，指出若干思想家堅持「三者之間的流動是很自然的，很通暢的」。（73-1，頁48）

（二）主客體關係

在統治的主體與客體之間，孫教授發現中國古人微妙而複雜的區分法：在統治的當然主體：「君」，與統治的當然客體：「民」之間，還有一個既像主體也像客體的「臣」存在。我發現他的這種區分，非常重要，正足以破今天學界若干人提出的“state vs society”，也就是政府與社會是相對立的謬論。因為臣是統治者，是 state 的一部分，但臣也是被君統治的，在相當層次上是被治者，是 society 的一部分。今人以政府與社會為兩極，是一種不符事實的認定。真正的事實，從孫教授的理論可以推論出來：民與臣之間的高度流動，使政府基本上是社會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將民意做相當深刻的反映，不可能長期對立。若有對立，也出在幾個獨裁但無能的君的誤導。一般而言，臣是君與民溝通的正規橋樑。

接著他用角色理論，配合階層理論加以分析，並將焦點放在最重要的先秦，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儒、道、墨、法四家。他說：「在理論上，先秦儒、道、墨、法四家諸子對君、臣、民的角色期待，與君、臣、民階層流動的見解，各有不同。就對君、臣、民的角色期待而言，如以儒家為基準加以比較，墨家與儒家最為接近，而道、法兩家則各趨極端。」（73-1，頁49）儒、墨兩家要求君與臣的比重高於要求民；法家要求臣、民的比重，高於要求君；道家表面上似乎都不太重視，因為主張順從自然，反對有所作為，其實不然。孫教授緊接著說：「各家對各角色的評價雖有不同，但基本上卻仍有相同之處，譬如各家都最重視君的討論，其次為臣，再次為民，可見各家的價值體系間，仍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當然君最受重視，其次為臣，再次為民，這是當時政治社會中的事實。又可見各家價值體系與政治社會的事實間，也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73-1，頁49）根據這樣一個價值體系，中國古代思想家要求君、臣、民的嚴格程度，也有了明顯的差異。其中自然

以君被要求的最為嚴格。他說：「君、臣、民的角色社會功能既然不同，而為了履行不同的社會功能，便需要不同的才能與訓練，無可否認的，君需要最大的才能與訓練，臣次之，民需要的才能與訓練最小。」（73-1，頁48）。

〈柏拉圖與先秦儒家賢人政治及階級觀念之比較〉(70)提供讀者一些令人訝異的發現。在比較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名著《共和國》(The Republic)與《法律》(Laws)兩書之後，孫教授發現柏拉圖與先秦諸子看法若合符節之處甚多，特別是對「人治」的堅持。（70，頁56）而且，「孔、孟、荀始終主張賢人政治，柏拉圖卻先主張賢人政治，後主張富人政治，而富人未必就是賢人。」（70，頁57）「所謂賢人政治，就是以好人為政；而主張以好人為政，也就是主張人治……」。

為何柏拉圖會以賢人或富人來統治，而孔孟荀祇要求賢人？孫教授也深入加以探討。他指出關鍵有二：首先他們都有階級觀念，而把人畫分成階級。其次，他們的階級之間的流動。先秦諸子對流動問題的答案，前面已提及，這裡祇提階級畫分的根據。他說：（70，頁57）

柏拉圖把一國之內的人分為治國者，衛國者與生產者三個階級，分別由金質之人，銀質之人與銅鐵質之人充當。而人之有金質、銀質與銅鐵質之分，是出於天生，生來便是如此：因而其階級的畫分是根據出生，也就是說人生來便有階級之分，為治國者、衛國者或生產者，生來便決定了。而孔、孟、荀的見解則不是如此。……依照孟子與荀子的說法，階級畫分的根據是後天的努力與成就，……。

可見當年東、西兩個世界的思想家，在統治主體與客體之間關係的論述上，東方的先秦諸儒，比西方的 Plato 還要來得更為「現代」(modern)與「開放」(open)。

當然，孫教授的關懷決不僅止於古代，而更關懷近代。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他也舉出許多前進思想，這裡以王船山與唐甄為例：在〈王船山思想中的君主角色〉(82-2)，他介紹船山的君位君權的「相對主張」。在〈唐甄的政治思想〉(75-2)，他介紹唐氏最獨特的兩大主張：

首先是：盡量壓低君主地位，相對的提高臣民地位，而寓有君民平等的精神。不過雖稱獨特，孫教授接著說：只是如孟子般出於傲視君主的氣魄，以及對其前或其時抑制君權思想的加強，而與侯外廬所說的「民主政體」無涉，也非「虛君立憲的萌芽思想」。

其次是：斥罵歷代帝王為盜賊。唐氏一方面壓低君主地位，一方面又

加重君主責任，以爲亂天下亡天下，以至於殺戮人民，其責任皆在於君；因鑑於歷代殺戮之慘，乃認爲自秦以來，歷代帝王皆係惡毒之盜賊，因爲他與盜賊同樣殺戮人民。（75-2，頁89）

孫教授肯定地說：「歷代學者對某些特定的暴君，如桀、紂、秦始皇等，多加斥責辱罵，但對自秦以來所有帝王一律加以斥罵，全視之爲盜賊，而無有例外者，恐唯唐氏一人而已。」他對唐甄在十七世紀的敢於衝決網羅，給予高度的評價。

二、論統治原理

孫教授所論述的統治原理，主要集中在德（道德；ethics）、力（權力；power）、倫理、民本以及義務五個基本概念。這五個概念，從今天西洋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似乎有掛一漏萬之嫌，因爲權利、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法律、人權等重要觀念，都付之厥如。其實不然。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從先秦以至清中葉所重視的，並非西方的這些觀念，而環繞在孫教授所介紹的五點上面。

〈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德與力〉(81-1)提出他通觀中國古代以至清代，前後三千年的思想家屈指難數的著述之後，所做的結論。他認爲歷代思想家或從政者，對「德」與「力」的見解可分爲五類，（81-1，頁207）

1.重德輕力，幾乎否定力（不言力）：有先秦的莊子，唐的李翱，宋的司馬光、蘇洵、蘇軾、蘇轍，明的王守仁、方孝孺等。

2.重德輕力，然不否定力（先德而後力）：有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墨子，秦的呂不韋及其門客，西漢的陸賈、董仲舒、楊雄、黃老學者及君主大臣，魏晉的何宴、王弼、阮籍、嵇康、劉伶、張湛、向秀、郭象，隋的王通，宋的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朱熹，明的呂坤、李贄，清鴉片戰後的保守人士等。

3.德與力並重：有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東漢的王充、王符、荀悅、崔實、徐幹、仲長仲，唐的柳宗元，宋的李觀、王安石、陳亮，明的劉基、張居正，明末及清前半期的學者，清鴉片戰後的開明人士等。

4.重力輕德，而不否定德：有漢的晁錯、黃生、杜周、張湯、桑弘羊及《鹽鐵論》中所載的其他丞相御史大夫等。

5.重力輕德，否定德：先秦的《商君書》作者、韓非，秦的李斯，宋

的葉適等。

根據這些資料，孫教授看出兩點：第一、中國自古以來，大多數的重要學者，都曾討論或涉及德與力的問題，這證明德與力正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中心課題。第二、合計中國自古以來討論或涉及德與力問題的重要思想家及學者來看，要以重德的人多，重力的人少，特別重視德而不太重視力，更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特色。只有極少數統治者明白宣示重力不重德，如曹操在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曾數度下令求才，專要「負污侮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可算例外。（81-1，頁207）掌握權力之人不宜強調權力，而應強調道德，的確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特點。

為何古代中國人會以道德，而不以權力作為政治思想的核心？我們知道，權力(power)的觀念是現代政治學最基本的元素，沒有它，幾乎不用談政治。然則為何中國舊傳統與西人今天理念不同，在論述當中沒有它的蹤影？

孫教授並未直接處理這個問題。因為他更希望問的是：為何獨有道德的蹤影？以正面地找尋政治上的道德中心論的根源，來代替負面地詢問 why not 之類空無的問題。

他所發現的答案，讀者一定不會吃驚，因為這是了解中國古代政治的人所耳熟能詳的。他說：道德之所以獨大，原因在於政治與倫理之間的關係。孫教授指出：中國人政治與倫理是接近「合一不分」的。而且，這種合一不分，是經過理性設計出來，而非自然產生的。因為中國人企圖在二者之間，作「適當的調和」，也就是：「一方面再把政治與倫理合起來，一方面要想法免除或適當解決前述政治與倫理不分的難題。」（參見未刊稿：〈我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之倫理觀念及其難題〉，頁25-26）孫教授這種說法，為中國政治文化以倫理主導的正當性，以及其原因，做了深入淺出且雋永的闡明。

對於民本思想，他基本上十分贊成，因此特別以專文〈我國民本思想的內容與檢討〉(77-1)深入討論。他將民本思想「視為一種限制君權思想的思想」，而其內容主要有三：「尊重民意」、「重視人民地位」以及「安民保民養民教民」。文中依序「論述民本思想的內容。然後依所述內容，進行檢討，先與民主思想相互對照比較，以窺探民本思想的確切意義與本質；次由歷史事實，觀察民本思想對實際政治的影響；最後以缺乏鬥爭精神、報應說的信仰、真命天子思想、人治觀念等，說明中國民本思想不能發展為民主的原因。」（77-1，頁436）

他語重心長地說：（77-1，頁437）我們現在寧願選擇民主，而不選擇

民本，但那只是籠統地就民主與民本的整體來說。實則民本思想中，仍有些精神較民主崇高，而值得我們取法，譬如民本思想中的安民、保民、養民、教民，雖似君主的恩德，不是人民的權利，沒有確切的保障，但卻對君主以聖賢相期，要求他做得好。對於民主的功能，孫教授提出保留。他說：

民主思想中的為民服務，雖然執政者的職責，是人民的權利，有確切的保障，但因對執政者以公僕看待，只要求他不違法；不違法只是與法律規定相符合，未必做得很好。

能夠做得好，當然優於僅是不違法，這是民本精神較民主精神崇高，而值得取法的原因之一。他又說：再如我們曾說民本思想下的政治是一種仁政，是要君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存著恤民愛民之心，去做安民、保民、養民、教民的工作。而「民主思想下的政治是責任政治，而所謂責任政治，只是要求執政者為民服務盡責任負責任而已」。孫教授這些說法，比較深刻；一般人如果沒有冷靜而且誠懇的態度，以及深入的政治思維，就沒有可能了解，也不可能接受。那麼，為何中國人重視民本呢？因為中國古代自我的修鍊，與自我的要求，因此強調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對於此，〈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之義務觀念〉（75-1，頁119）有深刻的論述。

因此，義務、道德以及民本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三大核心觀念，而執行的要領，就在倫理的維護上面。倫理要如何來維護，才能產生統治的功效呢？就牽涉到具體的統治組織、方法與手段。

三、論統治組織、方法與手段

孫教授問學，以政治思想為主要範圍，特別論斷從先秦到晚清的時段。這個時期的思想家，雖然確有一部分曾經討論統治組織，或政治制度、或者政府，但人數比較上少。因此，孫教授在這方面也較少著墨。在古代的討論中，以政權轉移為主，重點放在政體的本質上面。不過，也僅是理論上的探究。沒有真正進入制度的內部。

與制度有關的研究，似乎以〈清末憲政運動時期民主政治的提倡與設計〉(84)以及〈北洋主政時期與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86)兩篇近作為主，重點放在政體的本質上面。這兩篇作品當中，孫教授似乎與原來偏重民本的做法有所不同；在「民本」與「民主」之間，逐漸偏重民主。84年發表的文章列舉嚴復、康有為與梁啟超諸說，主張從培養人民自治

能力下手；也列舉孫中山、陳天華等，主張建國應分軍法、約法以及憲法之治來循序漸進。另外還介紹不少人，「主張研究憲法、普及教育、設立地方議會，實行地方自治。」（84，頁34）

民國86年的文章再進一步肯定「民主思想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國必然要走的路，實行之，不僅可以使政治現代化，也可以帶動其他方面的現代化」，如果竟然有人要「加以反對，要回頭，要倒退，要取消共和，恢復帝制」，那麼不僅阻礙進步，對國家民族有害無益，而且孫教授明白地說，「會『違背潮流』，因此根本是走不通的。」（86，頁18）以對民主的肯定為立論基礎，再憑以論斷民國初年反對民主、維護民主以及闡揚民主思想諸人的看法。

統治組織也可以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結構來看。以前，他從階層的流動來看君——臣——民三者之間的關係，來了解先賢關於統治組織的看法。十四年前，他的〈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一文，就可以從統治組織的觀點來重新理解：「就對君、臣、民階層流動的見解而言，儒、墨兩家最接近，認為君、臣、民三者之間均可流動。道家與儒、墨也相去不遠，而法家則與各家根本相反。」比較起來，在統治組織之中，其成員的屬性是否可以變動，各家的意見不同：「似乎是墨家的君、臣、民流動途徑最為暢通，其次是儒家，再次是道家，最次是法家。」（73-3，頁222）先秦以外，更論及秦漢直到近代的情況。其中特別介紹唐代韓愈與明末黃宗羲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說：（73-3，頁222）

韓愈的見解似乎更超過法家，連臣、民之間的流動途徑都不能暢通，臣只能向下流動為民，民卻很難向上流動為臣。黃宗羲的見解則較特殊，雖然就君、臣、民之間均可流動來看，似與儒、墨、道的見解相同，但他不承認君、臣、民為三個不同的階層，因而君、臣、民之間的流動，不是階層間的上下流動，只是平面的角色變換。

從早期的介紹君主時期的政治思想，到最近的介紹反對與肯定民主制度的各種說法，孫教授從思想切入，就發現民本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一前一後，出現在中國政治思想的三千年歷史之中。這種發現，似乎也代表了他研究對象的改變，其中包含了價值判斷在內。

不過，孫教授近年的肯定民主，畢竟比不上過去數十年的肯定民本。因為民主祇描述一種過程，重視的是形式的意義，民本反而比較具有實質的內容：要求統治者以人民為根本，也就能扣緊以人民的福祉為終極目的

與判準的大原則。

孫教授也論述有關統治的方法與手段。

以人民的福祉為目的，是孫廣德教授研究歷代政治思想家的核心關懷。他的這種關懷，透過對思想家個人政治思想的介紹，得以深刻地表達。這裡限於篇幅，祇介紹近代的一部分。而以呂坤(1536-1618)、顏元、李塏、王夫之、唐甄、倭仁為例，來簡單敘述。

呂坤政治思想中的一大特色，是他的思想與策略、措施完全一貫、一致甚至合一。孫教授發現：他似乎是依思想擬定策略，依策略採取措施；又似乎是由措施化為策略，由策略化為思想。換言之，他確實能將統治原理融合到統治的方法與手段裡面，使理論與實際結合。「譬如講養民時所講的救濟與儲蓄，講教民時所講的鄉約與社學，講臣的職責時所講的教官之職、知州知縣之職、守巡道之職，講臣的行為時所講的盡心滿分、留心鄙瑣、戒喜事等，可說是措施，也可說是策略，又可說是思想；既是思想，也是策略，又是措施。」這特色顯然是由他求實用、主用世的基本精神而來。（83-1，頁49）孫教授說：呂坤不祇注重實用、實行與效果，也頗富實利精神。（67，頁42）

顏元與李塏、王船山、唐甄都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顏元與李塏都是實利思想的倡導者，而且其言論「較明確而有系統」（67，頁43）。他們二人以外，黃宗羲、顧炎武等，也有趨重實利的傾向，唐甄亦然，但性質不同。

唐甄較強調理論與實際之間的連結，多少能符合實用或實利的原則。孫教授指出：唐氏能重農並不稀奇，因為這是中國傳統思想主脈，但他能明白表示不輕商，則堪稱獨特。此外，「唐氏於論及各種政治問題之時，不僅揭示理想，且多能提出具體的策略與方法，如對人才的選拔與任用，官吏的裁減與待遇的提高，黨人的懲治，官制與幣制的改革，帶兵之道，用兵之法等，所提出的策略或方法，大都非常具體，非徒高論空談者可比。」（75-2，頁89）這一點也使唐甄在政治思想史上有獨特的地位。

近代這些人的政治思想，似乎都步向比較上功利，或者說是實用或重視實利之路。〈龔自珍的政治思想〉(73-4)就是這方面的力作，而〈龔自珍的經世思想〉(73-1)更直接討論實用致世的內涵。後者曾於當年應邀，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世思想」研討會上宣讀，並且收入近史所《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3年3月）當中。而前者篇幅較大、論列更深更廣，以公羊家的「因時變、應時需」的精神，積極地主張變法

改革以及仿製西洋器物，更進步凸顯傳統儒者力求突破，將內聖外王為主要訴求的舊傳統，改為針對時弊，在統治組織、統治方法、統治手段等方面，從禮儀、祭祀、官職、官風、稅制、兵制等項目，具體求變的努力。當然，任何人的思想都有其局限。孫教授說：龔自珍也有他時代的局限，例如主張抑商、用女樂以消耗士人資財精力，為的是控制其議論等等「治術」。其思想的正反兩面，均經孫教授指出，並且明白加以肯定或評論。

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傳統政治智慧對西式政治制度、思想、政策、民情等的思考、接納、爭議、批判及反動。時下的知識份子處理傳統的，特別是保守的這一類思想，每多貶抑，甚至不屑一顧。孫教授則不然。他一直保留自己在比較冷靜的情境，因此能夠不以人廢言，〈倭仁的政治思想〉(71-2)就是例子。倭仁為蒙古正紅旗，道光9年進士，信守儒家思想及宋明理學，而且性行嚴謹，以孟子所謂的「大臣」之道來事君。這種人的思想，事實上代表中國當年政治思想的主流，自然值得深入了解。不過，孫教授也指出，他「過於迂謹，所以偏於守成，而難以進取，致有違背時代潮流的主張與言論。」(71-2，頁202)孫教授很清楚地指出倭仁思想的重點所在：

當時倡導洋務的人，要在求中國的富強，而倭仁反對洋務，頗易令人誤認其不求富強。實則儒家思想與理學都不反對富強，而且其中都包涵了富強，倭仁既信守儒家思想與理學，也自然會求富強。但儒家思想與理學的重點仍在人倫道德，尤以理學為然，一方面認為富強是講求人倫道德的必然結果，一方面認為講求富強的途徑必由人倫道德。倭仁也是如此，這就是他奏摺中所說的「尚禮義不尚權謀……在人心不在技藝」。

不過倭仁反對洋務的主張，在當時曾發生極大的影響。之所以如此，孫教授認為有更深刻的內容。他的反對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招取正途出身者前往學習，竟然造成士人裹足不前，「而詞館曹郎皆自以下喬遷容為恥，竟無一人肯入館者」。這一方面固然由於「時倭文端方為首揆」，地位顯要；而一方面卻也由於倭仁並非根本反對富強，且其主張也頗能言之成理。

孫教授引用陸寶千教授的看法，指出：「倭仁之斷斷與恭王等相難，實與理學者力圖自強之心聲相共振」；倭仁主人格之陶冶，倡導洋務者主事業之創建，而「健全之人格乃一切事業成功之必要條件……故知倭仁等所說不為無見，與船堅砲利之論並不衝突。此恭王等歷次辯難，所以不能

服其心也」。

孫教授明白地下了結論，他肯定陸寶千教授之說，不過他懷疑所謂「倭仁等所說」，「與船堅砲利之論並不衝突」。他以畫龍點睛的手法，強調倭仁的保守，的確有矛盾存在，不用替他掩飾，因此：倭仁所說，應當是指求富強的目的而言，在方法上則很明顯的相互衝突，而且，孫教授道出了最終極的特色：儒家、理學家以至於倭仁，雖也求富強，但「富強並不是他們的最高目的」（71-2，頁203）。

結語

以統治的主體與客體、統治的原理為主軸，輔以對統治組織、統治方法以及統治手段的論述，孫廣德教授建構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精神，而其內涵，依我個人淺見，至少包括道德、倫理、義務、民本以及權力五個大項。從這五個項目，以及先秦儒、道、法、陰陽、與墨家五大學派，推而及於秦以後，綿延至清末，上溯至西周，前後三千年的各宗派，形成一個內容複雜，變化多樣，但原理簡單、脈絡清晰的龐大政治思想世界。這個世界，獨立於西方的政治思想之外，為期兩千五百年以上，直到明末。

孫教授治學的重點，就在通觀這段時間的政治思想特質，而歸結到民本思想以及（道）德重於（權）力的兩大主軸上面。民本與德治，可說是中國政治思想兩千多年來的最大特色。孫教授分從統治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三層互補與交流的合作關係，而非西方的兩層矛盾對立的辯證關係，也就是君、臣、民三者之間的互動，來詮釋先秦以來政治思想家，以及少數政治家（如張居正）的政治思想。

除了這兩大主軸，另外還有一些特色，而為西方所無。例如陰陽五行、無為而治兩大項。除開兩大主軸與另外兩大特色之外，對於階級、神話、賢人等，均有所介紹與申論。這些想法，加上義務觀念，乃形成精英主義：要求士大夫自我期許，從獨善其身出發，到治國平天下的以民為目的，但不主張人民作主的思想。

根據這一政治思想特質，孫教授進一步關懷近代以來的變化。其中自以兩大路線之爭為核心：一則主張向西人學習；一則繼續肯定自身傳統。在二者之間，也就是傳統與西化之間，更精確地說：民本與民主之間，產生了高度的爭議。孫教授用專書及文章直接敘述思想的爭議，也用文章多次介紹與

討論言行的爭議。前者如《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71)、〈龔自珍的政治思想〉、〈龔自珍的經世思想〉。後者如〈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86)與〈倭仁的政治思想〉等。透過這些論述，孫教授指出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以民主為新範圍與新議題的新時代趨勢的內涵。

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中國人已經不再以民本思想為主軸，而改採民主。他介紹民主，並肯定民主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存在與必然。

由於孫教授近日仍有三大部書籍付梓，且有現成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未刊稿，在適度增補以後亦可出版，可以看出其在思想上更上一層樓的工程，將在未來的歲月中完成。值此孫教授榮退接近一年的日子，筆者謹以最誠摯的心情，祝福他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新局面，毫不猶豫地繼續邁開大步。

附錄：孫廣德教授著作目錄

專書

- 《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60 年 5 月，236 頁。
- 《晉南北朝隋唐俗佛道爭論中之政治課題》，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61 年 5 月，197 頁。
- 《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1 年 5 月，219 頁。
- 《政治神話論》，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9 年 9 月，197 頁。
- 《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2 年 6 月，320 頁。
- 《中國政治思想史》，與朱滋源合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 86 年 1 月，426 頁。
- 《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集》（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中）。
- 《明清政治思想論集》（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中）。
- 《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論集》（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中）。

期刊論文

- 〈五德終始與朝代更替〉，《中山學術文化集刊》，集 2，民國 57 年 11 月，頁 141-181。
- 〈呂坤的政治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2 期 7，民國 59 年 7 月，頁 21-24。
- 〈墨子及其著作〉，《中央月刊》，卷 5 期 6，民國 62 年 4 月，頁 137-145。
- 〈春秋時代上層社會的天神觀〉，《東亞季刊》，卷 5 期 3，民國 63 年 1 月，頁 13-27。
- 〈孔孟荀的天道觀〉，《孔孟月刊》，卷 13 期 7，民國 64 年 3 月，頁 11-16。
- 〈我國古代政權轉移理論之研究〉，《社會科學論叢》，輯 24，民國 65

- 年 3 月，頁 289-317。
- 〈陰陽五行說與漢代政治（單行本）〉，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民國 66 年 2 月，頁 1-27。
- 〈顏元與李塏之實利思想〉，《社會科學論叢》，輯 27，民國 67 年 11 月，頁 41-73。
- 〈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政治學論叢（論文集）》，聯經文化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68 年 1 月，頁 37-93。
- 〈戊戌前後的民權思想(1894-190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變法與立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0 年 8 月，頁 8-33。
- 〈柏拉圖與先秦儒家賢人政治及階級觀念比較〉，《中國國學》，期 9，民國 70 年 9 月，頁 56-62。
- 〈我國正史中的政治神話〉，《社會科學論叢》，輯 30，民國 71 年 9 月，頁 29-76。
- 〈倭仁的政治思想〉，《政治學報》，期 10，民國 71 年 12 月，頁 135-205。
- 〈龔自珍的經世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3 年 4 月，頁 275-294。
-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爭議之檢討〉，《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冊 3，民國 73 年 5 月，頁 451-475。
- 〈我國古代的君臣民理論〉，《社會科學論叢》，輯 32，民國 73 年 12 月，頁 173-223。
- 〈龔自珍的政治思想〉，《政治學報》，期 12，民國 73 年 12 月，頁 191-291。
- 〈唐甄的政治思想（上、下）〉，《食貨月刊》，卷 15 期 11、12，民國 75 年 6 月，頁 30-54；卷 16 期 1、2，民國 75 年 9 月，頁 67-91。
- 〈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之義務觀念〉，《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卷 19 期 1，民國 75 年 6 月，頁 119-133。
- 〈我國傳統思想中成就定位與成就觀念的檢討〉，《社會科學叢論》，輯 35，民國 76 年 3 月，頁 9 至 24。
- 〈我國民本思想的內容與檢討〉，《社會科學論叢》，輯 36，民國 77 年 3 月，頁 401-438。
- 〈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天道觀〉，《中國國學》，期 16，民國 77 年 10 月，頁 91-126。
- 〈先秦儒法道三家的無為而治思想〉，東海大學文學院《第一屆中國思想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8 年 6 月，頁 1-18。
- 〈中國傳統思想中之德與力〉，《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64，民國 81

年 3 月，頁 189-208。

- 〈劉基的政治思想〉，《社會科學論叢》，輯 40，民國 81 年 6 月，頁 1-49。
- 〈王船山思想中的君主角色〉，《哲學與文化月刊》，卷 20 期 9，民國 82 年 9 月，頁 848-859。
-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67，民國 82 年 10 月，頁 17-69。
- 〈呂坤的政治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69，民國 83 年 9 月，頁 1-49。
- 〈薛瑄的政治思想〉，《社會科學論叢》，輯 42，民國 83 年 12 月，頁 47-100。
- 〈張居正的政治思想〉，《政治學報》，期 23，民國 83 年 12 月，頁 1-80。
- 〈清末憲政運動時期民主政治的提倡與設計〉，《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71（下冊），民國 84 年 10 月，頁 1-34。
- 〈丘濬的政治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期 73（下冊），民國 85 年 10 月，頁 69-110。
- 〈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上）〉，《政治科學論叢》，期 7，民國 85 年 6 月，頁 1-38。
- 〈北洋主政時期民主思想的反動維護與闡揚（下）〉，《政治科學論叢》，期 8，民國 86 年 6 月，頁 1-20。

學術研討會論文

- 〈墨家政治思想中之唯物傾向與唯心傾向〉，韓國中國學會第七次國際中國學大會論文，約六千字，民國 76 年 8 月。
- 〈先秦儒家的人性論〉，香港大學儒學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約一萬四千字，民國 76 年 12 月。

書評

- 〈評邵德門著「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五）》，民國 79 年 4 月，頁 1-17。
- 〈評李澤厚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七）》，民國 80 年 6 月，頁 13-36。
- 〈評吳廷嘉著「戊戌思潮縱橫論」〉，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八）》，民國 81 年 6 月，頁 17-35。
- 〈評張錫勤著「中國近代思想史」〉，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九）》，民國 81 年 12 月，頁 1-28。
- 〈評李龍牧著《五四時期思想史論》〉，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十一）》，民國 82 年 12 月，頁 311-338。

狹間直樹先生

石川禎浩^{*}撰 黃自進^{**}譯

一、先生的經歷與學風

狹間直樹先生乃是日本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東方部主任，同時也是孫文研究會代表、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理事及東洋史研究會評議員，是一位活躍在學術界第一線的學者。其研究成果可見附錄的著作目錄，其中不少已被翻譯並在各國發表。

先生於 1937 年 8 月 30 日出生於兵庫縣小濱村（即現在的寶塚市）。從少年時期即對世界地理與世界歷史饒有興趣，後來藉由對《朝日新聞國際週報》的閱讀而對中國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和關心。至於在高中時代，受教於福永光司教授(1918-)，可謂是引領先生投身中國研究的人生轉捩點。眾所週知，福永教授是研究中國思想的大家，以論述老、莊以及諸子百家而享譽當世。先生在大阪府立北野高校就讀時，福永教授正在該校任教（1951-1955，其後歷任東京大學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等職）。當時先生在班導師福永教授的薰陶下，即矢志從事中國史的研究。是以，高中畢業後乃於 1957 年 4 月進入京都大學文學部就讀。

有感於先生對中國研究的熱誠，福永教授特在先生進入大學就讀後，為他開闢「個人講座」。也就是除了課堂上正常的課程之外，每週一次以一對一的方式為先生講讀《史記》列傳。這對當時的學生來說是一項不尋常的殊遇。福永教授的「課外講授」非常嚴格，先生常為了每次兩小時的課程，要花十個小時以上的預習。而先生的漢語也就在如此的兩年「講讀」之中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就讀時，先生有幸受教於羽仁五郎、井

* 日本神戶大學文學部助教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上清等自由主義前衛學派，再加以與里井彥七郎、小野信爾、近藤秀樹等學術先進的交往，更加篤定先生投身中國研究的決心。先生的大學畢業論文是〈山西商人的研究〉，1961年4月開始其京都大學大學院碩士課程時，正巧是京都大學正準備大規模的拓展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1960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京大人文所)的小野川秀美(1909-1980)與島田虔次(1917-)，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兩位教授合組了「民報研究會」。先生因適逢其會，而得以參加。此一「民報研究會」也就是爾後「辛亥革命研究」(負責人：小野川、島田)的前身。1966年，京大人文所正式成立以研究中國近代史問題為主旨的共同研究會時，「辛亥革命研究」是該研究所第一個研究計劃。而小野川教授在籌劃「民報研究會」時，就準備將《民報》刊載的所有文章皆作成摘要，同時也計劃編輯《民報》的詞彙索引。現在研究辛亥革命史及清末思想史所必備的參考工具書《民報索引》二卷(小野川秀美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刊行，1970，1972年)便是當時的研究成果。而先生與島田虔次、小野信爾、小野和子等人皆是參與製作該索引的幕後功臣。

參與「民報研究會」三年後，1963年先生結束其碩士課程，而進入博士課程。在博士課程期間，先生於1965年11月到翌年的1月，加入京都「中國研究青年代表團」，訪問中國，並曾於12月下旬至翌年1月間就教於北京大學歷史系陳慶華教授，這是先生的第一次訪問中國。如前言所述，京大人文所於1966年才正式成立以中國近代史為主題的共同研究會，並因此才有助理研究員的配額。而先生便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首任助理研究員(1968年10月就任)。以「辛亥革命研究」為起點的京大人文所的中國近代史共同研究會，至今天為止，仍然是日本關西地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重鎮。從此一角度而言，先生的研究過程不妨也可等同視為是關西地區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里程。

先生於助理研究員任內，與小野川秀美及島田虔次兩位教授共同盡心於「辛亥革命研究」的組織運作。「民報研究會」和「辛亥革命研究會」除推出先前所學的《民報索引》之外，還有《中國革命的先驅們》(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島田虔次著，筑摩書房出版，1965年)、《辛亥革命的思想》(辛亥革命の思想)(島田虔次、小野信爾編，筑摩書房出版，1968年)、《辛亥革命的研究》(辛亥革命の研究)(小野川秀美、島田虔次編，筑摩書房出版，1978年)等書相繼問世，使日本的辛亥革

命史研究有了飛躍性的成長。其中《辛亥革命的研究》（辛亥革命の研究）一書是以論文集的方式呈現，先生曾盡心於該書的匯集整理，可比美為責任編輯。

先生每每自謙「自己受到良師的錯愛」。除上文已提及的福永教授外，島田虔次教授可謂是影響先生治學最深的另外一位老師。當先生在大學院就讀時，即受教於島田教授，而承受親炙則是自擔任助理研究員起。有關島田教授的學術成就，可參見本刊第十八期森紀子所寫的學人介紹。先生在助理研究員五年半的任內，日日親沐島田教授的薰陶，學習到一字一句也不苟且的學風以及晝夜無間的問題態度。此處敘述一段當年的小故事，可一窺先生的治學風格：島田教授在編撰《世界名著：孫文、毛澤東》（小野川秀美主編，島田虔次助編）一書時，經常工作到深夜。有時常過了晚上十點鐘還從研究所打電話把先生叫來進行孫文著作的文獻解讀，而先生總是二話不說的便應允前來。即使有些僅是枝微的細節，先生仍是辛勤查對。這種一絲不苟的島田式問學精神，先生至今仍奉守不渝。而先生於1990年所發表的〈一個小發現：有關「希查標柱」〉（ある小さな発見——「希查標柱」について），就是這種治學精神的最忠實反映。也就是說，先生在這篇短文裡，實證出《民報》第五期所刊載朱執信文章中所提到的「希查標柱」，事實上是翻譯 Donnelly 的 Caesar's Column 一詞。而這裏所謂的「希查標柱」，是當年先生在編撰《民報索引》中的翻譯詞句對照表時，所面對的無解謎題。雖然歷經近二十年，先生從未釋懷。1990年的發現，當然是先生長年鏗而不舍鑽研的成果。先生治學之誠，由此可見一斑。先生至今的生活方式，依然不捨晝夜，不拘週休的在研究室苦讀。

1974年4月，先生轉任京都佛教大學文學部副教授。1977年4月又以副教授資格回任京大人文所（1985年升任教授）。在佛教大學任教期間起，先生仍以京大人文所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員身分，發表了眾多令人注目的學術著作，建立了他的學術聲望。

京大人文所成員的最重要任務，除了進行個人的學術研究之外，還需網羅京都大學內外的學術同好共組共同研究會（每週或隔週集會一次討論）。自1975年10月島田教授外調到京都大學文學部之後，就由先生繼任共同研究會的召集人，負責該研究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1973年完成「辛亥革命研究」主題研究計劃之後，則又陸續進行了「五四運動之研究」（1973-1978）、「民國初期的文化與社會」（1978-1983）、「國民革命之研究」

(1983-1988)、「一九二〇年代之中國」(1988-1993)、「梁啓超之研究——以日本爲媒介而對近代西方的認識」(1993-1996)、「中國近代的都市與農村」(1993-1998)、「中國共產主義與日本——思想、運動、戰爭」(1996-)等相關主題的研究會。除了「中國近代的都市與農村」由森時彥爲召集人之外，其他各研究會均由先生出任召集人。京大人文所的共同研究會是集合京都大學內外學術菁英而成，是以，擔任共同研究會的召集人，除需具有豐碩的專業素養外，還需有整合各研究人員的統御領導能力。先生自1977年以來，主導中國近代史共同研究會達二十年之久，這也間接的透露出，慕先生之名，加入先生主持的研究會的關西學者是何其之多。

共同研究會除了擁有「學者的學校」性格之外，同時也是研究資訊的交換場所，以及年輕研究人員的培養場所。嚴格而又真摯的學術意見的交換，可謂是共同研究會的特色。這段時間，先生傳授給年輕學者的，無非是上承島田教授一貫對學術的真摯態度。到去年三月爲止，筆者曾有幸任先生的助理研究員達七年之久。在這七年中，先生從不要求筆者從事其他雜事，惟要求做學問，惟要求「坐在桌前」。借用先生的話來說，「不坐下來是無法讀書的」，「讀的還不夠喔！」這些先生一再重覆的話，常讓筆者聯想起島田教授，相信這些都是先生得自島田教授的傳承。

先生的治學態度，表現在上述各研究會結束後所刊印的論文集之外，也表現在有關的學術論爭上。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1987年在中央大學舉行有關「五四運動研究」的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論爭的焦點及論辯的詳細內容均可見於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輯出版的《「五四」運動史學術討論會紀錄》（「五·四」運動研究史シンポジウム記録）（中央大學出版部出版，1988年）與《季刊中國研究》第十三號（1988年10月）等書，亦可見先生所撰〈《五四運動之研究》一書之刊行〉（《五四運動の研究》の刊行を終えるにあたって）一文（見本文附錄），《紀錄》一書收錄了先生在會中的講話，可謂對先生問學態度的真摯深切做了最忠實的註腳。

話題再回到共同研究會上，現今先生負責兩大業務。一爲主持「中國共產主義與日本」的研究，另一爲「梁啓超研究」論文集的出版發行業務。梁氏研究是去年才結束的研究計劃，有鑑於日本是梁氏壯年期的主要活動舞台，因而此一研究以日本爲中心，凡梁氏在日本的言論活動，無論是政治、經濟、思想、文學，皆涵蓋在此一研究計劃內。基於題材的多元性，此一研究會，果然如同預期，獲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研究成果。先生也自

承梁氏研究是他主持「眾多共同研究會中，最感愉快者之一」。這一方面可參照先生在本刊第二十四期所發表的〈梁啓超研究與「日本」〉。此外，「梁啓超研究」的論文集，也可望於今年出刊。

最後，欲介紹先生在海內外間的學術交流事蹟。戰後日本對於中國史的研究，時常要受到中國政治情勢與日中關係變化的影響。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學術交流亦不例外，在1972年之前，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受到極度壓抑的。在這期間，先生首先於1963年協助小野信爾教授籌辦中國學術代表團的訪日活動，從而奠定了今天的日中學術交流基礎。以當年日本國內的政治情勢來說，這可謂是非大勇不敢為的創舉。之後先生參加了京都日中學術交流懇談會的籌備工作，並於1978年4月擔任該會秘書長負責全盤事務的推動。直到今天，先生仍與大陸的著名學者如金沖及、楊天石、黃彥等人保持密切的交流關係，這種友誼並不是一蹴可幾的。另一方面，先生與台灣的學術界也保持了密切的聯繫。1994年11月參加了在台北召開的「國父建黨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1997年3、4月間前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並在該所舉行一場學術演講（請參閱本刊第廿四期），爾後並與中央研究院等台灣學術單位陸續推展各種學術交流。先生常自嘲似地說「我老是前往沒有邦交的地區」，由先生此一表達也可看出，先生所求的無非是以文會友，並不受當時政治體制所左右。

先生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始自1981年在武漢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其後總計出席此等國際會議，也不過十餘次。以先生之盛名，只有此等參與，讀者或許會訝異不已。但是，如果對先生問學風範稍有理解，咸信不致苛責。先生認為「凡是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就必需要參照該會的宗旨，撰寫一篇有新意的好文章」。是以，先生自許，每年以參加一次國際學術會議為限。由於先生不輕允出席會議，如出席則必定有新意發表，這也是先生的著作能深受海內外學者重視的原由。

1994年12月，先生在主持共同研究會的討論會時，突因腦溢血而昏倒在地。所幸經一個月的住院治療後，竟奇蹟似的完全康復。先生於去年邁入花甲之年，現在除擔任東方部主任負責京大人文所的中國研究之外，也是經常召開國際會議的孫文研究會的代表，似乎比發病前更加精力充沛。

先生身為近代史研究者，研究領域廣及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的社會思想、五四運動、國民革命和日中關係等諸多方面。為求能鉅細靡遺的介紹先生在各方面的研究領域，似乎以先生研究方法論的演變為線索，一分為

二較爲妥當。換言之，1982年《五四運動研究序說》的出版，代表著先生研究風格的變革。是以，本文以該書的撰寫爲界線，分前後兩期介紹，以求能更精確的掌握先生學術生涯的成長。

二、前期的研究(1963-1982)

如前所述，先生在京都大學就讀時便有志於研究中國近代史。當時京都大學對中國史的研究可謂是「厚古薄今」，以研究近代以前的歷史爲主，然而先生卻選擇近代史。先生最早的研究成果是〈山東萊陽暴動小論—辛亥革命時期人民鬥爭的任務〉(辛亥革命における人民鬥爭の役割)和〈中國近代史中「隸屬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農民」的出現與以其爲題的農民鬥爭〉(中國近代史における“資本のための隸農”の創出およびそれをめぐる農民鬥爭)。這二篇論文原來是先生的碩士論文，因前者屬於實證性，而後者則偏重理論性，因而分成二篇論文形式刊出。前者以1910年所爆發的萊陽農民暴動爲焦點，在對其暴動組織詳細分析後，指出小資產階級(亦即農民)雖是推動辛亥革命的原始動力，但鑑於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遂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只得曇花一現，終究難挽失敗的命運。這份論文是先生廣泛蒐集各種實地調查報告與地方志撰寫而成的研究成果。爾後先生從事研究時一向秉持的實證主義精神，早已在這篇論文中預見端倪。

至於第二篇論文，則是將第一篇論文中，未能深入探討到關於「隸屬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農民」的理論(“資本のための隸農”論)做更進一步的闡揚。也就是說，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農民即是清朝、地主支配下的封建性隸屬農民，又是無意識的隸屬於機器工業大生產事業的基層勞工，即隸屬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農民。換句話說，以推動辛亥革命的中國人民可視爲是「隸屬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農民」此一概念，來呈現農民的歷史性定位。先生的此一創見，很快的引起重視，被當時學術界視爲是今後研究的新方向。對誰應是辛亥革命的旗手，此一學術論辯的老議題上，無疑的是注入了一股新活力。關於「隸屬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農民」的理論(“資本のための隸農”論)，一則是參照了中國大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論」，另一則是採納了羽仁五郎「資本主義在東方的形成」等日本學術界既存的理論概念建構而成。先生的此一理論概念，直到今日仍是在論及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里程中必定提出的課題。鑑於先生的此一理論概念，乃是

一項政治屬性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關聯性的假說，因而在辛亥革命的階級定義素有爭辯的中國，對先生的創見也是時有反響。當年，中國經濟史大家吳承明教授來日訪問時，就因為對先生的觀點夙有關注而不惜紆尊拜訪比他年幼二十歲的先生。由此一事例，也可一窺先生的創見在當年是如此的獨領風騷。

關於「隸屬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農民」的理論（“資本のための隸農”論）所呈現出的方法論，以及資產階級與當時中國所見的資產階級型態之間的比較分析，爾後皆成爲先生研究辛亥革命的基軸。〈辛亥革命時期湖北的革命與反革命——以江湖會光復襄陽爲例的探討〉（辛亥革命時期の湖北における革命と反革命——江湖會の襄陽光復を中心に）、〈共和與帝制——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認識與行動〉（共和制と帝制——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革命派の認識と行動）、〈廣東辛亥革命的一項考察〉（廣東辛亥革命の一考察）、〈論南京臨時政府〉（南京臨時政府について）以及兩篇〈辛亥革命〉等等文章，皆以辛亥時期各階級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的應對措施爲焦點，在與史實的相互對照之下撰寫而成。這些有關辛亥革命的論文，均引起了當時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日本的《史學雜誌》每年都會以發行「回顧與展望」爲題的專輯，專門介紹當年度日本國內的研究動向。以上所列舉先生的這些文章也皆在此一刊物上被大幅報導。先生在這一系研究當中的焦點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由於階級的未成熟性，分爲「企圖在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妥協中攫取本身利益」的「改良主義派」和「與現實生產關係愈有距離就愈『革命』」、「傾向勞動人民群眾」的「革命派」。（以上見〈論南京臨時政府〉（南京臨時政府について）。）

不消說，先生當時的視野是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或說是受到一元性發展史觀的強烈影響。然而我們仍須注意一點，先生的研究，並不似常人一般，僅止於從辛亥革命時期歷史人物中找出典型的資產階級，或者以資產階級中下層等概念來詮釋「革命派」。先生所欲強調的，無論「革命派」或「改良派」，皆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然而兩者雖可謂是同根共源，但卻有尖銳的意識型態對立。這也是起因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未成熟性，是以有其特別研究的價值。先生所發表的〈辛亥革命時期的階級對立〉（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階級對立）一文，就是根據以上觀點而對辛亥革命時期階級關係的經濟基礎加以解析歸納而成。時至今日，以階級觀點來探究辛亥革命的研究業已日趨式微，但對「革命派」、「改良派」

等稱呼以及以此爲區分，學術界今日已開始重新探討，而先生所強調的「革命派」與「改良派」本爲同根生的說法，似乎有新的重估價值。

關於清末民初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有關引進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研究，也是先生的研究核心之一。代表著作是〈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中國の社會主義）一文以及由此延伸而成的《中國社會主義的黎明》（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再則有〈劉師復與《民聲》〉（劉師復と《民聲》）、〈盧梭與中國——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形成〉（ルソーと中國——中國におけるブルジョア革命思想の形成）等文。鑑於中國的民主主義、早期的社會主義皆是借助於明治時代的日本而得以引進，是以對中日兩國的近代思想史均有極深造詣的先生，得在此一領域盡情發揮。日人中江兆民翻譯的盧梭著作與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著作均對清末的中國革命思想產生極大影響。此等事實自從島田教授指陳以來，似乎已成學術界的共識。但事實上，將島田教授的指陳，落實到成爲學術界共識，則是先生的努力所成。先生所著的《中國社會主義的黎明》（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不僅解決了孫文、朱執信所倡導的民生主義在社會主義思潮中的定位問題，也對當時一般知識份子所提倡的「社會主義」（例如欲精確反映當時的現況，可將「社會主義」解釋爲企圖克服資本主義弊害，或者可克服資本主義弊害的一切主義概念）提供了獨具一格的見解。鑑於這本書將翻譯成中文的日文社會主義書籍作了詳盡的目錄，是以時至今日，仍可視爲是研究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及孫文思想史的必備參考書籍。

先生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如同前言所提的辛亥革命研究，皆以大量史料做爲論點支柱。與先生同時代的學者，往往只重視先生在論文上所採用的分析架構、方法論等技術層面問題，而忽略支撐先生理論架構是靠大量的史料爲佐證等基本事實。凡是到過先生的研究室者，一定會對那堆積如山，甚至溢到室外的龐大史料，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過，不可諱言的，以《中國社會主義的黎明》（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爲中心的清末政治思想著作中，先生仍以彰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中各階級間關係爲主要考量。例如在論及三民主義革命理論時，仍將其視爲是「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創作，是以只能評爲過渡時期的革命理論」或者「應指陳的是革命黨人如欲加入歷史的行進軌道，則必須更加考慮人民的立場，以及更明確宣示階級及階級鬥爭的觀點」。

三、後期的研究(1982-)

八〇年代以後，特別是為《五四運動研究序說》一書執筆時，先生的研究角度有了很大的改變。也就是說，從以往以「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考量歷史事實，轉換成以「時代脈絡來解析歷史現象」。

先生的此一轉變，和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的學術著作及史料出版的大幅度成長有密切的關連。也就是說，以往時有禁忌的有關史料，在 1979 年以後像潮湧一般刊出，其中當然也包括民國時期的報紙及雜誌。由於史料的大量出版，民國史研究也因而具備史料考證的條件，這也使本就喜愛考證及酷愛史料蒐集的先生，更有發揮的空間。

此外，先生有如此轉變的另一個理由，可歸諸七〇年代後期起先生開始對歷史的單線發展理論感到懷疑，至八〇年代時先生更覺得不應拘泥於此一理論。借用柯保安（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作者，1984 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話來說，從以往「帝國主義的研究角度(imperialism approach)」轉換成「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角度(China-centered approach)」。或者也可視為是「以歷史事件為考量基軸的研究角度」。也就是說，對先生而言，他所嘗試的無非是回到歷史現場，讓歷史事件在史料中重現外，也追溯事件之所以成為歷史的過程。

此一新的研究傾向，首見於先生在 1980 年所著〈國民黨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中的勝利〉（中華民國第一回國會選舉における國民黨の勝利について）一文中。對以往從未仔細研究的第一屆國會選舉的實況及其意義做了非常詳細的考證及解析。爾後出刊的《五四運動研究序說》一書，可謂更明確的展現出先生的新研究風格。此書是竭盡所能的蒐集在日本所能見到的有關五四運動報導的報紙、雜誌及其他資料。並以此為基礎，論述了北洋政府的權力架構，以及重建從 1919 年「五四」學生運動到同年六月上海三罷鬥爭的史事經過。尤其是三罷鬥爭運動對中國政壇所造成的衝擊，江蘇督軍李純發密電指名要求罷免曹陸章等三人親日派大官僚等事件的演變以及發動三罷鬥爭的經緯，藉由重現歷史事件的史料鋪陳手法，使五四運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清晰及細膩。以民眾運動與政府對應政策為例的研究，刻劃出政府對應政策多變性的同時，也呈現出先生從「時代脈絡考量歷史真相」的後期研究風格。

不過，正如同本書的副標題「五四運動期無產階級的任務」所揭示一

般，本書在解析五四運動成爲新民主主義起點的原由時，仍未放棄階級鬥爭史的觀點。筆者之所以將《五四運動研究序說》一書作爲介紹先生研究歷程的分界點，一則在於論述先生前後期研究風格的異質性的同時，也欲強調其中的同質性存在。此外，也是有感於近日日本部份學界在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之際，連帶對先生的五四運動研究也持否定意見，甚至對先生所倡言的「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了新的質量變化」這類的基本評斷也在被否定之列。

自從《五四運動研究序說》一書出版之後，先生的研究重心轉向以從「時代脈絡考量歷史事實真相」，其研究成果有 1.〈孫文思想中的民主與獨裁——以中華革命黨成立時期孫文與黃興對立爲例的探討〉（孫文思想における民主と獨裁——中華革命黨創立時における孫文と黃興の對立を中心に），2.〈「三大政策」與黃埔軍校〉（「三大政策」と黃埔軍校），3.〈五四運動的精神背景——對於惲代英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歷史背景〉（五四運動の精神的前提——惲代英のアナキズムの時代性），4.〈從宋教仁看傳統與近代——以《宋教仁日記》爲例的探討〉（宋教仁に見る傳統と近代——《日記》を中心に），5.〈「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再考〉（「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についての考察）等論文。在這幾篇論文中，先生的觀察重點在於重新檢視目前近代史研究中一般所通用的術語，以及早已習以爲常的歷史認定，試圖以史料考證的方式對其重新定位。例如在第一篇論文中對「中華革命黨」成立經緯的實際狀況以及孫文對民主主義理論的重新定位。第二篇論文，則在探討「三大政策」之所以成爲口號的過程。第三篇論文，旨在重新省思當時被稱爲「過激派」青年的思維模式。第四篇論文，則在解析「傳統思想」在近代的變遷。第五篇論文，則對所有近代史的史書上都曾記載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重新佈置歷史現場的方式對此一宣言的成立過程作全面性的掃描。

先生在第二篇論文中，對曾是國共兩黨長期論爭不已的「三大政策」之所以成爲宣傳口號的形成過程，以拉回歷史現場的方式，予以重新定位。按先生的考證，「三大政策」此一說辭，是中共爲了緩和因北伐是否立即可行而導致國共之間的傾軋，特別是爲了扳回劣勢而創造出的名詞。同時，此一中共所刻意創造的名詞，之所以能被時人信以爲真，最主要是由於此一名詞的內涵與當時蔣介石等將領的革命言論也有符合之處。在這

篇論文中，以新發掘出的《黃埔潮》，以及被改竄以前的蔣介石講稿等來實證先生的新發現。此一研究成果，也曾得到國共關係史的研究大家蔣永敬教授的公然推崇，可視為是展現先生後期研究風格的代表作。

發表第二篇論文以後，先生緊接著發表了第五篇論文。在先生的解析下，可以清楚看到國共合作時期，兩黨之間或者黨內各派系之間的合縱連橫的真實面貌，甚至連在大會宣言的成形過程中，也離不開政治上的相互較勁。第五篇論文，網羅到國內外所有可蒐集得到的「一大宣言」版本。先生藉由對各版本異同的考證，也進而對「一大宣言」成立的過程重新檢驗。讀先生這篇大作，就如同身歷其境一般，威信感嘆國民黨內部情況錯綜複雜者，當不止筆者一人。

先藉由精密細緻的文獻比較方法，進而掌控各文獻產生的時空背景。先生以如此的研究態度又相繼完成了以下諸文：〈武漢時期國共兩黨關係與孫中山思想——以農民問題與革命領導權、共產黨武裝問題為例的探討〉、〈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成書考〉、〈關於《支那保全分割合論》的若干考察——孫文訪日初期革命活動的一個側面〉。這些文章是分別將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孫文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等文獻資料以及對收錄此等文獻資料中不同版本的綜合考察，並以此為線索，探討各版本在異同中所反映出的歷史現況，是以，先生的研究，無論是梁啟超在日活動、清末革命運動及國共關係等這類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上，皆提供了前人未曾有的新視野。

先生近日研究的重點是旅日時期的梁啟超。此一研究，無疑地充分展現出先生重返歷史現場的企圖。梁啟超的所謂「新知識」是藉由明治時代日本的新聞出版管道建構而成，此等事實，早已為學術界公認。而先生則嘗試以儘量蒐集梁啟超所曾閱讀過的日本書籍及雜誌的方式，來解析建構梁啟超「新知識」的各方來源。換言之，就是要模擬重建梁啟超的書齋。先生的梁啟超研究近日即將問世，威信必能讓海內外梁學研究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而學術界的同好對先生的期待，也可從同是共同研究會成員的法國巴斯蒂教授(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於1995年9月，在法國的Garchy召開了「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Conference on European thought in Chinese Literati Cul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請參閱本刊第二十一期黃克武先生的介紹)以及美國的傅佛果教授(Joshua A. Fogel)擬在今年9月在美國加州召開「梁啟超與日本國際學術討論會」

(Conference on Liang Qichao and Japan)等相關的學術活動中一見端倪。

其次，「吉野作造與中國：吉野的中國革命史與日中關係史」（吉野作造と中國——吉野の中國革命史と日中關係史について），所代表先生的日中關係史研究；《以數據資料來看中國近代史》（データでみる中國近代史）代表先生對近代史的數量分析研究，無一不展現出先生研究領域的廣泛。鑑於先生的研究成果甚豐，實在無法一一介紹，再則，本文也已超過篇幅甚多，只得留待他日再行補充。最後，所欲指陳的，先生可謂是日本學界中，最熟悉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近代史研究動態者。島田虔次教授等人所編的《亞洲歷史研究入門》（アジア歷史研究入門），就是由先生負責撰寫中國近代史部分。此外先生也常撰寫《中國歷史學的新趨勢》（中國歷史學の新しい波）、《中國境內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動向》（中國における中國近代史研究の動向）等類的文章，介紹中國的最新研究走向。先生之所以能掌握資訊撰寫此類文章，當然和先生樂於切磋樂於交友，交遊滿天下的個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附錄：狹間直樹教授主要著作目錄

專書

- 《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岩波書店，1976年8月
- 《五四運動研究序說》（《五四運動の研究》第1函第1分冊）同朋舍，1982年3月
- 《中國國民革命の研究》（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3月
- 《民聲（原本復刻版）》（復刻、解題）朋友書店，1992年10月
- 《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編）汲古書院，1995年9月

共著、共編、監譯、共譯

- 《中國文明選 15 革命論集》（共著）朝日新聞社，1972年3月
- 《中國近代史 1840-1924》（共譯）平凡社，1974年4月
- 《東アジア近代史研究》（共著）佛教大學通信教育部，1980年
- 《人間周恩來》（共譯），サイマル出版社，1982年11月
- 《鄧小平は語る》下（共譯）風媒社，1983年11月
- 《中國歷史學の新しい波——辛亥革命について》（共編著）霞山會，1985年2月
- 《總索引》（《五四運動の研究》第5函第18分冊）（共著）同朋舍，1992年

1月

- 《周恩來傳》全3卷（監譯）阿吡社，1992年8月，10月，1993年2月
《孫文とアジア 1990年8月國際學術討論會報告集》（孫中山記念會研究叢書II）（共編著）汲古書院，1993年6月
《データでみる中國近代史》（共著）有斐閣，1996年10月
《孫文與華僑——紀念孫中山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共編著）孫中山記念會，1997年3月

論文

- 〈山東萊陽暴動小論——辛亥革命における人民鬥争の役割〉《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2號，1963年10月
〈中國近代史における“資本のための隸農”の創出およびそれをめぐる農民鬥争〉《新しい歴史學のために》第99號，1964年11月
〈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中國の社會主義〉《思想》第503，507號，1966年5月，9月
〈民衆の生活とその意識〉吉川幸次郎編《講座中國II 舊體制の中國》筑摩書房，1967年12月
〈辛亥革命〉野原四郎等編《講座現代中國II 中國革命》大修館書店，1969年9月
〈辛亥革命〉《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23 近代10》岩波書店，1969年12月
〈辛亥革命時期の湖北における革命と反革命——江湖會の襄陽光復を中心に〉《東方學報》京都 第41冊，1970年3月
〈共和制と帝制——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革命派の認識と行動〉《東方學報》京都 第43冊，1972年3月
〈劉師復と《民聲》〉《思想》第578號，1972年8月
〈幸徳秋水の第一回社會主義講習會における演説について〉《鷹陵史學》第1號，1975年3月
〈廣東辛亥革命の一考察〉《鷹陵史學》第3、4合併號，1977年3月
〈歴史學における主觀と客觀〉樺山紘一編《社會科學への招待、歴史學》日本評論社，1977年12月
〈南京臨時政府について〉小野川秀美、島田虔次編《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書房，1978年1月
〈ルソーと中國——中國におけるブルジョア革命思想の形成〉《思想》第649

- 號，1978年4月
- 〈中華民國第一回國會選舉における國民黨の勝利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第52冊，1980年3月
- 〈辛亥革命研究史略論〉《東亞》第172號，1981年10月
- 〈義氣の集團——會黨〉《月刊百科》第242號，1982年12月
- 〈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階級對立〉《中國研究月報》第409號，1982年3月（漢譯：〈辛亥革命時期的階級對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華書局，下冊，1983年6月）
- 〈中國近代における階級鬥爭と民族運動〉社會經濟史學會編《社會經濟史學の課題と展望》有斐閣，1984年9月
- 〈有關孫中山早期活動的重要史料〉《光明日報》，1985年4月17日
- 〈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孫中山研究論叢》第3期，1985年10月
- 〈孫文思想における民主と獨裁——中華革命黨創立時における孫文と黃興の對立を中心に〉《東方學報》京都第58冊，1986年3月
- 〈中國人による《民約譯解》の重刊をめぐる〉《中江兆民全集 別卷月報》，1986年4月（漢譯：賀躍夫譯〈中國人重刊《民約譯解》——再論中江兆民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哲學社會科學，第25號，1991年6月）
- 〈中川恒次郎報告孫中山革命活動的信〉（何培忠譯）《歷史檔案》第23期，1986年8月
- 〈“三大政策”と黃埔軍校〉《東洋史研究》第46卷第2號，1987年9月
- 〈何天炯與孫中山——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與楊天石共著）《歷史研究》1987年第5期
- 〈記念される孫文と孫文研究〉竹內實編《轉形期の中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8年3月
- 〈民國初年における勞働尊重觀念の形成〉《日本文化と東アジア》東北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施設，1988年3月
- 〈“三大政策”についての若干の考察〉《中國研究月報》第478號，1987年12月（漢譯：〈關於“三大政策”的幾點考察〉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與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冊）中華書局，1989年10月）
- 〈五四運動の精神的前提——俾代英のアナキズムの時代性〉《東方學報》京都第61冊，1989年3月（漢譯：〈五四運動的精神背景——對於俾代英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歷史背景〉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等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

- 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0月)
- 〈宋教仁に見る傳統と近代——《日記》を中心に〉《東方學報》京都 第62冊，1990年3月
- 〈ある小さな発見——「希查標柱」について〉《中國——文化と社會》第5號，1990年6月
- 〈清末民初の民族主義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排滿」と「五族共和」をめぐる〉河内良弘編《清朝治下の民族問題と國際關係》1990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總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1991年3月
- 〈近代中國の成立〉《しにか》第2卷第4號，1991年4月
- 〈第一次國共合作と孫文——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をめぐる〉《東亞》第286號，1991年4月
- 〈朱執信對孫文民生主義的理解〉《近代史研究》第63期，1991年5月(日語：〈朱執信と孫文の民生主義〉《孫文とアジア 孫中山記念會研究叢書 II》汲古書院，1993年6月)
-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についての考察〉《中國國民革命の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3月(漢譯：馬寧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考——國民革命核心國共合作的一個側面〉《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社會科學 第30期，1994年2月)
- 〈1911-1919年〉竹內實編《中國近現代論爭年表 1895-1989》同朋舍，1992年11月
- 〈盧梭《民約論》與中國〉《“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Livelihood, in: Eto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 (e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4年11月
- 〈初到日本的梁啟超〉廣東康梁研究會編《戊戌後康梁維新派研究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 〈武漢時期國共兩黨關係與孫中山思想——以農民問題和革命領導權、共產黨武裝問題爲中心〉《近代史研究》第85期，1995年1月
- 〈試論孫文逝世前後有關的社會評價〉國父建黨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一冊，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3月

- 〈《東邦協會會報》掲載の孫文〈支那保全分割合論〉〉《孫文研究》第18號，1995年7月
- 〈吉野作造と中國——吉野の中國革命史と日中關係史について〉《吉野作造選集》第7卷，岩波書店，1995年8月
- 〈國民革命の舞台としての一九二〇年代中國〉《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汲古書院，1995年9月
- 〈孫文の中國統一思想——とくに民族主義について〉《孫中山記念館 十年の歩み》孫中山記念館，1997年3月
- 〈關於《支那保全分割合論》的若干考察——孫文訪日初期革命活動的一個側面〉《孫文與華僑 紀念孫中山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孫中山記念會，1997年3月
-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成書考〉《近代史研究》第100期，1997年7月
- 〈梁啓超研究與「日本」〉（張玉林譯）《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4期，1997年9月

翻譯、譯注、解說

- 〈民報の六大主義〉（胡漢民著）島田虔次・小野信爾編《辛亥革命の思想》筑摩書房，1968年2月
- 〈人民内部の矛盾を正しく處理する問題について〉（毛澤東著）小野川秀美編《世界の名著64 孫文、毛澤東》中央公論社，1969年7月
- 〈京師保國會集會での康有爲の演説〉〈南北アメリカ州諸華僑に答えて中國は立憲を行いうるのみで、革命を行えないことを論じた書簡〉（康有爲）西順藏、島田虔次編《中國古典文學大系58 清末民國初政治評論集》平凡社，1971年8月

學界動向

- 〈中國近代史における帝國主義のとらえかたについて——横山英氏の「變革コース論」批判〉《アジア・アフリカ人民連帶の歴史學のために》第3號，1968年11月
- 〈「學問的誠實」とは何か——齋藤道彦氏の批判にこたえ、あわせて安藤久美子氏の民生主義理解に及ぶ〉《歴史學研究》第456號，1978年5月
- 〈最近の中國における五四運動研究について〉《中國研究月報》第380號，1979年10月
- 〈武漢シンポジウム印象記：現代中國における辛亥革命研究(1)〉《東亞》第182

- 號，1982年8月（《中國歷史學の新しい波》所收；漢譯：趙軍譯〈武漢學術討論會印象記〉《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第1號，1983年6月）
- 〈孫文と周邊の研究書も多彩：現代中國における辛亥革命研究(7)〉《東亞》第190號，1983年4月（《中國歷史學の新しい波》所收；漢譯：趙軍譯〈對孫文及其周圍人物的豐富多彩的研究〉《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第1號，1983年6月）
- 〈辛亥期の“新しい女性”——尹銳志の場合：現代中國における辛亥革命研究(9)（與松尾洋二共著）〉《東亞》第194號，1983年8月（《中國歷史學の新しい波》所收）
- 〈野澤豐氏の批判に答える——五四運動における上海の罷工門争の評價をめぐって〉《近きに在りて》第4號，1983年9月
- 〈近代I〉（共同執筆）島田度次等編《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2，同朋舎，1983年
- 〈武漢シンポジウム外国人参加論文について：現代中國における辛亥革命研究(15)〉《東亞》第203號，1984年5月（《中國歷史學の新しい波》所收）
- 〈日中學術交流と陳慶華先生〉《東亞》第211號，1985年2月（漢譯：羅福慶譯〈日中學術交流與陳慶華先生〉《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第4號，1985年4月）
- 〈最近の日本における五四運動研究〉《中國研究月報》第452號，1985年10月（漢譯：韓鳳琴譯〈日本學者對中國五四運動的研究〉《黨史通訊》1986年第7期；何培忠節譯〈日本對五四運動的研究現狀〉《國外社會科學》1986年第8期）
- 〈民生主義研究在日本——由明治時代至現在〉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中華書局，1986年7月
- 〈規範性認識と歴史事象〉《「五・四」運動研究史シンポジウムの記録》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8年7月
- 〈規範性認識と歴史事象〉《季刊中國研究》第13號，1988年10月
- 〈《五四運動の研究》の刊行を終えるにあたって〉《五四運動の研究》第5函第18分冊，《總索引》同朋舎，1992年1月
- 〈中國における中國近代史研究の動向〉小島晉治、並木頼壽編《近代中國研究案内》岩波書店，1993年6月
- 〈“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に参加して〉《孫文研究》第18號，1995年7月

巴斯蒂

(Prof.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許文堂*

當今歐洲研究近代中國史學界中，法國的巴斯蒂教授無疑是斐聲國際的學者之一。她不僅成名甚早，而且長期以來累積的研究論文立論嚴謹成果豐碩，特別是廣為各國學者提供研究檔案資料，促進學術交流的學術服務精神更贏得世界各地同行的友誼。

一、家庭與教育

巴斯蒂出生於二次大戰德軍入侵時期維琪(Vichy)政府治下的里昂(Lyon)，父母皆為地位崇隆的法蘭西學院院士。戰後學家遷回巴黎，在此接受教育。未滿十七歲即進入巴黎大學就讀歷史系，二十歲取得學士文憑，並考取女子高等師範學院。依法國學制沿革，高等師範學院其教學與研究雖均首屈一指，然本身並不頒發文憑，故而在校學生必須同時在大學註冊，以獲得相關科系學歷。在巴黎大學外交史名家杜福賽(Jean-Baptiste Duroselle)及中國史講座教授謝諾(Jean Chesneaux)指導下，巴斯蒂以《辛亥革命時期法國對中國的態度研究》取得巴黎大學歷史碩士，1964年於高等師院畢業，又以第一名的成績取得歷史與地理科大學中學教師資格。這年適逢法國與中共建交，巴斯蒂即於8月應北京大學之聘，前往外語學院教授法文。次年，復取得中法教育獎學金，進入北大歷史系研習。

其實，巴斯蒂家庭與中國素有淵源，甚至可說是一部近代中法教育、文化交流史的法國部分縮影。乃父在戰前即與早期留法學生如李煜瀛(石曾)等中國名流相往返，而乃母所教授的學生中，也有曾為巴斯蒂講解漢字結構等有關中國文化「神祕」事物的留法的中國學生，這些經驗使得巴斯蒂在幼年時期即立定志向要學習中文。及至1960年，進入高等師範學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院後，巴斯蒂同時前往國立東方語言學院研習中文，敲開通往漢學的大門。準確言之，巴斯蒂是先行接受嚴格的希臘文、拉丁文訓練，以及巴黎大學的史學方法後，再進入中國研究這片天地。進入北大歷史系後，從邵循正、陳慶華等教授問學，更深入中國歷史的堂奧，當時在北大的外籍同學當中，尚有現在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學的知名學者狹間直樹。

1966年6月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迫使巴斯蒂返回法國，進入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近代史組擔任專員，並繼續其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的研究工作，於1968年以《張謇的教育改革研究》取得博士學位。

同時，巴黎大學教授謝諾(Jean Chesneaux)主編的四卷本《近代中國》陸續出版，巴斯蒂是第一卷《從鴉片戰爭到中法戰爭，1840-1885》的主要撰稿人，第二卷《從中法戰爭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885-1921》則是由巴斯蒂與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合撰。這部書廣受好評，並先後逐譯成英、義、西等多國語文，迄今仍是法國學生必讀的經典著作。

二、研究成果

在奠定學術基石之後，巴斯蒂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自副研究員(1969)一路升任研究員(1973)、一級研究員(1981)、特級研究員(1990)。同時，她在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及法國第七大學講授研究生課程，指導博士生論文。從1988年至1993年間，復出任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副校長，實際負責四百名學生的研習方向，逐一面談諄諄指導。繁忙的教學工作之餘，巴斯蒂教授對研究工作絲毫不鬆懈，在課餘之時猶查閱檔案，摘錄資料，撰寫大量論文，其主要的研究領域有：

(一)清末以降的教育史

包括清末留歐學生、福州船政學堂的造船技術轉移、張謇的教育改革、教育制度的變革、勤工儉學運動等課題。巴斯蒂教授特別重視檔案資料，除法國官方檔案外，更能參照利用私家文牘，如日意格(Prosper Giquel)私人檔案，使研究船政局的論文能更加深入歷史情境的核心。其他如對實業教育的施行於經濟的影響，新式教育與文化傳統的延續性和斷裂性等，皆有深入的研究。近年更延伸至對中共的教育制度與政治經濟關係的研究。這些成就，使得巴斯蒂教授成為當代法國唯一的中國教

育史專家。

(二)清末政治制度史

巴斯蒂教授曾為《劍橋中國晚清史》撰寫〈清末中國社會的變遷〉一章，承繼年鑑學派的傳統，她提出中國中心觀，依據史料，對清末社會的階級、結構等問題進行全面分析式的社會史考察。根據巴斯蒂教授的看法，清末社會的變局在於新舊知識份子與封建皇權關係的斷裂，新興的工商階級和軍人特權階級的上升，農村經濟的破產，使得舊有共同體瀕臨解體。因此辛亥革命能造成空前的作用，即是得力於此一時空背景之故。在清史研究中，巴斯蒂特別注重政治制度的課題，尤其是乾隆以降的政治制度。另外有關「朋黨」、「清議派」中諸多重要人物關係，亦多有論文。

(三)辛亥革命研究

巴斯蒂教授運用大量法國檔案、報章雜誌，對辛亥革命研究開創了新視野。不論是法國政治人物與孫中山的關係，或在文化層面上法國大革命對辛亥革命的影響，乃至從思想史的角度探討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對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以及梁啟超的政治思想的探討等研究，都使得辛亥革命的相關研究在材料和觀點兩方面更為豐富。

三、學術服務

在學術研究之外，巴斯蒂教授長期擔任多種學術服務工作。自 1973 年起，她即擔任世界著名的 *China Quarterly* 之執行委員及編輯達二十年之久。1975 年起至 1990 年間出任 *Modern China*、*Etudes Chinoises*、*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這些著名研究中國學期刊的編輯。1991 年至 1996 年間因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法國代表團成員的緣故，始將上述編務交卸。巴斯蒂教授同時在 1992 年至 1996 年獲選為歐洲漢學研究會主席，該學會擁有全歐將近七百名研究中國的學者，由此也反映巴斯蒂教授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來自真誠待人與無私共享研究資料的胸襟。不論熟識或初見者，巴斯蒂教授總盡其所能提供資訊或提出中肯的批評，故而常可在若干文章或書籍的序言或跋語中見到感謝巴斯蒂教授的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巴斯蒂教授也秉持法國知識份子入世的傳統，獲選為祖居小鎮 *Le Mage* 的鎮民代表，為鄉里盡心建言作為回饋。

巴斯蒂教授多年的研究與教學生涯廣受世界各地學界肯定，歐洲各國如英國、德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義大利、瑞士、奧地利、丹麥、瑞典等國均曾邀請巴斯蒂教授前往訪問。她並應世界各地名校如美國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中國的北京大學、華東師大之邀請前往訪問或擔任客座教授，當然也曾多次來台灣開會與訪問。除此之外，1995年更獲得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頒贈之榮譽博士學位，1996年上海華東師大贈與名譽教授銜，1997年蘇格蘭亞伯丁大學頒贈榮譽博士。而法國政府則授予榮譽軍團騎士勳章、國家功績團軍官勳章。這些外來的榮譽不只肯定巴斯蒂教授的學術地位，也表彰她的學術服務，而她則保持謙和如昔。

巴斯蒂教授的先生布吉耶(Michel Bruguière)也是名教授，撰有滇越鐵路與法國對華干預政策等論文，廣為學界引述，惜英年早逝。兩位愛女由夫人獨立教養成長，是巴斯蒂教授最大的寬慰。繁重的教學與行政工作和女兒的教育曾經佔據巴斯蒂教授的大部份研究時間，如今正值盛年的巴斯蒂教授在卸下諸多服務工作之後，正可期待在研究生涯開創新的高峰。據悉其下一部專著將是以十九世紀清代政治制度的變遷為研究主題。

巴斯蒂教授主要著作目錄

Books

La Chine 1: des guerres de l'opium à la guerre franco-chinoise, 1840-1885, in coll. with J. Chesneaux, Paris, Hatier, 1969, 224 p. Translated into American (New York, Pantheon), Italian (Turin, Einaudi), and Spanish (Barcelona, V. Vives).

La Chine 2: de la guerre franco-chinoise à la fondation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1885-1921, in coll. with J. Chesneaux and M.-C. Bergère, Paris, Hatier, 1972, 224p. Translated into American and Italian.

Aspects de la réforme de l'enseignement en Chine au début du XXème siècle, Paris/ La Haye, Mouton, 1971, 321p.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s Qing, 1873-1911,

Paris, EHESS, 1979, 136p.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in coll. with R. Hayhoe, Armonk/ New York/ Londres, M. E. Sharpe, 1987, 359p.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中外比較教育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456p.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ranslated by P. J. Baile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53), 1988, 331p.

Essays in collective volumes

"Level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S. Schram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59-197.

"Prüfungswesen," in W. Franke ed., *China Handbuch*,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1974, pp. 1071-1074.

"Le développement des filatures de soie modernes dans la province du Guangdong avant 1894," in *The late Professor Muramatsu Yuji commemoration volume*, Tokyo, 東洋經濟進報社, 1975, pp. 175-188.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late Ch'ing reform," in P. Cohen et J. Schrecker eds.,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17-127.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in *La science et la technologi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Paris, OCDE, 1977, pp. 127-143.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aris, OECD, 1977).

"Les mondes asiatiques,"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directed by P. Léon, vol. 4, *La domination du capitalisme, 1840-1914*, Paris, A. Colin, 1978, pp. 529-558.

"L'organisation de l'enseignement et les institutions éducatives," in M. Engelborghs-Bertels ed., *La Commune populaire chinoise*, Bruxelles, Crédit communal belge, 1978, pp. 81-84.

"Currents of social change," in J. K. Fairbank et K. C. Liu (劉廣京)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535-602 et 622-626,

-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劍橋中國晚清史》,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 〈從辛亥革命前後實業教育的發展看當時資產階級社會政治的作用〉, in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vol. 3, pp. 2318-2330.
- “The structure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Qing,” in S. Schram ed.,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London/ Hong Kong/ New York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t. Martin’s Press, 1985, pp. 51-79.
- “Education, youth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in the early 1980’s,” in B. Arendrup et al. ed., *China in the 1980’s and beyond*, London/ Malmo, Curzon Press, 1985, pp. 8-29.
-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的經濟政治概況〉, in 《中法戰爭史專集》, (南寧: 廣西社會科學院, 1986), pp. 206-233.
- “Mandarins et commissaires dans la Chine du Xxème siècle,” in *Servir l’Etat*, directed by F. Bloch-Lainé and G. Etienne, Paris, E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7, pp. 31-60.
- “Official conceptions of imperial authori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n S. Schram ed.,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London/ Hong Kong,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7-185.
- “Li Yuying (1881-1973) and the image of France in China,” in T. Grimm and al. eds.,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XXIXth con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Tübingen, ATTEMPTO Verlag, 1988, pp. 1-6.
- “Qingyi 清議(disinterested counsel) and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in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 pp. 873-893.
- 〈論法國革命對中國辛亥革命的影響〉, in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 (台北: 中央研究院, 1989), pp. 769-782.
- 〈法國的影響及各國共和主義者團結一致: 論孫中山與法國政界的關係〉, in 《孫中山和他的時代: 孫中山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北京: 中華書

- 局, 1989), pp. 454-470.
- “The influence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o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in Zhang Zhilian ed., *China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0, pp. 29-38.
- “Instituts et laboratoires Pasteur en Chine avant 1949,” in *L’Institut Pasteur: contributions à son histoire*, directed by M. Morange, Paris, Editions de la Découverte, 1991, pp. 253-268.
-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as a profession in Republican China,” in 《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 (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1991), vol. 3, pp. 137-154.
- 〈福州船政局的技術引進(1866-1912)〉, in 張寄謙 ed., 《素馨集：紀念邵循正先生學術論文集》,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pp. 236-257.
- “Sun Yat-sen’s republican idea in 1911,” in Eto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 e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okyo, University of Toyko Press, 1994, pp. 209-217.
- “La ‘paix’ en chinois,” in *Les enjeux de la paix. Nous et les Autres, XVIIIe-XXIe siècle*, directed by Pierre Chaunu, Paris, PUF, (collection “Histoires”), 1995, pp. 265-274.
- “Some themes of 19th and 20th century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on China,” in *Europe Studies on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Han-Shan Tang Books/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London, 1995, pp. 228-239.
- “France and the 1915-1916 National Protection Movement 護國運動,” in 《國父建黨革命一百週年學術討論集》, (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1995), vol. 1, pp. 155-181.
- “L’éducation des meilleurs,” in *L’apprentissage du savoir vivant: fonction des grands collèges européens*, directed by Paul Viallaneix,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5, pp. 201-208.
- “Le Palais sous les Qing,” in *La Cité interdite: vie publique et privée des empereurs de Chine (1644-1911)*, Paris, Paris musées, 1996, pp. 39-63.
- “Les éléments religieux dans les rituels d’Etat en Chine au XIX^e siècle,” in *Le*

Protocole ou la mise en forme de l'ordre politique, directed by Yves Deloye, Claudine Haroche et Olivier Ihl, Paris, L'Harmattan, 1997, pp. 69-79.

Articles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et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de 1911,"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avril-juin 1969*, pp. 221-245.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北京：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1983), pp. 67-94.

"Economic necessity and political ideals i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42, April-June 1970, pp. 16-45. Reprinted in J. Karabel et A. H. Halse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589-607.

"Mass education in China," *Courrier de l'Extrême-Orient*, (Bruxelles), February 1969, pp. 71-86.

〈フランスにおける中國研究と中國認識〉, in 《情況》, (Toyko), October 1971, pp. 1161-1172.

"La Chine après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Politique étrangère*, n°1, 1972, pp. 11-37. Translated into Italian (Mercurio, Milan, October 1972).

"L'éducation en Chine: tradition et révolution", *Études et document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et de recherche sur l'Asi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de Genève), vol. 1, n°1, 1973, 22p.

"D'une révolution à l'autre? - L'évolution de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chinoise, 1969-1974," in coll. with J. L. Domenach, *France-Asie*, n°3, 1974, pp. 15-59. Reprinted in C. Aubert, L. Bianco et al., *Regards froids sur la Chine*, Paris, Seuil, 1976, pp. 126-172.

Biographies of Wei Yuan (魏源), Zeng Guofan (曾國藩), Zuo Zongtang (左宗棠), Liang Qichao (梁啟超), Kang Youwei (康有為), Li Hongzhang (李鴻章), 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Paris, 1976.

"L'ascension de Hua Guofeng," *Défense nationale*, February 1977, pp. 15-35.

"Le système politiqu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théorie et pratique,"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Toulouse*, vol. XXV, 1977, pp. 245-255.

"Les corps intermédiaires dans le système politique chinois," *Pouvoirs*, n°3, 1977, pp. 87-94.

- 〈歐美關於近現代中國的研究〉, in 《國外史學動態》, (北京大學), n°3, 1978, pp. 23-58.
- 〈法國歷史研究和當代主要思潮〉, in 《國外史學動態》, (北京大學), n°3, 1978, pp. 1-22. Reprinted in 《知識狀態》(北京), n°4, 1978, 20p., and 《世界史研究動態》(北京), n°2, 1979, pp. 5-16; et n°3, pp. 8-12.
- “La vie politique en Chine,”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n°348, 27 October 1978, pp. 3-39.
- “Le système éducatif et l'évolution de la jeunesse,” *Projet* (special issue on China), n°132, February 1979, pp. 134-147.
- “La position de la Chine dans la guerre sino-vietnamienne,” *Mondes et cultures*, vol. 39, n°3, 1979, pp. 357-371.
- “A survey of recent trends in French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tate of the field,”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53, n°4, Winter 1980-1981, pp. 698-707.
- “A la recherche d'une stratégie de l'éducation: école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puis 1949,” *Tiers Monde*, vol. XXII, n°86, April- June 1981, pp. 317-338.
- “L'ouverture aux idées d'Occident: quelle influenc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ur la révolution républicaine de 1911?,”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n°2, 1983, pp. 21-39.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anton, 1984).
- “Idéologie et politique dans la Chine de Deng Xiaoping,”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n°486, 20 April 1984, pp. 4-31.
- “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he 1980'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98, June 1984, pp. 189-219.
- “Les lettrés et l'ordre moral: la 'prison des lettres'- censure et inquisition sous la dynastie des Qing,”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n°4, 1984, pp. 71-80.
- 〈清末のヨロッパへの留學生たち福州船政局の近代技術導入をめぐる〉, in 《東亞》, (Tokyo), n°213, March 1985, pp. 77-92.
- “L'enseignement au service de l'économie,” *Tiers Monde*, vol. XXVII, n°103, October 1986 (special issue on reforms in China), pp. 844-866.
- “La mutinerie du 29 février 1912 à Pékin vue par Marcel Granet,” *Etudes*

- chinoises*, vol. VI, n°1, 1987, pp. 95-123.
- “Réforme politique en Chine,”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n°579, 4 mars 1988, pp. 1-61.
- “L’argument économique dans les réformes de l’enseignement en Chine au Xxème siècle,” *Interchange*, (Toronto), vol. 19, n°3/ 4, 1988, pp. 19-31.
- “L’influenc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sur la pensée politique en Chine avant la révolution de 1911,” *Beijig information*, (Peking), n°21, 22 May 1989, pp. 24-27.
- “L’influenc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sur la pensée politique en Chine avant la révolution de 1911,” *Etudes Jean-Jacques Rousseau*, vol. 4, 1990, pp. 125-140.
- 〈清末赴歐的留學生們——福州船政局引進近代技術的前前後後〉，《辛亥革命史叢刊》，(武昌：中華書局，1991)，vol. 8, pp. 189-202. Reproduced in 李國君編，《中華教育大典》，(上海：中華書局，1995)
- “Penser chinois,” *Revu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n°3, 1993, pp. 407-421.
- 〈東洋學の傳統から社會科學のパラダイムへ——フランスにおける近現代中國研究の變遷〉，《中國——と社會文化》，n°10, June 1995, pp. 291-305.
- “The Cantonese and modernity,” *China Perspectives*, (Hong Kong), n°4, March-April 1996, pp. 9-13.
- “Les Cantonais et la modernité,” *Perspectives chinoises*, (Hong Kong), n°34, mars/ avril 1996, pp. 21-25.
- “La ‘position’位 dans le cérémonial d’État à la fin de l’Empir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n°18, 1996, pp. 51-69.
- Numerous reviews of books on Chinese or East Asian history in: *La revue historique*, *Annales ESC*, *La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Pacific Affairs*, *The China Quarterly*, *T’oung-Pao*, *La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La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研究概況

牛津大學的中國研究

曾銳生*

簡 介

在牛津大學推動中國研究主要有三個教研中心。在大學本部屬下的有「中國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在「中研所」內另設有一個「近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for Modern Chinese Studies)。此外大學內的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亦設立了一個「亞洲研究中心」(Asian Studies Centre)。三個教研機構在推動有關中國的教學和研究方面既有分工亦有合作。它們的成員中亦有數位是在不同單位內身兼數職的。

中國研究所

在九十年代初在香港的影視界鉅子邵逸夫爵士(Sir Run Run Shaw)的鼎力支持下，牛津大學校本部得以進一步推廣對中國的教學與研究。其重心在把在「東方學部」(The Oriental Faculty)的語言、文學和歷史的教研人員和以聖安東尼學院為基地，以推行有關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見稱的「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合併組成位於 Walton Street 的「中國研究所」。「中研所」成立於 1994 年。現任所長是杜德橋。

在大學主修中文的本科生都是「中研所」的學生。在四年的課程裡他們不但要學習現代漢語和文學，還要學習近代史、中國社會與政治和古文。一般來說，本科生在校修讀兩年後都被安排到台北進修漢語，以加強他們的語言能力和增進他們對中華文化的了解。主修中文的本科生都屬於

* 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查良鏞講座資深研究員兼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大學的「東方學部」。

在大學其它學部的學生亦有機會選修有關中國近代史、中國經濟和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機會。具體的安排一般是透過他們所屬的學院(College)和學部(Faculties)與個別同事們作出。總之，在牛津大學內，學習有關中國事務的學生並非全部都是「中研所」或「東方學部」的學生。在牛津從事中國研究的研究生更是分佈於不同的學部和學院，其中以聖安東尼學院的人數最多。

「中研所」內設有一個設備先進的「語言教學中心」和一個教學、研究兩用的圖書館。該館是大學中央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所屬的一個單位，所藏圖書中、英文並重，內容則以教學用書為主。館長是海德(Anthony Hyder)。大學中央圖書館下另外設有一個主要作為研究用的「東方研讀館」(The Oriental Reading Room)。

近代中國研究中心

此中心的前身是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在聖安東尼學院和胡佛臣學院(Wolfson College)贊助下在 1982 年成立的「中國研究中心」(The St. Antony's-Wolfson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該中心在 1987 年改組成「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七年後，在 1994 年併入「中研所」，但保持其自治的地位。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以訓練中國大陸的中層經濟幹部和領首推動有關香港政治和歷史的研究著名。牛津大學的羅德圖書館(The Rhodes House Library)亦在「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合作和支持下建立了在香港和英國國家檔案館以外有關香港最重要的檔案。

該中心的現任事務主任(Programme Director)是林至人。

亞洲研究中心

成立於 1982 年，這是聖安東尼學院內的一個區域研究中心(regional studies centre)。它的區域研究不但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還包括了從日本到中東之間的國家。在學術工作方面它側重於比較在亞洲地區內各個國家在政治、社會、外交、經濟和教育的發展。此中心的前身是成立於 1954 年的「遠東研究中心」(The Far East Centre)。

該中心的現任主任是曾銳生，其成員包括三位「中研所」的同仁。其他的成員是另外八位聖安東尼學院的院士 Michael Aris, Robert Barnes, Jenny Corbett, Rosemary Foot, Roger Goodman, Nandini Gooptu, Mark Rebick, Arthur Stockwin, David Washbrook, 和 Ann Waswo，三位牛津大學其它學院的院士 Judith Brown, Peter Carey 和 James Lewis，和兩位劍橋大學的同事 Janice Stargardt 和 Wolfgang Stargardt。另外「亞洲研究中心」有專職研究員一位，即「偉生研究員」張志超。

主要的教研工作和同仁簡介

牛津的三個教研單位都在大力推動各方面有關中國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每一個學期「中研所」和「亞洲研究中心」都舉辦有講座、研討會、國際會議或小型學術討論會(workshop)。「亞洲研究中心」每年更舉辦一次大型的「黃興基金會講座」。在過去的五年內，這些活動所包含的課目，從台灣的民主化到香港政權的移交到大陸的改變，林林總總，要詳細的報告所需要的篇幅太長，不便盡錄。也許值得一提的是應邀到「亞洲研究中心」演講的人士不單只是學者教授，還有政界和其它行業的傑出人士。在過去的二、三個月內，這類講者便包括了香港的財政司曾蔭權、香港民權黨的領袖陸恭蕙、前香港總督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1996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Jose Ramos-Horta，和中國大陸的異議分子魏京生。

其實牛津的學術活動都是同仁們努力的成果，與其羅列各教研單位過去數年的活動，不如簡單地介紹各同仁目前的研究工作和過去五年內的著作，讓讀者了解我們各人的研究範圍和興趣，作為以後交流或合作的參考。

在介紹各同仁時，排名以英文姓氏先後為準。在著述方面，除了數位剛取得博士學位不久的年輕學者外，所羅列的著作都是在過去五年內已出版的書目和論文（不包括讀書報告）。由於篇幅的關係，為數頗多即將出版的著作只好不錄了。

布寧(Nicholas Bunnin)，牛津大學博士，「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成員和該中心的哲學研究計劃負責人。自1994年開始，他與余紀元博士合作正在編寫一部中英對照的西方哲學辭典。他在近五年的著作如下：

Sino-British Summer School of Philosophy: Best Examination Essays 1992 & 1993, editor (Beijing & London, 1993).

In Conversation: Professor Sir Peter Strawson, co-editor (London & Oxford: Philosophy in Britain & Philosophy Summer School in China: China Britain Australia, 1994) & associate producer of accompanying video interview.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co-editor (Oxford: Blackwell, 1996)

Author of entries on 52 Chinese philosophers in Brown, S. et 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ers* (London: Routledge, 1996).

晁時杰(Robert Chard)，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牛津大學古文講師，聖安妮學院(St. Anne's College)院士，「中研所」成員。他對與軍事有關在元代完成的賦，特別是曹操、司馬穎和劉裕的作品最感興趣。其它的研究領域包括近代的武俠小說、中國民間宗教的發展，和比較中國古代與古希臘、古羅馬對宗教的態度。他近年的著作如下：

“The Stove God and the Overseer of Fat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r Beliefs and Chinese Cultur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No. 4 (Taipe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4), v. 2.

“Rituals and Scriptures of the Stove Cult,” in David Johnson, ed., *Ritual and Scripture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Five Studies*, Pub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Project 3 (Berkeley: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Project, 1995).

〈後漢對夢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華夏文明與傳世藏書——中國國際漢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杜德橋(Glen Dudbridge)，劍橋大學博士，牛津大學中文教授，「中國研究所」所長，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院士，英國國家學院院士(FBA)。他的研究工作涉及不同時期的中國文學作品。在過去數年他的著述如下：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tale of Liu Yi and its analogues,” in Eva Hung, ed., *Paradox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4).

“A second look at ‘Li Wa chuan’,” in Eugene Eoyang and Lin Yao-fu, eds.,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ina's vernacular cultures: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1 June 199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The General of the Five Paths in Tang and pre-Tang China," *Cahiers d'Extreme-Asie* 9, 1996-1997.

科大衛(David Faure)，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國歷史講師，「中國研究所」和「亞洲研究中心」成員，聖安東尼學院院士。近年來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於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家族發展史，十六世紀以來的中國商業史和香港歷史。除了對中國社會和經濟史的研究外，他亦是一個關於台灣原住民研究計劃的負責人。他的著作包括：

書目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vol. 2 Society, edito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co-editor (with Tao Tao Li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co-editor (with Helen Si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論文

"Reflections on being Chinese in Hong Kong," in Judith M.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eds.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Macmillan, 1997.

"Ming Jiajing chunian Guangdong tixue Wei Xiao hui yinci zhi qianyin houguo ji qi dui Zhujiang sanjue zhou de yinxiang," (Guangdong Education Intendant Wei Xiao's destruction of illegal temples in the early Jiajing period, causes and its cosequence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Zhou Tianyou, ed. *Diyu shehui yu chuantong Zhongguo* (Local society and traditional China), Xian: Xibei daxue chuban she, 1995 (in Chinese).

"Company law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firm," in Rajeswary Ampalavanar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First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vol. 4

"The Power and Limit of the Private Contract in Ming-Qing China and Today," with A. Pang, in L. M. Douw and P. Post, eds. *South China: State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msterdam: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996.

“Becoming Cantonese, the Ming dynasty transition,” in Liu and Faure, *Unity and Diversity*.

“lineage Socialism and Community Control: Tangang Xiang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n Faure and Siu, eds. *Down to Earth*.

“Guangdong Province, a brief history,” in Brian Hook, 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Guangd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e control of equity in Chinese firms within the modern sector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early Republic,” in Rajeswary Ampalavanar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ingshan, a Hakka village cluster to the east of Shenzhen,”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ational Conference of Hakkaology*, eds. Qiao Jian and Zheng Chiyan, Hong Kong: Xianggang Yatai Yanjiusuo Haiwai huaren yanjiushe,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1994.

“Ownership versus control, the upturns and downswing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November 26, 1993.

傅詩(Rosemary Foot)，倫敦大學政治及經濟學院博士，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聖安東尼學院院士兼太古資深研究員，「亞洲研究中心」成員，英國國家學院院士(FBA)。她的著作以有關韓戰和中美關係著稱。目前她正從事兩項研究計劃，其一是有關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公約國組織的關係，其二是中國大陸與世界社會有關人權的對話。她近年的著述如下：

書目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Hardback, 1997-paperback).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co-editor, with Judith M. Brown(London: Macmillan, 1997).

Migration: the Asian Experience, co-editor, with Judith M. Brown(London: Macmillan, 1994).

論文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debate in East Asia,” *Democratization*, vol. 4, no. 2, 1997.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its Fear of Empowering the Chinese,”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1, no. 3, Fall 1996.
- “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s seen from Beijing,” Sumit Ganguly and Ted Greenwood, eds., *Mending Fences: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in South Asia*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1996).
- “Thinking Globally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Chinese,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Reflections on the Post Cold War Er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8, no. 2, June 1996.
-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Intere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Cold War Era,” a review article fo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0, no. 3, 1996.
- “Chinese-Indian Rela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onfide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9, no. 1, 1996.
- “The Stud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u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roaches,” in Ngaire Woods, ed.,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since the 1980s,” in Michael J. Hogan (ed.), *America in the Worl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acific-Asia: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alogu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1989 Era,” in Robert Benewick and Paul Wingrove (eds.), *China in the 1990s* (London: Macmillan, 1995).
- “Neither Friends nor Enemie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Oxfo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5, no. 2, 1994.
- “Pax Americana: Setting the Global Agenda after the Korean War,” in William J. Williams (ed.), *A Revolutionary War: 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3).
- “Negotiating with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olitics of Peacemaking in Korea,” in Kim Chull Baum and James I. Matray(eds.), *Korea and the Cold War: Division, Destruction and Disarmament* (Claremont, Ca.: Regina Books, 1993).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牛津大學博士，聖安妮學院研究員(UCC Research Fellow)。她的研究工作集中於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史方面，其中又以對辛亥革命對普及文化的影響見長。她目前的研究計劃是以西北人民對現代化的觀感為中心的。

她的著作在短期內將包括：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Se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Martyrs and Militarism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Republican China* (forthcoming).

干曉允(Shiao-yun Kan)，中文導師，「中研所」成員。

林至人(Cyril Lin)，牛津大學博士，中國經濟學講師，聖安東尼學院院士，「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事務主任(Programme Director)，「亞洲研究中心」成員。他的專長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和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目前他正從事有關大陸的財經改革的研究。他近來的著述如下：

Co-authored with Derek Morris, “China’s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Reforms”, *China’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World Bank, 1994).

劉陶陶(Tao Tao Liu)，牛津大學博士，現代漢語講師，華爾登(Wadham College)學院院士，「中研所」成員。她的專長是近代中國文學與唐詩。她剛完成的研究包括近代中國文學對城鄉的演繹。她目前正在寫一篇有關中國人的表情與台灣原住民的歷程的論文。她近來的著作如下：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co-editor, with David Faure(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Regional Literature and Chinese *xiangtu wenxue*,” in Faure & Liu, *Unity and Diversity*.

“Homesickness, Exile and Displacemen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Wolfgang Kubin(ed.) *Melancholy and Society in China*.

米曉琳(Celilia Milwertz)，「中國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她目前的研究項目是以婦女組織的發展看人文社會(civil society)在中國大陸的建立。

她的著作有：

《城市中生兒子意願的文化含義》（與劉犁合著），出版在李小江、朱虹和董秀玉合編，《平等與發展：性別於中國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

1997)。

Accepting Population Control -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Chinese Women on the One-child Family Policy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1997).

“Control As Care-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Women and Birth Planning Workers,”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David Strand (eds). *Reconstructing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Discourses of State, Society and Nation*,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Chinese NGOs at the Women’s Conference in Beijing,” *NIASnytt*. Number 3, (November 1995).

“Når tvang opleves som omsorg accepteres befolkningskontrol,”(When coercion is perceived as care population control is accepted). in *Kvinder, Kon og Forskning*. Number 2 (1995).

Reproduktiv selvbestemmelse og befolkningsproblemet-Et barn pr. Kvinde i Kina. (Reproductive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Problem-One Child Per Woman in China). In Bente Rosenbeck og Robin Schott (eds). *Forplantning, Kon og Teknologi*. Copenhagen: Museum Tusulanum(1995).

米德(Rana Mitter) 劍橋大學博士，現代中國政治與社會副講師(Junior Lecturer)，「中研所」成員。他目前正在研究中國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研究和著述，從而探討中國人對外國的看法和關係。他的論著如下：

“Reassessing the resistance: Ma Zhanshan in Heilongjiang, 1931-2,”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 5 (Spring 1996).

“Stalinist shadows,” *Business China* 7 (August 1995).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during the Manchurian crisis, 1931-33 (forthcoming).

吳勞麗(Laura Newby)，牛津大學博士，中文講師，聖希岱學院(St. Hilda’s College)院士，「中研所」成員。她的專長是清代中國對外交、邊界和亞洲中部的政策。她目前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探討清朝在新疆的統治和與Kokand的關係。她剛完成了一篇有關的論文：

“The Begs of Xinjiang: Between two worlds,”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June 1998).

彭軻(Frank Pieke)，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現在中國政治與

社會講師，聖高士學院(St. Cross College)院士，「中國研究所」成員。他目前的主要研究科目是中國大陸在地區上社會、經濟和政治在改變中的相互關係。他的著述如下：

書目

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form and the 1989 People's Movement in Beijing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6).

The Chinese in Europe, co-editor, with G. Bent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8).

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Interests, co-editor, with E. B. Bermeer and W. L. Chong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8).

論文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Leeds East Asia Papers* (1995, with Gregor Benton).

"Bureaucracy, Friends, and Money: The Growth of Capital Socialism in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3)(July 1995).

"Accidental Anthropology: Witnessing the 1989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in C. Nordstrom and A. Robben, eds., *Fieldwork under Fir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Violence and Surviv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The Use of Making History: Chinese Traditions of Protest," *Issues & Studies* 30(1) (1994).

"Hervormingen en de Chinese maatschappij: Ievensvatbaar model of vlees noch vis?" (Reforms and Chinese Society: Viable Model or Failed Compromise?) in *Ontwikkeling van Onderop: Zelforganisatie in de Derde Wereld*. J. P. de Groot, ed.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1993).

"The 1989 People's Movement: Dramatization and Ritualization of Political Action," in Chun-Chieh Huang & Erik Zürcher, eds. *Norms and Their Populariz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Leiden: Brill, 1993).

"Images of Protest and the Use of Urban Space in China's Tradition of Protest," in Peter Nas, ed. *Urban Symbolism* (Leiden: Brill, 1993).

“Chinese Languages in the Netherlands,” (with M. E. van den Berg) in G. Extra & L. Verhoeven, eds. *Minority Languages in The Netherlands* (Amsterdam: Swets & Zeitlinger 1993).

潔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劍橋大學博士，牛津大學梅頓學院(Merton College)院長，英國國家學院院士(FBA)。她的專長是商、周的銅器和玉器，和秦漢兩代的下葬與信仰制度。她對中國及中國以外使用飾物的意義亦感興趣。她過去五年內的著述如下：

“Chang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ife and the Afterlife as Illustrated by the Contents of Tombs of the T’ang and Sung Periods,” Maxwell K Hearn & Judith G Smith (eds), *Arts of the Sung and Yuan*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New Discoveries of the Early Dynasties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6).

“Ancient Chinese Ritual Bronzes: The Evidence from Tombs and Hoards of the Shang (c. 1500-1050BC) and the Western Zhou periods (c. 1050-771BC)” *Antiquity*, vol. 67, no. 257 (December 1993).

宋暘(Yang Song)，英國約克大學碩士，中文導師，「中國研究所」成員。

曾銳生(Steve Tsang)，牛津大學博士，「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聖安東尼學院院士，教務長(Dean)，兼查良鏞資深研究員，「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成員。他的研究興趣包括中國近代的政治和外交史，特別是中、英關係、民主化的問題，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香港歷史和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他目前正在寫一部有關英國和中華民國(台灣)的專著和完成編一部有關中國面對現代化的挑戰的書。他近五年來的著作如下：

書目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C Hurst and Company,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editor and co-author).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Volume I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Hong Kong: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I B Tauris, 1997).

論文

- “Political Problems Facing the Hong Kong Civil Service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3, no. 1, March 1994.
- “Unwitting Partners: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Taiwan (1950-58),” *East Asian History* (no. 7, June 1994).
- “Target Zhou Enlai: The ‘Kashmir Princess’ Incident of 195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tember 1994).
- “Dealing with China after Hong Kong,” *Parliamentary Brief*, vol. 3, no. 6, April 1995.
- “La Unificacion de China,” *Revista de Occidente*, no. 172, September 1995.
- “A Famous Victory Leaves Hong Kong With a Hangover,” *Parliamentary Brief*, vol. 4, no. 1, October 1995.
- “Revitalising the Revolution: Chiang Kai-shek’s Approach to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1950s,” in *Proceedings of Centennial Symposium on Sun Yat-sen’s Founding of the Kuomintang for Revolution*, vol. 4 (Taipei, 1995).
- “The Chinese Take-Over of Hong Kong: Implications for Britain,”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vol. 141, no. 2, April 1996.
- “Maximum Flexibility, Rigid Framework: China’s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 1996.
-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A Colonial Paradox,” in Rosemary Foot & Judith Brown (eds.), *Hong Kong’s Transition, 1842-1997* (Macmillan-St Antony’s series, 1997).
- “Strategy for Survival: The Cold War and Hong Kong’s Policy towards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the 1950s,”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25, no. 2 (May 1997).
- “China Despues de Deng: Destabilidad Politica?” *Tempas para el debate*, no. 30 (May 1997).
- “Hong Kong y China: Un Futuro Conjunto,” *Meridiano Ceri* (June 1997).
- “Democratisation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Yossi Shain & Aharon Kileman (eds.) *Enduring and Prospective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St Antony’s College-Macmillan series, 1997).
- “Changes in Continuit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 XV, no.4, winter 1997.

"Calculated Ambiguity: The ROC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day," in Marie-Luise Nath (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onderdruck: Peter Lang, 1998).

〈一九五〇年代台灣與英國的關係初探〉，《台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94年）。

〈一九九〇年代蔣中正先生反攻大陸政策〉，《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9期，1995年12月。

張志超(Zhang Zhichao)，牛津大學博士，剛獲遴選為「亞洲研究中心」偉生亞洲太平洋研究員(Wai Seng Research Fellow in Asia and Pacific Studies)。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發展經濟學、金融經濟學。他的專長是人民幣匯率問題、中國大陸之貨幣政策和金融制度、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中國營企業之治理結構。他目前研究的項目為中國大陸與香港之經濟關係，包括大陸與香港的商品貿易、貨幣匯率聯繫、證券市場之互動、直接投資，以及經濟一體化之前景等問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65)

關德懋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沈雲龍·張朋園 紀錄：林能士 102頁 平裝200元 精裝250元

關德懋(1903-)，安徽六安人，同濟大學肄業，北伐後，曾追隨陳銘樞，擔任武漢衛戍司令部少校秘書、粵省府秘書。後赴德就讀德勒斯登高等工業學校，民國23年8月返國，任教西北農專。因預警楊虎城將造反，於西安事變前返南京，追隨翁文灝，任職行政院科長、參議等職。期間，曾擔任德國萊希勞上將訪華隨從翻譯，對抗戰期間，德國軍事顧問團之貢獻、一億馬克借款、駐德大使人選等有深入剖析。27年，接任同濟大學秘書長，協同校長趙士卿整頓校務。29年8月，任駐德大使館一等秘書，對當時國際情勢及中德邦交有深刻見證。31至35年，任工礦調整處西安辦事處主任，負責搶運敵後物資及援助民營工業，同時兼管煤焦管理委員會西北分處。35至42年，任中紡公司購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參與中紡撤台復廠事宜，對其曲折經過，有詳細介紹。44年銜命赴德，聯繫自由俄聯及安排德國議員訪華，53年再度奉派赴德，致力於中德之復交，惜因國際情勢變化，未能成功。此外，由於家世淵源，對北洋政局亦頗多見證。



史料介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中英庚款會檔案簡介

周琇環*

一、前言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以下簡稱中英庚款會）於 1931 年成立於南京。中英庚款會與同樣以庚款為基金所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下簡稱中基會）之性質，不盡相同，並非獨立於兩國政府管轄權之外的基金會，而是由南京國民政府取得管理運用庚款權及人事權的半官方機構。其次，該會與中基會雖然同樣是由中外人士共同組成董事會的形式，來負責會務，但是中英庚款會大部份的決策，則多出自於中國籍董事。

至於英國庚款的運用方式，除依據「解決中英庚款換文」規定，將部份經費用於某些特定項目之外，其餘大部份的款項皆用於配合國民政府的建設計畫。換言之，中英庚款會係以庚款為基金，分別借予各個事業機關運用，再以其借款所得利息，興辦文教事業，使得庚款成為挹注於國民政府實業建設與教育文化事業的重要經費。

中英庚款會的另一項特色，為該會董事長自始迄終皆由朱家驊一人擔任，因此該會的許多事業，多與朱家驊的政治生涯有著密切關係，乃至於中英庚款會結束後，該會檔案之所以移交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保管，也是緣於當時朱家驊正擔任中研院院長的這層關係。1950 年 1 月英國承認中共政權，中研院院長兼中英庚款會董事長朱家驊，為處理中英庚款會的結束業務案，曾經堅持將中英庚款會的尾款用於學術事業與建設中研院，而不同意將該款挪用於私人，或是其他不合乎換文規定的建議。

* 國史館協修

幾經研議，雖然保留住尾款作為中研院的建築費與新所籌備費，但是朱家驊也因此得罪多人，惹來是非，最後甚至因此辭去中研院院長一職。¹

基於上述將中英庚款尾款用於中研院的決議，中英庚款會同時決定將該會所有的檔案文件一併交由中研院負責保管。這或許就是後來近史所研究員陶英惠先生，會在其總辦事處發現《中英庚款檔案》的原因。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目前所庋藏相關於中英庚款會的檔案，實際上不只前項總辦事處所發現的《中英庚款檔案》，另外院史資料室藏《朱家驊檔案》的附錄部分、近史所檔案館所典藏的《導淮委員會檔案》與郭廷以圖書館所典藏的 F.O. 檔，也有不少關於中英庚款的重要檔案資料。因此，本文擬採較為宏觀的視角，將中研院近史所典藏的中英庚款會檔案，分別以該所各典藏處所為單元，即以院史資料室、檔案館、郭廷以圖書館三處的館藏，一併予以說明，以完整介紹該所相關於中英庚款會檔案的典藏狀況，俾便各界學者參考運用。

二、郭廷以圖書館庋藏之相關檔案資料

關於退還英國庚款的經過，最早自 1908 年英國議院提議減收起，²以迄於 1931 年 3 月 3 日英皇批准「中國賠款(用途)修正法案」(A Bill to Amend the China Indemnity(Application) Act of 1925)³，正式歸還庚子賠款予中國止，總共經歷了二十三個寒暑。退還庚款一案之所以遲遲無法達成協議的原因，主要是受到英國政府無意退還，與兩國國內政局更迭頻繁等因素影響所致，但是英國至終還是難敵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國民政府的淬礪奮發，在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的第二年，實踐了歸還庚款的承諾。在這個漫長的研議過程當中，本文將以 1922 年、1925 年與 1930 年三個關鍵年代，來說明退還庚款一案發展的梗概。

¹ 楊樹人，〈中央研究院最近的十年〉，《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75 年 6 月，初版），頁 332-340；程毅志，〈朱驥先生與中央研究院的重建〉，《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頁 362-363。

² 〈王省三觀察倡議電謝美國減收賠款意見書〉，《申報》，上海，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1908 年 11 月 7 日），第四張，版二。

³ 〈庚款退還換文〉（民國二十年四月六日），《中英庚款檔案》，中央研究院院史資料室藏，檔號：第 41 函；李仕德，〈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1929-1937)〉（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85 年 6 月），頁 39。

1922年12月11日，英國外相寇松侯爵(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電知其駐北京使節，可以通知中國政府（即北京政府）英國決定退還庚子賠款之事，惟尚須經國會通過法案，方能正式成立。22日英國代理公使口頭上非正式地通告中國政府退還庚款的決定，⁴中國國內各界一片讚譽。但是，隨後英國內閣更迭不斷，英國國會一直未能通過庚款退還的法案。

1925年，五卅慘案引發了中國的反英運動，一時民族主義沸騰不已，英國為改變情勢，表達其善意，於是在慘案發生恰滿一個月後，亦即6月30日，英國國會迅速通過退還庚款的法案，是為「中國賠款案」(China Indemnity Act, 1925)。但是中國賠款案的通過，並不等於英國庚款可以真正退還給中國政府，因為法案中又規定，要先行組成委員會待研究調查過庚款的用途之後，才能實施退還。因此於1926年1月，依據「中國賠款案」的規定，在英國組成諮詢委員會，先行派員來華調查庚款的用途及基金管理辦法。待該委員會中英委員查訪中國的民情輿論，首於10月18日向外交部提出報告書之後，又建議應成立一個基金管理委員會來管理英國庚款，英國才能實施退還。⁵於是一波三折，一直到1930年9月，中英兩國才相互正式換文，解決了英國庚款的退還問題。

通過「中國賠款案」前的英國，一直是只承認北京政府為合法政權的，因此不論退還庚款宣言與「中國賠款案」中所謂的「中國政府」，皆係指北京政府而言。然而，隨著南方國民政府北伐軍事的不斷順利進展，又威脅及長江流域的英國利權時，英國才開始試圖與南方政府建立關係。1926年11月，英國外交部將一直支持北京政府，相信吳佩孚定可建立政權，而反對與南方政府建立關係的駐華公使麻克類(Ronald Macleay)召回，改派藍普森(Miles W. Lampson)出任駐華公使，⁶當然這也代表英國政府對華

⁴ F.O.405/237, [F 3613/216/10], The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to Mr. Clive, December 11, 1922, p. 128；〈英將以庚子賠款興學〉，《申報》，上海，民國11年12月23日，版三；〈英國有退還庚子賠款意〉，《申報》，上海，民國11年12月26日，版六；王樹槐，《庚子賠款》（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4年再版），頁428。

⁵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together with other Documents respecting the China Indemnity," *Great British Command Papers*, China No. 2, Vol. viii, 1926, p. 48.

⁶ 李仕德，〈北伐前後時期中英外交關係之研究(1925-1928)〉（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8年6月），頁108-109，122-123。

政策的改變。果然，在同年 12 月 18 日英國正式發表了著名的「十二月宣言」，次年 1 月 27 日又發出所謂的「一月照會」，從此，英國的對華政策，已從區域的機會主義，改成與南方政府建立關係，並對國府的「革命外交」採取逐步退讓的對華政策。

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之後，1928 年 12 月 20 日英國正式承認了國民政府，同時與國府簽訂關稅自主條約。⁷此後，延宕多時的退還中英庚款案的談判對象，也不再是北京政府，而是統一全國後的國民政府。經中英雙方於 1930 年 9 月所議定「解決中英庚款換文」之規定，這筆 11,186,547 英鎊 13 先令的鉅款（約合當時中國銀元二億三千六百餘萬），⁸除用於在英購料與派送留英學生外，大部分作為國民政府訓政時期，鐵道、水利、電氣及文教事業的建設基金。退還庚款一案，於 1931 年 3 月 3 日經英皇批准「中國賠款（用途）修正法案」後，英國乃正式實踐其歸還庚款的承諾。

為究明中英庚款會成立的背景與緣由，除了中文檔案與資料外，若是缺乏英國檔案的對照與佐證，許多英國政府的政策考量與民間的輿論意見，是無從得知的。因此，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所藏有關退還中英庚款的史料，對於庚款退還的背景問題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郭廷以圖書館所藏英國檔案資料，檔案方面，以英國中央政府所轄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 簡稱 P. R. O.) 製作之外交檔案(Foreign Office, 簡稱 F.O.) 微捲片為主；報刊方面，以 *North China Herald* 與在上海出版的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為要。

郭廷以圖書館典藏相關於退還中英庚款案的 F.O. 檔案，計有 F.O.228、F.O.371、F.O.405 等三種。F.O. 檔案中與 F.O.371 同屬中國通信類、政治類的 F.O.17，由於其年代係在 1815 年至 1905 年之間，與退還中英庚款案的年代並不相符，故不列入。F.O.228 屬於使領館檔案——中國通信類，館藏計 638 捲，該項檔案起迄年代是 1834 年至 1920 年，F.O.228

⁷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Papers Regarding the Disposal of the British Share of the China Indemnity of 1901, Sep. 19-Nov. 14, 1930" *Great British Command Papers*, China No. 3(1930), Vol. viii, p. 4.

⁸ 〈歷年財務概況〉，《朱家驊檔案》，中研院近史所院史資料室藏，檔號：附件二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第 81 函；楊仲揆，《中國現代化先驅—朱家驊傳》（臺北：近代中國雜誌社，民國 73 年 1 月初版），頁 185。

的性質與 F.O.17 類似，但內容上比較豐富，通信機關的層次也較高，其中以英國外交部與我國總理衙門或外交部間的往返信函與所訂協議、各地領事館對我政經社文軍事等各方面的報導及相互間往返聯繫的函電為主。

F.O.371 是中國通信類的政治類(General Correspondence: Political)。本類檔案年代在 1905 年以前者，歸入 F.O.17。F.O.371 是一個超級巨大的類(Class)，自 1939 年至 1947 年即有 1500 多宗(pieces)，1947 年僅是報導 Marshall 如何放棄協調的報告即長達一萬七千頁。郭廷以圖書館典藏的 F.O.371 計 666 捲，館藏檔案的起迄年代是 1905 年至 1947 年。

F.O.405 為關於中國事務的機密文件(Confidential Print)。郭廷以圖書館藏有 48 捲，其檔案的起迄年代是 1848 年、1857 年至 1937 年。本部份檔案至 1968 年方才公佈，是英國秘密檔案之重要彙集。⁹而此項檔案係經過英國外交部整理分類者，每捲(roll)中分為若干卷(volume)，每卷前多列有目錄與索引，較易查閱。

郭廷以圖書館所典藏相關於中英庚款的重要報章中，值得提出說明者，如《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此報是英國在上海出刊的半官方報紙，館藏《北華捷報》係由 Ohio 的 Bell & Howell 公司，於 1963 年翻拍的微捲，共計 114 捲，其年代上起 1850 年，下迄 1941 年。其次如出版於上海的 *China Weekly Review*，該報曾數易其名，在 1917 年至 1921 年 5 月間稱為《彌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s*)，1921 年 6 月更名為 *The Weekly Review*，1923 年 7 月更名為 *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52 年 8 月又更名為 *The Monthly Review*。郭廷以圖書館所藏者共 39 捲，典藏的報紙年份為 1917 年至 1953 年 7 月年之間者。

三、院史資料室度藏之中英庚款會檔案

1931 年 4 月 8 日，即英皇批准「中國賠款修正法案」一個多月後，中英庚款會正式成立於南京，爾後並建會所於南京山西路七十八號。依據該會章程規定，中英庚款會成立的宗旨，是管理運用英國所退還的庚子賠款，並且隸屬於國民政府行政院之下。由於該會的人事權與庚款管理權皆

⁹ 本文關於 F.O.檔性質的介紹，係參照朱法源，〈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關中國史料初步調查報告〉，《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1（民國 75 年 3 月），頁 78-79。

歸國民政府掌有，因此中英庚款會可算是政府機構之一。又根據換文規定，在倫敦另外成立了購料委員會(Chinese Government Purchasing Commission)，購料委員會設立的宗旨，為負責為各借款機關處理在英國購料的事宜，該會於同年4月29日開始辦公，會址則設於英國倫敦 Tothill 街二十一號。¹⁰

中英庚款會所贊助與興辦事業之項目，可區分為兩大類來說明之：其一是生產建設事業；其二是文教事業。中英庚款會所贊助的建設事業，包括資助粵漢鐵路株韶段的完工、招商局四海輪之採購外，並曾經協助黃河堵口工程與導淮委員會兩年施工計畫，贊助建設委員會的首都電廠與戚墅堰電廠之建設等。而該會所興辦與贊助的文教事業，其中較重要的項目，包括興建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館，補助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與研究機構，贊助西北開發計畫與中國的美術教育，兩次搶運故宮古物與整理影印居延漢簡，在戰時資助科學研究者與教授，及考選留英學生等等。綜而論之，中英庚款會所辦理的事業，不但範圍較其他庚款機關廣泛，其對於訓政時期的政府建設不論軟硬體方面，都確曾予以極大的支持，而獲得各界學者一致的肯定。

1958年3月，中英庚款會受下列因素影響，已無以為繼，首先是受到抗戰破壞的影響，使該會經費所剩無幾，其業務亦多已停頓；其次是英國在1950年1月5日撤銷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承認，政治利空因素的影響下，使得該會失去其繼續存在的法理依據；再則是當時中英庚款會的董事或老成凋謝或散處國外，並且久未改選，使得董事人數嚴重不足，在臺的董事只剩下朱家驊與劉瑞恆兩人，董事談話會已無法召集。於是該會只得呈請行政院准予結束其會務，並經行政院5月2日的核准，而正式結束。中英庚款會結束後，除尾款全用於建設中研院外，該會的檔案、帳冊及其在抗戰時期所購買之建設公債等，也一併議請中研院代為保管，但是為了保留對於被凍結的兩項購料款項之權利，中英庚款會對外的名義上仍暫時保留，以待重議購料款項時能再度行使管理之權。¹¹

¹⁰ 〈本會成立案〉(民國20年4月10日)，《中英庚款檔案》，中研院近史所院史資料室藏，檔號：第1函；〈購料會年刊〉(民國20年購料會會務報告)，《朱家驊檔案》，中研院近史所院史資料室藏，檔號：附件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第20函。

¹¹ 〈文教基金會呈行政院為結束保管請核備文〉(民國47年3月17日)、〈行政院准中英文教基金會即行結束保管處業務文〉(民國47年5月2日)，《朱家驊檔案》，檔號：附

中研院近史所院史資料室所收藏的中英庚款會檔案，依據其檔案移轉機關的不同，區分為兩部份，即業經整理完竣的《朱家驊檔案》附件（附件二中英庚款董事會、附件三、附件四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帳冊），與新近完成初步整理的《中英庚款檔案》二者。

（一）《朱家驊檔案》附件

《朱家驊檔案》係於民國 52 年經郭廷以所長洽商朱家驊夫人王文淵女士，移送中研院近史所保管者。¹²雖然《朱家驊檔案》佔院史室檔案中的最大部份，但相關於中英庚款會的檔案為數不算多，因之列為《朱家驊檔案》的附件二、三、四等項。其中附件二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檔案共計八十七函；附件三，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帳冊共計三十九函；附件四，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帳冊（原帳用及影本）五十一冊。

附件二的檔案中，較重要的檔案僅佔全數檔案四分之一強。院史室將本項檔案劃分為總類、財務、會議、文教補助、會計師查帳等五類，其較富參閱價值者如下：

（1）總類項下的〈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人名錄〉案；

（2）財務類項下的〈購料季報、購料會務報告〉、〈導淮借款及庚款會乙組四四至四五次常會議事錄〉、〈中英庚款會息金支用標準、息金明細表〉、〈文教基金會工作報告〉、〈會務報告〉、〈歷年財務概況〉、〈結束公函〉、〈文教基金會十年來管理概況〉、〈董事會概況〉、〈文教基金會呈行政院為結束保管處請核備文〉等案；

（3）會議類項下的〈庚款會半年刊〉、〈購料會年刊〉、〈各機關庚款聯席會議〉、〈董事會會議紀錄（第三三至四六次）〉、〈常務董事會會議紀錄（第三三至四四次）〉、〈教育委員會議事錄（第八至四四次）〉、〈技術委員會議事錄（第二九至五四次）〉、〈董事會財委會議事錄（第五五至一〇五次）〉、〈事務所議事錄（第三一至一五二次）〉、〈董事談話會紀錄〉等案；

（4）文教補助類項下的〈庚款會請款總卷〉、〈補助各大學學術機關撥款簽呈卷〉、〈庚款會倫敦存款十五萬英鎊指充庚款留學生經費〉、〈庚

件二中英庚款董事會，第 82 函。

¹² 李慧玲，〈中研院近史所院史資料室簡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0（民國 84 年 11 月），頁 53-55。

款留英生一至八屆名單〉、〈歷屆庚款留英生回國就業一覽表〉等。

其餘各式契約、借款預算書、付息收據、資產收支表月報表、帳目傳票、經費概算結算書、現金出納表等案，雖然數量眾多，但是可供作研究中英庚款會各項事業者似嫌不足。

附件三與附件四的檔案，則全數為帳冊、出納簿及會計師的查帳報告等，其中較可供參考者，僅係本項檔案列於《朱家驊檔案》目錄最末的中英庚款會董事會的工作報告書耳，而該項工作報告書又多與《中英庚款檔案》中所藏者重覆，故再不贅述。

(二)《中英庚款檔案》

《中英庚款檔案》係由近史所研究員陶英惠於兼理秘書組主任期間，在中研院總辦事處倉庫的舊紙堆中發現的，後經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先生核准，於民國 76 年 11 月 16 日運至近史所典藏。院史資料室初步整理後，將原來的五大木箱檔案，分類歸納為一三三函的檔案資料，並且定名為《中英庚款檔案》。¹³這批檔案應是目前所有相關於中英庚款會檔案中，最為完整的檔案。《中英庚款檔案》的內容，本文擬分為組織系統、財務問題、文教事業、生產建設事業等四類，以說明之：¹⁴

1. 中英庚款會的組織系統

關於組織系統方面的檔案，又可以下述四部份來說明其概要：

(1) 董事會概況方面：包括董事會的成立，章則，會名之更改，人事，疏散，還都接收會刊，會務摘要，事務所經費等部份。

(2) 董事會會議方面：包括董事簡派，董事會議中英文紀錄（第一至五十七次），董事會議事日程（第四十三次至第五十七次），常務董事會中英文會議記錄（第一至四十八次）。

(3) 分組委員會方面：包括分組委員會，談話會，財務委員會議事錄（第四至一〇五次），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第二至四四次），技術委員會會議紀錄（第三十九至五十六次），以及董事會、常務董事會、教育委員會、技術委員會之議事錄等。

(4) 購料委員會方面：包括章則，人事，庚款之處理，庚款存儲，付

¹³ 同前註，頁 55。

¹⁴ 由於《中英庚款檔案》項下一三三函的檔案都十分重要，但案名多所重覆，限於篇幅也無法將案名全文照錄，故本節案名僅擇要說明，而不用篇名號表示之。

款清單，料款停付，以及購料會會務報告，往來文件，購料季報，帳目報告，議事錄等。

2. 中英庚款會之財務問題

關於中英庚款會的庚款數額、經費運用、與財務問題，約可分為以下三項說明之。

(1)中英庚款數額問題：庚款數目，庚款保息還本辦法，庚款利息及投資盈餘，解決中英庚款換文，會計制度，處理請款規則，庚款收據，海關擔保。

(2)往來的金融機構：中央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央信託局，中國國貨銀行四行聯合辦事處。

(3)六厘英金庚款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

3. 文教事業方面

中英庚款會自行舉辦的事業，係以文教事業為主，其中除例行的自辦事業與選派留英公費生外，也包括保存古物與戰時搶購淪陷區之善本書等工作。而該會的文教事業之所以得與中基會所興辦者相媲美，亦在於其文教事業確曾為我國培育不少現代化的人才，在抗戰前後，也曾對我國教育事業善盡贊掖之功。

《中英庚款檔案》所藏關於文教事業的檔案，必須與《朱家驊檔案》中所藏者互相參照方才完整，本項檔案主要的內容包括：

(1)自辦事業：自辦研究所章程，中國蠶桑研究所，中國地理研究所，中國美術學院，中國海洋研究所等案。

(2)留英公費生：公費生章則，留學生人事調查表，第五至九屆留英公費生，各屆留英公費生通訊錄，羅士培獎學金案等。

4. 生產建設事業方面

中英庚款會係以庚款為基金，依據換文規定借予交通部、經濟部、導淮委員會、建設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各機關，興辦鐵路、水利、電氣等事業。¹⁵借款所生利息即中英庚款會興辦文教事業的經費，故若未借款則無以生息，無息金則文教事業無法興辦。中英庚款會的資金即採此法，循環運用，以圖久遠。《中英庚款檔案》所藏關於該會生產建設事業的檔

¹⁵ 〈歷年財務概況〉，《朱家驊檔案》，中研院近史所院史資料室藏，檔號：附件二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第81函。

案概要，茲說明如次：

(1)鐵公路借款：關於粵漢鐵路者最多共計十五函，包括粵漢鐵路借款，粵漢鐵路公債基金，粵漢鐵路總稽核處之經費、報告、人事，粵漢鐵路株韶段借款、材料、工程、還本付息等。

關於京贛鐵路者共八函，包括京贛鐵路借款基金委員會、京贛鐵路借款，京贛鐵路材料與購料，京贛鐵路還本付息，京贛鐵路會計處、工程處、清理處與其改組為民營公司案。

其次，尚有湘桂鐵路理事會組織規程、借款、購料，浙贛鐵路借款，膠濟鐵路借款，敘昆滇緬鐵路借款，鐵道部公路客貨車輛借款等。

(2)電訊借款：交通部西南西北話網借款，交通部話網購料，國際無線電臺借款，交通部有線無線電料借款，九省長途幹線及江蘇全省話線借款，核議申購短波廣播機等。

(3)基本工業借款：株洲機廠借款、借款基金委員會，中央機器廠借款、購料，戚墅堰機廠借款，交通部資源委員會購料，交通部存滬材料，交通部存港材料等。

(4)電氣事業借款：建設委員會電氣事業公債，電氣試驗所借款，揚子電氣公司借款材料，昆明電廠與中央電工器材廠借款，首都、戚墅堰電廠借款與材料。

(5)水利事業借款：導淮會完成二年計畫借款，徵收導淮區域船閘費用，導淮會借用中英庚款保管會常會紀錄，淮河水利工程總局承理導淮借款。中英庚款會對於導淮委員會水利事業的贊助，則另見於檔案館所藏之《導淮委員會檔案》。

四、近史所檔案館度藏之中英庚款會檔案

近史所檔案館度藏之《導淮委員會檔案》中，亦藏有關於中英庚款會的檔案若干，可對前述檔案中關於庚款運用於導淮事業的問題，有所補充。導淮委員會藉由中英庚款會資金支援，所完成的水利工程，包括黃河堵口工程、廣東西江金東、金西基圍修理工程，以及導淮委員會兩年施工計畫中——邵伯、淮陰、劉澗三閘工程與張福河疏浚等工程，而導淮委員會的三閘工程，所運用的新式設備，且曾為我國水利史創下的新的紀錄，

¹⁶因此這部份檔案，對於中英庚款如何贊助我國的水利工程，及其成效與影響的評估等研究議題，應具相當的參考價值。

近史所檔案館所藏之《導淮委員會檔案》中，關於中英庚款會的檔案，主要列於該檔的經費、會議、工程與購料等項目下，其主要內容說明如次：

(一) 經費類

經費類關於中英庚款會的檔案，較重要者包括：〈淮陰閘工局工程經費〉、〈邵伯閘工局工程經費〉、〈劉老澗閘工局工程經費〉、〈借用英庚款、現款〉、〈庚款、籌劃工款〉、〈中英庚款保管委員會經費〉、〈英庚款保委員會本會借用經費〉、〈二三至二五年度經費報告〉、〈導淮會歷年借入款項及用途〉等案。

(二) 會議、工程、購料類

由於會議、工程、購料類中，關於中英庚款會的較重要檔案數量不多，因此合併於一小節中說明。會議類較重要的檔案計〈庚款保委會等會議紀錄〉、〈導淮計畫及附屬機構董事會、黃河水利委員會等會議紀錄〉、〈關於淮河水利工程會議〉等案。工程類較重要的檔案以〈張福河工程實施及入海水道工程〉、〈邵伯船閘竣工〉、〈黃河堵口復堤工款〉為主。購料類中較值得參閱的檔案，包括〈英料訂購：庚款購料〉、〈英料訂購運輸〉、〈英料運輸：僱專員購料事項〉、〈借用中英庚款及基金〉等案。

伍、檢討與建議

若就檔案的重要性與完整性言，中研院近史所所典藏相關於中英庚款會的檔案資料，在各處的檔案機構中，厥為該項檔案的典藏重鎮。雖然國史館或其他政府機關如教育部、外交部、中央圖書館，也存有不少相關的資料，可補中研院檔案之不足，但是中研院近史所所典藏中英庚款會檔案的質與量，皆遠超過上述各機關。尤其是在借閱方面，目前仍珍藏在教育部本部木柵庫房、外交部檔案資訊處、與中央圖書館的庚款檔案，因受到機關檔案不對外公開的限制，並非一般研究者有幸得窺其堂奧者。而在中

¹⁶ 〈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概況〉（民國38年4月），《朱家驊先生言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6年5月初版），頁399-406。

研院近史所不但保存檔案的設備十分完善，只要不損及檔案本身，學者在借閱與運用檔案時皆十分便利。

以檔案的分類言，國史館檔案的分類方法，基本上係依部會為準，故相關中英庚款的檔案，必須由各部會檔案中爬梳整理出來，其中如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交通部、外交部，甚至內政部也都有部份中英庚款檔案，所以蒐集上較耗時費神。而中研院近史所的中英庚款會檔案，則列為專檔，蒐集上較為省時省力，但是如有可能，建議近史所應將《朱家驊檔案》的附件與《中英庚款檔案》合併，以避免將同一議題分存於兩項檔案的重覆現象；其次，因為這兩部份的檔案，並未發現中英庚款退還前對中英談判部份之檔案，而皆係中英庚款會相關會務的檔案，故而檔案名稱似可以《中英庚款會檔案》為名，而不必以涵蓋面較廣之《中英庚款檔案》為題。

對於中英庚款會的議題，有許多方面是值得我們繼續深入研究的。例如在英國的對華政策方面，藉著中英庚款會的研究，可觀察英國自鴉片戰爭後砲艇外交的武力政策，轉化為利己也利人的文化策略的蛻變過程如何？以及中國對於列強文化策略的反應如何？而中英庚款會的各项事業中，中英雙方各獲利多少？這些事業對於國民政府的現代化與抗戰的助益到底有多大？人才為中興之本，那麼留英公費生是否如同美國庚款學生一般，曾經扮演著中西文化觸媒的角色，而為中國文化帶來若干新意？而其影響的深度及廣度如何？再次，各國庚款與英國庚款之間，其利弊得失的比較如何？凡此種種議題，皆可從這批中英庚款的檔案文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而這也就是中英庚款會檔案值得學者們一再深入研究剖析的原因所在。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西班牙外交部總檔案館 及其所藏有關中國史料簡介

(Archivo General de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李毓中*

長達三個多世紀以來，西班牙人透過他們在東方的殖民地——菲律賓，不斷地與中國進行交流。這些昔日交流留傳下來的文字記錄，就成了今天史學研究者的保貴史料，被妥善地保存在西班牙境內的各個檔案館裡。這些與中國有關的西班牙文史料，由於記錄者及年代上的不同，以致收藏這些文件的檔案館也有所差異。基本上，從十六世紀起到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有關中國的西班牙官方檔案，大多保存在西班牙南方塞維亞市的印度總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裡。¹鴉片戰爭之後，隨著南京條約的簽定，中國正式開始與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從這時候起，有關西班牙與中國的外交往來文書，則多保存在馬德里的外交部總檔案館裡。

西班牙外交部總檔案館的設立，開始於十八世紀初法國波旁王朝入主西班牙之時。檔案館最初是附設在馬德里王宮內的國務部(Ministerio de Estado)²內，一直到1900年，才被提昇為一個獨立的部門，然後跟著國務部(於1938年改稱外交部)一起遷往新的辦公大樓——聖十字宮(Palacio de Santa Cruz)，檔案館則被安置在聖十字宮的地下室內。五〇年代，隨著外交部的擴建，這些檔案才被轉往聖十字宮後面新大樓內保存，也就是外交部總檔案館的現在所在地。雖然，七〇年代中一部份的檔案被轉往馬德里市郊的行政管理總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la Administracion)內保存。但是，外交部總檔案館內所收藏的外交史料，仍是今日西班牙史學界研究西班牙近現代外交史時，不可或缺的材料。

* 西班牙塞維亞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¹ 請參考李毓中，〈西班牙印度總檔案館簡介〉，《歷史月刊》，總115期(臺北：歷史月刊，民國86年8月)，頁4-10。〈西班牙塞維亞印度總檔案館內所藏有關中國史料簡目初編〉，《漢學研究通訊》，總64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民國86年11月)，頁476-484。

² 其前身為1716年菲利浦五世在位時所設立的 Primera Secretaria de Estado y de Despacho。

目前保存在這個檔案館裡的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初。但是普遍而言，這些史料所註明的日期，大多可以上溯到 1834 年。而在檔案的分類上，主要是以 1931 年做為一個分水嶺，將檔案分為兩個單元。1931 年以前的文件，依慣例稱為歷史檔案(Archivo Historico)縮寫為(H)。1931 年之後的則稱為更新檔案(Archivo Renovado)縮寫為(R)。除了這兩個主要的部份之外，還有其它的檔案，如：個人檔(Personal)縮寫為(P)，慈善事業檔(Obra P'ia)縮寫為 (OP)，西班牙駐教庭使館檔(Archivo de la Embajada de Espana en la Santa Sede)縮寫為(SS)；條約檔(Tratados)縮寫為(TR)。之後，則又加上了一些其他的部份：如地圖檔(Mapas y Planos)縮寫為(MP)，除了地圖之外，還包括了些手稿檔及藏書。

一、有關中國的檔案

檔案:報告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1445	次檔案:大使館及使節團	年代:1836-1865
檔案:報告 系列:中國(北京) 文件編號:H 1446	次檔案:大使館及使節團	年代:1866-1878
檔案:報告 系列:中國(北京) 文件編號:H 1447	次檔案:大使館及使節團	年代:1879-1885
檔案:報告 系列:中國(北京) 文件編號:H 1448	次檔案:大使館及使節團	年代:1886-1895
檔案:報告 系列:中國(北京) 文件編號:H 1449	次檔案:大使館及使節團	年代:1896-1916
檔案:報告 系列:中國(北京) 文件編號:H 1450	次檔案:大使館及使節團 次系列:口頭照會	年代:1917-1930
檔案:報告 系列:廣東(中國)	次檔案:領事館	

文件編號:H 1862		年代:1868-1885
檔案:報告 系列:廈門(中國) 文件編號:H 1885	次檔案:領事館	年代:1856-1950
檔案:報告 系列:西貢(中國) 文件編號:H 2038	次檔案:領事館	年代:1863-1899
檔案:報告 系列:上海(中國) 文件編號:H 2063	次檔案:領事館	年代:1858-1898
檔案:報告 系列:上海(中國) 文件編號:H 2064	次檔案:領事館	年代:1899-1929
檔案:報告 系列:天津(中國) 文件編號:H 2078	次檔案:領事館	年代:1898-1899
檔案:政策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2361	次檔案:外交政策	年代:1848-1860
檔案:政策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2362	次檔案:外交政策	年代:1861-1871
檔案:政策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2363	次檔案:外交政策	年代:1872
檔案:政策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2364	次檔案:外交政策	年代:1873-1877
檔案:政策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2365	次檔案:外交政策	年代:1878-1890
檔案:政策	次檔案:外交政策	

-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2366
年代:1891-1893
- 檔案:政策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2367
次檔案:外交政策
年代:1894
- 檔案:政策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2368
次檔案:外交政策
年代:1895-1900
- 檔案:政策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2369
次檔案:外交政策
年代:1901-1929
- 檔案:政策
系列:英國
內容描述:有關傳教士在中國雲南的備忘錄
文件編號:H 2501
次檔案:外交政策
卷宗編號:001
年代:1878
- 檔案:政策
系列:英國
內容描述:英國代表要求古巴總督處理
中國移民的問題
文件編號:H 2502
次檔案:外交政策
卷宗編號:001
年代:1879
- 檔案:政策
系列:日本
內容描述:英國與日本的結盟，有關中國
及韓國完整性的事務
文件編號:H 2538
次檔案:外交政策
卷宗編號:001
年代:1902
- 檔案:政策
系列:日本
內容描述:日本對於中國的政策
文件編號:H 2539
次檔案:外交政策
卷宗編號:001
年代:1924
- 檔案:政策
系列:日本
內容描述:日本干涉中國的內政
文件編號:H 2539
次檔案:外交政策
卷宗編號:002
年代:1925
- 檔案:政策
次檔案:外交政策

- 系列:墨西哥
 內容描述:美國大使有關與中國交涉的照會
 文件編號:H 2556 卷宗編號:004 年代:1901
- 檔案:政策 次檔案:外交政策
 系列:秘魯
 內容描述:有關智利和秘魯的船隻在中國海
 附近出現的問題
 文件編號:H 2593 卷宗編號:004 年代:1866-1867
- 檔案:政策 次檔案:外交政策
 系列:俄國
 內容描述:各列強在中國利益的矛盾
 文件編號:H 2649 年代:1910
- 檔案:政策 次檔案:外交政策
 系列:頒佈命令
 內容描述:1896年08月28日主動向中國
 、日本、秘魯、土耳其等國發佈有關
 古巴的事務
 文件編號:H 2734 年代:1896
- 檔案:政策 次檔案:內政
 系列:公眾法令 次系列:逮捕
 內容描述:逮捕中國、法國公民
 文件編號:H 2769 年代:1920
- 檔案:政策 次檔案:海外事務
 系列: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屬地—菲律賓 次系列:與中國的關係
 內容描述:向中國政府抗議其商船
 “El Bilbaino”號在中國遭搶劫並燒毀的
 卷宗
 文件編號:H 2956 卷宗編號:002 年代:1839-1844
- 檔案:政策 次檔案:海外事務
 系列: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屬地—菲律賓 次系列:商業
 內容描述:在西班牙本土的港口針對
 菲律賓群島及中國的農產品及特
 定品徵收臨時性優惠關稅³

³ 其內容請參考英文譯本，Encarnacion Alzona 譯，*Report on the commerce and shipping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79).

文件編號:H 2956	卷宗編號:003	年代:1833
檔案:政策 系列: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屬地—菲律賓 內容描述:有關菲律賓官員 D. Manuel de Orense 遭中國海盜殺死的卷宗	次檔案:海外事務 次系列:海盜	
文件編號:H 2958	卷宗編號:020	年代:1847-1850
檔案:政策 系列: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屬地—菲律賓 內容描述:有關英國反對菲律賓總司令宣佈驅逐四個中國商人的卷宗	次檔案:海外事務 次系列:和英國的關係	
文件編號:H 2959	卷宗編號:036	年代:1866
檔案:政策 系列: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屬地—瑪利亞島 內容描述:有關引進中國移民到瑪利亞島的討論	次檔案:海外事務 次系列:瑪利亞島(Marianas)	
文件編號:H 2959	卷宗編號:040	年代:1860
檔案:政策 系列: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屬地—菲律賓 內容描述:有關菲律賓政府向某些中國人的銀行借款計劃的卷宗	次檔案:海外事務 次系列:商業	
文件編號:H 2959	卷宗編號:046	年代:1866-1867
檔案:政策 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戰 內容描述:允許在中國及泰國經商的個人名單	次系列:商業及黑名單	
文件編號:H 3007	卷宗編號:003	年代:1918-1919
檔案:政策 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戰 內容描述:寄送允許在中國及泰國經商的商人名單	次系列:商業及黑名單	
文件編號:H 3007	卷宗編號:004	年代:1915-1918
檔案:政策 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戰 內容描述:逮捕中國、美國輪船上的德、奧公民	次系列:逮捕西班牙船上的德、奧公民	
文件編號:H 3015	卷宗編號:019	年代:1916

- 檔案:政策
 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戰
 內容描述:中國對抗德國船運公司的態度
 文件編號:H 3021
 次系列:地中海的交通
 卷宗編號:006
 年代:1918
- 檔案:政策
 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戰
 內容描述:保護中國境內的德國人
 文件編號:H 3076
 次系列:西班牙承擔保護的責任
 卷宗編號:004
 年代:1914-1918
- 檔案:政策
 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戰
 內容描述:和平會議
 文件編號:H 3108
 次系列:威爾遜和平計劃的建議
 卷宗編號:005
 年代:1914-1918
- 檔案:政策
 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戰
 內容描述:與中國有關的條款及法令
 文件編號:H 3110
 次系列:和平會議
 卷宗編號:007
 年代:1914-1918
- 檔案:草約
 系列:中國
 文件編號:H 3446
 次檔案:外國王室
 年代:1887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與中國之間的友好、
 商業及航行條約
 文件編號:TR 141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商業、通訊及航行
 編號:0208
 卷宗編號:001
 年代:1845-1868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與中國之間的友好、
 商業及航行條約
 文件編號:TR 141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商業、通訊及航行
 編號:0208
 卷宗編號:002
 年代:1854-1865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與中國之間的友好、
 商業及航行條約
 文件編號:TR 141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商業、通訊及航行
 編號:0208
 卷宗編號:003
 年代:1854-1866

- | | | |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與中國之間的友好、
商業及航行條約
文件編號:TR 141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 商業、通訊及航行

卷宗編號:004 | 編號:0208

年代:1844-1866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與中國之間的友好、
商業及航行條約
文件編號:TR 142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 商業、通訊及航行

卷宗編號:005 | 編號:0208

年代:1849-1866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與中國之間的友好、
商業及航行條約
文件編號:TR 142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 商業、通訊及航行

卷宗編號:006 | 編號:0208

年代:1864-1867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與中國之間的友好、
商業及航行條約
文件編號:TR 142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 商業、通訊及航行

卷宗編號:007 | 編號:0208

年代:1867-1870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與中國之間的友好、
商業及航行條約
文件編號:TR 142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 商業、通訊及航行

卷宗編號:008 | 編號:0208

年代:1859-1896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有關外國使節向中國皇帝呈遞
國書的事宜
文件編號:TR 171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草約

卷宗編號:003 | 編號:0267-02

年代:1872-1875 |
| 檔案:條約
系列:西班牙
內容描述:西班牙財政部奉國王命令宣佈
中國、夏威夷、日本、波斯、泰國為
關稅優惠國
文件編號:TR 182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商業. 關稅及豁免權

卷宗編號:004 | 編號:0294-01

年代:1878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有關古巴的 中國移民 (苦力)的協議 文件編號: TR 189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01	編號:0299-01 年代:1865-1868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就前往古巴 的中國移民 (苦力)問題所達成的協議 文件編號:TR 189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02	編號:0299-01 年代:1867-1878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就前往古巴 的中國移民 (苦力)問題所達成的協議 文件編號:TR 190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03	編號:0299-01 年代:1878-1880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就前往古巴 的中國移民 (苦力)問題所達成的協議 文件編號:TR 190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04	編號:0299-01 年代:1878-1886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就前往古巴 的中國移民 (苦力)問題所達成的協議 文件編號:TR 191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05	編號:0299-01 年代:1872-1893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就前往古巴 的中國移民 (苦力)問題所達成的協議 文件編號:TR 191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06	編號:0299-01 年代:1864-1877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就前往古巴 的中國移民 (苦力)問題所達成的協議 文件編號:TR 192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07	編號:0299-01 年代:1855-1866
檔案:條約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編號:0299-01

- | | | |
|--|--|--------------------------------|
|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就前往古巴
的中國移民 (苦力)問題所達成的協議
文件編號:TR 192 |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08 | 年代:1871-1877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就前往古巴
的中國移民 (苦力)問題所達成的協議
文件編號:TR 193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09 | 編號:0299-01

年代:1873-1875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和中國之間就前往古巴
的中國移民 (苦力)問題所達成的協議
文件編號:TR 193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卷宗編號:010 | 編號:0299-01

年代:1849-1868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國務部及財政部的命令，中國
及日本的产品至本年 06 月 30 日止，
仍享有最惠國待遇
文件編號:TR 275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商業

卷宗編號:015 | 編號:0416

年代:1892 |
| 檔案:條約
系列:在北京的多方條約
內容描述:草約內容於 1891 年 02 月 23 日
確定，由總理衙門(Zung li Yamen)及派
駐在中國的使節團團長所簽署
文件編號:TR 278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國際草約

卷宗編號:005 | 編號:0422-03

年代:1888-1896 |
| 檔案:條約
系列:在馬德里的多方條約
內容描述:有關安南、中國、日本及泰國
等國家適用最惠國關稅的命令
文件編號:TR293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商業、關稅及豁免權

卷宗編號:001 | 編號:0447

年代:1892-1895 |
|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中國及日本之間的情勢
保持中立的聲明
文件編號:TR296
備註:只有卷宗夾 |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中立的防禦政策

卷宗編號:010 | 編號:0455-02

年代:1894 |

<p>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與中國改訂關稅的草約及重訂 商業條約 文件編號:TR 416</p>	<p>次檔案:雙邊條約的計劃 次系列:商業、關稅及免稅權</p> <p>卷宗編號:001</p>	<p>年代:1883-1919</p>
<p>檔案:條約 系列:法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及法國雙方同意互相 保障對方在中國的商標權 文件編號:TR 435</p>	<p>次檔案:雙邊條約的計劃 次系列:工業及商標權</p> <p>卷宗編號:005</p>	<p>年代:1904-1912</p>
<p>檔案:條約 系列:美國 內容描述:與中國有關和平、商業及航行 條約的卷宗 文件編號:TR 460 備註:於 1844 年 07 月 13 日簽署</p>	<p>次檔案:三個國家的條約 次系列:外交政策</p> <p>卷宗編號:028</p>	<p>年代:1844-1846</p>
<p>檔案:條約 系列:美國 內容描述:與中國商業條約的卷宗 文件編號:TR461 備註:於 1868 年 07 月 28 日簽署</p>	<p>次檔案:三個國家的條約 次系列:商業</p> <p>卷宗編號:009</p>	<p>年代:1868-1869</p>
<p>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西班牙代表在北京同中國及 日本方面簽署郵務條約 文件編號:TR 465 備註:於 1923 年 12 月 08 日簽署</p>	<p>次檔案:三個國家的條約 次系列:通訊及郵務</p> <p>卷宗編號: 006</p>	<p>年代:1923</p>
<p>檔案:條約 系列:葡萄牙 內容描述:有關葡萄牙在中國商業利益 的卷宗 文件編號:TR 475</p>	<p>次檔案:匯報 次系列:商業</p> <p>卷宗編號:004</p>	<p>年代:1843-1844</p>
<p>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1864 年 10 月 10 日的天津條約， 西班牙方面由 D. Sinibaldo de Mas 代表 簽署</p>	<p>次檔案:二十世紀的條約 次系列:商業</p>	<p>編號:0208</p>

- 文件編號:TR 508 年代:1864
- 檔案:條約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條約 編號:0299-01
 系列:中國 次系列:領事館事務及移民
- 內容描述:有關中國移民前往古巴的協議，
 於 1877 年 11 月 17 日於北京簽署，西
 班牙代表為 D. Carlos Antonio
- 文件編號:TR 520 年代:1877
- 檔案:條約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編號:0416
 系列:中國 次系列:商業
- 內容描述:財政部(1892 年 03 月 15 日)
 聲明中國至本年 06 月 30 日止，仍享
 有最惠國待遇
- 文件編號:TR 535 年代:1892
- 檔案:條約 次檔案:十九世紀條約 編號:0455-02
 系列:中國 次系列:中立的防禦政策
- 內容描述:1894 年 08 月 18 日西班牙宣佈
 對中國及日本之間的情勢保持中立
- 文件編號:TR 538 年代:1894
- 檔案:條約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條約 編號:0558-01
 系列:海牙公約 次系列:國際和平會議
- 文件編號:TR 546 年代:1899
- 檔案:條約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條約 編號:0558-04
 系列:海牙公約 次系列:國際和平會議
- 文件編號:TR 546 年代:1899
- 檔案:條約 次檔案:二十世紀的條約 編號:0013
 系列:中國 次系列:外交政策
- 內容描述:列強(八國聯軍)在中國的使節
 團之間友好的照會
- 文件編號:TR 549 年代:1901
- 檔案:條約 次檔案:二十世紀的條約 編號:0035-02
- 系列:中國 次系列:草約
- 內容描述:有關北京外交區使館付稅的草約
- 文件編號:TR 551 年代:1904
- 備註:只有卷宗夾

檔案:條約 系列:多方的條約 內容描述:中國對全球郵政協議內容條款的 批准 文件編號:TR 571 備註:1922年01月05日公布	次檔案:二十世紀的條約 次系列:通訊及郵務	編號:0241-08 年代:1920
檔案:條約 系列:西班牙 內容描述:西班牙同意1922年02月06日 有關中國海關關稅的國際條約 文件編號:TR 580	次檔案:二十世紀的條約 次系列:海關	編號:0291 年代:1925
檔案:條約 系列:中國 內容描述:在南京簽署的友好及商業草約 文件編號:TR 587 備註:1930年05月09日公布	次檔案:二十世紀的條約 次系列:外交政策	編號:0387 年代:1928
檔案:外交部 系列:勳章及勳位 內容描述:阿豐索十二世的勳章頒給其指 定者 文件編號:C 311	次系列:中國	年代:1903

二、有關臺灣的檔案

檔案:報告 系列:高雄(日本) 內容描述:十九封發自淡水及高雄的領 事館報告 ⁴ 文件編號:H 2073	次檔案:領事館	年代:1897-1998
檔案:政策 系列:日本 內容描述:臺灣島上的動亂及委派西班牙 傳教士 文件編號:H 2537	次檔案:對外政策 卷宗編號:001	年代:1893

⁴ 這些信件中多數是有關臺灣島上的鼠疫疫情報告。由於西班牙所屬的殖民地菲律賓與臺灣僅僅是一峽之隔，因此西班牙政府對臺灣島上的鼠疫疫情非常關心。

檔案:政策 系列:日本 內容描述:有關日本給予友好強國其公民 及船隻種種優惠 文件編號:H 2537	次檔案:對外政策 卷宗編號:001	年代:1896
檔案:政策 系列:日本 內容描述:臺灣島上道明會教士的要求 文件編號:H 2538	次檔案:對外政策 卷宗編號:001	年代:1896
檔案:條約 系列:日本 內容描述:日本政府聲明,臺灣地區適用 所有與日本簽定的商業條約 文件編號:TR 298	次檔案:十九世紀的談判 次系列:商業 卷宗編號:012	編號:0474 年代:1896

三、結語

西班牙外交部總檔案館內所藏與中國有關的檔案中,較重要的部份是中西兩國之間,針對中國僑民在菲律賓及古巴所往來的外交書信。這些資料正好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內所藏的外交檔案,有著互相補充及互相驗證的價值。⁵有關十九世紀後半中國苦力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的史料,總計有十捆。其內容除了西班牙駐外單位、苦力仲介商等各方針對中國苦力問題所致西班牙外交部的書信外,當年西班牙政府內部針對中國移民合法(正常)化問題所進行的相關討論也收錄在檔案中。另外,還可以找到一些中方官員針對中國苦力問題所遞交給西班牙政府的外交書信,例如清廷駐美、墨、日(西班牙)⁶大使陳蘭彬於光緒五年(1879)十一月間致西班牙外務大臣的照會。

當年,因為中國契約工在古巴遭受凌虐的問題,而由清朝官員前往古巴所記錄下的十二冊《古巴華工呈詞》,如今仍完整地收藏在西班牙外交部總檔案館裡。除了上面提及的中、西文史料外,也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

⁵ 參見姜正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外交檔中之華僑資料〉,《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6年9月),頁104-111。

⁶ 此處的「日」,係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語的西班牙之意)的縮寫。

葡文的資料，例如一封西班牙駐澳門領事的信中，則附上了葡萄牙澳門總督針對苦力船在運送中國移民途中，大量苦力於旅途中死亡的慘劇，所規定的相關法令（印刷品），以便防止這樣的悲劇的再度重演，⁷嚴格規定苦力船上每日各項食品的最少配額，以及從澳門出發抵達目的地的最大期限日等事項。

此外，西班牙與清廷所簽定的雙邊條約、西班牙船隻因船難漂流至中國海岸遭劫掠所帶來的外交問題、清廷於馬尼拉設立領事館的爭議以及兩國對臺灣及菲律賓之間領海問題所進行的磋商等等，都可以在西班牙外交部總檔案館內找到相關的史料。雖然整體而言，這些有關中國的外交史料，不若英、美、法等國所收藏般的豐富，但對於中國近代外交史（特別是有關華僑的部份）的研究而言，仍有著其特殊及不可或缺的史料價值，值得國內學界的繼續發掘研究。

⁷ 有趣的是，筆者於葡萄牙外交部外交史檔案館(Arquivo Historico-Diplomatico de Ministerio dos Negocios Estrangeiros)中卻未找到這份文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66)

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劉鳳翰 紀錄：李郁青 313頁 平裝250元，精裝300元

溫哈熊將軍(1923-)，廣東台山人，美國維吉尼亞軍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1944年班砲科畢業，後任駐美軍事代表團侍從參謀，其間曾至美國陸軍指參大學受訓半年，並任我國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參謀。民國36年調任國防部長辦公室參謀，來台後歷任陸軍軍作戰處參謀、砲兵營副營長、營長、國防部連絡局副組長、組長、陸總部連絡室副主任、主任、砲指部指揮官、國防部連絡局副局長、國防部部長辦公室副主任、駐美採購服務團軍資組組長、駐美採購服務團團長、聯勤總司令、總統府戰略顧問、國策顧問等職。本書所述，以將軍之家世、經歷、交遊與事功為主，且因追隨蔣經國多年，故對蔣經國於國防部長及行政院副院長任內事蹟多有詳述。另對孫立人案、江南案、紐約刺蔣案、尹清楓案等，及我國對美軍事採購辛酸史，均有諸多見證和剖析，為研究台灣政治與軍事發展之重要史料。



新書評介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報業與政治：時報與清末改革的文化》). By Joan Judge (季家珍).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98pp.

二十餘年前德國社會學兼哲學家 Jürgen Habermas 提出“public sphere”的觀念，指陳西方歷史中，隨著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之發展，有一個「公共領域」出現，銜接於政府與人民大眾之間，是一個為人民大眾表達意見的結構。美國的中國學術界拾起 Habermas 的觀念，詢問中國在清末民初之際，有沒有這麼一個公共領域？有的論者說有，有的說沒有，掀起了一次相當熱烈的辯論。辯論的結果，贊成「有」的相當多數，而且拿出證據給說「沒有」的看。季家珍(Joan Judge)就是其中之一。她拿出來的證據相當堅強，而且很能說服人。她拿出來的證據是清末民初的一份報紙——《時報》(1904-1937)。

要介紹季家珍博士的著作並不十分容易。她選擇《時報》這個研究主題，知道的人很少，不容易引起讀者的興趣。這就有如我在三十年前介紹「立憲派」被人白眼一樣。三十年前提起立憲派，有人會嗤之以鼻，會帶著諷刺的口吻說：「啊，立憲派！那一批反動分子呀！他們是反革命的，有什麼值得研究的？」不料季家珍正巧就選擇了「反動派」的一個宣傳機關。知道立憲派的人已經夠少了，知道《時報》的更是少之又少。但是請不要先下結論。讀者如果有耐心看完季氏的著作，印象會大大改變。

為了使讀者容易深入季家珍的著作，在此有必要先將《時報》的背景稍作介紹。該報始於 1904 年，停刊於 1937 年，先後長達三十三年之久。這是清朝末年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了宣傳維新主張而在上海創辦的一份報紙。上海得風氣之先，現代性的報業最先在此出現。比《時報》較早的中文報紙如《申報》、《新聞報》等，另外還有西洋人辦的英文報紙，如 *North China Herald* 等。《時報》創刊，可謂遲遲而來。但該報在狄葆賢主持之下，辦得有聲有色。別家報紙以迎合上海的商業發展為目的，《時報》則著重政治性的維新鼓吹，其特色因此而突出，影響面甚為深遠。

季家珍將《時報》的內容分析當作文化史研究。文化的實踐與表現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研究者如何能得其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這是著者所堅持的一個原則。她指出：最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將辛亥革命看成了歷史的主流；萬流歸宗，辛亥之前所發生的一切都當作前奏 (prologue) 看待，(頁 3) 這是她所不取的。以《時報》作為例子，其所涉及的範圍超出了革命的意義。《時報》這一批新式的新聞從業人員所抓住的社會論域 (social discourses) 十分寬廣，他們做了深刻而有意義的詮釋和整合。他們有如中介者 (brokers)，討論一些人類理想的觀念 (high ideas)，將一些置諸四海皆準的政治理想引入中國，將西洋的知識與中國儒家思想相結合。他們是一群新式文化的耕耘者，同時也是政治活動者，他們不激進也不保守。落實到他們的實際工作，他們是報館的編輯，是政論家，是翻譯者，是小說家，是一般民眾的導師，是婦女解放的倡導者。利用報紙把他們的所思所見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傳播。季家珍謂這是一個新的領域，由於其中庸性質，中介地位，可以稱之為「中間領域」(Middle realm)，這是一個很有構思的理論框架。

全書分爲三編九章，每編三章，平均分配。第一編談「中間領域」的形成，也就是理論架構的說明。報章雜誌對社會變遷的影響，最近頗有不少研究成果問世。季家珍廣泛閱讀相關著作，引用社會科學的理論作為歷史學家的輔佐工具，本書的架構可以得窺一二。第二編三章論報人對「新民」的塑造。中國人如何從子民走向公民 (from subjects to citizens)，如何成爲一個國民 (common people)，報紙言論的鼓吹功不可沒。《時報》受梁啟超「新民說」的影響，在這一方面鼓吹不遺餘力。近年，史學家喜歡談中國「國民」觀念的升起與落實，季家珍有很好的交代。第三編談《時報》以言論督責清廷。《時報》人士說他們「非官、非紳、非民」，無以名之，自稱爲「第四階級」(fourth estate)。他們的言論令清廷痛恨，指爲「斯文敗類」。清廷愈是以出版法約束他們，他們愈要危言聳聽。在立憲運動中他們支持請願。清廷宣布鐵路國有，他們支持民間自辦鐵路。武昌起義之後，他們的言論不知不覺中同情革命。

我對於全書的研究方法、資料引用及論點，都感到滿意，雖然有一些小的缺點，在此不必提起。1973年我曾發表一篇短文：〈時報：維新派

宣傳機關之一〉，¹那時由於研究環境的限制，我的論文掛一漏萬，多有不稱意之處。季家珍說她是受了我的影響，²實是虛懷若谷。立憲派的言論引導中國人求新求變，貢獻良多，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研究。過去的史家多半以諷刺的態度對待立憲派人。直到今天季家珍的大著才為這一批穩健的知識分子講了公道話。我個人對她是由衷的感佩。

季家珍在結論中以 1910 年立憲派的請願與 1989 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相比較。很多人都不明瞭立憲派人請願的情況。他們爲了促成清廷早日召開國會，特去北京請願。經過三次遊行示威，終於逼使清廷將九年預備立憲縮短爲六年。上諭宣布之後，並命令立憲派人立即出京，不得繼續瀆請。比較 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民主示威，兩者有明顯不同之處；前者沒有發生流血，後者則遭到了坦克車的鎮壓。著者似有所感傷，將近一個世紀之久的中國民主運動，竟然倒退，更極權更專制了。滿清帝制時代尙能有所讓步，而自稱「人民政府」的中共政權，竟然沒有一點容忍的雅量。中國民主政治的旅程似乎還要走漫長的黑路，這是立憲派人所沒有預料到的，也是著者感傷的癥結所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朋園□

¹ 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民國 62 年 5 月），頁 151-175。

² 季家珍博士送給我一本她的大著，說：“In appreciation of your generous help and your own exemplary work on this subject.”（感激你的慷慨幫助，你的大著是本書的範例）

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張啓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4 年 11 月，366 頁。

在二十多年外蒙涉外關係研究之過程中，雖然我採用之史料，完全來自現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外蒙檔案，以及畢桂芳，陳籙諸當事人的一手史料；惟只根據原始史料，對外蒙涉外關係，作一詳細分析，始終提不出一個爲多數所認同的理論架構。當時日本有位國際知名的東洋史學者佐佐木揚先生爲了拙著《中俄外蒙交涉史始末》，特意在《東洋史刊》上發表書評，表示：「像我這樣以一位無緣涉獵該中國原始史料的學者來說，該書有高度之學術價值；惟能搜集如此龐大的史料，卻無法提出一理

論架構，實為美中不足也」。這確是真知灼見，也是我二十多年來研究過程中之隱痛也。後來張啓雄先生以〈國際秩序原理之爭端〉，獲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是繼王崧興兄後，從台灣去日本留學並獲該學位之屈指可數的留學生。他不但自創「中華世界帝國」概念，而且更提出一套「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理論，令人興奮不已。最近張啓雄先生又出版《外蒙主權歸屬交涉》，以「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作為分析之架構，頗獲學術界之肯定。全書分四章，在序論中先介紹其研究心得「中華世界秩序原理」。

作者先提出「中華世界帝國」的概念：「中華世界帝國」就是「華」加「夷」等於「王畿」加「屬藩」；即「中國」加「諸王國」等於「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換言之，「中華世界帝國」皇帝就是天子；天子基於天命爭天下，開創王朝，統治「中華世界帝國」，即統治天下。天子再依據華夷分治理念，在帝國內推行郡國並行制；在其直轄領域的中國王畿，設置郡縣，王畿之外，封為藩國，從而訂定天朝體制，明定上國與屬藩間之關係；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之關係。此種宗藩關係之所以能維持，作者首先提出「名分秩序論」。

「中華世界帝國」係採禮治主義，禮治首先要定名分，建秩序；定名首在正名，名既正可依名定分，依分求序；有序則一切可治。皇帝稱朕，命令稱詔敕，直轄領域稱中國，統治領域稱天下，首都稱京師，皇位繼承人稱太子，藩國不得僭越；其次是「奉正朔」，即恭引天朝皇帝所定記有年號之曆書，以示臣服之意。最後是「封貢體制」；冊封意指正式承認具統治領域與統治者為國為王，以此為前提，朝貢者始能正式納入「中華世界帝國」。原則上，皇帝頒授印信給受封的臣下；冊封之際，皇帝對藩屬國王，在頒詔敕的同時，也頒賜「鍍金銀印」；屬藩王位交替時，繼承者也繼承其印信；惟須以「中華世界帝國」皇帝之命令作為王爵襲封之基準。作者以「名分秩序論」、「奉正朔論」、「封貢體制論」，規範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作為當時「中華帝國」與屬藩間關係處理之原則。

第一章「俄國策動下的中蒙統獨紛爭」文中指出，外蒙獨立之起因，由於清末新政所引起之利害衝突。蒙古所以要求清廷不得在蒙古地方殖民、設官、駐軍的理由，因為漢人墾殖剝奪了蒙人的牧地；設官侵害了蒙古王公的權益，也破壞了蒙旗的封建體制；駐軍則強化了中蒙矛盾與中蒙人民間之危機意識；清廷實施殖民與墾荒之目的是為了對抗強俄的蒙疆侵略；而俄國在漢人眼中是侵略邊疆之大敵，但對蒙人言，正是抵抗漢人殖

民墾荒的盟友；利害衝突變成了族群對立，族群對立，引發了民族的認同，民族主義油然而生，自決運動因此而起。不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國家之獨立與從屬，不能以民族關係來立論，民國政府取代滿清統治中國，這種改朝換代對每個國家內部而言，應該是統治者或政體變更的問題，而不是歸屬變更的問題。民國成立，正期待與外蒙重新統一成爲一個新的整體時，外蒙卻宣佈獨立，將中蒙主屬關係全部否定，因此發生了外蒙脫離中國而獨立的統獨爭執。

第二章「中俄北京會議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北京會議，包括陸庫北京會議、孫庫北京會議，中俄聲明文件之協商。在談判的過程中，俄國爲了取得外蒙宗主國中國承認其在蒙既得利益，主動向中國表示，只要中國承諾由俄國調停中蒙統獨紛爭，俄國將只許外蒙之地位局限於自治，而不會承認其獨立。北京政府既感於國力之不振，又希望外蒙回歸中國，才允許俄國居間調停，於是中俄雙方先後在北京召開陸庫會議與孫庫會議，並簽訂了中俄「聲明文件」，決定了蒙案的處理原則，成爲日後中俄蒙三方於恰克圖會議之基本藍圖。北京會議以承認俄蒙商務條款，以換取俄國在聲明文件中「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宗主權」，在另一聲明中，「承認外蒙古土地爲中國領土之一部份」。

第三章「中俄蒙恰克圖會議的名分利權論爭與交涉」，在改制過程中，爭論最激烈者爲外蒙帝號年號國號與政府名義之存廢，以及外蒙利權的爭論，在召開三方會議之前，袁世凱曾召見議約專使，當面指示議約最高方針：一、承認聲明文件；二、取消獨立；三、取消共戴年號；四、取消帝號仍用「哲布尊丹巴」作爲開議條件。所謂承認聲明文件，實即規定外蒙在中國宗主權與領土權架構下，有實施自治之權。所謂取消獨立，即取消大蒙古國，解散其政府，回歸喀爾喀四盟各自分立的前清舊制；所謂取消共戴年號，即奉正朔，改用中國年號，以示臣服之意。這四項用來維持中蒙宗藩關係的奉正朔與正名的名分秩序，正是代表中國的國家目標；而外蒙也同樣重視「名分秩序」，與中國之立場正好衝突，因此，中國之開議條件，非有俄國的施壓，不易達成。在改制之過程中，中俄雙方同意在約內不得用「國」及「政府」字樣，並以「自治外蒙」、「自治官府」或「自治政府」取而代之。此項決議，正足以代表外蒙僅是中華民國領土主權下的自治地方而已，不具主權國家的資格。取消額真汗帝號，用汗王爵號，取消共戴年號，用民國正朔年曆，都充份表示外蒙的地位從屬於中國宗主

權之下。就是連活佛以宗教領袖兼任政治領袖之地位，在形式上還是須先獲得大總統之冊封才行。在恰克圖會議中，中國堅持，不用「三國會議」，而稱「三方會議」；稱「外蒙」而不稱「蒙古」，在在表示外蒙土地是中國完全領土之一部份，中國對外蒙擁有宗主權，外蒙是自治地方而不是自治國。這充份顯示，中國強調名分秩序的概念。再從外蒙尋求獨立所採取的方式而言，由四盟公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大蒙獨立國大皇帝，立共戴年號，不用民國正朔，建立獨立政府，與東方人的名分秩序不謀而同。至於俄國認為名分秩序是無關痛癢的問題，實際利益才是重要，完全顯示西方功利主義的政治文化，與我們受儒教思想影響之政治文化，背道而馳。因此，俄方才會在交涉過程中，指責中國專使在會議中，將重要的問題如華人在外蒙之地位，外蒙之領域界線，不予重視，而特別強調諸如國號、帝號、正朔年號等無關緊要的問題。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俄國所重視的是俄國在蒙既得利益之維護；而中國則採用捨實求名，不惜付出重大的國家利益，來換取宗主名分，正顯示當時非常重視封貢、奉正朔、名分秩序的概念。換言之，北京政府將構成「中華世界秩序」的理念，發揮無遺。

有關外蒙利權之論爭，主要包括鐵路郵電、駐節及其衛隊之數目，訴訟問題、稅則及界線問題。有關鐵路郵電，中國反對俄國與外蒙私訂「俄蒙鐵路電線條約」，而俄蒙認為此係屬於外蒙古工商之內政範圍，而中國堅持郵政為中國宗主權之一；雙方爭持不下，最後中國讓步，同意恰克圖、庫倫、張家口間之電線行經外蒙者，劃歸自治官府之完全產業，而中國在庫倫及蒙古恰克圖之郵政機構仍舊保存。有關駐節及其衛隊之數目，俄蒙認為外蒙既有自治權，自有能力維持其境內之秩序與治安，因此堅持中俄駐庫大員之護衛隊不得超過百名。而中國專使強調這不是治安問題，而是尊嚴問題，中國為宗主國，堅持俄國駐庫倫代表之衛隊，必須較外蒙宗主國駐庫倫大員之衛隊，少五十名。有關訴訟問題，中國專使站在外蒙為中國完全領土之一部份的立場，強調中國人在外蒙，係在本國領土境內，其與蒙古人間之訴訟，當由中國官吏來審理；至中俄兩國人民間之訴訟，應按 1858 年天津條約辦理。惟外蒙認為這與中國不干預自治外蒙內政的承諾相抵觸，主張在自治外蒙境內之中、俄、蒙間之訴訟，不論誰為原被告，均由蒙古官府各地方衙門會審辦理。雙方意見懸殊，無以磋商。北京政府鑒於時局艱困，不及早定議，恐失時機，即指令專使，如將現行蒙古律由大總統正式頒佈，並聲明此律僅適用於蒙古地方，則華蒙訴訟，華民亦一

律可用蒙律，以維持名義上之宗主關係。俄有實事，我有虛名，以示讓步。惟俄使仍不同意。俄國企圖更改天津條約，以備將來根據中俄蒙協約，擴展其在華之領事裁判權。中國專使鑒於當時列強在華均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更改天津條約，牽動各國會審條約甚巨，最後有關中俄訴訟，中國讓步，刪去「天津條約」，並同意審判權由原告或被害人一方之官員會審，而被告或加害一方之官員，有執行判決之義務。有關稅則問題，中國站在宗主國之優越地位，主張在蒙所享有之權利，不可少於俄國；同時主張外蒙沒有設關之權利。惟俄國認為外蒙既然自治，當然得徵收各項稅捐，中國亦在其列；而俄國與外蒙訂有專約，當然享有一律免稅權利。至於外蒙則以自治國姿態出現，主張中國人民在蒙古應繳納各項租稅。惟中國專使駁以自治權僅對蒙民行使，不適用於宗主國人民；磋商再三，最後由中國稅務處梁督辦與庫使面商，規定無論何種出產，照華商定納貨捐，但洋貨由蒙古入中國內地，須照光緒七年陸路通商條約所定之關稅定納；對俄貨入蒙一律免稅不提，獲俄國之同意，卒達成協議。至於界線問題，中國主張應以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為限；外蒙主張以前清理藩院蒙古則例內所裁邊界為限，承認將請願歸附蒙古之各地全行劃歸蒙古國管轄。而俄國支持外蒙主張，要求中國在達里崗崖、錫林郭勒、烏蘭察布各盟以及與外蒙交界之哲里木盟各蒙旗不殖民、不設法、不駐兵。中國專使即告以「會議問題凡牽涉內蒙古者，無權討論」，表示堅決拒絕。經再三磋商，最後俄國提出折衷草案：自治外蒙，以前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所屬轄境為限。後經中俄蒙三方無異議，外蒙界線遂行解決。

第四章「冊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難局與交涉」，根據中俄蒙協約第四條規定，「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名號受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中華民國年曆」，中國積極展開外蒙活佛冊封事宜。6月10日，中國外交部以冊封蒙古之事乃函請管轄機關蒙藏院承辦外蒙冊封事宜。6月12日，北京政府以電告方式行文外蒙自治官府，發布冊封哲佛的命令。7月10日大總統袁世凱命冊封專使徐紹楨、榮勳組成冊封使節團，備辦資品十四種，訂11月1日啟程前往外蒙首府庫倫，主持哲佛冊封大典。而外蒙一聽冊封專使即將到達，深恐「蒙古將恢復到昔日中國所管轄之行省地位」，而心存排斥，聯合俄國，阻撓中國冊封專使赴蒙。陳都護使籙抵達庫倫後，晤外蒙總理大臣三音諾顏，商議冊封專使來蒙冊封哲佛事宜，蒙方以冊封已於大總統發佈冊封命令時完成，毋須

再行冊封爲詞，三音也以「派使賚送印冊，約無明文」爲由，加以拒絕。中國政府認爲冊封是實施封爵儀式的一套過程，它始於命令的頒發，終於冊印之接受，命陳使再與外蒙商議。11月2日，外蒙官府答以「約文無金印金冊字樣」之外，並明白表示冊封專使親臨庫倫冊封之舉於約無據。同時並強調外蒙已於20日經自治官府電覆，並聲明甚爲欣幸，因此，認爲冊封哲佛之事，已於往復電文中完成。哲佛業經受封，自無庸再封，金印金冊礙難接受。分析其癥結之所在，實因北京政府曾照會俄國駐華公使庫朋斯基，表示中國不但要冊封哲佛，而且將來對外蒙各王公貴族之封號爵職暨各喇嘛之名號，也有所考慮。因此，引起俄國之猜忌，認爲中國擬乘冊封哲佛之機，對蒙擴張勢力。而俄駐蒙外交代表密勒，爲了轉化外蒙因恰克圖會議俄國背蒙失信所造成的不滿，不但極力阻撓中國冊封哲佛，且陰謀從中挑撥中蒙的宗藩關係，力勸外蒙乘袁世凱稱帝之機，脫離中國之宗主權，再次宣佈獨立。陳籛鑒於冊封哲佛的問題，是出在外蒙拒收印冊；而外蒙拒收印冊是出在俄人的阻撓，因此建議由劉大使鏡人逕與俄政府協商。惟俄方仍認爲派使冊封約無明文；同時更爲蒙人表明立場，認爲大總統冊封哲佛，僅需「電傳封號」即可；並建議改緩行期，由陳大員與蒙官直接交涉。再經三方分別會商，還是無法打開僵局。北京政府爲了取得俄國合作，以期早日完成冊封儀式，確保冊封外蒙的宗主權，乃令駐俄大使劉鏡人向俄政府解釋，說明派使冊封乃民國新訂體制，與前清舊制蒙古王公皆須來京受封者不同；遣使冊封比來京受封更爲尊崇，卒獲俄國諒解。在俄國不再阻撓下，外蒙自行提出折衷辦法，建議「不如由政府派人將印冊送庫倫，再由中國駐庫倫都護使，送交哲佛博克多祇領」。此種方式既無損中國方面之宗主權，亦符合名分觀念。至洪憲元年3月22日，袁世凱撤消帝制，廢止洪憲年號，仍以本年爲民國五年。3月下旬，中俄雙方對變通辦法均表同意，冊封之事，就此成議。

總而言之，本書之中心思想在強調「名分秩序」、「奉正朔」及「封貢體制」，乃規範中國的傳統秩序原理，雖民國初期亦不例外。分析言之，北京會議中國承認「俄蒙商務專條」以換取俄國在聲明文件中「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宗主權；放棄清末以來在蒙設官、駐兵、殖民的既得利益來換取俄國承認蒙古是中國領土主權一部份之承諾，並尊崇由此領土關係上所出生之中國歷來所有之種種權利，特別是俄國承認外蒙與中國之關係，是有向來之中央與地方之性質。俄國旨在爲己圖利，而中國總是強調名分秩

序，採取「捨實求名」之對策。

恰克圖三方正式會議凡四十八次，中俄私下談判亦不下四十次，歷時九月有餘。在談判中，有關宗藩關係，奉正朔與正名秩序條款，代表中國的國家目標，與同為東方，重視名分秩序之外蒙，雙方立場衝突。中國堅決要求外蒙放棄國號、帝號、年號及獨立政府名義，認同民國；而外蒙尋求獨立所採用之方式，如宣佈成立蒙古國，以額真汗帝號擁立哲布尊丹巴，立共戴年號，不再用民國正朔年曆，亦正合「名分秩序」之政治文化。在歷經九個月之談判中，中國堅持不用「三國會議」，而用「三方會議」，稱「外蒙」而不稱「蒙古」，強調中國對外蒙擁有宗主權。在駐節及其衛隊之交涉中，中國以承認外蒙之自治權及俄蒙商務專條為條件，換取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堅持俄國駐庫倫外交代表之衛隊，必須較外蒙宗主國之中國駐庫倫大臣之衛隊少五十名；中國強調，衛隊之數目，不是治安問題，而是尊嚴問題，基於宗主國之優越地位，中國並要求在各種慶典上中國駐庫大員應列於最高地位，必要時有獨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之權。有關鐵路郵政交涉，兩害從其輕，為了打開疆局，中國犧牲電線而換取保有郵政及台站之使用權。在訴訟問題之交涉中，中國所強調者，中國為外蒙之宗主國，中蒙間之訴訟當由中國官員來審理，後來為了避免罷議，自行讓步，如果現行蒙律由大總統正式頒佈，則華蒙訴訟，華民亦一律可用蒙律，犧牲實質權利以換取虛名，惟仍無法獲俄國之同意。在稅則問題交涉中，中國強調外蒙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同時站在中國為外蒙宗主國之優越地位，堅持內地商民得照舊享有免稅權利。並強調中國所享之權利不可少於俄國。稅則固然是外蒙之自治權，惟自治權僅能對蒙民行施，未經宗主國許可，不能使用於宗主國人民等理由，力圖爭回中國在外蒙之實質權益，惟中日交涉告急，不得不採取捨實求名之對策。

在冊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交涉中，中國以冊封形式作為繼承宗主權之手段，表示志在必得。而俄國深恐按舊制冊封，即授中國對外蒙主權之柄，對其擴張在蒙既得利益不利，公然排斥。後經中國解釋，獲俄國之諒解，以變通辦法，以新制代替舊制，卒獲三方之同意。

就整個交涉過程而言，俄國是實利之攫取者，中國是分名之戰勝者，外蒙雖重視名分，限於本身之國力，兩皆落空也。

在改制中，中蒙雙方之所以如此重視「名分秩序」、「奉正朔」，「封貢體制」這種理念，因為當時的西方國際法觀念尚稱稀薄，作者以「中華

世界秩序原理」，作為外蒙主權歸屬交涉之分析架構，至為適當。惟作者說：「中華世界秩序原理」萌生於在東京大學攻讀國際關係時，不知此種理念如何產生，是否從分析當時中國與鄰國間之涉外關係而發現？該項分析是否亦包括「中俄外蒙交涉」在內，如果該書以另一角度來撰述，以「外蒙主權歸屬交涉」之分析，歸納「中華世界秩序原理」，認為當時東方國家對國際關係處理之理念與行事準則，確以「名分」、「奉正朔」、「封貢體制」為依據，這樣可能更具有學術性。任何有系統、合邏輯之觀點，獲多數之認同，稱為學說。學說可能見仁見智，有不同的看法；惟學說經學術界普遍的認同，放之四海皆適用，始稱為原理，作者所提之「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只能說是中西文化未通前，東方國家對鄰國間關係處理所持有之理念與措施，可否稱為「原理」，有待再斟酌。作者將繼續不懈之研究與探索，不斷地予以體系化，希望「中華世界秩序原理」能與西方國際法前後相輝映，甚至於東風壓倒西風，用心可嘉，期待不免過當。西洋國際法以「主權對等」等功利觀念為基礎，而「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是以禮治主義為依規，受傳統儒教思想之影響，重名輕利；在目前重功利的國際關係中，「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殊難有發展之空間，更無東風壓倒西風之可能。本人研究中英西藏交涉之過程中，發現滿清政府以及民初北京政府對國際關係處理與對策，可說與「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所示不謀而同，中國所強調的就是「名分」、「奉正朔」、「封貢體制」。因此，建議作者今後將清季中國與其周邊國家間之關係，作個案的全面分析，以加強「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學理基礎。不過要注意的，當時所謂「國際」是指「中華世界帝國」而言，「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所稱示者，是指當時東方國家所持有之處理國際關係之理念，實無法與近代西洋國際法原理相較勁也。國內研究外蒙涉外關係者，都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蒙檔案」，以及陳籙、畢桂芳等當事人一手資料為主，很少採用外文資料，而作者採用很多「陳春華」所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以及「日本外交文書」，顯示一大特色，為該書大大增加學術價值。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呂秋文□

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蘇雲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5年8月，439頁。

一、前言

多年以來研究中國新式教育史的人極夥，但真正專注大學教育史者，已是並不多見，而將國內著名大學逐一有系統深入研究者，除蘇雲峰先生外，幾可說絕無其人。而在蘇先生所著各大學諸文之中，尤以此著成就最高。由蘇先生此著之中，可以使讀者深切了解一所國際知名的中國大學是如何成長的。由它的這種成長過程也可以使人省思，構成成功的大學教育其條件是什麼。為何與它同時興起的大學，竟然多得不到如清華的成功。這一些正是蘇著這本專書成功之處。

二、內容簡介

蘇著此書除前言及結論之外，計分為十章。在第一章中，蘇先生首先討論清華的設立及其發展的一般情況。對1905年時我駐美公使梁誠的見機興作，力促美政府歸還超收的庚子賠款，以之用之於教育，故方有清華學堂的創設，大加讚賞。此章中蘇先生確切釐清了一般誤解，美將全部庚款歸還用之興學。實際上美人所歸還的，不過是將其所應得的庚款較其在庚子事變中的損失款項多出的部分，歸還中國，用之於留美教育而已。但僅此數額，連同利息，即高達2,840餘萬美元，以之用於留美及其預備教育，使清華在創辦之初，即成立有豐厚的基金。此非其他學校所能及。

至於清華興辦的宗旨與發展，蘇氏在第一章中亦有清晰的探討。中美雙方在議定退還庚款的用途時，已規定中國以此款資送留美學生1,800名。而興辦清華學堂，則是作為留美的預備學堂。學制參照當時奏定的學堂章程及美國學制，亦即採引美制中學六年及初級學院二年，行八年一貫制。學習科目，雖資送留美學生以攻讀經濟實業等為主，甚至在1908年派遣留美學生章程中規定百分之八十學農、工、商、礦、科技，百分之二十習政治法律。而清華由於主持人認定：人文教育是基本教育，可幫助學生適應美國社會文化風俗習慣，故仍應極為注重。學生日後攻讀科目方

向，大體上符合規定所要求的。

清華最初稱為遊美肄業館，1909年9月28日開辦。次年方更名為清華學堂。因址設清華園而得名。民國以後則改名清華學校。初立學額為500名，實收468名。其中在北京考取者284名，各省咨送者184人。分中、高兩等。故其規模一開始即甚宏大。

1911年辛亥革命時，清華才上課一個多學期，即被迫停課五個月。故其在清末時期未發生大作用。民國元年5月重新開學。旋因二次革命，學校經費不足，僅留校延修班學生得以赴美。在校學生時僅388人。學校的發展似不順利。校長周詒春則力圖振作，提高清華學術程度，要求擴充學額，預備設立大學，並圖擺脫美人控制。旋因遭受劉文治等北京教育界人士攻擊去職。自此時起校內人事糾紛不斷，共換三位校長、三位代理校長，是清華發展上的低潮時期。當時一般人認為，清華是洋化最深的學校，蓋用洋文課本，洋教習，校內說洋文，一時間頗有異議。迨1922年曹雲祥出任校長，方再安定。1921年清華在學制上改為三三二制，中學三年，高等三年，初級大學二年。次年再改為四三一制，並停辦中等科。1925年中等科結束，開始辦大學及研究院國學門。三年後改為國立大學。清華在此時期進步快速，已由留美預備學堂完全轉變成中國的一流大學。

在第二章中，蘇先生討論清華的人事行政問題，首先說明在外交部管理清華時期較初歸教育部時人事穩定。當時外交部部長雖亦更動頻繁，但次長多由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擔任。此三人及部中高級官員多是留美人士，與美方合作良好。教育部當時不僅部長更調頻仍，且多為留日政治人物，與美方關係欠佳，時有衝突，學校政策及方針難於維持一定。1917年以後清華成立董事會，管理基金及學校經費。旋正式設立基金委員會，並由基金會設立董事會。董事初為六人全由外交部遴派，但每年改派三分之二。董事會職權在詳籌基金存放生息辦法，稽核學校經費用途，不得干預校務。一切學校用款在二百元以上者，均須報董事會核定轉報外交部。1920年以後，董事改為三人，其中一人為美駐華使館人員。董事可協同校長管理校務及遊美監督處事務。後董事陸續增為十八人，其職權似較過去為小。

蘇氏在清華人事問題中，特別討論清華與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關係。指出自顏惠慶時起，清華歷任主管多為聖約翰大學出身，可視為聖大校友主宰清華事務。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為諸人的互相援引，另一方面亦

因兩校均為說英語學校，皆重西方科技。

在學校行政組織及權力變革方面，氏分清華為兩大時期，是由職員治校時期發展成教授治校時期。創校之初，設有學堂監督，由遊美學務會辦兼任，下設有教務長、齋務長、庶務長治事。迨改為學校後，監督改為校長。值得注意的是，設有副校長一職，輔助校長治校。日後教務長下分設中西文部，唯因待遇不同，華員（多為中文部教職員）日後成立華員公會，爭取權益。1918年校長周詒春去職，校長權力因受制於董事及五四學生運動與校友返校任教影響，權力大為縮減，人事亦不安定。迨曹雲祥擔任校長，不斷發展至成立十人校務管理委員會，委員除校長及行政主管外，教員會議選出四名。後更演變成權力機構有二：一為教授會，由全校教授及行政部門主任組成，一為評議會，由校長、教務長及教授會互選評議員七人組成。由此可看出清華不僅是教授治校最早的學校，而且其形成的脈絡清晰可尋。

蘇先生在此章中，亦注意及清華職員及工役——特別是工役，人數過多的問題。1917年時學生600人，教員72人，職員46人，工役竟達120人，職員及工役人數是教員的2.31倍。故被攻擊用人浮濫。教員與學生的比例，1912年時是1:12，1927年遞減為1:1.66，情況頗有改善。但職員仍有68人，是教員的66.02%，所佔比例仍高。

在第三章中，蘇氏討論清華校長人選、貢獻及繼任風波。以為清華校長是更動頻繁的。自開辦至1928年，除代理者外，計換過九任校長。其中最長者為曹雲祥，任期五年十個月。次是周詒春，四年九個月。再次為唐國安，三年九個月。其他多五日京兆，有短至二個月者——溫應星。貢獻以任期最長之三人為巨。唐氏貢獻在為清華奠定良好基礎，周氏貢獻在提升學術水準，擴建校舍，使清華由留美預備學堂升格為大學。但氏為人詆詬為崇洋，實則卻極具愛國心。曹雲祥則有民主精神，開創教授治校先例。

在清華校長繼任風波問題上，蘇氏主要討論曹雲祥辭職後的人事糾紛。分析留英、留法與留美派，北方南開派、北大派與南方東南大學集團間的紛爭。最後竟因張作霖入主北京，校長一職竟落入其親信溫應星之手。

蘇著第四章是討論清華的經費、設備與校舍。在經費一項中，氏首先指出，在因內戰頻仍，國庫空虛，政府用於教育的經費極其微少情況下，各校常積欠教員薪水。清華則不受影響。1909-1914年間，每年收入在美

元 48 萬餘至 54 萬餘之間。1916-1931 年時，竟年收入為 79 萬美元，平均每月 6.5 萬餘美元。其收入除退還之庚款外，尚有捐款及房租等。但清華因積極擴充，一切採取美制標準，故經費仍不能充份得到滿足。時董事會控制預算甚嚴，規定每月的經費定額 2.9 萬美元（折合銀元 5.8 萬元）。希望年有結餘，至 1940 年退還庚款終止時，清華基金可積存至 1,000 萬美元以上。蘇先生根據數額分析，以為清華經費用於人事費上過高，佔總支出 41.4%，辦公雜支亦然。圖書儀器費不足，僅達學校所要求者 20%。然則此一情況，已使其他大學豔羨不已。

在設備與校舍項目中，蘇氏說明清華校地曾有兩次擴充，1914 年時計有 1,200 畝，甚為寬敞。建築，原有之清華園是中式建築，後增建西式及中西合璧式建築。1914-1920 年間完成西化四大建築，工程品質甚高，為美籍工程師麥譚所設計。工程分為兩批，先建圖書館及體育館，後建大禮堂及科學館。氏認為四大工程完成後，清華的智、德、體、群與科學教育之物質基礎奠定。至 1928 年時，清華共有房舍 31 棟，耗資 200 萬元以上。

在設備一項中，或由於蘇先生個人對圖館興趣濃厚，因之著墨之處詳細。稱是甚現代化之圖書館，可藏書 15 萬冊。圖書經費清華始終較其他學校充足。至 1928 年時，圖書館年經費有 6.6 萬餘元，次年更高達 11 萬餘元。藏書 1931 年時，計 18.5 萬冊，其中中文 14 萬冊，西文 4.5 萬冊，雜誌中文 60 種，西文 217 種，日報 56 種。氏以中文圖書遠超過西文圖書的數據，駁斥外間誤以為清華藏書西文多於中文之說。1924 年以後清華摘要介紹之中西文期刊計有 50 種之多。氏認為對清華圖書館貢獻最大者，則為戴超（首任館主任）、袁同禮（首任副館主任）及查修（制定中國現代圖書分類編目法）三人。

蘇著第五章討論中美師資素質及差別待遇問題。清華美籍教員以 1918 年時二十五人為最多。此後逐漸減少，至 1927 年時僅剩下九人。但師資素質則因擴升為大學而提高。最初多為學士或碩士，1922 年起，學歷為博士者即有四人。所授科目多為語文、西洋文學、歷史、及自然科學方面。教師的來源多是由青年會推薦。1924 年留美清華同學建議，清華設立大學部以後師資不應由青年會推薦，使清華的師資漸改為由自己所培養之留美校友或其他留歐學生擔任。美籍教師漸僅擔任西洋語文、文史、音樂方面課程。清華美籍師資程度雖不高，但教學極為熱忱認真，使清華學生基礎紮實。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美公理會牧師史密斯(Arthur H. Smith)

認為透過教育可擴張美國對中國的精神影響及商業利益。故日後清華校史編者評之為美國文化侵略。蘇先生並不支持此種看法，並舉不少教師對中國歷史及考古發生興趣，如 Malone 日後在美國大學教授中國文化藝術，成為東方學專家，加以反駁。

關於華籍教員，原概分為教授西文學科及中文學科者，兩者資格待遇均不相同。成立大學部後，華籍師資大增，1927年時為75人，遠多於美籍教師。西文部華籍教師來源，最初多係國內大學畢業生，1915年以後則多聘華籍留學歐美者，尤其清華早期留美者，如梅貽琦、劉大鈞等。使清華華籍師資以留學歸國校友居多數。

清華教員的待遇一開始即有中美的不同，日後華籍中又有土洋之別。1918年時美籍教員月薪幾是西文部華籍教員的三倍，至少亦是二倍以上。同等級中文部教員月薪少於西文部華籍教員百分之十以上。因而引起不平風波。此種待遇不同，亦表現在居住方面。美籍教員可免費住新式寬敞有現代化衛生設備的洋房。少數華籍人員如校長、副校長可得學校所贈之新式住宅。中國教員中僅有少數可分配到中式住宅，但有的尚須付租金。另外多須租賃民房，甚至有住茅屋者。因而造成中籍教員的不平。迨年輕的留美校友返校執教，則又發生少壯派與保守勢力的抗爭。此亦是造成清華人事糾紛不斷的一項重要原因。

蘇著第六章是討論課程問題。清華創辦之初，目的在使其留美學生直接插入美大學二、三年級，故課程設計重心在英文與直接用英文教授現代科學。因之用英文教授學科一律安排在上上午上課，中文科目則在下午。西文學科計算成績與學分，有必修選修之分。中文學科皆非必修，不計算學分。畢業成績以西文學科為準。故外間批評崇洋及重理科。實際上清華是文理並重的通才教育。1923年以前較偏重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與自然科學。1924年以後，為加強對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懷，中文課程有所增加。理科是應用與學術並重。後又增加工程技術課程。課程分為十類，每類有通修專修之別。通修屬概論性者，供低年級修讀；專修較專精，多在最後兩年開設。中等科需72學分，高等科68學分，即140學分方能畢業。1923年在張彭春主持下，改革課程，加重國學比例，西文部亦不再全用美國課本及教法為標準，必修第二外國語及修讀歐洲通史、機械、技藝等。其大學部課程特點在不注重分系及授學位。迨梅貽琦任教務長，大學部分為十七系，設有通識課程。規定大一必修中英文各六學分。大一或

大二必修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各一種。體育每年必修。學生上課時數，1921年以前，西文課每週不超過21小時。成績80分以上者，可多修一課。中文與體育課計有四門，故每週學生上課總時數在30小時以上。較當時美國高中為重。學生興趣據1924年調查，三年級生對英、理化、歐洲史較有興趣。國文則高居第五位。學校對成績要求嚴格，學生淘汰率極高，1922年時被開除者有12人。

蘇著第七章討論學生素質與社會背景。清華因是以美退還之庚款興辦，而庚款是各省均有攤付，故招生辦法是大部分由各省咨送，小部分公開招考。而各省咨送最初辦理不善，日後方趨嚴格。公開招考，初僅在北京一地，後擴及滬、武漢、廣州諸地。1925年大學部成立後，大學部純採公開招考辦法。以1911年為例，係採一至四場考試淘汰辦法。時第一試考科目三種，二至四試考十門，共考功課十三門。應考生第一試就500人中錄取150人，最後考取百名。亦即淘汰率高達五分之四。所收學生年齡在十五至十八歲之間，但十八歲佔絕大多數，十五歲僅一人。多數是中學畢業生，亦有少數高等學堂及大學畢業生。出身上海聖約翰大學及公私立中學與教會中學者佔60%。大學部1925年招生，名額150名，有21省籍996學生報名，僅取132人，錄取率為13.27%。後復增加熱河、蒙古及朝鮮考區，報名人數達978人，錄取率降為12.27%。大學部招生雖欲打破區域間的不平衡，但歷次錄取者，仍以沿江海省份為多。其中江蘇佔第一位，其次是直隸湖南浙江。上海聖約翰大學出身者，因該校不鼓勵，人數降為僅有一人。大多數錄取者來自教會學校。

清華如同他校，有所謂「特別生」及「自費生」。如民初時每年增加留美學額三名，給予袁世凱子弟。但仍必須通過考試，絕非外間所傳免試入學。入學後亦須遵守一切校規，不得享有特權。清華學生中有少數貴胄子弟，亦有教育部及使館等推薦之官費生。因有此項惡例，日後亦有權勢之家的自費生。1922年訂立招收自費生辦法，設立捐款總學額二百名。每年招收二十名，以能捐款二百萬元者為限。各省及團體或個人捐款國幣一萬元者，准其保送學生一名。仍須來校測試，及格後方得分班上課。程度較差者分入特別班。該班學生每名每年學費1,054元。

清華學生家庭背景無精確統計。有人認為是貴族學校，或官僚子弟學校，甚至視為是地主、官僚及資產階級學校。蘇氏則認為上述諸說，不夠真實。以為不論其家世如何，學生中藏龍臥虎，絕非紈袴平凡之輩。

蘇著八九兩章討論清華的校園生活。氏開章明義的說明：校園生活是代表一所學校的文化與學風，並由此亦可了解辦學的成功與否。清華在訓導管理上，是允許學生成立自治組織。要求學生自我約束。其自治組織由學生推舉級長、室長、值日生、社團代表、中等科科長及高等科代表組成。管理原則初採隔離主義，即中等與高等科完全分開。對中等科管理較嚴。1925年以後則一律採取較放任自由的態度。在早期學校不允許學生加入政黨，與聞國事。或充任校外報社採訪員。甚至對學生生活、體育、私人用款、寫家信、以及看小說均予管理。高等科學生有抽煙及進城的自由。外宿則須請假。五四運動發生時，清華因在郊外，及學校管理較嚴，學生因而未曾積極參加。但以後亦熱烈投入，更因而要求學校放鬆管理。學生思想亦呈現多元化，一時間成立五十多個社團。清華週刊亦改由學生主編。甚至校中發生學生毆打師長，趕走校長事件。一時間輟學學生人數甚多，學生精神渙散。1922年曹雲祥校長到任，有所整頓，加強師生間溝通，厘訂「四禁三處置」規程。即禁止早婚、私出校門、熄燈後燃燭談話、及中等科生在自修室喧擾。三處置是：派職員為中等科顧問、取締廚房除欠、家中匯款數目須告知校方，或直接存入學生儲蓄銀行，俾便稽查學生用度。1925年學校並請有影響力教授定期與學生舉行座談會，作德育指導。惟學生仍受時事影響，強烈參與政治動。1926年清華學生會幹部已與國民黨組織掛鉤，時北京學生最時髦之行爲，即是當革命黨黨員。國民黨左派最受學生歡迎。

作者分析清華學生生活有六種類型：（一）闊少型：重視生活享受，是快樂逍遙之享樂主義者，人數不多。（二）書蟲：雖然讀書目的有多種，但此型學生祇知讀書，生活範圍狹隘，精神似缺少些什麼。（三）敷衍型：抱得過且過心態，能享受即享受，滿口性與三角戀愛經。（四）活動家型：多是青年會會員，平日忙於宗教活動，或熱心平民教育，或專從事政治活動者。（五）編輯家、哲學家和文人：以拉稿、喜好文學與美及探討人生意義等為生活重心。（六）科學家：多沉靜好學，頭腦清晰，實事求是者。在校園生活中，蘇氏亦討論及清華的衛生、疾病、死亡、與社團活動。值得注意的是，清華雖衛生設備不錯，但仍然是疾病甚多。1921年以前，所發生疾病有93種，春天則傳染病如感冒、猩紅熱、角膜炎、肺病等流行。學生死亡率1911至1921年時最高為1920年，佔學生總數1.77%，最低為1918年之0.31%。死亡原因除疾病外，亦有用功過度者，但無自殺

之人。

清華社團宗教性者是以基督教青年會最活躍，此外尚有孔教會以及上社等。上社（取名於上進之意）是與二十（因成立於1920年故名爲二十）原爲讀書會性質。後上社轉變爲具宗教及社會服務性質社團。二十與清華科學會等相同，都是業緣性社團，二十會友全爲學經濟者。政治社團則有學生會、中山主義研究會及清談集等。清華學生會成立於五四運動後，不僅對校外政治運動時作響應，對內亦要求改革校政。曾趕走校長張煜全，不時爲學生爭取各種權力。中山主義研究會是親國民黨的組織，成立於1925年寒假。清談集是少數激動份子在激烈政治風氣影響下所成立的，主不談校事，交換知識，促進研究的具有若干清流意識的社團。此外清華亦有不少如今日學會性社團，除上述之清華科學社、二十等外，尚有農社，數學會等。

各種社團活動中，值得注意的，是校際間競賽，如1916年至1922年間清華、北大、高師、匯文、協和等舉行中英文辯論會等。此類活動一方面有互相觀摩互相較勁用心，一方面亦含有校際串聯作用。

蘇著第十章討論清華國學研究院。氏首先正名，認爲章名應稱之爲清華學校研究院。因當時清華無能力辦數理及社會學科研究所，而且1929年以前，學校公文亦僅稱研究院。吳宓在研究院開辦後，曾要求正名爲國學研究院未果。蘇氏章名用國學研究院顯是就其實質而言。

國學研究院是與大學部同時成立，與大學部、舊制留美預備部是三個獨立單位。在性質上除不教歐洲語文外，如同今日文學院。成立原因與五四時期胡適等主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時代潮流有關。當然亦受校長曹雲祥提升清華程度，以及糾正外人誤解清華忽視中國文化與國情知識等因素影響。創辦人爲清華出身留學哈佛兼通中西文化的吳宓。其制度規模略仿中國傳統的書院及英國大學制與道爾頓輔導制。與北大國學研究所不同。北大國學研究所是採絕對自由方式，無入學資格限制及入學考試，行導師制，自由研究，不按時上課，可通信研究，不需常川住宿，研究期限學生自訂。無專任教授，學生透過所主任請指導教授。清華制不然，在自由中略有限制。有入學試，師生須常川住院，教授有專任，學生研究有期限限制。一年完成論文，導師核准即可畢業。第二年起成績優異者，可續研究一二年，每年發給畢業證書。諸此均與北大不同，清華顯較嚴謹。其最大特長仍在能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籍，師生關係極爲密切。

國學研究院對入學考試甚為注重。投考資格不限於大專畢業生，其中亦有中學畢業及國學專修館者。考試科目因注重中西會通，除須選考經學、小學、中國上古史、儒家哲學、宋元明清學術史等外，有些科須考世界史或西洋哲學史、外國文。畢業生大多服務教育界。就師資言，是以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為主流，陣容堅強。所開課程尤以前三人為多，主要集中於中國的經史子集與文字學。而陳寅恪、趙元任、李濟所教授者較為新穎。學生更是一時之選。畢業論文多可視為甚專深之專著，與今日大學研究所之情境迥異。國學研究院師生集體活動有茶話會、參觀訪問等。其中以茶話會最重要，每月舉行一次，集全院師生於一堂，增進師生間人際關係。學術出版物，有叢書：多教授主編，國學論叢（季刊）：主要載老師研究成果，學生著作有價值者，經教授核定後亦可在其發表。學生主編的有實學月刊，水準似較北大為高。

國學研究院最後決定停辦，其原因蘇氏認為在：（一）清華組織章程中無辦設國學研究院之規定。（二）錢端升等堅決反對。（三）清華改組委員會中國學研究院無教授代表，故委員會所擬定的組織大綱草案中決定成立大學院（畢業院）時，國學研究院停辦。蘇氏對國學研究院的停辦殊為惋惜，以為是我國學術研究上一大損失。

在結論中，蘇先生討論清華教育的成功，並將其成功歸之於駐美公使梁誠的爭取美方歸還庚子賠款超收部分，用之於興辦留美教育。認為無梁誠則美方根本不會退回庚款超收部分；無梁誠不顧個人的政治前途，違背袁世凱旨意，堅持用於派遣留學生及廣設學堂方面，此款或將挪作他用。故梁誠是建立清華的第一功臣。蘇氏也承認梁誠的作為是基於其根本認識：教育是中國現代化的動力，學習美國則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氏並分析美方的目的，雖與梁誠看法相同。但根本上則在培養親美勢力與增強在商業及政治上影響力，其動機並不十分純正。

蘇氏同意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的看法：一流大學需有好的師資設備與一流學生，以及教授治校，學風自由注重學術。清華則正具有此一特色。氏將清華建立良好的傳統歸功於兩位校長，一是前期的周詒春，氏之貢獻在建構優美環境與完善設備，建立健全的課外活動風氣。另一則是後期的曹雲祥。氏之貢獻在改組董事會，加強基金管理，大量延聘校友返校任教，實施教授治校，建立自由注重學術的校風。

結論中蘇氏曾詳細討論清華學生在美讀書的表現以及歸國後在各界

服務的情況與貢獻。大多數均是極為傑出，而且是領導階層中的秀異份子。就在美讀書情況言，在已知資料 969 人中，取得博士學位者，佔 19%，碩士 45%，兩者合計已佔 64%，居大多數。學士佔 25%。未得學位者僅 8%。至於歸國後服務情況，在已知 800 人中，教育界者佔 38%，醫、法、社會事業者，20%，工程界者，13%，商業者 8%，銀行界者 6%，以及清華校友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居於各界領導人物的情況說明清華辦學的成功。

三、蘇著的優點與美中不足之處

蘇著之所以被認是一本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個人以為其得到成功之處，首先是所用資料極其豐富。根據其徵引書目可知：計有中文檔案文書 28 種、清華出版物 24 種、清華師生傳記回憶錄和著作 37 種、專書論文 33 種、期刊雜誌 7 種，英文資料 24 種，僅此已達 153 種。另有關國學研究院者，計 25 種，共有 178 種。看似並不十分突出，但實際上並不然。蓋有關清華資料，現存者原已不多，而且零散，故氏所使用幾可說已達完美地步。其中最為可貴的，則是引用甚多未刊檔案，如中研院近代史所所藏之未刊外交檔案及教育部所有未刊的學部檔案，均是極為珍貴，而且過去殊少有人精密使用過的。蘇先生積其窮年累月之功，苦讀檔案，方能使其著作有精細的分析與研討。所可惜的是南京第二檔案館的資料應用不多，祇有已刊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報告二種。南京第二檔案館所藏民國時代檔案極豐，如果教育部所遺留在大陸的檔案亦收藏於該館，則必仍有未刊的有關清華檔案。可惜由於種種限制，蘇先生並未能多用些大陸未刊的有關清華資料。這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

蘇著另一項值得稱讚之處，是全書佈局恢弘，幾乎於清華基金的來源、學校籌設，以及成立後行政、課程、師資、設備、學生生活、校園風氣，人事糾紛各方面均有所討論。可以說是一本最為完整的大學史，如將之與當前台灣各大學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史相較，寫得確是完整，而且行文活潑生動，時刻提出個人的看法，褒貶客觀中肯。不似當前一般大學的校史刻板呆滯，缺少可讀性。

當然任何一本活潑生動，時刻提出個人看法的史著，勢必會有略嫌主

觀的成份。蘇著自亦難免。全書之中洋溢著一種對清華讚美稱道的氣氛。蘇先生對清華雖亦有若干批評，或指出其缺點，但其所予人的印象明顯是：清華是中國大學中的楷模意味。史著客觀論述雖是一種理想，但絕對客觀勢亦有所不可能。我們絕對承認清華是一所辦得成功的學校，唯以清華所具有的各项條件而言，是不是還可以更好，仍是一件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事。

在各章之中，個人覺得寫得最好的，是第四章第四節與第六、八、九、十諸章。也許由於蘇先生本人負責過圖書館，對圖書館的問題既有興趣，又有心得，何況圖書館在大學及學術研究上極為重要，因而此節寫的非常突出。不僅對清華圖書館有貢獻的戴超、袁同禮及查修有相當的介紹，而且對圖書館內的組織與一般職員均表列說明。至於圖書統計、藏書、出納統計更不用提。這是寫大學教育史所甚少見的。由於我們不知道其他大學圖書館的詳細情況，因之無法比較其是否清華居於第一位。祇能說清華的圖書館因戴超、袁同禮以及查修等的努力，是一流的。至於在此節中蘇先生言及清華中文藏書中有國民黨的刊物和馬克斯經濟學說與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十四種以上，書庫因採開架式的，學生可自由取閱，不受任何限制，而南開明列三民主義為禁書，就認定清華在學術上較他校具有自由與寬容，似乎亦嫌過譽清華。如就此一標準言，是否北大更比清華自由開放？

至於第六章蘇先生由清華的課程設計、內容、改革直敘及考核方法與學生課業負擔及興趣。寫得非常細膩，或由於資料充足的關係，學生修讀的課程及授課的教授均曾表列，實在是極其充實而遠勝於其他大學史的。由此可以看出蘇先生研究深入與用心，確是一位治學認真的學人。

其第八、九兩章是討論學生的校園生活，為全書中寫作精采的極峰，一般寫作大學史的，往往忽略學生課餘的活動，蘇先生則否。氏以生動的筆法描述清華最初訓導之嚴，以及因五四運動的影響，由嚴而弛，甚至毆打齋務長（訓導長），趕走校長張煜全。迨曹雲祥出任校長，先成立調查委員會，增進師生間溝通，以教員兼任學生顧問，使學生由過份的任意自由，而復納入正軌的整個過程記敘生動。令人讀後一切歷歷在目。確是真切的介紹了清華校園生活。而且字裏行間使讀者看到了五四運動影響的另一個面。

第十章國學研究院蘇先生的長處，在將其特徵寫得非常清楚。對入學考試、師資、課程及學生的研究範圍，亦均有詳細的介紹。使我們了解，它確在謀將新學與傳統中國的書院制度相結合。但其制度究竟與我國傳統

的書院有很大差異性，惜蘇先生於此著墨之處不多。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國學研究院學生與政治的關係，蘇著中雖言及有學生參加國共兩黨，也參加學生會組織，但缺少更清楚的說明，這些人的政治活動的內容，甚至後來他們在政黨中的情形，俾了解他們是先為職業學生而後考入國學研究院，或進入國學研究院後才參加政治活動的，進而因此乃從黨從政，成為職業的政治人物。

蘇先生第十章的架構，大體上與前二至九章相同。個人倒覺得，這一章應特別著重學生離校後的學術成就。祇有在畢業生進入社會後從事學術工作，研究成果卓著時，才能稱為研究院的教育成功。

全書在結構上另一項個人並不十分贊同的，即是蘇先生將清華學生畢業後的成就置之於結論中討論，其實如能闢為專章，則更理想。蓋專章的好處是較為突出醒目。誠如前面所言的，一個大學辦的是否成功，校友傑出與否，在那一方面傑出，是一項重要的表徵。單獨成章才能顯現出其重要性。由蘇著結論中所言，我們可以看出清華校友確很傑出，而且其傑出多表現在學術或精深的專業方面，故清華確是一所注重學術，而且辦得很成功的學校。

四、結 論

寫一本很成功的學術著作是極其困難的。而將清華由學堂到大學，這樣一個長期演進甚為複雜的學校介紹很清楚，並能分析其成敗之因，更是難上加難。但是蘇先生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理想，充份證明蘇著確實是一本可讀性甚高，甚具學術價值的專書。

由蘇著的清華至 1929 年時的成長史來看，一所辦得很成功的學校，是要經過長年累月的不懈努力的。就學校本身事務言，人事、經費、設備、師資、學生諸方面，均要相當完善，才能使其校務突飛猛晉。如更進一步研討，在上述諸務之中，則以人的問題最重要。所謂人的問題即包括行政人員、師資與學生三方面。清華在師資及學生方面選擇有其水準，但行政似並不良好。職員治校，校長人選的不良，是造成其動盪不安的主要原因。幸而有兩位好校長，即前期的周詒春，與後期曹雲祥，方能使清華得到好的成功。這種情況不僅見之於清華，實即各地學校均有類似情況，祇是清華較為特殊的，是其無經費困絀的問題。台灣當年所謂的名校，如台北一

女中、新竹中學及高雄中學等，又何嘗不是如此。由於得有久任的好校長，經長時期的努力，而辦學甚為成功，學校聲譽斐著。故久任的好校長是所謂人的問題第一要件，無久任的好校長，則師資與學生的素質難於提高，經費雖再充足，設備雖再良好，也是枉然。今日國內大學校園民主，教授治校的境界是達到了，校院所系負責人均由選舉產生。但學校的行政，學術的情況，非僅缺少改善，而且有江河日下之勢。顯然所謂的校園民主，教授治校的制度，仍有應予檢討改進之處。清華在這方面的成功仍在於有一位不是由選舉而產生的好校長曹雲祥，其院所系負責人似亦非選舉產生，故清華的教授治校與今日所行的似仍有不同。

此外由清華的事例，亦可看出，中國的機構常會發生人事糾紛。人事糾紛使清華多年停滯不進。幸而清華出現了好校長又得長期久任，方能脫離這種困境。人事糾紛與教授治校校園民主間雖然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是卻有時是糾纏不清的。清華在曹雲祥離職後的派系之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們僅盼蘇先生能對此一問題做些研究，並予討論這種派系的人事糾紛，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還是中國文化中所特有的產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國祁□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謄寫，電腦打字稿並附磁片尤受歡迎。
-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7)來稿請寄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7.2-1998.3)

公小穎輯*

1997.2.11 義大利那波里東方大學(Napoli)主辦之「馬國賢：十八世紀天主教在中國的傳道和在那波里的『中國學院』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Matteo Ripa: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18th Century) and the "Collegio De' Cinesi" of Naples)」，邀請來自中國、義大利、荷蘭及歐洲各地學者參加，會期二天(至12日)，共宣讀論文十四篇。

3.12 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第四十九屆年會在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市 Sheraton Hotel 舉行，會期五天(至16日)，共有來自美、日、韓、加、台灣、大陸、香港等地學者二千七百多人與會。

5.29 第三屆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召開，本屆年會主題為“Mapping the Terrain of Taiwan Studies”(繪製台灣研究的版圖)，會期四天(至6月1日)，共宣讀論文四十五篇。

8.26 中國社會史學會舉辦的「海峽兩岸中國族譜學學術討論會」於揚州市舉行，會期四天(至29日)。

9.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六年度第一次學術講論會，由研究員劉錚雲先生主講：〈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資料檢討——史語所藏《乾隆六十四年分四川通省民數冊》的幾點觀察〉。

9.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張壽安女士演講：〈孫星衍原性說及其在清代思想史上的意義〉。

10.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陳慈玉女士主講：〈撫順煤礦工人，1907-1931〉。

10.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吳素樂女士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演講：“Historicism, ‘New History’, Taiwan Consciousness: Some Remarks on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Taiwan”。

10.16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福清(B. Riftin)先生演講：〈俄國收藏的台灣資料與台灣研究〉。

10.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陳三井先生主講：〈知識份子與抗戰變局〉。

10.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組「禮教與情慾：近代早期中國文化的後／現代性」主題研究計畫，邀請政治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汪榮祖先生演講：〈清帝的樂園與失樂園：圓明園情慾世界探索〉。

1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黃仁宇教授演講：〈出入故紙堆中五十年〉。

11.6 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舉辦“Conference on Cultural China and Taiwanese Consciousness”，會期四天（至 9 日），會議中宣讀以下論文：Huang Chun-chieh（黃俊傑，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Historical Vicissitudes of the Taiwanese Nostalgia for Cultural China (1895-1950)”；Lin Man-houng（林滿紅，Academia Sinica），“Equal Wealth with Status Differentiation: A Crucial Concep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Realization in Taiwan’s Historical Process”；Liao Ping-hui（廖炳惠，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Post-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cademic Sinica), “An Anatomy of the Chinese Triangle: The Dynamics of the Economic Centripetal and Political Centrifugal Forces”；Henry Rosemont (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 “Which Rights? Prolegomena to A Confucian Critique of the Western Liberal Tradition”；Sung-sheng Yvonne Chang(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Beyond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Current Re-evaluation of the *Kominka* Literature from Taiwan’s Japanese Period”；Thomas Go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aiwan Society at the Fin de Siècle”；Ching-yi Cyrus Ch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ationality in the Taiwan-China Relationship”；Steven Harrell(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s China a Nation? The View from Three Peripheries”；Harry Hsin-yi Hsiao (University of Victoria), “Multiple Political Identities with One Cultural China”；Huang Huang-hsiung (Visiting scholar of Fairbank Center), “Cultural China and Taiwan Consciousness: A Retrospect”；

Robert Weller (Boston University), “Religion and New Taiwanese Identities: Some First Thoughts”; Steven Sangren (Cornell University), “Anthropology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 The Relevance of Local Religion”。會議由杜維明教授主持，討論人有哈佛大學的 Ezra Vogel、William Kirby、Leo Lee（李歐梵）及哈佛燕京社訪問學人、清華大學的張維安等。

11.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張瑞德先生主講：〈紀念與政治：台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

11.15 第四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假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召開，會期二天（至 16 日），共七十九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三十三篇。（詳見本期「學術會議」報導）

11.15 由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舉辦「第一屆東亞學術國際研討會」，有來自中、日、韓等國的學者與會，會期三天（至 17 日）。

11.18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行研討會，邀請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戴寶村先生及師大歷史所碩士劉慧真女士演講：〈大台北地區客家史研究〉。

11.19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行座談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王俊義教授演講：〈清代思想研究的回顧〉。

11.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午后沙龍開講，由所長杜正勝先生主講：〈《番社采風圖》題解——平埔族歷史初期的社會與文化〉。

11.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楊久誼女士演講：〈清代鹽專賣制之輪廓〉。

11.26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汪榮祖先生演講：〈中國史學及其近代發展〉。

12.3 由香港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於香港大學聯合舉辦「香港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包括：1.一百五十餘年來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諸方面的歷史發展、2.中英關係與香港、3.中國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會期三天（至 5 日），有來自香港、大陸、澳洲、英國、加拿大、埃及、日本、澳門、台灣和美國等地學者與會。

1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演講會，由研究員王爾敏先生演講：〈師友風誼，道術因緣〉。

12.5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二樓第一會議室，舉辦第六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

12.6 「抗戰前十年國民政府之研究(1928-1937)」學術研討會假政治大學行政大樓舉行一天，茲將論文發表人與題目臚列於後：閻沁恆：〈北伐後中、英廢除不平等條約交涉及日本侵華初期英國的反應〉、周惠民：〈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1930-1934)〉、毛知礪：〈試探抗戰前十年的《銀行週報》與《錢業月報》〉、吳圳義：〈抗戰前十年國民政府之國內宣傳(1928-1937)〉、王壽南：〈抗戰前十年的出版法規〉、林能士：〈抗戰前國民政府與地方實力派之關係——以貴州為例〉、胡春惠：〈抗戰前國民政府之訓政與憲政之爭〉。

12.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般近代史組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湯志鈞先生演講：〈晚清文化思想對政治的影響(1898-1911)〉。

12.14 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六十週年，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與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舉行紀念「南京大屠殺」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會期一天，共發表論文十篇。

12.1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第七次學術講論會，由副研究員何漢威先生主講：〈《李星沅日記》中所見道光朝後期的政治社會〉。

12.1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行座談會，邀請挪威奧斯陸大學中文系艾浩德教授演講：〈挪威漢學研究概況〉。

12.1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銘傳大學國貿系助理教授林瓊華先生講演：〈台灣原住民土地產權之演變(1624-1945)〉。

12.16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高承恕先生演講：〈從歷史的觀點再思考台灣中小企業的意義〉。

12.18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劉序楓先生主講：〈明末清初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的形成〉。

12.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理員藍旭男先生主講：〈中國對波茨坦宣言(1945.7.26)的反應〉。

12.18 國史館為慶祝建館五十週年暨在台復館四十週年所主辦的「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假國家圖書館舉行，會期三天（至 20 日），計有來自五十餘個學術單位二百多位學者專家與會，發表論文六十五篇。（詳見《漢學研究通訊》第六十五期）

12.19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假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舉行二天（至 20 日），共宣讀論文十篇。

12.21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主辦「檔

案利用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假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第一會議室舉行，會中宣讀的論文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有關者為：賴惠敏：〈乾隆朝內務府的當舖與發商生息〉、劉錚雲：〈從物價看清代庶民社會生活〉、莊吉發：〈故宮檔案與清代社會史研究〉、張憲文：〈民國歷史檔案的研究與利用〉、洪麗完：〈日治時期之戶籍舊簿與平埔研究：沙轆社之例〉、朱德蘭：〈日治時期有關台灣的防制犯罪檔案與犯罪事例〉、廣瀨順皓：〈日本近代史研究と公文書公開狀況〉。

12.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邀請國立交通大學共同科教授顧燕翎女士演講：〈同或異，分或合？——婦運與婦研的挑戰與思考〉。

12.27 「近代中外關係研讀會」舉行本學年度第四、五次研討會，主講人及講題分別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力先生：〈二次世界大戰後英美兩國對中國海軍的影響〉及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黃金麟先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

1998.1.3 由財團法人逸仙文教基金會與國父紀念館合辦「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於國父紀念館舉行。會議以 1.孫中山與中國革命、2.孫中山的救國主張與思想內涵、3.孫學的時代意義及其影響等三大主題，探尋孫中山先生的全貌，會期三天（至 5 日），共發表論文三十九篇。

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午餐會，由研究員許雪姬女士主講：〈廈門大學台灣史研究概況簡介〉。

1.13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假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舉行「紀念蔣經國先生逝世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茲將發表人姓名與論文臚列於下：張瑞成：〈蔣經國先生在贛南——政治生涯的起點〉、胡國台：〈蔣經國先生與青年軍〉、王良卿：「新人」與「起家」——蔣經國先生的崛起與三民主義青年團〉、陳立文：〈蔣經國先生與東北戰後交涉〉、張力：〈蔣經國先生與冷戰前期的中美關係〉、施俊文：〈蔣經國先生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喬寶泰：〈蔣經國先生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工作〉、朱重聖：〈由國史館現藏幾件珍貴史料看經國先生〉、鄭梓：〈追尋六〇年代「蔣經國先生的政治改革」——以新聞報導下「用人政策」為主軸的思考〉。

2.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葉其忠先生演講：〈1923 年「科玄論戰」前張君勳對歐戰四個看法之嬗變〉。

2.23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台灣資本主義研究討論

會，由兼任研究員王世慶先生主講：〈台灣拓殖會社之研究成果與課題〉

2.24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吳文星先生演講：〈東京帝國大學與台灣殖民地之經營——以學術調查研究為中心〉。

2.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邀請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王芝芝女士演講：〈娜塔莉戴維士(Natalie Zemon Davis)：一位女性歷史從業者的故事〉。

3.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戰爭與社會研究群午餐座談會，邀請北海道大學助教授松浦正孝先生演講：〈走向戰爭——戰前日本的財經界與政治〉、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葛凱(Karl Gerth)先生演講：〈近代中國的戰爭論述與國貨運動〉。

3.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張秋雯女士主講：〈清季鹿傳霖力主收回贍對始末〉。

3.9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台灣資本主義研究討論會，邀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蔡采秀女士演講：〈日治時期基隆石炭業〉。

3.14 台灣歷史學會主辦「民族問題學術研討會」，會議歷時一天，會中宣讀論文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有關者為：王俊中：〈蒙藏二度的政教合作：五世達賴之噶丹頗章政權在西藏的建立〉、方弘仁：〈明弘治朝西北少數民族政策〉、瓦歷斯·諾幹：〈皇民化教育下的族群意識轉向——以《理蕃の友》台灣原住民族先覺者為例〉、王雅萍：〈原住民家族史研究：以賽夏族二個家族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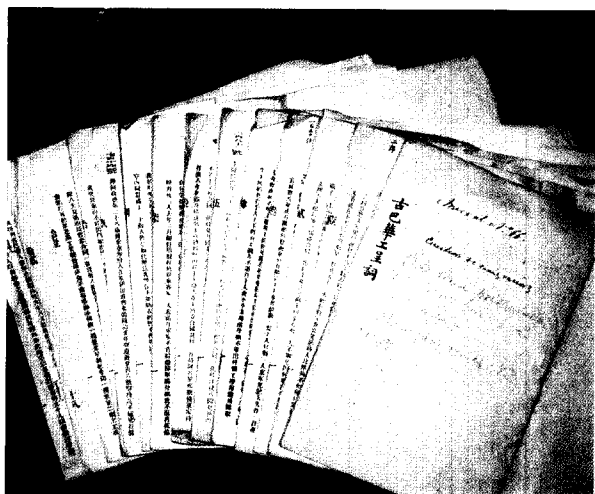
3.17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日本近畿大學助教授近藤正己先生演講：〈從昭和戰爭期間的公文類纂來看台灣總督府〉。

3.19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美國 Iowa 州立大學人類學系主辦中國文化面貌新探國際研討會，會期三天（至 21 日），研討主題為 1.中央與地方關係、2.近代政治與經濟發展、3.文化與族群關係、4.台灣與中國。

3.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座談會，邀請《印尼華人經濟》作者、外交部專門委員，新任駐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江宗仁先生主講：〈蘇哈托總統執政以來印尼華人的處境——從經濟觀點評析〉。

▶ 日本中國近代史研究大家狹間直樹教授。

▼ 孫廣德教授（右）與夫人台大園藝系李岍教授（左）合影。



▲ 西班牙外交部所藏清朝官員訪問古巴記錄：《古巴華工呈詞》十二冊。

◀ 巴斯蒂夫人是以「中國中心觀」考察中國近代史的法國史學名家。

本期要目

嚴復研究的新趨向：

記近年來三次有關嚴復的研討會

第四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現代教育家雷沛鴻教育思想討論會綜述

第二屆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會議紀要

師友風誼，道術因緣——退休講演

教學與研究生涯四十年

學人簡介——王爾敏、孫廣德、狹間直樹、巴斯蒂

牛津大學的中國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中英庚款會檔案簡介

西班牙外交部總檔案館

及其所藏有關中國史料簡介

新書評介三本

